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孙中山全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艰难曲折而又宏伟壮丽的事业中，孙中山先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战斗的革命的一生。一个世纪以前，在黑暗的旧中国，在近代社会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从一个具有朴素爱国主义热情的青少年成长为一位坚定执著的革命者，并由此登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舞台。作为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他以政治家卓越的组织才能，倡导建立并壮大了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和中国国民党；他以百折不挠的大无畏气概，策划并指挥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中华民国。此后，为保卫共和制度，他又带领人民进行了维护统一、反对封建军阀割据的长期不懈的斗争。晚年，在新世纪曙光——苏联十月革命的映照下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通过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不断追求真理，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实行了国共合作，从而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进程。

孙中山先生漫长的革命生涯，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脉搏以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程紧紧相连，他始终不渝地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坚定不移地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百折不挠地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一生的光辉经历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实，因此，要了解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就必须了解孙中山曲折奋斗和辉煌壮丽的一生。

不仅如此，与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运动的战斗生活相映衬的是，他在颠沛流离、艰苦备尝的个人生活中，在与人民群众、国内外友人和广大爱国侨胞的接触交往中，在处理家庭和亲友的复杂关系中，还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这些方面体现出来的高贵品质和高尚情操，对即将迈入 21 世纪的中国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大有裨益的。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为缅怀孙中山先生的光辉业绩，我们编写了《孙中山全传》一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藉此对读者特别是对不大了解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青少年读者进行革命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进一步激发振兴中华的热情，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青春。

基于上述目的，本书在忠实于史实的前提下，对孙中山一生具有传奇色彩的丰富经历，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军事活动、日常生活细节，涉及他的术业、婚姻、家庭、嗜好、性格、交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适当的材料取舍，以时间发展为线索，以具体事件为主要内容，安排了八十多个历史故事。每个故事都可独立成篇，故事与故事之间也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全书内容注重文学性，力图以生动的笔调，从不同侧面和具体细节的描写中，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给读者展现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血肉丰满的形象。

作者

1996 年 1 月

孙中山全传

第一章 家世渊源

动荡中诞生

历史的巨轮在所有人的感觉和目光里，大气磅礴地驶入了 19 世纪。

整个世界一片躁动。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亦日趋尖锐。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斗争。

1831 年至 1834 年，法国发生了里昂工人起义；

1836 年，英国爆发了声势浩大、动员广泛的宪章运动，并且持续了十二年之久；

1844 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掀起反抗运动；

1833 年到 1837 年，在短短的五年里，美国先后爆发了一百七十余次全国范围的罢工斗争；

这一系列的斗争，深深震撼和打击了西方资产阶级。他们为了摆脱自己的危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把欺凌与剥削的魔爪，伸向了中国大地。

1840 年，英国政府以中国禁烟为借口，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一年的 6 月，英军进攻广州，掀开侵华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但是，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更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致使清军在广东、江浙等几个战场连遭失利。1842 年 8 月，英国军舰驶入南京江面，惊“惶失措的清王朝立即屈膝投降，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包括割地、赔款在内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至此，历时两年余的鸦片战争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结束。封闭的中国被侵略者用洋枪洋炮打开了大门，从此失去了宁静与平衡。紧步着英国的后尘，法、美、俄等侵略者相继进入中国境内。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泱泱封建大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可是侵略者们并不满足。为了谋取在华的更大利益，英军伙同法军于 1856 年在美俄的支持下，又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延续了四年之久，侵略者的铁蹄从南到北，在中国的大地上肆意践踏，迫使清王朝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半殖民地化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进一步加深了。

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软弱无能、卑躬屈膝的清王朝，对待自己的臣民却是一副凶残嘴脸。他们变本加厉地压榨、剥削人民，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陷入了更加困苦的境地。

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相继爆发了一场又一场反对清王朝黑暗统治和抗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起义和斗争。

1851 年，洪秀全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部队称为太平军。旋即打出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一举打到江苏省会南京，遂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其进军速度之迅猛，声势之浩大，令人民欢欣鼓舞，令清王朝胆颤心惊。

1853 年 9 月，小刀会首领刘丽川等在上海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以响应太平天国革命。

与此同时，各地捻党从秘密的反清团体，公开建成一支反清军队，攻城

陷阵，转战于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直隶（今河北）各省，成为太平军在北方的一支强大友军。

1862年5月，陕西渭南地区的回族人民，不甘忍受压迫，揭竿奋起反抗，迅速占领了临潼、华州等十州县。不久，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回民纷纷响应，在西北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

一时间，广袤的土地上，到处燃起了起义的烈火，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狠煞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纵横十八个行省，写下了近代农民战争最壮丽的诗篇。

1864年，清王朝调集大批军队，并勾结外国入侵势力，向太平天国发起大举进攻。7月，长期被困的天京不幸失陷，不久各地太平军也相继覆灭。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共同围剿中，终于失败了。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了。但是，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并没有泯灭。驰骋于北方的捻军，活跃于西北的回民义士，仍不时给统治者以打击。更多的中国人，则以他们特有的沉默与等待的方式，在慢慢地积聚力量，默默地锻造精神，痛苦地孕育着一种新的觉醒，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

然而无论如何，这时的中国，进入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在遭受了外国侵略者的欺凌之后，封建统治显得更为腐朽不堪，整个社会显得更为动荡不安，广大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困苦艰辛。

就是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中西各种势力大撞击的动荡年代，在一个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贫穷艰难、世代务农的家庭里，一个伟人诞生了。

公元1866年11月12日，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广东省香山县一带下起了大雨，刮起了大风。夜晚，雨仍然没有停息，渐渐沥沥地敲打在瓦片上，发出连续不断的烦人心绪的声响。深秋之夜的狂风，夹杂着雨水，一阵紧似一阵地袭来，给人以丝丝寒意。

夜深了，翠亨村的人们早已入睡。唯有一户姓孙的人家的破旧的窗格里仍透出一缕昏暗的灯光。房间里，一个中年男子，不停地来回走动，一副坐卧不安的神情；帘子后面传来一阵阵呻吟与喊叫，那是他妻子临产的征兆，是女人忍受分娩剧痛时的自然抒发。可是这呻吟这呼喊，却使得做父亲的更为焦急难耐了：怎么这样久？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时间像凝固了一般，令人窒息。在漫长的等待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啼哭，那哭声竟是那样清脆响亮，划破了深夜的宁静，融入大自然的风雨声中，似乎传出很远很远。

父亲高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下来。他一步跨进帘内，用他那双蒲扇般的粗糙大手，轻轻抱起刚刚坠地的骨肉。啊，是个男孩！他向妻子投去了感激而奖赏似的目光。疲倦的妻子从这目光里感受到鼓舞，嘴角边露出一丝快慰的笑意，像是回报自己的丈夫。然后，微微闭上双眼，平静而心满意足地昏昏睡去。

在这个如墨的深夜、伴随着凄风苦雨降临人间的男婴，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的乳名叫帝象。广东中部的乡村妇女有个习俗，每当生了儿女之后，便拿着孩子出生的年月日时（俗称“生辰八字”）去求教卜相家，然后根据卜相家的指点，供奉当地庙中的菩萨为孩子的义父（广东人称“契爷”）以保长寿平安。“帝象”一名，传说是母亲在抱着幼小的孙中山敬拜村中北帝神象为义父之后给他起的。

这一乳名的由来，还有另一种传说。他的父亲虔诚地信奉北帝。村中的北极殿里供奉着三尊村神，中间坐着一个男神，两边各立一个女神。男神便是北帝，是翠亨村的主宰。他手持宝剑，拇指朝天。村民们在这里烧香，祈求村神给他们带来好运。一天，怀孕的妻子做了一个梦。她对丈夫说：在梦里，北帝垂头丧气向我走来，他披头散发地哭着，好像我怀的孩子是他的克星似的。我们必须设法消灾避难，把孩子奉献给神，求神保佑，我们就把孩子取名为“帝象”吧。

丈夫同意了。儿子出生后就给取名为帝象。做父母的，希望把孩子奉献给神，他就不会危害神灵了。

至于孙中山的正式用名，是单名“文”，号日新，字德明。1886年改号逸仙（日新的粤语谐音），此后他在广州、香港、澳门学医、行医及游历欧美各国时常用此名。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遂以“孙中山”一名传布于世。以后，又曾取名为高野长雄。在欧美及南洋各地从事革命活动时，他还用过许多化名，如陈文、陈载之、吴仲、高达生、杜嘉偌及自署公武等。

在众多的名号当中，最为后人广为传颂、妇孺皆知的，就是那响彻寰宇的三个字：

——孙中山。

更夫家的儿子

孙中山的出生地，是广东省香山县的翠亨村。

香山县名的由来，据说是由于本县山中盛产“沉香”的缘故。沉香木是一种常绿乔木，树干很高，给人以俊逸挺拔的感觉；长着卵形或披针形的叶子，开着乳白色的花，绿叶白花，衬托得和谐而好看。沉香木的材质坚硬而重，泛着黄色，散发出淡淡的香味，不仅是制作家具的好材料，而且可以入药，具有镇痛、健胃的效用。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县，后又改为中山市。

香山，地处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的南部，与南海毗连。交通便利，南边直达澳门、香港，北面直通广州，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冲。

在香山县的东南部，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就是翠亨村。

翠亨是透明的碧玉的意思。村庄依偎在珠江与南海的旁边，坐落在香山县城石岐和澳门之间。群山环抱，绿树成荫，是个十分秀丽的地方。村里大约有七十户居民，百余间房屋疏密不等地依次坐落在山坡土岗上，掩映在绿树丛中。

村里的百余间房屋，大多是红砖绿瓦，只有少数几间是土墙茅顶的泥草房。村中有杨姓和陆姓两家地主，拥有村里的大部分耕地。其余的村民，大多靠租种杨、陆两家的土地来维持生活。

珠江三角洲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素以美丽富饶而闻名天下。然而，坐落在这里的翠亨村，却只得她的美丽，而没有得到她的富饶。翠亨村的耕地大都比较硠薄，坚硬而不肥沃，耕种起来十分吃力，收成自然不会很好。这实在是老天爷作弄翠亨村的农民。佃农们不仅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七十交给地主，而且还要忍受衙役酷吏的不时盘剥，生活十分艰辛、窘迫。

孙中山的家庭，就是翠亨村里众多贫苦佃户中的一户。

村边有一座泥草屋，乍一看是一副破旧的景象，草屋的主人叫孙达成。他便是孙中山的父亲。

孙中山的降临，既给孙达成带来喜悦，又给孙达成以忧虑。喜的是，自己又有了个儿子，那白白胖胖的圆脸，实在招人喜爱，将来一定是自己耕田作活的好帮手；忧的是，儿子的出世，将给他带来更大的生活负担，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嗷嗷待哺的孩子养育成人。就是这眼前，他竟无力弄到一点像样的东西，来喂饱他那身心交瘁的妻子。

孙达成望着啼哭好一阵刚刚安静下来的儿子和昏昏沉睡的妻子，心中一阵酸痛，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他记得自己从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开始跟在父亲的身后下地干活。父亲没有土地，父子俩今天跑东家，明天跑西家，或头顶烈日，或脚踩寒露，打短工，卖苦力，勉强挣回一碗糊口的番薯饭。

小小年纪的他，由于长期干活，皮肤晒得乌黑乌黑，掌心磨起了许多血泡。有一次，他的母亲握着他的手，用针把血泡一个一个地挑破，然后用一块小布片蘸上盐水，轻轻地擦去血污。母亲小心翼翼地做着这一切，怜惜的泪水，沿着憔悴的脸颊，默默地往下淌。懂事的他忍住疼痛，反而安慰起母亲来：这根本就不疼，根本就不疼……

后来，他的两个弟弟也慢慢长大，能够帮助父亲干活了。可是没有土地的父亲，却揽不到更多的活干。家中的生活便更艰难了。一家人常常不得不

靠野菜充饥，不得不忍受饥饿的煎熬。

听说澳门有很多店铺，需要雇佣帮工。与其一家人围在一起忍饥挨饿，不如出去闯荡闯荡，或许能混碗饭吃。于是在十六岁那年，他便告别双亲，独自一人，徒步去了澳门，在一家鞋铺当学徒。

学徒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起早摸黑，不仅仅只是学搓麻绳、纳鞋底、上鞋帮的活，还得侍奉老板，照顾师傅，忙里忙外，从早到晚没个歇息的时候，动不动还得挨师傅的骂，遭老板的打。好在总算有碗饱饭吃，他终于挺下来了，而且一呆就是十几年。

那一年他已经三十二岁了，仍然是孤身一人，尚未婚娶。父亲从家中捎来口信，要他回家完婚，否则将不认他这个不孝的儿子。古人有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孙家长子的他，已过了而立之年还没有娶媳育儿，这该会使老人多么伤心和失望啊！

他的父亲这时已五十六岁了，他感到确实愧对自己的父亲，也感到孤身呆在澳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就返回了阔别十六年的家园，与附近隔田乡（今崖口乡）一位姓杨的女子结了婚。

他的妻子杨氏，是位温柔善良、勤劳贤慧的女人。就在结婚的当年，便为他生下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终于使他那可怜的父亲满足了做爷爷抱孙子的心愿。

后来，妻子又为他生下了二胎、三胎和四胎。二胎是个男孩，由于先天不足与营养不良，三岁上便死了。就在这一年，他那辛苦操劳一辈子的父亲也去世了。第三胎是个女婴，体弱多病，六岁时夭折了。第四胎又是个女孩，如今已满三周岁。算起来，今夜所生的这个男孩，已是他们夫妻俩的第五个孩子孙达成勤劳聪慧，厚道持重，颇得村民的尊敬。他与贤慧的妻子一道，把家调理得井井有条，并且佃租了几亩田地，自耕自种，养家糊口。虽说佃租田地比他的父亲四处打工要好一些，但家境依然窘迫。因为他一方面要赡养老母，抚育儿女，另外还要担当照顾两个弟媳的责任。他的两个弟弟先后去了美国，在海洋的那一头辛苦卖命。

仅靠几亩薄田，哪里能够承担这样的家庭重负？为了贴补家用，他便做起了打更的更夫。每当夜深人静，村民们呼呼大睡的时候，他却必须带着白天的劳累，忍受瞌睡的侵袭，一手拿着竹梆，一手拿着竹棍，边走边敲，边敲边吆喝。这既是为了震慑鸡鸣狗盗之徒，也是为了向村民报时。于是，他隔一个时辰，就必须绕着村子巡逻一圈。

一想到打更，孙达成突然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该是打三更的时候了。他内疚地看了看床上的妻儿，戴上斗笠，披起蓑衣，顶着风雨，走出门去。

不一会，风雨声中，隐隐约约传来了竹梆的敲打声，还有孙达成那浑浊嘶哑的喊声。这声音里，似乎传达出他今夜得子的一缕喜悦，更多的却是渗透出他不辞辛劳、奋力持家的艰难与辛酸……

而此时此刻，幼小的帝象却睡得很沉很香。他两脚叉扒，两只小手微屈上举，静静地偎依在母亲的身边，是那洋的温驯、乖巧。

孙达成的打更声远去又近来，在翠亨村的上空久久回荡。它伴随着帝象度过了来到人世的第一个夜晚，这是父亲送给他的第一件礼物——一支高亢厚重的击梆喊更催眠曲。

家境日窘

帝象出生后，孙家的境况更为困顿了。

父亲孙达成整日在外干活，傍晚回到家里，端上碗，匆匆扒上几口，就赶紧躺下，迷糊几个小时。到了夜里，他就不能再熟睡了，必须敲着梆子满村转。然后，就只能利用时辰之间的间歇，随便靠一靠，似睡非睡地打个盹。

这样没日没夜的劳累，又加上夜晚的风寒，使父亲落下个咳嗽的毛病。五十多岁的人，面黄肌瘦，皱纹密布，像榆树皮似的粗糙，与他的实际年龄显得很不相称。

母亲杨氏操持家务，丝毫不比父亲轻松。一大早，她就得起床，趁着帝象还在熟睡时，为外出干活的丈夫烧好早饭，打扫房屋。帝象醒来之后，她就才几个月的帝象背在身后，继续做着各种家务，几乎没有一刻安闲的时候。小帝象哭了，母亲一边干着活，一边抖抖晃晃，嘴里还轻柔地哄着：“帝象乖，帝象乖，帝象不好哭，妈妈这就给你吃奶啦。”

可是母亲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活。安静了一会儿的帝象，由于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于是又啼哭起来。母亲这才擦擦手，解开背带，放下帝象，撩起衣襟，将乳头塞进帝象的嘴里。

帝象贪婪的小嘴拼命地吮吸着，小小的身体还不时抽搐。母亲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让帝象平静下来，然后又轻轻抹去停留在帝象脸蛋上的泪珠。突然，她感到腿上一阵发热，她知道那是什么。她赶紧抽掉帝象身上湿透的尿布，又换上块干净的。

等帝象吃饱了，母亲又重新背起他，继续风风火火地料理那似乎永远料理不完的家务。

母亲除了料理家务之外，还要照看比帝象大三岁的女儿，还得侍奉婆母。母亲对婆婆十分尊敬、孝顺，有什么好吃的，总是亲亲热热地喊声“妈”，恭恭敬敬地递到婆婆面前。妯娌之间，由于杨氏的宽宏大度，相处得也很好，从来没发生过口角。村里的居民都知道孙达成有个贤慧的妻子，常以羡慕的口吻在孙达成的母亲面前称赞她。

孙家夫妻俩的生活就是这样忙碌，劳累，日复一日，周而复始。但夫妻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相亲相帮，共同支撑着他们的家。

这天黄昏，孙达成干完一天的活，拖着一双疲惫的脚往家走，路过村边的时候，一个邻居喊住了他。

“达成兄，你好啊！”

孙达成抬头一看，原来是早年与他弟弟一道赴美国当华工的邻居阿四。他又惊又喜，连忙应道：

“阿四，是你回来了。发财了吧！”接着，又急急问道：

“我弟弟怎么样？他怎么没回来？”

阿四低下了头，半天不言语。终于，吞吞吐吐地说：“你弟弟……他……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孙达成一阵晕眩，两只铅锤般重的脚站立不稳，热泪立刻盈满了他的眼眶，扑簌簌往下掉。

“是病死的。不，是累死的。你不知道我们在美国干的是怎样的活，吃的是怎样的苦。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阿四的话匣子打开了，说个没完，隔壁邻居也都围过来，打听他那远涉

重洋的冒险故事。

孙达成却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回家的。他像喝醉了酒，摇摇晃晃，似痴似迷地挪进了家门。

“你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哪里不舒服？”妻子见丈夫这副模样，焦急地连声询问。

孙达成坐在小凳上，任凭妻子如何问他，就是一声不吭。最后，才憋出那句他实在不想说的话：“兄弟死啦！”

说完，孙达成便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哭了起来。

父亲的哭声，惊扰了伏在母亲背后的帝象，他张开嘴，哇的一声，用劲地哭喊起来。

正在这时，孙达成的母亲颠着蹒跚的小脚，从菜园子里回来，孝顺的媳妇连忙迎上前去，接过婆婆手中的篮子，含着泪，哽咽着，把那不幸的消息告诉婆婆。

这消息，如同晴天一个霹雳，把老人给震懵了，婆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有那伤痛的泪水，猛地涌出眼眶，在饱经沧桑的脸颊上不住地流淌。

不一会儿，孙达成的弟媳也知道了。立刻，一阵嚎陶大哭声冲上云霄，传遍了整个村庄。那撕心裂肺的痛哭，震撼着翠亨村每一个有同情心的人。

那天晚上，孙家的大人谁都没有动筷子，伤心、痛苦占据了他们的整个心灵，他们什么也吃不下，什么也不想吃。

而几个不懂事的孩子，在陪着大人们不明不白地哭了一通之后，却是胃口大开，端起饭碗狼吞虎咽起来。还不满一周岁的帝象，更是什么也不明白，他偎在母亲怀里，使劲地吮吸，却因吃不到什么奶水而不断啼哭。他的哭声，断断续续，闹了一个通宵，搅得悲伤的大人们更是伤感难受。

第二天，孙达成遵照母亲的吩咐，买了些纸钱，在家门口烧了，祭奠遗骨他乡的亲人。看着燃烧的纸钱和随风旋转的纸灰，一家人又痛哭了一场。

逝去的亡灵在纸灰中似乎得到了超脱，而活着的人日子却更为艰难沉重了。

这一切首先是从孙达成的母亲，也就是帝象的祖母开始的。

失去一个爱子，老人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不久，老人家就由于伤心过度而病倒了。

孙达成和妻子非常着急，连忙请来医生为母亲诊治。那郎中给老人家把了脉，对孙达成说：“令堂大人血亏气衰，又受了刺激，需要好好补养将息。我这里开几帖药，让令堂大人吃吃看。”

孙达成连连道谢，拿起药方就去抓药。村子里并无药铺，得去四五里外的邻村才能抓到。药方上有几味补药，一帖就要不少钱。为了抓这一次药，孙达成把家中仅有的一些钱花光了。

老人家吃了药，病慢慢好起来。可是药一停，病又犯了。于是又请医生，又去抓药，反反复复，老人家再也没有利索过。

孙达成的日子本来就艰难，如今隔三岔五就得为母亲请医抓药，哪里承受得起？但孙达成夫妇并不觉得是什么拖累。在他们看来，侍奉母亲，为母亲治病，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子女应尽的责任。因此，尽管他们已背了不少债，他们仍然想方设法，东挪西借，尽一切力量为老人家抓药治病，没有丝毫怨言。

倒是老人家看着忙前忙后的儿子媳妇，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有好几次，

老人家一边喝着媳妇煎好送来的药汤，一边默默地流泪，说：“我活这一把年纪也够了。你们就别再为我糟踏钱了。”

媳妇连忙安慰婆婆，又把帝象抱到婆婆面前，说：“快喊奶奶，快喊奶奶，奶奶病好了，还要逗帝象玩耍呢。”

就这样苦苦挨了一年多。老人家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也撑持不下去了。1869年10月初的一天，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闭上了双眼。一直守候在床前的孙达成夫妇，顿时恸哭失声。这时的帝象已快满三周岁了。他惊奇地睁大眼睛，看了看哭得死去活来的父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也大声哭起来。

老人家去世了，却给她的儿子媳妇留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为了还债，孙达成夫妇活干得更多更勤，生活却是越来越苦，用勤劳的汗水和节俭的艰辛积攒下一个又一个铜板。即使这样，仍然无济于事。那债务就像座大山似的，总是搬不掉，压得夫妇俩始终喘不过气来。于是，夫妇俩迫不得已，只好把才满十五岁的大儿子，送到邻乡南葫一个地主家做长工。

上工的那一天，母亲特地为儿子做了点好吃的。说是好吃的，那也不过是用番薯面烤成的饼。懂事的儿子说什么也不肯吃，拿起小包袱就出了门。

母亲抓起烤饼，边喊边追了上去。

哥哥走了，妈妈走了，小帝象赶紧迈着小腿往外跑，他哭着，喊着：“哥，哥——你到哪里？”

可是哥哥并不理睬他，反而越走越快，一会儿就不见影了。

童年磨砺

那外出打长工的哥哥，便是帝象的大哥孙眉。

孙眉，字德彰，号寿屏。比帝象大十二岁，是个很有经济头脑和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正是他的奋斗与拼搏，才把孙家从贫困的煎熬中解脱出来。但这是后话，此处暂不赘言。

而眼下的孙家，家境却是十分困窘。孙达成夫妇俩没日没夜地忙乎，仅仅只能使全家人勉强糊口。香喷喷的米饭，几乎与他们无缘，因为大米太贵了。整年整月，只能以白薯为主食。他们省吃俭用，一点一滴地抠出钱来偿还债务。整整两年，他们才摆脱了债务的缠绕。

帝象就在这艰难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哥哥出门了，父母忙得根本没工夫来照管他，只有一个大他三岁的姐姐陪伴着他。

六七岁的姐姐带着三四岁的弟弟，整日在田间地头玩耍。两人都没鞋穿，光着小脚走来走去。田埂上的荆棘、泥路上的石子，常常刺破了脚丫、硌疼了脚心，可他们从来不哭。玩困了，就倒在田头睡一觉；玩饿了，就自己想法弄点东西充充饥。日晒风吹，摸爬滚打，倒使帝象的身子长得很结实，更养成了他坚强沉着、不畏困苦的性格。

到帝象五岁那年，母亲又为他生了个妹妹。妹妹的出世，自然又增添了家庭的负担，母亲就更无精力、时间来照看帝象了。而姐姐为了抱妹妹，也不能再陪帝象玩耍。

于是，帝象便一个人去村子里闯荡了。村里有不少同帝象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帝象与他们一起玩游戏、捉迷藏，很快就玩熟了。小朋友们常玩一种叫跳青蛙的游戏，就是看谁跳得远跳得快。比赛结果，结实而机敏的帝象总是高出别人一筹，使得别的小孩都很佩服他。

转眼之间，帝象就迈入了第六个年头。从这一年开始，他就零零星星地干起活来，从此告别了快乐而自由自在的时光，过早地尝到了劳作的辛苦和生活的艰难。

起初，帝象和姐姐一起去捞塘藻，所谓塘藻，是浮在塘面上的一种水草，是喂猪的饲料。父亲给姐弟俩一人做了一个捞竿，就是用铁丝弯捏成一个勺状，并将它固定在一根细竹竿上。然后又准备了两只小背篓。

姐弟俩挎上背篓，扛起捞竿，一蹦一跳出发了。来到塘边，放下背篓，姐弟俩便比赛似地捞起来。帝象人小力气有限，沾满塘藻的捞竿，不能悬空提起来，只能沿着塘边慢慢拖上来，然后用小手将塘藻放进篓里。

一开始，帝象觉得这事挺有趣。可是时间一长，他便感到乏味而吃力了，于是干脆放下捞竿，坐在塘边玩起来。

姐姐妙茜毕竟大几岁，又是女孩子，不仅懂事些，也不像男孩那样贪玩。妙茜一边捞，一边催促着帝象：“别玩了。快捞吧，捞不满篓子，阿妈会生气的。”

帝象哪里听得进，照旧玩他的。后来，妙茜捞满了自己的篓子，就要来帮弟弟的忙，可是帝象却不要姐姐帮忙，说：“我的篓子，我自己捞。”

说着，就站起身来，拿起捞竿，起劲地捞起来。站在一旁的姐姐悄悄地帮弟弟捞，然后趁帝象不注意，把塘藻塞进他的篓子里。

终于，篓子满了，姐弟俩背起篓子，一步一挨地往家走。湿漉漉的水草，仍旧在滴水，打湿了他们的后背，在他俩踩出脚印上留下一串水印。沉甸甸

的篓子，勒得肩膀生疼，他们走一阵，歇一阵，走走停停，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好像那路没个尽头。俗话说，看见屋，走得哭，姐弟俩确实尝到了这种难受的滋味，尤其是年幼的帝象。

塘藻毕竟有限，是根本不够猪吃的。姐弟俩又常常拎着篮子去田野里挖猪菜。这可是个费工夫磨性子的活，那猪菜东一根西一根，首先得寻找，然后用铲子一根一根地挖。半天也挖不满一篮子猪菜。帝象一手握铲，一手提篮，从这块田里铲到那块田里，转眼就是大半天。

有时，帝象还和姐姐一道，下地帮父亲除草。除草虽然不是很累，但是得特别小心，一方面不能踩坏了庄苗，一方面更不能把庄苗当成杂草拔去。姐弟俩在父亲的指点下，很快就学会了辨认哪是草，哪是苗，把草除去，把苗留下，然后把土松一松。

帝象干得很认真，小脸蛋晒得绯红，汗水直淌。田间各种各样的小虫，老叮在他的脸上、腿上，留下一个个红包，奇痒无比。他一边除草，一边不知不觉地用手在痒处抓来抓去，有的地方抓破了，渗出了殷红的血。可他并不知道，依然专心除他的草。

中午，母亲给他们送饭来了。于是一家人坐在树荫底下，围成一圈，就着茶筒的水，开始了他们的田头午餐。只有这时，才是一家人更是帝象最欢快的时刻。

这时，母亲发现了帝象脸上、腿上被虫叮咬的红肿块和抓破的伤口，她往手上吐口唾液，轻轻涂抹在帝象那红肿和破皮之处。然后又是一口唾液，又是一阵涂抹，直到把所有的红肿和伤口都涂抹一遍才罢休。

帝象大口大口地吞咽着番薯，静静地享受着母亲唾液的温润和手指的抚摸，真是舒服极了。那红肿之痒、伤破之疼，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帝象也同农村所有的苦孩子一样，还当过放牛娃。可是他所放的牛，并不是自家的，而是别人的。

原来，父亲耕种土地需要用牛，家中无牛，父亲只好向别人借，而作为对借牛的抵偿，孙家必须每年为牛主放养两个半月的牛。

于是，农闲时，牧牛就成了帝象的主活。可他也并不闲着，牛儿在静静地吃草，帝象不是挖点猪菜，就是拾点柴草。直到天黑，牛儿吃饱了，帝象才爬上牛背，带着猪菜、柴草，满载而归。

有时，帝象随母亲去外祖父家小住。外祖父家住在海边，以打鱼取蚝为生。作为小客人的帝象，根本闲不住。每当遇上外祖父出海的时候，他便跟着一起去。

海浪汹涌，海风劲吹，宽阔的海面一望无际，初次下海的帝象感到好奇与兴奋。尤其是当他帮助外祖父打上鱼蚝时，他就更是兴奋得拍掌叫好。

小小的帝象，于各种活儿的滋味差不多都尝过了。而在所有的活儿当中，给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和姐姐一道上山砍柴了，因为这是一种最苦最累的活。

翠亨村人所烧的柴草，都要到十里之外的金槟榔山上去打。每当打柴的日子，姐弟俩一大早就得起床。而清晨，往往是孩子们睡得最香的时候。帝象矇矇眈眈地起了床，吃好早饭，揣上干粮，插上柴刀，带着扁担绳子，直到迎着晨曦走出很远，才完全清醒过来。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跋涉，姐弟俩来到了金槟榔山。他们放下扁担绳子，稍作歇息，便挥舞柴刀，奋力地砍起柴来。柴草很硬，十分难砍，小帝象使

出全身力气，才勉强砍下一小把。但他毫不气馁，依然不停地抡着手臂，一下接一下地砍着。汗水不住地流淌，湿透了衣衫，湿透了头发，就像在水里浸泡过一样。手指臂膀，脚踝腿肚，被柴草荆棘划出一道道红杠，留下许多锯齿般的血痕。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已是烈日当头了。累了，小帝象就坐在地上歇口气；饿了，就掏出干粮啃几口；渴了，就跑到山涧里喝一肚子清泉。

终于，砍好了一担柴草。姐弟俩你帮我，我帮你，捆好柴草，插上扁担，再歇口气，然后挑起柴担，小心翼翼下了山。

下山的时候，姐弟俩清楚地看见了掩映在树丛中的村庄，隐隐约约地看见了自家那座破旧的茅屋，似乎一切都在眼前。

可是，肩上的柴担越挑越重，腿肚肩膀越来越疼，歇脚也越来越勤，可那路像是走不完似的，总没个尽头。俗话说，看见屋，走得哭，小小的帝象确实尝到了这种急于卸掉重担却没法办到的难熬滋味，真正领略到这句俗语的含义。

直到黄昏，姐弟俩才终于到家了。小帝象累得筋疲力尽，瘫坐在门坎上，一动也不想再动了。

崇拜英雄

帝象所生活的翠亨村，处在珠江三角洲的南部。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土地。就是在这块土地上，首先吹响了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号角，第一次将长矛大刀刺向外国侵略者的胸膛；香山县城的城头上，曾高高飘扬起林则徐抗英卫国的旗帜；香山县辖属的磨刀洋面上，也曾流淌过水师提督关天培同英国海军决战到底的热血。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的家乡花县，离香山不过几十里。香山县很多贫民百姓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投入了反清武装暴动，有的直接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起义英雄的英名，仍然活在广大人民的心里，在父老乡亲中广为传颂。

村里有个名叫冯爽观的农民，曾经参加过太平军的不少战斗。空闲的时候，他就喜欢坐在大树底下，一面抽着旱烟袋，一面向围着他的儿童们讲述自己当年的经历，讲述天王洪秀全的事迹。

冯爽观总喜欢这样开头：“你们知道吗？洪天王和咱们是邻居，咱们去他家，不过几十里地。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接着，冯爽观便慢条斯理地说起来。

“洪天王也是个农家子弟，从小就聪明好学，志向不凡。道光三十年，他与杨秀清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起义。

“那一天，金田村的上空到处是太平天国的旗帜，成千上万的起义农民手执长矛刀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聚集在金田村前。在一阵高过一阵的欢呼声中，洪秀全等人登上了小土坡。

“只见洪秀全身披长袍，手按长剑，神情十分严肃。他扫视了一下满山遍野的人群，挥起手中的长剑，起义的人们顿时安静下来。洪秀全庄严宣布：太平天国建立了！起义的部队，就叫太平军！

“从此，洪天王领着起义军杀出广西，一路挺进，势如破竹，杀得清兵闻风丧胆，不久就打下了南京。洪天王把南京改为天京，建立了咱们农民自己的政权……”

冯爽观说得有声有色，那些孩子们也听得有滋有味。其中有个小孩听得最入神，他歪着小脑袋，一会儿陷入沉思，一会儿又现出兴奋激动的神情。这个孩子便是帝象，他听着听着，便向冯爽观提了个问题：

“洪天王打仗厉害吗？”

“那当然，”冯爽观眉飞色舞地接着说，“洪天王不仅有身好武艺，尤其善于调兵遣将。起义后不久，洪天王指挥太平军攻下了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清兵不甘心失败，立即纠集了十万军队，向起义军疯狂反扑，气势汹汹地把永安州团团围住，妄想把起义军一口吞掉。

“洪天王面对强敌，毫不畏惧。他镇定地指挥将士，以一当十，打退了清兵的多次进攻。但镇守孤城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洪天王决定突围。

“在洪天王的安排下，太平军立即行动起来。起义军把银钱衣物，故意到处丢弃，引诱清兵竞相抢夺。然后在一个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趁清兵松懈熟睡之时，起义军悄悄地向州城东北方向发起进攻，一举冲破了清兵的防线，全军顺利突围东去，踏上了前进的征途。

直到第二天中午，清兵首领才发觉起义军已东去很远了，气得吹胡子瞪眼，大骂部下无能。

“说实在的，倒不是他的部下无能，是我们的洪天王太有本事了。”

听到这里，孩子们都一齐鼓掌欢呼起来。唯有帝象不动声色，他沉思了一会儿，又问：

“洪天王为什么要起义造反啊？”

冯爽观非常喜欢这个专心致志、爱动脑筋的孩子，就不厌其烦地解释道：

“为什么？就为这世道不公平，不合理，就为这世界太黑暗，太肮脏。

“不说别的，就拿洪天王自身的经历来说吧。洪天王自小聪慧好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据说他参加了好几次考试，都因为朝中无人、无钱无势而名落孙山。那些有钱有势却无才学的人反而中举做官，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

“再看看我们的身边吧。有钱的人不劳动，却能吃香喝辣，花天酒地；穷人终年辛劳，反而填不饱肚子，破衣烂衫，苦挨苦熬。洪天王就是要推翻黑暗朝廷，消除这不合理的怪事。他建立太平天国，就是希望建成‘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好社会哩。唉，可惜洪天王失败了……”

帝象听得入了神，不禁对洪秀全这位农民起义领袖和反清英雄充满了钦敬与崇拜之情。他想起含辛茹苦的父母，想起外出打工的大哥，又想起小小年纪就得干活的自己和姐姐，一股不平之气涌上心头，他不觉自言自语地脱口说道：

“要是洪天王灭了朝廷就好了！”

从此，在帝象那小小的脑袋里，便滋生了朦胧而强烈的反抗不合理制度的意识，幼小的心田里深深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他打心眼里钦佩洪天王，崇拜洪天王所做的一切，并且在自己的行动中，处处显露出效法洪天王的迹象。

翠亨村中有个做豆腐的人，名叫亚秀，村民们都喊他“豆腐秀”。豆腐秀不是本地人，而是从外地一个叫大象埔的地方迁来的，他在离帝象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一爿豆腐店。

豆腐秀是个本份老实的人，可他的两个儿子却十分顽皮，年纪都比帝象大。两个顽皮的捣蛋鬼，经常欺负村子里的小朋友，帝象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常常用弹弓夹小石子，躲在暗地里弹射帝象。

帝象被打疼了，就去追打他们。可他们年龄大些，跑得快，转眼就不见踪影了，根本沾不了他们的边。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激怒了小帝象。他心里暗暗下了决心，下次再欺负我，我一定得狠狠教训教训他们。

这一天，两个捣蛋鬼又用小石子弹射帝象，正好打在他后脑勺上，鼓起了一个小包。帝象怒气冲天，他捡起一块石头就追，一直追到豆腐店里。两个捣蛋鬼不知躲到哪去了，却见一锅煮开的豆浆，腾腾的热气直逼帝象而来，似乎也在跟帝象过不去。满腔怒火无处发泄的帝象，正好找到了目标。他高高举起右手，将石头狠狠地砸向锅里。“咯”的一声，大锅被砸通了底，豆浆四溅，涌向炉膛，把炉火扑灭了，发出嘶嘶的响声，冒出一股焦臭的烟雾。

豆腐秀闻声而出，一见此状，大惊失色，正想发作，却见帝象双手叉腰，昂首挺胸，两眼像冒火似的，直瞪他的两个儿子，心里便明白了一大半。

豆腐秀赶到帝象家告状，帝象毫不示弱，他说明事情的来由，据理为自己辩护。豆腐秀自觉理亏，回家把两个顽皮的孩子教训了一顿，只得自认晦气。忠厚而通情达理的帝象父母，尽管自己并不富裕，还是赶到豆腐店来劝慰，表示愿意赔偿豆腐秀的损失，使正在发愁的豆腐秀十分感动。

从那以后，两个捣蛋鬼再也不敢欺负帝象了。而帝象，则因这件事，被村里的人称为“石头仔”，以称誉他那不怕硬碰硬的倔强、勇敢的性格。

石头仔不但不能容忍别人来欺负他，而且也看不惯别人受欺侮。因此，一旦发现有人受侮，石头仔就要打抱不平。

有一次，两个小孩在村头打架，被帝象看见了。他连忙走过去，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说：“是他欺负我。我在这玩得好好的，他却来捣乱。”另一个说：“我就捣乱，怎么样？”说着，两人又扭打起来。

帝象生气了，立即参加了战斗，把那个捣乱的孩子打倒在地，并质问道：“看你还敢捣乱，看你还敢欺负人。”

正在这时，那孩子的哥哥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帮着弟弟打帝象。那哥哥比帝象年纪大得多，力气也更大，他抓住帝象的辫子，把帝象的头往墙壁上一阵猛撞，口里说首：“叫你多管闲事，叫你打抱不平。”

帝象并不屈服，忍住痛，大声说：“他欺负人，我就打抱不平！”结果，帝象被撞得晕了过去。母亲听说赶了过来，连忙用湿布裹住帝象的脑袋。过了一会儿，帝象才慢慢苏醒过来。尽管如此，这位小英雄，一声也没哭。

这件事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也传到了冯爽观的耳朵里。一天，冯爽观又给孩子们讲故事，帝象听后，又提出个问题。冯爽观爱抚地摸摸帝象的小脑袋，奖赏似地说：

“你真是洪秀全第二啊！”

从那以后，帝象真的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寻思着身边的不平事。稍一得便，他就和他的小朋友偷偷跑到邻村，观看三合会会员练武，一边看一边比画。回到家，就仿照看到的架势，舞起拳弄起棒来。他盼望自己练就一身好武艺，扫平身边不平事。

好问的学生

七八岁年纪，本是入学读书的时候。可是因为家中贫困，交不起学费，帝象只能眼睁睁地瞅着别人上学。每当学塾里传出此起彼伏的读书声时，他就忍不住去张望一下，心里充满了钦羨与向往。

这一天，帝象终于十岁了，要上学了。尽管这日子姗姗来迟，但她毕竟还是来了。帝象的心里有多高兴啊！

上学的头天晚上，母亲在油灯下为帝象缝了个布书包，又找些粗糙的纸订了个小本子。然后，母亲看了看坐在一旁的父亲，对帝象说道：

“帝象，以后上学了，就给你起个大名叫‘文’吧。我和你爸都没读过书，就指望你好好念书，将来做个有本事的人。”

帝象点点头。从此，孙中山有了第一个学名——孙文。

“快睡吧，明天早点起来上学”，母亲又嘱咐道，“念书要听塾师的话，别同其他的孩子打闹。”

帝象答应一声，躺倒在床上。可他睡不着，他对学塾向往已久，心里洋溢着阵阵激动，那激动又化作巨大的决心，在周身的血液中奔腾。他望着仍在油灯下忙碌的母亲，望着和衣躺在一边的父亲及父亲身边的梆子，像是悟出了什么。他在不知不觉中，朦朦胧胧睡去。

那天夜里，帝象梦见自己在学塾里成绩得了优等，超过了所有的孩子。回到家里，父亲母亲都乐呵呵地对着他笑，笑得那样舒畅，一种帝象从未见过的舒畅。

翠亨村虽然只有七十来户人家，姓氏却不少。最有钱的是杨姓，族大人多，他们专门请一位塾师教本姓子弟读书。其他近十来个姓氏的人家被称为杂姓，都是些穷苦的农户，他们联合起来，也请了位塾师，在冯氏宗祠办学。

孙家亦是杂姓之一，帝象便来到冯氏宗祠上学。按当时学校的规定，他所读的，不外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以及《大学》、《中庸》几本书。

帝象用“孙文”的名字注册上学，好像自己一下长大了许多。他读书非常踏实、刻苦，老师要求背诵的书，孙文从不偷懒，他一遍一遍地大声念着、读着，很快就能读得十分流畅，并且能背诵出来。

第二天一上学，老师就要对头一天念的书进行检查，让学生们一个个到前面去背给他听。谁要是背不出来，老师就要用戒尺打手心，以示惩罚、督责。

这可是许多学生最害怕、最难熬的时候。他们往往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前去，疙疙瘩瘩地背着；老师将戒尺一拍，他们又只好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来，拼命地忍受戒尺起落带来的痛楚，然后满面通红，甚至含着负痛的泪水回到自己的座位。

勤奋、聪慧的孙文，却从来没尝过戒尺的滋味。

然而，孙文却比学校所有的孩子都更辛苦，更劳累。他每天上学之前，得帮家里做家务，不是劈柴、担水、打扫房屋，就是去塘里捞点塘藻；每天放学之后，不是帮父亲插秧、除草，就是帮姐姐拾柴草、挖猪菜，遇上什么干什么，常常都得很晚才回家。

吃过晚饭，勤奋的孙文就要拿出书来读。由于家境贫寒，点灯读书受到了父亲的限制。父亲规定：有月光，就不许点灯；没有月光，也只能用一根

灯草。

于是，孙文便只能借助月光，或在光线十分微弱的油灯下读书。由于光线太弱，两眼实在疲乏吃力，孙文就不住地用手揉眼睛。母亲看了，疼在心里，便把油灯加上一根灯草，屋里顿时亮堂了许多。父亲嗔怪母亲道：

“你这样助着他耗费灯油，真指望他给你考个举人回来？”

孙文知道父亲的艰难，他默默地挑去一根灯草，然后低下头来，就着昏暗的光，继续读书，一直读到很晚才睡。

孙文就是这样，一面读书，一面干活，努力克服种种困难。而这种半耕半读的生活和艰苦的学习条件，并没有使孙文产生丝毫的怨气和懈怠，相反，更促使他勤奋地学习，更认真地去思考书中的道理。

然而他的这种好学多思的精神，却与传统的教学方法产生了矛盾。

有一天，孙文按照惯例来到老师面前，把书本交给老师，然后背诵昨天的功课。他背得十分流利，一字也不差。老师赞许地点点头，提起毛笔，在孙文的书本上圈点了几段，作为今天的功课。然后领着念一句，让孙文跟着念一句，如此念了两遍，孙文就会了。

回到座位上，孙文又念了几遍，试着背一背，不多久就全能背出来了。这样一来，可以说这一天的功课就基本上完成了。孙文不禁为自己的好记忆洋洋得意起来，他想起了去年春节前发生的一件事。

快过年了，家家都忙着办年货。婶婶家忙不开，就让帝象去五里外的一个圩场买些东西。那时，帝象正在门口与一班小孩子玩耍，听到婶婶喊他，就跑回家。婶婶怕东西多，担心他记不住，要帝象用笔记下来。可帝象说不用，接过钱，拎上篮子就跑。婶婶很担心，生怕帝象弄错了。

过了两个多小时，帝象回来了，篮子里装得满满的，该买的年货一样也不少。婶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不住地称赞道：“这孩子，记性真好！”

塾堂里的读书声，又把孙文的注意力引回到书本上。他又读了几遍，读着读着，他不禁为自己刚才的那份得意而惭愧起来。光记性好，会背又有什么用？这书里说的意思，怎么自己一点也不懂？难道读书就是背背而已吗？

这么一想，孙文就不再觉得无事可做了，便对着书本，苦苦思索起来。可是这样思索了半天，竟然什么也没琢磨出来。他抬头看了看讲台上的老师，想问又有些怕。因为从来也没人问过老师什么。可是，这书上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犹豫了一阵，终于鼓气勇气，站起身来问道：

“先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一段话是什么意思，请讲给我听听吧。”

孙文的话音刚落，嘈杂的塾堂里立刻安静下来，静得连掉下一枚针也能听得见。同学们大都以惊异的目光看着老师，有的甚至吓得发呆，低下头，不敢抬眼，生怕老师怪罪到自己头上。

老师听了孙文的提问，不觉也怔住了。在他看来，所谓教书，就是让学生自己读，自己背，哪有学生向老师提问的？很快，老师明白过来，拿腔拿势地反问孙文，想把他给震回去。

“你不好好念书，乱说些什么？”

孙文已经豁出去了。他不慌不忙地回答道：“书我已经念好了，就是不懂其中的意思，想请老师讲讲。”

老师生气了，忽地站起来，把戒尺一提，离开讲台，气冲冲地走到孙文

桌前，厉声喝道：

“你说都读好了，那是能背了？”

“能背。”孙文镇定地回答。

“那就背给我听听。”说着，老师伸手拿过孙文的书本，就要让孙文当场背诵。他根本不相信，孙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背出那几段课文。

整个塾堂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一起落到了孙文身上。只见孙文张嘴一字一字地背了起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不仅一字不差，而且背得十分流畅。老师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把书还给孙文，那态度却已平和了许多，略带教训的口吻说。

“古人有言，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你要想懂得书中的道理，惟有多读而已。知道吗？”

“学生知道。可是……”

孙文还想再说，话还没出口，就被老师不耐烦地堵住了：

“别再废话了。书上说的，都是圣贤们立下的大道理，不是一时半刻能说清得清的。只要用心读，时间长了，自然会明白的。”

说着，老师向其他同学大喝一声：“发什么呆，还不快给我念书！”

塾堂里书声又起。孙文的心里很有些不服，可老师不愿讲，又有什么法子呢。他只好一遍接一遍地读着，暗暗下了决心：

“这书里的道理，总有一天我要把它弄明白。”

放学的路上，几个同学围住孙文，直夸他了不得，竟敢向老师提问，竟然不怕老师的戒尺。

孙文回答道：“读书不懂，就应该问啊。可是老师却不回答我。戒尺有什么可怕的？要是老师的戒尺能把我打得弄明白书中的意思，我情愿挨它几下哩。”

同学们听了，一个个打心眼里佩服起孙文来。他们从孙文的话语中，似乎也明白了一些道理。

不满旧规矩

孙文进了私塾，每天勤奋读书，又喜欢刨根究底，因此进步很快，不仅同学们都佩服他，连老师也觉得他聪慧好学，机灵可爱。就拿这次提问的事来说，尽管弄得老师不大高兴甚至有些恼怒，要是换了其他学生，戒尺早就下去了，但是对孙文这样聪明好学的学生，老师却实在不忍下手，提问毕竟没有过错啊！

既然老师不肯讲，孙文只好读啊，背啊，渐渐地，他朦朦胧胧地体悟到书中的一点意思。

然而，无论如何，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孙文在一天天长大，他所接触的事情越来越多，懂得的道理也越来越多。当他面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时，他身上的那种“洪秀全第二”的精神就强烈地表现出来。

事情首先发生在姐姐缠足一事上。

那年，孙文已经十二岁了。有一天他放学回家，看见姐姐坐在门边，两手紧紧地捂住双脚，豆大的汗珠挂在脸颊上，脸色苍白，一副痛苦难熬、百般无奈的样子。

孙文整天同姐姐在一起，时常与姐姐一道干活，时常得到姐姐的关心、帮助，因而对姐姐怀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他爱他的姐姐，信赖他的姐姐，他不忍心看姐姐那副痛苦的模样。于是，孙文急忙问道：

“姐姐，你怎么了？哪里难过？”

姐姐抬起头，看着自己的弟弟，一句话也没说。孙文这才看到，姐姐的两只眼睛泪水汪汪，哭得又红又肿，就更不明白了，连声追问道：

“姐，你到底怎么了？快告诉我。”

姐姐本不想说，被弟弟问得紧，躲不过，只好答道：

“我脚疼。疼得钻心，实在受不了。”

“脚疼？”孙文这才注意到姐姐那双一天到晚光着的脚，现在被缠上了一道又一道布条。那布条紧绷绷，密麻麻，把姐姐的一双脚捆绑得严严实实，扭成尖角般形状。

“为什么要捆脚？谁给你捆的？”孙文真是奇怪极了，一双好好的脚，为什么要捆成那般模样？是谁那么狠心，竟然让姐姐受这么大的罪？

姐姐只是默默流泪，不愿再说什么。孙文走进家门，就去问他的阿妈。

“阿妈，是你给姐姐捆的脚吧？为什么要捆姐姐的脚？”

阿妈笑一笑，很平静地回答道：

“这是女人的事，你不懂的。读你的书去吧！”

可是孙文并不放过，他非要弄个明白不可。母亲只好按照自己的理解告诉他，女人缠脚是古代传下来的一种习俗，是天经地义的事，经过包缠之后，女人的脚才能变小，就成了所谓的三寸金莲。这样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是有家教的标志，也是有德行的象征，才能够嫁得出去。

说着，母亲指了指自己的脚，不无自豪地说：“你看，阿妈的脚不是很小吗！那也是吃了很多苦才缠成这样的。女人生来都要过这一关的。”

在孙文的头脑里，一直以为母亲的小脚以及那几个脚趾并拢重叠成一团的怪样子，是生来就如此的，还真不知道也是捆绑的结果，也经历过姐姐现在这样的痛苦。他不禁用同情的眼光看了看母亲，恳求道：

“既然阿妈知道缠脚很苦，为什么还要阿姐也受这苦呢？求求阿妈，就

不要为难阿姐了吧！”

“那怎么行呢！”母亲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接着说：“如果我现在不让姐姐吃这点苦，她以后就会吃更大的苦。到那时，你姐就会怪怨阿妈的。”

然后，母亲列举了村子里一些不缠足的广西客籍女子，处处受人歧视的事来作为自己的证据。

孙文还是想不通，把一双好好的脚缠成怪模怪样的，到底有什么好处？但是他说服不了母亲，也没有力量去改变母亲的观念。但是他并不以为他的母亲是对的，于是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母亲：

“姐姐太难受了。阿妈就放了她吧！”

不知是孙文的恳求起了作用，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母亲松开了缠在姐姐脚上的布条。可这只是暂时的。过了几天，母亲另请了邻村的一位阿婆，把姐姐的脚重新缠起，并且再也没有松开过，直到把姐姐的脚缠小为止。

缠足风波之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原来，孙家在过去，也是个有田有地的人家，那田地还真不少，足足有好几十亩。靠着这些田地，孙家繁衍生息，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到了后来，不知咋的，那日子竟一天天衰落下去，就像那俗语所说的，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为了应急救窘，只好变卖田地。今天两亩，明天三亩，不知不觉，几十亩田地就弄得一干二净。到了孙文爷爷的父辈上，竟是一分土地也没有了，成了完完全全的佃耕农，那日子自然是更不好过了。

田地虽是卖完了，而有关田地的事却并没有完。不仅是没有完，还变成了一根绳索，束缚得孙家喘不过气来。

原来，过去变卖田地是很随便的，只要履行个简单的手续就行，那就是卖主写张契约给买主，买主付出约定的钱，田地就归买主了，而并不去官府申报盖印。当然，并不是不需要到官府申报，而是买卖双方都怕麻烦，都怕因申报而花去一笔似乎是多余的开支。对于卖主来说，他们尤其不想公开，卖地毕竟是件不光彩的事，何必弄得大家都知道？买主只要达到田地归他使用的目的，是乐得越简单越好。这样一来，人们就形成了一个惯例，田地交易都不申报，而是悄悄地私下进行。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卖地的已失去了田地，可在官府的地册上却依然写着他的大名，官府的衙役每年依然上卖主家收纳地下税。孙家便是陷入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

每到纳税之时，衙役们在孙家坐着，孙家小心翼翼地陪着，然后到真正的田主家将税钱收来转交给衙役。

这样做，孙家却是多了道麻烦。但只要能把税钱收上来，麻烦点也没什么。可是时间一长，事情就不再是跑一趟，代收一下那么点麻烦了，而是根本收不上税钱来。因为时间一久，地产已几易其主，转来转去，要想再维持原来收税的办法，确实是很难很难了。官府里仍是一到时间，就上门收税，孙家从田主那里收不到税钱，只好自己掏钱抵交税务。

于是，没有田地的孙家，却一直要代人交纳地丁税，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受拖累的巨大困扰，始终不得摆脱。

从孙文的爷爷开始，孙家就被这地下税搅得困苦不堪。一家人糊口尚且不易，到哪去弄钱赔出去呢？

年幼的孙文，并不知道家中还承受着这一桩不合理的重负。

他眼看着父母没日没夜地操劳，他和姐姐也同别家的孩子不一样，当别人在尽情玩耍的时候，他和姐姐却学会了做各种各样的活。尽管一家人辛辛苦苦、拼死累活，却依然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孙文心里很有些想不通，一天，他就问他的父亲：

“阿爸，咱家比谁都更加勤快辛苦，为什么日子倒不如别家好过呢？”

父亲叹口气，就把赔地丁税的事告诉了自己的儿子。

孙文一听，愤愤不平，大声说道：

“哪有这样的怪事！没有田地，却还要交田地税！阿爸，难道你就愿意交吗？你完全可以不睬他们嘛。”

老实厚道的孙达成，却没有儿子那份勇气和不满情绪。他看着眼前激动不已的孙文，虽然知道他说得对，但却丝毫没有受到感染和振奋，脸上仍是一副无可奈何、自甘认命的神态。然后，他不紧不慢地说：

“这都是祖上留传下来的，是我们的命不好啊。有什么法子呢？”

“这怎么是命呢？”孙文越想越气愤，他见跟父亲说不出什么结果来，就跑到冯爽观家去了。

自从听了冯爽观所讲的那些太平天国的故事，孙文打心眼里佩服眼前这位活着的起义英雄。冯爽观那满脸的络腮胡子，洪亮的声调和豪放的性格，处处都给孙文那幼小的心灵以巨大影响。所以，一有空，孙文就喜欢往冯爽观那里跑，有什么事，也乐于向冯爽观请教。

“大叔，你看这不公平的事，能不能想个办法把它改过来呢？”

说着，孙文满怀希望地盯着冯爽观。

冯爽观十分同情孙家的遭遇，也十分理解孙文此时的心情，但是，他能有什么法子来帮助他们呢？

“没法子可想，孩子，这都是皇帝老爷订的规矩，不是想变就能变的。”

孙文只好折回了家，心情沮丧极了。走着想着，心中的不满又强烈地升腾起来：

“皇帝订的规矩难道就不能变吗？”

抗抵恶行

古人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的是，一个人应该能够推己及人，由此及彼，就是要求人们不仅要顾及自己的利益，还须由此出发，也要为别人着想。

这是做人的一种高尚品德。而这种品德，在孙文那颗纯真无邪的心里，已深深地扎下了根。他不仅是反对给姐姐缠足，不仅是不满自己家中所承受的地丁冤枉税，更可贵的是，他只要遇上不合理的事，都敢于以他特有的和能够立刻采用的方式加以抵制和反抗。

下面，不妨从孙文童年时期许许多多的“反抗义举”当中，举几件说说。

翠亨村里的几家富户，如杨姓和陆姓两家地主，都蓄养了一批奴婢。这些女孩子，年龄都很小，不是由于家中贫穷，无法生活，就是欠下东家的债偿还不了，只好卖给东家做奴隶。

有一天，孙文拾了柴草回来，路过村庄，走到杨姓地主门口时，看到一对母女在啼哭。女儿嚎啕大哭，那声音凄惨无比，撕人心肺，两手紧紧拽住母亲的衣襟，边哭边哀求道：

“阿妈，不要丢下我。我不想离开阿妈。阿妈……”

阿妈听着女儿的哭喊、哀求，心酸得直掉泪，她努力克制着，不使自己再哭出声来。她抬起胳膊，用衣袖为女儿拭去眼泪，安慰道：

“孩子，别哭了。你先留在这儿。过一阵子，阿妈就会来接你的……”

“阿妈骗人，阿妈骗人，我要跟阿妈回家。”女儿越哭声音越响，两腿也跪了下去。

阿妈什么话也说不出，连忙蹲下去，紧紧地将女儿搂在怀里。

这时，从杨家大门口台阶上冲下来一个人，恶狠狠地将母女俩分开，没好气地说：

“有什么好哭的，又不是死了见不到了。”

接着，那人一手抓住女孩的手，像拎小鸡似的，把女孩拉进了杨家大院。

院子里传来女孩的阵阵哭喊：“阿妈，带我回家，阿妈……”

门外的阿妈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嚎啕痛哭起来。

目睹这一幕的孙文，难受得也直掉眼泪。他真不明白，那么小的女孩，为什么要离开母亲，杨家的人为什么那么凶？

回到家，孙文就把见到的事告诉母亲，并向母亲提出了一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

母亲看着这个好问好管的儿子，耐心地解释起来。

母亲说，母女分离，那是没有法子的事。是穷人被弄得无路可走，才把女儿卖到富人家。那些可怜的小女孩，从此以后，就像进了地狱，不仅再也享受不到父母的疼爱，甚至连见一面部很困难，而且还得干活，一天到晚，没有丝毫的自由。稍不如东家的意，轻则骂，重则打。吃的是东家不吃的剩饭剩菜，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服，过的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这些苦命的孩子”，母亲说着，也掉下了同情和伤心的泪。

听了母亲的一番话，孙文的眼前，又浮现出他刚才所见的一幕。他不禁为那个小女孩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起来。

这太不合理，太不人道了！孙文愤慨不已，他恨透了那些蓄养奴婢的家伙，是谁给了他们权力，竟然那样残酷地奴役、虐待别人的孩子呢？

孙文逢人就说，逢人就讲，尽情地把自己心中的不平与愤慨抒发出来，真可以称得上是大声疾呼了。这样做，虽然于事无补，但孙文的心却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因为他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做了自己能做的事。

又一天，孙文正在塾堂里读书。突然，一阵轰响传进了教室，把大家都惊呆了，霎时，所有的读书声都停了下来，大家一齐竖起耳朵，只听见那声响一阵紧似一阵地传来，并夹杂着呼喊与喧闹声。大家吓得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孙文和大家一样，也吃了一惊，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要去出去看个究竟。他悄悄站起身，趁大家不注意，就跑出了塾堂，直奔那声响而去。

孙文转过一幢房子，突然看到十几个头扎黑巾，短衣短衫的人。啊，是海盗！机灵的孙文，连忙缩回身子，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两眼却死死盯住这帮强盗。

只见他们抬着一根粗木头，拼命地撞击着一幢房子的大门。那屋里住着一户刚从海外回来的侨商。猛烈的撞击声如天崩地裂，震得大门摇摇晃晃。终于，咣当一声，大门被撞倒了。

海盗们挥舞着大刀，一拥而入。接着，传来海盗们的吆喝、叱骂声和女人孩子的哭叫声，乱糟糟的，响成一片。

不一会，哭叫声更响了。海盗们三三两两，抬着好几个大箱子出来，大摇大摆地出了村子，转眼就不见了。

这时，村民们才陆续围拢来，一个个惊魂未定，打听这，打听那。被抢的侨商老泪纵横，悲愤欲绝，断断续续地向人们诉说被劫的经过。说着说着，老侨商更伤心了：

“我在海外辛苦几十年，好不容易才积了一点钱，一下子全被抢光了。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难道就没有王法了！让我找谁去啊！”

老侨商已泣不成声。一直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的孙文，心里既难受又气愤。他懊悔自己为什么不长大一点，为什么没有一身好功夫，去帮助老侨商摆脱这场劫难？同时他又想到，海盗不就是十几个人吗？如果村民们团结起来，一齐出来制止，还怕斗不过那些强盗吗？

孙文想着想着，不觉攥紧了小拳头，心想，总有一天会收拾那帮坏蛋的！不久，村子里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

这一天，翠亨村一大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平静。数十名清兵在几名官吏的带领下，耀武扬威地开进了村庄。顿时，鸡飞狗叫，尘土飞扬，孩子们害怕得哭喊起来。大人们也都用惊恐的目光，打量着这些招惹不起的不速之客，害怕他们闯进自己的家。

清兵进了村，径直来到一所大房子前面，气势汹汹地把整座房子围了起来。然后，咚咚地打门，如土匪一般。门一开，几个清兵就冲了进去，不一会，抓出三个人来。

村民们一看，是这家的兄弟三个。他们犯了什么罪？人们正在纳闷，却见清兵把三兄弟一个个五花大绑捆起来，推推搡搡地押走了。

清兵们走了，那几个官吏却留了下来，占据了这户人家的住宅和财产。

这户人家的屋后有座园子，十分宽敞雅致。园里花草树木，郁郁葱葱，浓荫密布，幽静清凉。园中央有块草坪，草坪上的草浓密厚实，像一幅柔软的地毯。村里的小孩都喜欢上这园子来玩，孙文也不例外。

他们在花园里嬉戏，捉迷藏，在草坪上翻筋斗、练摔跤。真是自在极了，舒服极了！

可是如今，孩子们的乐园被几个官吏霸占了。他们很想进去玩，可又不敢进去，只能站在外面，眼巴巴地瞅上几眼。

孙文气极了，决心要与这不公平的事斗一斗。

这一天，他约上几个同学，一起去那园子，倒不一定是为了去玩，而是为了要与那几个官吏碰一碰。可是，当走近园子时，那几个同学都失去了勇气，任凭孙文怎样劝说，再也不肯往前挪一步。

孙文只好一个人往前走。他跨过一道破墙进入园子，映入眼帘的情景，真使他难以置信。整洁、繁茂的园子已失去了往日的风姿，花草被折腾得零零落落；树枝杈桠倒垂，像是被扭断了翅膀，令人伤心；垃圾、杂物扔得到处都是，肮脏得简直无从下脚。孙文一看，气得胸脯直鼓，“这帮坏蛋，把个好园子竟糟踏得如此不成样子！”

孙文真想痛骂一顿才解气，他不觉又往里走了几步，怎么一个鬼影见不到？正在纳闷，一个身佩弯刀的家伙，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小东西，谁叫你上这儿来的，快走！”

恶狠狠的语气，凶神恶煞似的，不仅没有吓跑孙文，反倒使孙文镇静下来。他站住脚，冷眼看了看这个令人厌恶的家伙，理直气壮地说：

“我是上这儿来玩的，为什么要走？”

“不许在这玩，快走！”那家伙的口气更凶了。

“为什么不许玩？这是他们三兄弟的花园，又不是你家的！”

孙文毫不示弱，驳得那家伙瞠目结舌，语无伦次起来：

“什么？屁话，就是不许玩！”

孙文又往里跨了一步，大声说道：

“我就是来玩！你们真不要脸，把人家三兄弟关进了大牢，就霸占了他们的房子。这是什么道理？”

“小崽子，竟敢教训起我来了。看我不好好地收拾收拾你。”

那家伙边说边拔出刀来，恶狠狠地朝孙文扫去。孙文一看苗头不对，早就机灵地躲开了，然后，转过身，一溜烟似的跑走了，那家伙追得气喘吁吁，哪里追得上，气得哇哇乱叫。

孙文跑回到同学们那儿，像是凯旋而回的英雄，心里痛快极了。

孙眉闯荡檀香山

正当孙文一天天长大，备尝生活艰辛，反抗人间种种不平现象的时候，他的大哥孙眉，却在人生的道路上进行着另外一种努力和拼搏。

几年前，只有十五岁的孙眉离开了家。家境的窘迫，使得孙眉小小年纪，就走上了独立奋斗的人生旅程。

他首先是到南荫乡一个姓程的地主家做长工。这个吝啬刻薄的地主整日让孙眉干着与成年长工一样的重活，却不像对待其他长工那样付给孙眉同样的工钱，只管三餐很不像样的粗饭。做了不久，孙眉便有些愤愤不平，就不想再干下去。他想换个地方，能挣些钱，好贴补家用，使父母不再那么辛劳无助，好让弟妹穿上像样的鞋子，不用再光着脚丫到处跑。

可是，到哪里去找赚钱的机会呢？孙眉只得苦苦挨着，在南荫干了两年。

这年春节，做完一年活计的孙眉回家过年，遇上了前来走亲戚的舅舅。舅舅比孙眉大不了多少，两人很合得来。晚上，舅甥同睡在一张床上。一躺倒，他们就海阔天空地闲聊，一聊就是一晚上。

一天晚上，舅甥俩又聊起来。聊着聊着，孙眉表露出自己想多挣钱、过好日子的愿望，得到了舅舅的赞同与支持。舅舅说：

“这日子是得想法子变一变。可在这黄土地上看来是弄不出什么名堂的。现在倒有个机会，就看你有没有胆量，敢不敢去闯一闯了！”

孙眉一听，来了劲头，立即回应道：

“什么机会？有什么可怕的，我敢去！”

“最近，有个在国外发了财的华侨，来香山招收工人，给的条件蛮不错。一个月的工钱，要抵我们这里好几个月。”

“什么地方，竟有那么高的工钱？”

“是夏威夷，在太平洋上。据说，那里地多人少，非常需要劳力。如果你想，我可帮你介绍。”

孙眉一骨碌坐起来，说：“我去，我去。什么时候动身？”

“别着急”，舅舅说，“光你愿去还不行，不知你爸和你妈同意不同意呢。如果同意，过了正月十五就要走。”

“舅舅，千万别告诉阿爸阿妈，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过了年之后，我就说仍去南荫干活。等我走了之后，舅舅再告诉阿爸他们吧。”

“这怎么行呢？”舅舅感到很为难。

“好舅舅，我求你了，帮我这个忙吧。”

孙眉不住地恳求，舅舅被他缠不过，只好答应了。

就这样，孙眉在舅舅的帮助下，悄悄离开了生活了十七年的故乡，离开了他的父母、弟妹，远涉重洋，来到了檀香山。

那是 1871 年初春的一天，孙眉和许多华工一起，挤上了一条破旧的货船。他仁立船舷，手扶栏杆，心潮起伏，激动不已，对茫茫前途充满了莫名的渴望与担心。面对渐渐远去的故土，他的决心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一定要挣很多很多的钱回来，让阿爸阿妈过上好日子，否则，我就不回来！

这一年，孙文才五岁。他只知道大哥出门做活去了，并不知道去了哪里，就连他的阿爸阿妈也不知道他们的大儿子已越过重洋，独自闯荡去了。他们以为孙眉还在南荫那个离家不过三里地的地方干活呢。

孙眉来到檀香山以后，先到一个菜园做工。那是一片很大的菜园，足有

好几百亩，受雇在园子里干活的有七八十名华工。菜园子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很多都是孙眉从未见过的，更不要说指出它们的名字了。

孙眉在菜园里的活，主要是担水、除草、施肥，然后在蔬菜成熟之后，把菜运送到集市上去。他在一名老雇工的指点下，很快学会了那一套活。从早到晚，从这块地干到那块地，工作的时间很长，活儿繁重而单调，每天下来，孙眉都感到很累很累。吃过饭，往床上一倒，他就呼呼睡去，沉得连什么梦也没有。

第二天，又重复着昨天的一切。

虽然苦点，累点，但孙眉感到很充实。因为干一天，他就能得到一天的工钱。而那一天的工钱，实在不算少。他就是为挣钱而来的，既然有钱可挣，为什么不卖力呢？何况他正值青春年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于是，他才干了几个月，就把划归他管理的那一块菜园，管理得井井有条，各种蔬菜长势良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而孙眉本人，则以他的手脚麻利、勤快灵活、处事老成、谦虚好学，得到了人们的赞扬，也得到了场主的注意和赏识。

这天，孙眉刚收工，正打算去吃饭，突然有人告诉他，说场主请他去一趟。

大家都知道，场主有请，不是祸，便是福。孙眉心里一惊，怀着忐忑与不安，走进了场主的办公室。

场主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坐着，一副安然自得的神态。他以审慎的目光打量着孙眉，半天才说道：

“小伙子，你知道我请你来的目的吗？”

“不知道。”孙眉小心翼翼地回道，心情不免紧张起来。

“小伙子，我看你挺能干，人也机灵，想提拔提拔你，让你去我的另一个牧场干活，工钱比现在的高出一半。你愿意吗？”

孙眉喜出望外，连忙应道：“愿意。谢谢场主提携。”

这样，孙眉便来到了农牧场，连头带尾，他不过在菜园里呆了十一个月。

牧场一望无际，绵延到天的尽头。碧绿的青草，密密麻麻；挺拔的芦苇，比人还高；肥硕的牛羊，漫山遍野，在广袤的牧场上自在来往。与菜园的宁静、恬淡的气氛明显不同，这里处处透露着喧嚣、粗犷甚至带一点野性的奔放。

初来乍到的孙眉，不禁为这种他从未见过的气势和豪放所深深吸引，并给他那充满追求和向上的心以激励与振奋。他更加勤奋地工作，更加用心地去对待他所接触的一切，尽可能把所要做的事做得完美无缺，不留遗憾。

可以说，从菜园到牧场，这一次小小的迁升，更增添了孙眉闯世界的信心，更激发了他挣大钱的雄心。于是，他在勤奋工作的同时，又以敏锐的观察力默默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留心学习一切有关生意、经营上的学问，耐心等待着更大机遇的降临。

一晃几年过去了。孙眉在不断的劳作中，得到了艰苦磨炼，增长了丰富的才干，这时的他已不再是个一般的苦工，而已成了一个有着相当经验和不乏主见的管理人员；他已不再满足于眼前的这份工作，而是向往着拥有自己的牧场，自己进行全面管理的牧场。他充满信心，一旦给他一个牧场，他肯定会比目前所有的场主都管理得更好。

他的这一理想，终于在他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冒险精神的促发下很快实现

了。

来夏威夷几年，孙眉虽然一直给家中寄钱，但他自己还是积攒了不少。他知道，要想干一番事业，要想拥有自己的牧场，没有钱可办不成。因此，他把挣来的钱，除了寄走一部分之外，剩下的全都积攒下来。他非常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他一门心思：挣钱——余钱——再挣更多的钱。

有了一些钱之后，孙眉的胆子更大了，希望做牧场主的要求也更迫切了。

正在这时，夏威夷政府为了迅速开发岛上那大片大片的蛮荒之地，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推出了向人们出租土地的措施。只要缴纳规定的租金，任何人都可以租用到相应的土地，也就意味着可以做个名副其实的农场主。

这是个十分诱人的措施，稍有胆识和积蓄的人，都可以一试。而在这两点上，孙眉恰好都已经具备了。于是，他承租了整个茂宜岛，从此结束了他做苦工的岁月，开始了经营管理，做农场主的生涯。

茂宜岛是夏威夷群岛中的一个重要岛屿，不仅面积较大，而且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是垦殖牧畜的好地方。为了承租茂宜岛，孙眉花去了所有的积蓄还不够，另外还借贷了一大笔款子。有个从香山老家与孙眉一起来檀香山做工的熟人，很替孙眉担心，便好心地劝阻道：

“还是老老实实干活吧，挣几个安稳钱算了。承租可是太冒险，弄不好鸡飞蛋打后悔就来不及了。”

“谢谢你们的关心，我自己心里有数。”

孙眉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按照自己的构想去大胆描绘事业的蓝图。他懂得，要想赚大钱，就必须敢于冒大的风险；不冒风险，按部就班，则永远不可能发家致富。同时，他心里有本很清楚的帐，只要经营妥当，要不了多久，他就能还掉所有的债务，收回成本，然后大把大把地赚钱……

他的如意算盘确实没有打错。

孙眉办理好各种手续，立即赶赴茂宜岛，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他花了几天时间，对全岛作了一番全面考察，然后因地制宜，作出了具体规划：什么地方耕种庄稼，开办农场；什么地方适合作牧场，养殖牛羊牲畜；什么地方辟为果园，种植咖啡，香蕉或甘蔗，如此等等。

他精力充沛，整日忙上忙下，不知疲倦。他雄心勃勃，提出一个又一个计划。与此同时，他招收了大批工人，给他们比任何一家农牧场都更高的工资。开工之后，工人出身的孙眉，也表现出一般农场主从未有过的对工人的关心与体贴，因此，他虽然多付了一些工钱，却赢得了工人干劲和信赖。他们都乐意为这个慷慨大方的场主出力。

短短的时间里，孙眉的经营就走上了正轨，一切都在按照他所预料和谋划的方向迅速发展。为了配合农牧果场的生产，孙眉还开设了一家店铺，经营的路子就更为开阔和活络了。

孙眉成功了，他从一个贫苦的打工仔，一下子成了夏威夷群岛上一个受人尊重和敬佩的华侨资本家。人们都称他为“茂宜王”。

大哥回来了

孙眉经过一番艰苦奋斗，终于摆脱了贫穷的缠绕，一跃而成了夏威夷岛上一个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他没有忘记故乡的父母，也没有忘记家中的弟妹。他把吃苦流汗挣来的、苦心经营赚到的钱一笔一笔寄回家，源源不断，越来越多，使家中的境况发生了很大转变。

1877年，孙眉已整整二十三岁了，离开故乡也有了七个年头。孙达成夫妇十分想念远在海外的长子，算算年纪，他早就该娶亲成家了，心里不免又为儿子着急起来。于是，他们就让人捎了口信，叫孙眉回一趟家，把终生大事给办了。

孙眉接到口信，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他何尝不想家，何尝不想念自己的父母？是该回去一趟了。父母都老了，弟妹们都长大了，家乡可有什么变化？一想到这里，孙眉更激动得坐立不安，恨不得立刻飞回那别离已久的故乡，回到日思夜想的父母的身边。

孙眉立即行动起来，开始做回乡的各种准备。他一边着手处理、安排农牧场和店铺的事务，一边一趟又一趟地上街采购，购买了夏威夷岛上各种各样新奇、贵重的礼物，大包小包，整整装满了几个大箱子。

不久，一切准备妥当，孙眉便踏上了回乡的旅途。当轮船启锚、隆隆开动时，他走上舱板，站在船舷边，眺望着无边无际的海的尽头，故乡的模样隐隐约约地浮现在眼前，两眼禁不住湿润了。

七年前的那个穷小子，悄悄地离开了家，破衣烂衫，前途未卜；如今却成了富裕的侨商，堂堂正正把家还，西装革履，信心十足。这一切，仿佛是在做梦。然而，这不是梦，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我就是那个穷小子。大海，你还认得我吗？我如今气气派派地回来了。”

孙眉那颗激动的心，一下子被喜悦和自豪占满了。那是奋斗的喜悦，那是成功的自豪。

六月的一天，晴空一碧，万里无云，耀眼的阳光直射在人们的身上，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孙文正同他的母亲在地里除草，太阳越来越高，越来越毒，晒得孙文汗流浃背，口渴难忍。他走到地头，去拿水喝。他提起茶筒，仰起脖子，正在喝水，却又停住了，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前方。

只见一行队伍朝他即翠亨村的方向走来。前面是一乘轿子，轿子上坐着一个他十分面熟的青年人，轿子后面跟着几个脚夫，一个个挑着沉甸甸的行李。行李旁边都贴有一块四方形的红纸，上面各有一个大大的“孙”字。这不是大哥嘛！

“阿妈，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

孙文兴奋无比，转过头，向他的母亲大声地喊起来。

可是母亲并不相信，她抬起头，看了看迎面而来的一行人轿，不觉有些好笑，说：

“这哪会是你大哥。”

“就是我大哥，没错。”孙文依然坚持。

“看你想大哥想疯了。大哥走时你才三岁，你怎么认得大哥？”

“我就是认得。这人与家中像片上的大哥一模一样，行李上又都有‘孙’字，不是大哥是谁？”

母子俩正在争论，那一队人轿已越走越近，不一会就来到了地头。只听轿子上的青年人大声喊道，既激动又亲切：

“阿妈，阿妈——”

轿子上坐的正是孙眉，当轿子踏上他熟悉的田间小路，梦牵魂绕的故乡翠亨村整个地呈现在他的眼前时，他激动的心像是要蹦出来。他东张西望，四处打量，一切还是老样子，一切都没有变化。多么熟悉，多么亲切！突然，他看见在自己曾经劳作过的田地里，有两个人在干活，一个妇女，一个男孩，这不就是阿妈和弟弟！

孙眉欣喜异常，以至不能在轿子上安坐。他身体前倾，眼睛定定地盯住田里阿妈的身影。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他已经能看清母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庞了。啊，老多了，他脱口而出，高声大喊起来。

真是大儿子回来了！母亲答应一声，连忙放下手中的活，一面欣喜地望着那顶轿子和轿子上的儿子。

孙文边跑边喊，“大哥，大哥！”转眼就到了轿子跟前。

孙眉急忙跳下轿子，握住阿弟的手，忙问，“你就是帝象，长这么大了？”然后，兄弟俩一起来到母亲面前，孙眉悲喜交集，满怀深情地喊道：“阿妈！”

“哎！眉儿，真是你回来了……”话还没说完，母亲的泪水就下来了。

孙眉看了，心里也一阵发酸，不由得热泪盈眶。

懂事的孙文，看看母亲，又看看大哥，忙把茶筒递给大哥，“大哥，喝点水吧！”

孙眉却把茶筒交给母亲，说：“阿妈先喝。”

母亲不肯接，推回茶筒，“还是眉儿先喝吧！有七八年没喝到家乡的水啦！”

孙眉不再推让，举起茶筒，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个饱，“家乡的水真甜啊！”

母亲端详眼前这个举止大方，服装整洁，潇洒气派的大小伙子，真不敢相信竟是自己的儿子。不相信也不行，他确实就是自己的大儿子，就那个七年前那个偷偷溜出家门，一人出洋闯荡的猛小子。一阵喜悦与激动涌上她的心头，忙说：“眉儿，咱们回家吧！”

一听说回家，孙文就在前面跑起来，边跑边喊：“我大哥回来了！我大哥回来了！”喊声从村外一直响到村里，引得人们都以惊羨的目光打量着焕然一新新的孙眉，悄悄议论、称赞这个敢闯能干的孙家的大儿子。

这一天，孙家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和热闹。一家人，因为孙眉的回来而喜气洋洋，母亲和姐姐在锅台前忙个不停，烧着各种好吃的，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父亲坐在桌前，一边抽着儿子带来的外国香烟，一边同儿子聊着。孙文则站在大哥身边，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谈话，不时也提出一两个问题。

不久，邻居们来了，向孙眉问长问短，孙眉高高兴兴地一一回答，一批没走，又来一批。又是问这问那，孙眉不厌其烦，又是详详细细地回答一通。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村邻们这才陆续离去，热闹了一整天的孙家，终于进入了一家人静静团聚的时刻。母亲端上大盘小盘的菜肴，姐姐布好碗筷、酒杯，一家人团团围坐在桌前，吃上了七年来的第一次团圆饭。

一家人有说有笑，亲亲热热。这天晚上，孙中山吃得很多很多，从来没有那么饱过，从来没有那么舒畅过，他沉浸在极度的兴奋和喜悦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哥回家所带来的兴奋与喜悦，慢慢冲淡了。然而，却在孙文的头脑中，激发了另一种感情，那就是对大哥的钦佩，对外面世界的热烈向往。他多么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大哥那样，去异国他乡闯荡一番，干一番事业，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来。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孙眉把孙文叫到身边，问道：“去三乡的路你认得吗？阿弟。”

孙文毫不迟疑地回答：“认得，前不久我跟阿妈还去过一趟。”

孙眉见孙文那份机灵样，心里十分高兴，就拿出一篮子礼物，交待道：“那好。你把这篮子东西送到平岚村去，交给村头的一个老伯，并告诉老伯，这礼物是他在檀香山做工的儿子捎来的。”

“是，保证送到。”孙文接过篮子、高高兴兴上了路。

从翠亨村到三乡平岚村，将近有二十里的路程，途中要经过一个叫痾屎环的偏僻地方。那地方，据说常有专干抢劫或拐卖小孩的坏人出没。走到这地方时，孙文的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再加上一路奔波和天气炎热，浑身上下都是汗。他不知不觉加快了步伐，想尽快通过这段是非之地。

突然，一个不三不四的家伙，从小土坡后面窜了出来，把孙文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又镇静下来。心想：果然遇上坏人了，得小心。

只见那家伙干笑几声，没头没脑地与孙文搭起话来：“小孩，上哪去呀？”

“你管我去哪！”孙文这么想着，嘴上却说：“我去平岚村。”

“那好，咱们正好同路。”说着，那家伙就与孙文并肩走起来。

孙文断定这家伙没安好心，但是他不动声色，一边走，一边说着话，显得很随便很亲热的样子。

两人边说边走，不知不觉来到了河头埔村头。孙文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放下篮子，突然对那家伙说道：

“我要拿点东西进村送人。你帮我看一下篮子，我一会就回来。”

说着，孙文果然从篮里取出一些东西，就往河头埔村里走去。

哪知，孙文根本不是送什么东西，而是到村里喊人的。他找到一个熟人家里，把情况一说，那熟人连忙喊了几个小伙子。随同孙文一起赶到了村头。

那家伙哪里知道一个小孩会有这一手，仍然痴痴呆呆地等着孙文回来，好完成他的丑恶勾当呢。正在得意，见孙文带着一帮人一起出了村，想跑已经来不及，只好硬着头皮站着不动。

一阵盘问，问得那家伙张口结舌，紧张得大汗淋漓，可想而知不是个好人。大家七嘴八舌，把那家伙教训一通。那家伙自觉没趣，就灰溜溜地走掉了。

孙文送过东西，回到家把这事同父母、大哥一说，大家都夸他聪明能干，有胆量。尤其是他大哥，更是眉飞色舞，开心得哈哈大笑。他对这个活泼机灵的小阿弟，自然是加倍地喜欢起来。

孙眉回乡之后，上门提亲的可真不少。虽然孙眉出外跑了一趟，但对婚姻大事，还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旧式的一套。不久，就由父母做主，定下了一门亲事，并且很快完了婚。

第二章 求学之路

初见世面

孙眉娶亲结婚，自是孙家的一件大喜事。婚事操办得风光体面，热闹非凡。这在孙中山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婚事之后，孙眉过了一段舒适恬静的生活。然后，便着手办理招募华工的公务。

原来，经营有方的孙眉，在此次回乡之时，得到了檀香山政府的特别准许，准许他多招华工赴檀，进一步发展岛上的垦殖畜牧业。

孙眉乐于担当这一角色，他四处奔跑，不断地向人们介绍檀香山的美丽与富饶，不断地向人们鼓劲：去檀做工，一定能多挣钱并逐渐富裕起来。

孙眉的介绍和鼓动很有魅力。他不仅细致生动地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海岛风光，而且展示出挣钱的巨大潜力和致富的广阔道路，引得村邻中的小伙子，一个个跃跃欲试，就连孙中山，也被他大哥的介绍与描绘所吸引，不禁心神向往。

其实，最好的样板还是孙眉本人。这个孙家的穷小子，如今的阔侨商，他的经历，他的致富道路，便是最有说服力的广告。他形象地昭示：明天的你和他，也会像我那样发达起来。

于是，陆陆续续有一百多人报名，愿随孙眉前往檀香山。

到了9月，孙眉回乡不知不觉已呆了三个月。他十分放心不下檀香山的生意，心想，是到了该回檀的时候了。

一听说大哥要走，对海外钦羨已久的孙中山，便提出要与大哥一起走。孙眉倒没什么意见，非常乐意带上这个机灵活泼的阿弟，可是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和坚决制止。

两位老人，对出外谋生，总还心存疑虑和莫名的恐惧。虽然儿子孙眉是风风光光地回来了，但是，他们阿弟的惨死，尸骨无归的后果，都给了他们痛悔莫及的打击，给了他们铭刻在心、终生难忘的痛苦，尤其是当他们一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在得知失去儿子后的那种悲恸欲绝的表情时，心里就不寒而栗。何况，两个儿子已经出去一个，另一个就该留在身边，要为孙家留条根苗。

可是，小小年纪的孙中山，怎能体会得到父母的这种感情与担心。他依然吵着、嚷着，就是要跟大哥走。然而，父母像是铁了心，任凭孙中山如何吵嚷、恳求，就是一百个不答应。最后，还是孙眉安慰弟弟道：

“你现在太小了点，等长大些，我一定带你出去。”

孙中山无可奈何，嘴上虽不再说什么，心里却是难受极了，失望极了。

不久，孙眉告别父母，领着招募的华工，匆匆走了。

孙中山的心也跟着大哥飞走了。很有一阵子，他觉得做什么都无心无绪，提不起精神，课前饭后，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家门口，久久地望着大海的方向发呆。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一天，孙中山放学回家，见家里来了客人，原来是大哥在檀香山的同事郑强。他这次受大哥委派，一来招募第二批华工，二来特请孙达成夫妇携阿弟一同前往檀香山生活。

孙中山一听，高兴得跳起来，就催着父母答应赴檀，恳求父母带他一同

前往。郑强在一旁，也帮着劝说。

年事已高的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去。倒是母亲听了郑强的劝说和帝象的恳求，心里开始活动起来。她决定去海外看看，去看看自己的大儿子在那块神秘的土地上开辟的天地，并且愿意带上小儿子帝象一起去。父亲虽说不大情愿，也不好再反对。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1878年5月初的一天，孙中山跟在母亲的身边，在郑强的关照下，登上了开往檀香山的轮船。孙中山向往已久而屡次无奈的心，终于得到了满足。他兴奋无比，好奇无比，睁大眼睛，仔细地观察着出现在眼前的所有的新鲜事物，仔细地体味着所有的新鲜事物给予他的非同寻常的感觉。

首先，是他所乘坐的那艘巨大轮船，船上的一切，使孙中山感到新鲜而惊讶。

这是一艘排水两千吨的英国轮船。巨大的船体，足有十余间房子那么长。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航行的呢？见不到一个人划桨，一点也不像香山的小木船，只有隆隆的机器声，船头犁出一股股巨大的浪花，飞速地向后退去，那船便划出一条水道，神气十足地往前奔。真是奇怪！世界上竟还有如此令人感到新鲜奇妙的东西。

最使孙中山着迷而引起他的遐思的，是轮船上的那根铁梁，实在大得令人难以想象。孙中山一边看，一边用手摸着，心想：这么巨大的铁梁该有多重呢？它是怎么装配上去的呢？发明这铁梁的人真是天才，一根铁梁，将船的两边紧紧地连贯在一起，使船体显得更加结实坚固了。为什么中国人只能做那种小木船，而不会做这种巨大而坚固的铁船呢？

想着想着，一种深恨自己国家落后的不满情绪，便闯进了孙中山的脑海中。

孙中山默默地走回舱底，心里不觉有些郁闷。

机器声隆隆不断。轮船在茫茫的大海中，继续航行。

一天早晨，正在熟睡的孙中山，被郑强喊醒了。“小阿弟，走，看日出去。”

孙中山迷迷糊糊地跟着郑强来到甲板上。那里已稀稀疏疏地站着一些看日出的人。前行的轮船，带动着清晨的海风，一阵连着一阵，向孙中山吹来。那略带咸味的海风，既使他清醒振奋，又使他舒服惬意。

“小阿弟，快看，太阳就要出来啦。”郑强边说边用手指指示着观看的方向。

孙中山眺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只见海天紧紧地吻合在一起，茫茫一片，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海。

慢慢地，前方的天际处泛出了一抹微红，那红越来越浓，越来越高，最后焕发成一道道清晰而柔和的光芒。接着，一个大火球从水中渐渐浮起，像是被人顶出了水面，巍然屹立在海面。整个大海被鲜红的太阳映照得像是一匹红盈盈的绸缎，散发出晶莹耀眼的斑斓。

孙中山看得呆了，脱口喊道：“很好看，好漂亮哟！”

这海上日出的美丽与壮观，深深震撼了孙中山，给那单调、乏味的海上之行带来了不少的生气与活力。

这天，好奇的孙中山，又在船上走来走去，这里看看，那里摸摸，总也看不够，总也摸不够。不知不觉，他转到了水手住的顶舱上。只见几个外国水手跑出跑进，嘴里叽哩咕噜，不知在说些什么，脸上的表情却是严肃而神

秘。

孙中山壮着胆子，悄悄走近那间舱房的门口。朝里一看，只见地板上躺着一个死人，浑身上下穿着一套白衣裳。光着脚，五个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两只手交叠在胸前，脸色灰白，双眼紧闭。孙中山不觉吓了一跳，忙往后退了几步。

可是，好奇心又驱使他靠近门去。他屏住呼吸，想看个究竟，看看外国人到底是如何处理尸体的。

这时，一个水手打来一盆清水，把毛巾搓了搓之后，小心翼翼地在死者的脸上擦拭一遍；另一个水手拿来一只很大的帆布袋，几个人便七手八脚，把尸体往袋子里面装。那袋子实在够大，整个人全都套了进去，竟丝毫也没露出什么来。然后，水手们又放进去一个小包裹，大概是死者生前用过的什么东西；接着，又塞进去几块沉甸甸的铁块。没什么需要再放进袋子里，一个水手就用针线将袋口缝起来。最后，他们又用绳子，在布袋的上中下三个地方，分别紧紧地捆绑了几道，尸体的轮廓又清晰地凸现出来。

一位长者，像是水手们的头，说了句什么，水手们立刻全都行动起来。只留下四个水手抬那帆布袋，其余的全都去了甲板上，排成整齐的队列。

不一会，洪亮而沉重的钟声敲响。四个水手抬起，在钟声的轰鸣中，默默地走向甲板。甲板上的水手站得更直了，一个个神情肃穆地注视着那缓缓移动的帆布袋。

抬袋子的四个水手，在船舷边停下了。一个水手拿了面鲜艳的旗帜走上前去，把旗子裹在帆布袋的外面，又用绳系好。

然后，所有水手在那位像是船长的人的带领下，做起了祈祷。他们一个个把右手掌竖在胸前，低着头，嘴里一阵嘀咕。

与此同时，四个水手继续往前走了两步。他们把帆布袋的一头搁在船栏上，然后将后面一头高高举起。帆布袋顺着船边，迅速下滑栽进了大海。

等孙中山伸头去看时，帆布袋早没有了踪影，只有汹涌的海浪在发出巨响，海风迎面抚摸着他那惊讶莫名的头脑。

对于眼前这一幕，孙中山实在难以接受。一具尸体扔进海里，被海浪冲来荡去，还会被鱼儿撕咬，到最后，一定会弄得什么也没有。这样做，对死者实在是太残忍了。船长有什么权力不把尸体归还他的家属，竟然投入这茫茫无边的大海？

他想起在自己的家乡，想起自幼耳闻目睹的一切：一旦死了人，人们总是四处寻找风水好的地方去安葬他。每到清明，家属又可以很方便地去坟头祭扫一番，寄托对逝去亲人的思念。而眼前的情景竟是那样的不合常理。这样想着，比较着，更激起了孙中山的不平。他转过头去。瞪着两只眼睛，将探索的目光在那些水手尤其是船长的脸上狠狠地扫了一遍，希望从他们的表情和神态中寻找出不合理的残忍无道的东西来。

但是孙中山失望了。那船长和所有的水手一样，都默默地站在甲板上，神情严肃而虔诚地注视着大海，像是在给他们的朋友送行，祝福他们的朋友，在大海的宽阔胸怀里找到宁静而安详的归宿。

难道他们并没有错，而是自己错怪了他们？为什么不能海葬而一定要土葬呢？土葬就是对的吗？孙中山原来的想法不禁开始动摇了。他凝望广阔无垠的大海，想到自己即将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觉得自己原来所奉行的那一套规则 and 标准，显得是多么的狭隘和幼稚？

他轻轻地抚摸着厚厚的船舷，终于明白了：这世界大得很，新鲜事多得很，他才不过见到一点点世面，才不过领略到这世面的一点点奇异而已。

他必须以活跃的头脑，以豁达的胸怀，以锐敏的观察，去迎接，去审视这世界的一切！

店铺中的小伙计

轮船在茫茫的太平洋上，颠簸了二十多天，终于抵达檀香山。

轮船发出长长的一声啼鸣，一股浓烟从粗大的烟囱口奔涌而出，然后慢慢地平息下来，就像是一个长途跋涉之后的人，在喘着粗气，努力清除满身的疲倦。

满船的华工，一起涌到了甲板上，满怀着惊异的目光，贪婪地眺望着他们的目的地。这就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他们即将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工作，然后像孙眉以及其他一些人那样发起来。看着，想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和兴奋油然而生。

孙中山与母亲夹杂在人群中，郑强站在他们的身边，不时地伸出手来，指指点点，向他们作点简单的介绍。

缓缓地，轮船渐渐向码头靠上去。到处张望的孙中山，突然对母亲说：“大哥，阿妈看。大哥接我们来啦！”

然后，孙中山就大喊起来：“大哥——”边喊边挥舞着手臂，高兴得直跳。

孙眉也看到了母亲和阿弟，他答应着，连连挥手。

轮船终于靠稳了。华工们争先恐后，接踵而下。孙眉逆着人流，往船上走。好不容易，才挤到母亲身边。他兴奋、激动地搓着大手，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亲亲热热地喊了声“阿妈”，就什么话也没有了。然后，挥手在阿弟的肩膀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说：“大哥等你三个小时啦，这下你该满意了。”

孙中山高兴得直咧嘴，兴奋地盯着他的大哥。大哥的一切都使他着迷、钦佩。是大哥把他带出了家门，来到这奇异的地方。真是个好大哥，一个说话算话的大哥。一种感激之情，在孙中山的胸怀里逐渐弥漫开来。

对于母亲和阿弟的到来，孙眉高兴的心情无法形容。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尊敬和孝顺，他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陪伴着母亲和阿弟，在夏威夷群岛上游玩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到一处，孙眉便就他所知道的，详细地向母亲和阿弟介绍，包括岛上的历史遗迹、风土人情。

夏威夷，一个风光绮丽的群岛，中国人称之为檀香山。它位于太平洋的中部，成为东西方交往的必经之地，享有“太平洋的十字路口”的美誉。靛蓝色的海水，簇拥在群岛的四周，形成海天同宽的奇景。黄金似的沙滩，在日照下闪闪发光，柔软得如同一张巨大的毛毡。晶莹洁净的温泉，随处可见，长年不断流。挺拔的紫山，翠屏似地矗立在岛中，显得更为峻峭巍峨。草苇茂盛的荒地，广阔无垠，绵延到海天的尽头。终年不息的活火山，常常喷火冒烟，流出的熔岩带着热气缓缓移动，荡漾成浩瀚千顷的岩浆带，蔚为世界的一大奇观。

而且，这里的气候十分宜人。虽然夏威夷地处热带，但一年四季，气候温和湿润，并无酷热。温和的气候，适合各种生物的生长，岛上土地肥沃，森林密布，枝繁叶茂，奇花烂漫。许多热带作物，如甘蔗、菠萝、咖啡、香蕉以及水稻、烟草，都是岛上的名产，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享有盛名。夏威夷美丽而富饶，无怪乎西洋人把它称为太平洋的乐园，也难怪不少华侨把它描绘成现实中的桃花源。

此后，孙眉一有空，或只要能腾出时间，就陪着母亲聊天谈心，出外游览，毕恭毕敬，克尽孝道，把个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照顾得开朗舒心，竟使

母亲有些过意不去。

这样的参观游览，这样的快活自在，对于孙中山来说，却是他从来没有领略过的，也是他求之不得的。十三四岁的他，正是敞开心胸，拥抱世界的时候。他跟在大哥、母亲的身后，到处观赏，仔细打量。异域的风土人情，旖旎风光，都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不知疲倦地跑着、看着、记着，想把看到的一切，都铭刻在脑海里。

在所有的景致当中，最令孙中山着迷而惊异不已的，是那腾腾冒火的火山。他真弄不明白，这山怎么会冒火喷烟？那火是从哪里来的呢？问大哥，大哥也说不清。“这世界上的趣事真多”，孙中山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弄清这火山喷发的奥妙呢。”

有一天，孙眉陪母亲阿弟上街游玩，顺便在邮局发了一封信。他在信封上贴了一张小小纸片，将信投入一个箱子，转身就走。

孙中山见了奇怪极了，就问大哥：“那信投入箱子，怎么就能到达收信人手中呢？”

大哥告诉他，只要在信封上写明地址，贴上邮票，世界各地都能去呢。而且很快，比如寄信回中国老家去，就不必等候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能找到一个归国侨民来带信，什么时候想寄都行。

“大哥以前写信和寄钱回家，就是在这儿寄的吗？”孙中山想起在家中不时收到大哥信款的事，就又追问一句。

孙眉点了点头。孙中山惊愕不已。真是所神奇的房子！他边走边又回过头去，仔细打量那被称为邮局的房子，却又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母亲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执意要回去，尽管生活得舒服，孙眉照顾得体贴入微，但她还是觉得不自在。时间一长，就呆不住了。

可孙中山不想走。母亲见夏威夷确实是个好地方，大儿子的事业又蒸蒸日上，也就不强求帝象跟她一起回去；对于孙眉来说，当然希望阿弟能留下来，学习学习商务，成为他生意上的好帮手。

这就样，母亲搭船回乡了，孙中山跟着大哥，留在了檀香山。

母亲回乡的当天晚上，兄弟俩一起吃晚饭。大哥给自己斟上酒，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又盯着孙中山看了一会，若有所思的样子，然后问道：

“阿弟，从明天起，到我的店铺中帮帮忙，好不好？”

这时的孙中山，正沉浸在得以留下来的喜悦当中，叫他干什么自然都乐意，他爽快地答应下来，并反问道：

“我做些什么呢？”

孙眉又喝了一口，说：“就是学习卖东西，记记帐，明天到了店里，我再跟你细细地说。”

孙中山听说有活干，似乎来了劲头，那晚上的饭吃得也特别的多，特别的香。

第二天一早，兄弟俩便一起去了商店。商店设在茂宜岛的茄荷蕾埠上，孙中山前不久去过一次。不过那是陪同母亲一起去参观，只是走马观花似的转了一圈。今天可不一样，他是要去店至干活，帮助哥哥管理店铺。他十分兴奋，突然有了一种长高长大的感觉。走到店门口时，他的脚步更有了弹性，就像要往上升腾，往上飞跃。

店员们见老板带着他的阿弟来了，便一起迎出柜台来，十分恭敬。孙眉挥挥手，让他们各去忙自己的，只是把店中的管事留了下来，很客气地对他

说道：

“管事，我阿弟就交给你了，请你多费神，教他学会记帐。

这之后，我再另安排份更重要的事让你做。”

那管事答应一声，友好地瞧了瞧孙中山，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孙眉转过身，又对孙中山交待道：“阿弟，你在店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跟这位师傅学记帐，了解、掌握店中的生意往来情况。空闲的时候，就在柜台上帮帮忙。”

“是，大哥。”孙中山欢快地应诺下来，又对着那管事，有礼貌地喊了声“师傅”。

孙眉交待完毕就走了。孙中山便跟着管事进了店堂。那管事从抽屉里拿出几个帐本，让孙中山坐下，然后详详细细地作了一番介绍。这个本子记什么，那个本子该怎么记，这样说了一通之后，管事的最后说道：

“小阿哥，你再自己看看，有不懂的地方问我，我再跟你说。”

管事的说得清楚，孙中山听得明白。接着，孙中山又把那些帐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要不了多半天，孙中山就对记帐的事有了个大致的眉目。

孙中山的机灵、聪慧，引得那管事十分高兴，话也不觉多起来。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如数家珍似的，把商店的情况里里外外说了个遍。到最后，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向孙中山问道：

“小阿哥，你会打算盘吗？”

“不会，”孙中山应道。

“噢，那可不行。学记帐，一走要学会打算盘。明天开始，我教你。”

第二天，店堂里就响起了噼哩啪啦的算盘声。孙中山端坐在桌前，按照管事所教的口诀，专心致志地练习起来。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

此后的一段时间，孙中山一面学记帐，一面学珠算，学了加法学减法。过往的人们，总能看见一个拖着长辫子，头戴蓝皮帽的小男孩，坐在桌子后面，不停地拨弄着算盘珠。

孙中山也不时地来到柜台前，看店员如何做买卖。来店中买货的，大多是当地的揩奈楷人。他们说的是本地的方言，既快又模糊，对孙中山来说，无异于天书，一点也不懂。可那些店员，即从大陆来的华工，都能听得懂，并且能对话。每当进来一个揩奈楷人，他们就用当地的方言交谈，显得亲热而融洽。

这一情景引起了孙中山的兴趣。他便向店员们学习揩奈楷人的方言。这个东西怎么说，那件物品叫什么，完全与中国话不同。两相对照起来，显得很有趣。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奇怪的发声，极不自然的节奏，引起了店员们一阵又一阵笑声。有了揩奈楷人进店，孙中山便主动上去搭话，努力地听，费力地讲，并不时地辅以手势来帮忙。等客人走了之后，孙中山已憋得满脸通红，累得满头是汗，那些店员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就这样，好学而机敏的孙中山，既很快学会了记帐，能够独立地应付一些简单的生意往来，又学会了揩奈楷人的方言，能够较为自然地与这些异国他邦的人交流了。

孙中山自小就做惯了各种活，养成了勤快而不怕吃苦的性格。每天来到店里，他除了学做他该做的事情外，只要一有空，他就主动地去干这干那。擦桌子，打扫店堂，整理货架，搬运货物，什么事都干，从来不嫌脏、不嫌

累。店员们同他开玩笑，说：

“小阿哥，你是我们的老板。这些活用不着你做。”

可孙中山回答：“我不是什么老板。就是老板，也要干活嘛”。

一天，孙眉来店里巡视，顺带问问阿弟在店中的情况。管事和店员们都在他的面前直夸孙中山，夸孙中山聪明好学、勤劳能干。孙眉听了，乐得哈哈大笑，脸上泛出喜悦、自豪的光芒。

“阿弟，过来”，孙眉喊道。

孙中山离开帐台，来到大哥面前。

“阿弟，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有的话，就向大哥提出来。”

孙中山想了想，说：“我就觉得清算帐目有些困难。”

“噢，我知道了，你还从来没学过算术。这样吧，我送你去盘罗河学校补一补。到时你就不会再觉得难了。”

于是，孙中山来到盘罗河学校，集中一段时间，专门把算术补习了一遍。除了加快了加减法的运算，还学会了乘除。

不久，孙中山又回到了店里。学会了算术方法的他，再面对那些数字时，他就能应付自如了。他拨弄着算盘，不时地在帐本上记着，成了店中地道的小伙计。

就读意奥兰尼

孙中山在大哥的店中，不知不觉已干了两个多月，他已经学会了记帐，学会了珠算，熟悉了店铺中的种种事务。他每天准时来到店里，照例很认真，很仔细地做着一切。

渐渐地，孙中山有些提不起精神了，他觉得记帐、打算盘已不能再给他兴趣：每天都是那些简单而枯燥的数字，每天面对的是一堆堆去而又来、来而复去的相同的货物，每天都是在单调和机械中重复。难道他远涉重洋所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生活？难道他的青春生命，就要在这毫无生气的日子里打磨殆尽吗？

这么一想，孙中山不免着急起来。他不想再干下去了。出海以来所遇到的许多新鲜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些新鲜事所给予他的新奇与启示又一点一滴地涌上他的心头，补习算术时那位老师讲过的话又重新在他的耳畔回响：

“你们所学的不过是一点点皮毛，这世界上学问多得很深得很，即使穷尽毕生精力，也是学不完的。”

想到这里，孙中山的心里突然明亮开来。

那天晚上，孙中山回到大哥的住处。他望了望大哥，终于鼓起勇气，说：

“大哥，我不想店里干了！”

“那你想干什么？”孙眉感到很奇怪。

“我想读书。”孙中山一字一顿地回答。

“读书？”孙眉不觉重复了一遍，显得有些为难起来。俗话说，打狗还得亲兄弟。何况他那日趋壮大的事业呢？他多么盼望眼前这个聪明能干的弟弟能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使自己的事业更为兴旺发达。

孙眉正在寻思，只听孙中山催问道：

“大哥，送我读书去，行吗？”

孙眉看了看眼前的弟弟，才不过十三岁，还是个孩子，正是读书的年龄啊！为什么不满足弟弟的愿望？有什么理由不送他去学校读书呢？

孙眉虽说本有自己的一套打算，但是他实在不忍心拒绝弟弟的要求，他爽快地回道：

“行。待我联系好学校，就送你去。”

孙中山快活得直蹦，眼睛里闪烁出兴奋而感激的目光。

果然，孙眉立即为弟弟找到了学校。经过一番奔波、了解，终于找到了一所很合孙眉心意的学校。

这就是檀香山的意奥兰尼。这是一所实施八年学制的男子中学，不仅允许华侨子弟入学，而且具有寄宿条件。但是学费比较昂贵，一年须缴纳一百五十美元。

孙眉当年初到檀香山做工时，每月的工钱才不过十五美元。这一年的学费，竟相当于那时他辛苦劳作一年的工钱。然而慷慨的孙眉不仅不感到心疼，反而感到值得花，应该花。他觉得，为了让阿弟加快学习的进度和熟悉洋人的种种习俗，就是要进这种花费较大的寄宿学校。他一下子为阿弟交清了一年的学费。

1878年秋天，十三岁的孙中山，在大哥的陪同下，跨入了意奥兰尼学校的大门。这时，学校已经开课整整两周了。

意奥兰尼设在檀香山正埠火奴鲁鲁，是一所纯粹的教会学校。1862年，由英国圣公会毕斯浦主教与威尔士夫人创立。1872年，韦礼士牧师继任校长。第二年，学校迁入白地斯街，并扩建校舍，由夏威夷王卡麦哈麦第五将学校命名为意奥兰尼。

那时，夏威夷还是个独立的君主政体国家，意奥兰尼学校是一个英国文化色彩十分强烈的学校。学校里的教师全是君主政体的拥护者，所讲授的功课，只是英国史，而没有美国史；数学只讲英币的镑、先令、便士，却不讲美元的元、角、分。孙中山，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竟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受教育，实在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这大概正好应了那句俗语：相反相成。不过这是后话了。

却说孙中山满足了心愿，进入了意奥兰尼学校学习，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困难。那就是语言不通。

学校里的教师只有一个夏威夷人，其余全是英国人，英语成了教学的正规用语。

第一次走进教室，同学们同他打招呼，他听不懂，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坐下来听课，老师所说的是清一色的英语，黑板上出现的是他曾在夏威夷街上看到过的字母，但比街上的更难辨认，常常连缀在一起，分不清彼此，他一个字也听不懂，一个字也看不懂，就像个又聋又哑的人，呆呆地坐在那儿，只是从教师的手势和表情当中，努力地去体会出一点什么来。

此后一连好多天，孙中山都是这样呆坐着。但是他并不气馁，更不放弃。他默默地观察，观察英语的特点，将他所知道的汉语与英语作比较。他虚心地向同学、老师请教，请教英语字母的发音和拼读的方法。很快地，他就摸索出一些独到的体会。他发现，中文和英文实在是差别很大的两种文字。汉字是一个一个的方块结构，由许多笔画构成，每一个字或词句都必须熟记；英文却只有二十六个字母，所有的字词句都是由这二十六个字母拼合而成。只要熟悉二十六个字母的发音和拼读方法，就可以触类旁通，成串成串地掌握许许多多的单词。这一发现，使孙中山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英文比汉字容易学，没什么大不了的。

从此，孙中山学得更有信心，也更为勤奋了。不久，他就掌握了英语常用的一些单词，能够与老师、同学作简单会话了。

攻克了语言这个障碍之后，无疑为孙中山的求知热望，插上了一双腾飞的翅膀。他坐在教室里，静静地、聚精会神地聆听教师所说的每一句话，努力地 from 每一句表述当中，去汲取、体会他所不懂的知识；他尽量多与老师、同学交谈，从交谈中了解异国他乡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亦从中锻炼自己运用英语的能力，除此之外，广泛地阅读各种英文书籍，就成了孙中山那时的最大乐趣。

一到课余时间，当同学们都在尽情地嬉戏打闹的时候，孙中山却静静地坐在一边，捧着书，边读边用笔记着什么。同学们的追逐打闹声，连续不断，越来越响，可在孙中山却是充耳不闻。他读得那样专心，那样入迷，似乎已超脱出身边的嘈杂环境，进入了一个神怡心旷的知识世界。

在孙中山所接触到的英文书籍中，他最爱读的是史传一类作品。尤其是对华盛顿、林肯的传记，简直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读了一遍又一遍。英美等国的历史，在他的眼前、打开了一条贯穿古今的知识长河、英美历史上许多的著名人物，在他的心中树起了一座座丰碑，使他敬仰，使他企羡不已。

一种凝重的历史感，一种仿效伟人建功立业的思想意识，就在这孜孜不倦的阅读中潜滋暗长。

这种广泛而勤奋的阅读，使孙中山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在孙中山之前，学校已有钟工宇、唐雄和李弼三名华侨寄宿生。孙中山都曾经向他们请教过英语方面的问题，而不久，孙中山就成了他们的小老师。他们常拿一些不懂的问题来与孙中山商讨。每当这时，孙中山总是很耐心，他就其所知，倾其所有，详详细细地与同学们谈论着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这所意奥兰尼学校，确实给孙中山打开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里，他接触到了许许多多为落后的中国私塾里所没有的东西。学校里不仅开设英语、历史，还开设数学、地理等自然学科。比如在地理课上，孙中山看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地图，从那张地图中，他了解到世界的辽阔广大，了解到世界上除了他原来所知道的中国、英国和美国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国家和民族。了解到这一点，孙中山真是惊讶不已，顿时感到他所在的夏威夷的渺小。在地图上，夏威夷只不过是几颗小小的豆子而已。

学校还开设一门军事体操课。对这一课程，孙中山也特别感兴趣。他跟随老师来到操场上，列队、做操、跑步、跳跃，然后用一些器械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沐浴在朗朗的阳光下，活动在宽敞的场地中，哪个少年孩子不喜欢？孙中山尽可能按照老师要求的去做，累得气喘吁吁，累得满头是汗，但这是绝不同于除草担柴的那种累。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畅流遍全身。

除了开设各种课程之外，学校还规定寄宿生每天都须做一些轻便的劳动，并且给每个同学分配了相应的任务。钟工宇管理抽水机，唐雄负责铲除水塘边的杂草，孙中山、李弼以及其他同学则照管园中的蔬菜。每当劳动的时候，孙中山就觉得特别舒心，因为照管蔬菜对于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他做得又快又好，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而其他同学则显得笨手笨脚，不知如何下手。于是孙中山在做完了自己的那一份之后，就热心地去帮助同学。

学校里还设有一个灭火组织。这个组织有一间专门的房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许多灭火的器具，每天都有人在那里值班。一旦发生火情，这个组织就会出面组织人力灭火。大家共同出力，有条不紊，所以就能消灾免祸，化险为夷。孙中山由此想到自己家乡救火的情景：一遇火灾，乡亲们便惊恐万状，不知如何是好。一阵忙乱之后，还没来得及扑救，大火已蹿上了屋顶。失火的人家痛哭流涕呼天抢地，“要是家乡也有这样的灭火组织就好了”，孙中山羡慕、赞叹地想道，由此深思，生发开去，他似乎找到了改革他所不满意的家乡私塾教育的方法。

兄弟隔膜

意奥兰尼的学习和生活，给了孙中山很多的知识与收获；孙中山则从知识与收获中获得很多的启迪与教育。他欢快地、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中，在这良好而丰厚的土壤里，孙中山就像一棵破土而出的幼苗，拼命地吮吸营养，充分地消化吸收，茁壮成长。

然而，孙中山并不是没有烦恼，他的烦恼，来自他的国家，其中之一就是国家的旧礼俗给他留下的那根辫子。

那时的西方社会，人们向来歧视东方人，看不起东方人，尤其鄙薄中国人。西方人的这种自矜自傲的优越感，有形无形地濡染了他们的子弟，因此，在意奥兰尼这个西方子弟占多数的学校里，中国人自然成了他们玩笑、嘲弄的对象。

一天，那是孙中山刚入学不久，他队宿舍往教室走，刚走出宿舍楼，就听见几个洋人子弟在他的背后嘀嘀咕咕。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从他们对他的比画中，从他们的神态表情中，他看得出那是在议论他，嘲笑他。他看了看他们，一股愤怒的火窝在心头。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默默地往前走。

他边走边想，这些洋人到底嘲笑自己什么呢？他往周围看了看，终于明白了。洋人所穿的，是短捷挺刮的西装，系着领带，梳着分头，蹬着锃亮的皮鞋；而自己，穿的是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圆帽，脖子后还垂着根小辫子，走起路来晃晃荡荡的，确实与学校的整个环境氛围有些不协调。但是，他转念一想，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民族风俗与习惯，谁也不能说就一定比别国强。而嘲笑别人，只能是自己无知的一种表现，就像自己第一次看到轮船上的海葬那样，硬要以自己所习惯的土葬去否走别人的海葬，那不是显得很幼稚、很可笑吗？

这样一想，孙中山的气就平息了。他觉得不值得为这事生气。那些洋人要笑，就让他们笑去好了。

可是那些洋人都并不觉得嘲笑别人是什么幼稚无知，相反，他们把孙中山的宽宏大度当作软弱可欺，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嘲笑与凌辱泼向孙中山。

一天，孙中山坐在一棵大树下看书，正看得入神。突然，一阵巨疼从头部传遍全身，原来是一个顽皮的洋同学，紧紧攥住了他的辫子。孙中山连忙护住头发，以减轻疼痛。然后偏转身子，大喊道：“快放开！快放开！”

可那顽皮蛋不仅没松手，反而绕着树干转来转去，开心得哇哇大叫。顿时，又围上来几个洋同学，他们像看把戏似的，看着孙中山被拖来拖去，用手捂住头顶的痛苦模样，反而一个个乐得哈哈大笑。那攥辫子的家伙开心够了，才松开手。

孙中山怒火中烧，他握紧拳头，忽地冲上前去，猛地一拳，狠狠地落在那洋小子的脸上。那洋小子正在得意，突然被打得后退了几步，疼得哇哇喊叫起来。他一清醒过来，连忙摆出架势同孙中山扭打起来。但这洋小子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文静瘦弱的中国学生，力气竟然那样大，他不仅占不了丝毫的便宜，反倒被孙中山推搡得晃来晃去，好几次差点摔倒。尤其是他的拳头一碰上孙中山的拳头，就像撞在坚硬的铁块上，骨头像是断了似的，他不免有些发怵了。

旁边的同学见事情闹大了，忙上来将他俩拉开。孙中山仍是怒气未消，

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那洋小子自知理亏，又不是孙中山的对手，就借着同学们劝阻之机，顺势下了台阶，嘴里喃喃地走开了。

从此，那些洋同学再也不敢拿孙中山开玩笑，更不敢欺辱他了。

那天，孙中山回到自己的宿舍，依然愤愤不平。但同时，他又感到脖后的小辫子确实别扭。他叹口气，握住自己的辫子，陷入了沉思。

同室的同学看着孙中山那又气又闷的样子，就劝他，干脆把辫子剪掉算了。

孙中山确实很想把辫子剪掉，但他并不图一时之快意，他想得很深很远。过了一会，他才回答道：

“留辫子这种愚蠢的风俗，是满洲人强迫的结果。我一个人剪掉辫子又有什么用，这耻辱还不是留在所有中国人的头上？等到大多数中国人都想将辫子剪去的时候，我也会毫不迟疑地剪去的。到那时，我们还应该把中国人所遭受的其他种种耻辱一同洗雪掉。”

孙中山说完，又陷入了沉思。

光阴荏苒。孙中山已在意奥兰尼学习了两年。在这两年里，孙中山除了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知识，也接触到了西方的《圣经》，并逐渐迷上了基督教。而这样一来，便引发了孙中山与他大哥的尖锐冲突。

《圣经》也是意奥兰尼学校的必修课程。为了使学校内的华侨寄宿生成为忠实的基督徒，校长韦礼士牧师费了不少心思，花了很大工夫。

韦礼士牧师单把几个中国学生集中起来，专门派了一位牧师去给他们讲授《圣经》。一开始，孙中山和他的同胞都很反感，根本不想听福音传教士的宗教宣传，他们甚至以罢课相威胁，弄得那位牧师毫无办法，只好抱着经文，愤愤离去。

这时，韦礼士校长来了。他对中国学生说，“你们如果不想听福音，那也可以，但必须离开意奥兰尼学校。”这就意味着，要在意奥兰尼呆下去，就必须研习经文。孙中山和同学们面面相觑，无可奈何，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屈从了。

但先前的那位牧师却无论如何不肯再来。于是，韦礼士校长便亲自担当起给中国学生传教的任务。他讲课，严谨不苟，要求他的学生必须熟悉经文，不容有半点的偷懒与疏漏。同时又规定他们必须和学校所有的寄宿生一样，每天早晚两次在学校教堂祈祷，星期天则要到学校附近的圣安德勒教堂参加唱诗班，作礼拜。没有特殊情况，绝不允许缺席。

韦礼士牧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态度则显得温和亲切。他从不高声说话，但是在平和的话语中却给人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他不时地与他的夫人一道，来到中国寄宿生中间，与他们同桌吃饭，一边吃，一边与孙中山等闲聊几句，并且常常讨论教义，又使得学生们愿意与他接近。

就这样，韦礼士校长用强制与诱导的两种手段，把孙中山等中国学生都吸引到基督教上去了。

于是孙中山对基督教的教义十分向往和推崇起来。他不仅专心攻读《圣经》，认真按照韦礼士校长的要求去做，而且热心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俨然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觉得这样做还不够，为了表现他的虔诚和对基督教的信念，他甚至萌发了要受洗入教的念头。

一次，孙眉来学校看望孙中山，孙中山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哥。

大哥一听，气得大发雷霆，咆哮道：

“谁让你信基督教的？竟然还想入教做基督徒。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否则我就停你的学，叫你回老家去。听见没有？”

兄弟之间一向相处得很好，孙中山十分敬重他的大哥，很感激大哥带他走出落后的中国乡村，送他来这样的学校学习西方的知识。孙眉则非常关心、爱护他的阿弟，很喜欢阿弟的机灵、聪慧，喜欢阿弟的文静、有礼、肯干、好学。可是，今天的大哥，怎么发这么大的火？

孙眉的怒火其实早已孕育了。只不过到今天才一下子集中爆发出来。

那是两个月之前，学校放暑假。孙中山回到孙眉的农场，他看到屋里烛光辉映，香烟缭绕，有病的工人，不找医生医治，却跑在关羽神像前，口中念念有词，虔诚地祈求天帝保佑，驱除病魔。他对这种愚昧行为感到气恼，就劝导那些工人，说：“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疗，关羽不过是三国时蜀国的大将。战败让孙权给杀了。他连自己都保不住，怎么可能降福人间，替后人消灾免病呢。”

接着，孙中山来到大哥的房里，悄悄地把大哥供奉的关羽画像扯碎扔掉了。

那时，旅居檀香山的粤籍华侨，都供奉关羽。因为，关羽忠肝义胆、患难与共的品格，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寄托。他们希望关羽能带来好运，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可孙中山竟然把关羽的像撕碎了，这实在是大大触犯了众怒。对此，孙眉当然也很生气，但他那时以为是阿弟调皮，也就没多责怪他。

岂知他撕碎关羽像，原因竟然是信上了外国宗教！这真是忘本和大逆不道！

孙中山还从未见过大哥发这样的火。他惶惶然瞥了大哥一眼，心里不觉有些害怕。尽管他心里很是不服，他不明白入教有什么不好？也不明白入教妨碍了大哥什么，以至大哥要如此强烈地反对。但是，他不想把事情弄僵，既不想拂了大哥的面子，更不想失去求学的机会。于是他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用沉默来表示应允大哥的要求。

这时，韦礼士校长正好也在一旁，他见孙眉如此强烈地反对孙中山入教，便堆下笑来，一面劝孙眉不要生气，一面又劝孙中山，让他听大哥的话，暂时不要入教。

一场冲突就这样平息下来。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暂时平静，孙中山与孙眉都是性格刚强的人。他们只要认定了某件事没做错，就不会轻易改变和放弃。

隔膜产生了，而兄弟俩相似的倔强个性正孕育着一场更大的冲突。

辍学回国

经过三年的系统学习，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毕业了。这个刚入校连英文字母都不识的中国学生，不仅毕业了，而且成绩优异，获得了英语文法第二名。

1882年7月27日，意奥兰尼学校举行了一个隆重而盛大的毕业典礼。所有毕业生，像过节一样兴奋、激动。他们穿着新衣服，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了学校的操场。操场上已临时搭起了一个主席台，装饰得隆重而华丽。突然，会场骚动起来，接着爆发了一阵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原来是夏威夷国王和王后来了。国王和王后不仅要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而且要亲自为学习成绩优异的毕业生授奖。

孙中山的心情激动得无以复加，他的勤奋终于有了回报。他没有辜负自己，也没有辜负他大哥，更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毕业典礼开始了。首先由韦礼士校长作了个简短的讲话，他祝福所有的学生顺利毕业，祝福他们今后继续深造，获得更多的知识。

然后，就由国王和王后向获奖者颁奖。孙中山迈着自豪的步伐，在人们惊羡和赞叹的目光中，健步走向主席台，来到国王和王后的身前。国王拿起准备好的奖品——一本精致的讲述中国故事的书，放在孙中山伸出的手上。

孙中山恭恭敬敬地行了礼，接过奖品，又在所有人的惊叹声中，喜气洋洋地回到原来的位子。左右前后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地要看那本由国王奖给的书。孙中山任由他们把书传来传去。因为让大家都来分享自己的欢乐，是最为高兴和惬意的事。

毕业典礼结束了。孙中山准备回宿舍，突然，他听到韦礼士校长在喊他。

孙中山连忙跑过去。“请把那本书给我。”孙中山吃了一惊，不解地看着校长。

校长接着说：“我要把你获得的奖品，亲自送到你大哥的手里。”

是这么回事，孙中山尚未平静的心，又激动和兴奋起来。

第二天，毕业离校的孙中山，与韦礼士校长一同来到了大哥的牧场。

孙眉听说校长亲临牧场，连忙迎了出来。他们一同走进办公室。刚一坐定，韦礼士校长就向孙眉介绍了孙中山这几年的学习情况，称赞他是个勤奋好学、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受到夏威夷国王的亲自颁奖。他一边说，一边从提包里掏出那本作为奖品的书，然后站起身郑重其事地交到孙眉手上，说：

“我为你有这样出色的弟弟而感到自豪。”

孙眉亦连忙站起，双手接过那本书，高兴得眉飞色舞。

这时，一些侨工在办公室的窗口探头朝里面张望，见是孙中山获奖，都一起欢呼起来。

孙眉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紧紧握住韦礼士校长的手，连声说：

“感谢校长，感谢学校的老师”。

然后，他喊来管事，吩咐道：为庆祝阿弟毕业，祝贺阿弟获奖，牧场休假一天，并设宴招待韦礼士校长和牧场里所有的工人。

孙眉向韦礼士校长提出邀请，校长欣然同意了。

整个牧场顿时像过年一样忙碌起来。工人们一个个喜笑颜开，扬眉吐气。孙中山获奖，就是他们自己获奖。孙中山的荣誉，就是他们的荣誉，也就是

夏威夷整个华人社会的荣誉。

工人们兴奋不已，啧啧赞叹孙中山为他们带来荣光，许多人都主动为宴会忙碌，宴会自始至终充满了融洽、热烈的气氛。这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多年之后都不能忘怀。

而最高兴的人，是孙中山的大哥。他向韦礼士校长连连敬酒，喝得满脸泛红。乘着酒兴，喜气洋洋的孙眉当众宣布，他要把自己的部分财产划归到他阿弟的名下，作为对阿弟学业优异的奖励。

韦礼士校长听了，带头鼓起掌来，孙眉和牧场的工人也跟着一起鼓掌。

作为主角的孙中山，那一整天都沉浸在兴奋之中。他的兴奋，只是出自对成功本身的喜悦，只是对大哥以及所有华工给予他的友好支持及鼓励的一种对等的反应。至于财产什么的，他根本无所谓。他甚至有些奇怪，大哥何必要这样做呢？

可是孙眉却郑重其事。他学着西方人在财产问题上的处理方法，到律师所办理了相应的手续。

毕业后的孙中山，自然还想继续求学。但所有的学校都放了假，再入学，那也是秋天的事。这期间，有近两个月的空闲。自小做惯活儿的孙中山，可不是个能闲得住的人。他向大哥主动提出，要去茄荷蕾店铺帮忙。

孙眉看了阿弟，以为是他的财产分割促使弟弟改变了主张，使他对从商有了兴趣，自然十分高兴。

孙中山来到茄荷蕾店铺。这时的他已不是三年前的那个小伙计了，他不仅长高长大了，更有了丰富的知识和不凡的辨别、鉴赏能力。

他以一种审慎的眼光，打量着店铺。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店铺里的货架，只是简单的一字排开，显得单调、呆板。各种货物码砖似地堆放在架上，架前是一排篮子，给人以零乱、拥挤的感觉。“应该变一变”，他想。于是，他与管事的一商量，就发动店员们一起动手，重新布置店铺。

首先是把店铺的主要构件货架，进行了不同的组合搭配。正面是四个大货架，几个小货架则对称地放在左右两边。里边的货物，根据不同的形状、色彩，重新堆放，摆成不同的姿势，既醒目又美观。装满水果的各种篮子，集中放在店堂的中央，形成一个长方形，四面留出走道，便于客人挑选购买。然后买了一些花瓶、鲜花和小小的装饰品，安放在柜台上，或挂在空余的墙壁上。

孙中山一面指挥，一面亲自动手，弄得一身汗，一身灰。不一会儿，全部整理好了。

重新布置后的店堂焕然一新，整洁而美观，店员们都夸孙中山有眼力、会安排。孙中山擦擦头上的汗，看着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也满意地笑了。

干了一段时间，孙中山向大哥提出了继续求学的要求。对此，孙眉感到意外。在他看来，孙中山的学识，已足够在商业上应用了，何必再花费那许多功夫。可孙中山的志趣并不在商业上，他要继续深造，要求得人生更多更深的科学文化知识。

孙眉只好同意。但他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孙中山必须断绝与基督徒的来往。

孙中山自然不肯答应。但为了求学，他没有公开顶撞大哥，仍然以沉默来表示他的服从。孙眉这才为孙中山联系安排了一所中学。

到了秋季开学时，孙中山又来到了火奴鲁鲁，重新跨入了学校大门。这

次所进的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设的高级中学，名叫奥阿厚书院。

孙中山更勤奋了。他已经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但他还须深入到宝库中去，去获得更多更好的宝藏。他已经尝过勤奋带来的喜悦和甘甜，他还须用勤奋来创造更大的喜悦和甜蜜的成果。他的生活，就只是上课，看书，看书，上课。从宿舍到教室，从教室到宿舍，两点一线，十分明确。节假日，他也不想回到大哥的牧场去，只是埋头于书本之中。

在苦读的同时，孙中山仍然对基督教一往情深。他坚持参加早晚的祈祷，按时去教堂做礼拜，而且与韦礼士校长保持紧密的联系，常常去意奥兰尼学校，向韦礼士牧师请教经文中的一些问题。

孙中山好久没回牧场，引起了孙眉的不满。一个星期天，见孙中山又没回去，孙眉便赶到奥阿厚书院，想看看他的弟弟究竟在干些什么。

孙眉来到奥阿厚，宿舍的门上挂着锁，教室里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人上哪去了呢？问同学，都说不知道。最后有个同学告诉他，说孙中山可能去了意奥兰尼。

去那干嘛？孙眉立即明白过来。阿弟一定是与那牧师打得火热。他不觉怒火上冲，干脆走向校大门，在那里等孙中山。孙中山终于回来了。孙眉迎上前去，劈头就说：“是从韦礼士牧师那儿来吧。我告诉你的话，都忘了？”

“信基督有什么不好？大哥不要干涉我的信仰自由嘛！”向来敬重大哥的孙中山还从没顶过嘴，这是第一次。因为他不想再沉默了。

孙眉本已憋了一肚子气，如今阿弟竟敢顶嘴，还说什么“信仰自由”，满腔的怒火便如夏威夷岛上的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大吼道：

“你竟敢顶嘴，竟敢不听我的劝告，还说是什么自由。那好，我不会再拿钱供你念书了。我要立即送你回老家！”

他说着，把孙中山丢在那儿，径直进了学校，直奔校长家中，要立即办理孙中山退学的手续。

孙中山没想到会弄成这样一种结果，不觉有些后悔。他连忙追上前去，喊道：“大哥，大哥。”大哥并不睬他，只管往里走。

校长是美国人，高高的个子，年纪约在五十岁上下，一头银丝，给人以睿智明理、和蔼可亲的感觉。孙中山希望校长能劝住大哥。

孙眉二话不说，就说要让孙中山退学，并要求校长将学费退还给他。

校长微笑着听孙眉说完了话，果真像孙中山预料的那样来劝孙眉。但终于未能得到预想的结果。

孙眉火气丝毫未消，也根本听不进校长的劝告。最后，竟气冲冲地，掉头走了。

孙中山无法可想，怔怔地站了一会。只好回宿舍收拾行李。

“我错在哪里呢？”孙中山想不通。他曾劝说过华工不要相信关帝，也曾偷偷地把大哥的关帝像撕了。但是年轻的他，还不知道信奉基督教与祭奉关帝并无本质的区别。

孙中山在一阵懊悔之后，见事情已无可挽回，倒也坦然了：“回家就回家，这并不能改变我的信仰。”

过了几天，孙眉打听到了一艘去中国的轮船，给孙中山买好了船票。

就这样，孙中山中断学业，启程回国了。

忍无可忍

1883年7月，孙中山离开生活了五年的檀香山，带着些微的惆怅与迷茫，乘船回国。

在漫长的旅途中，孙中山回想起自己在檀香山所经历的一切，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一幕幕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而最使孙中山追忆和回味的是：

他曾与杜南山所作的一次交谈。

那还是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一段时期，孙中山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去一所辅助华侨子弟进修中文的夜校学习。

夜校的开办者，是个名叫杜南山的老师。杜老师是广东顺德人，因受广州美国领事的邀请，遂前往檀香山，给当地美国政府人员教授中文粤语。由于事情不多，他就开办了这所夜校。

孙中山很喜欢听杜南山讲课，杜南山也喜欢孙中山的聪明好学。两人于是常有来往。一天，孙中山拜访杜南山，见老师的书架上放着好些医书，不免有些奇怪，就向老师请教。

杜南山笑着解释道：“北宋范文正有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我欣赏他的话，试着做做罢了。”

孙中山听后若有所思，似乎觉得不妥，又弄不清不妥之处在哪里。他苦苦思索了几天，终于通了，就又来到老师住处，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老师所举的范文正的话虽有道理，但也有误人之处。在我国，读书人并非很容易就能参预政治，就是参预了，也不能很快管理国家大事。如果费尽全力以求作相，到了不可得的时候再去行医，即使努力去做，也已经晚了，岂不误人？在我看来，应该两者兼行，政治与医术同时进行。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杜南山听了，连连点头称是，觉得孙中山想得深，说得在理。

如今，孙中山被迫中断学业，受责回乡，种种复杂的心绪搅得他不得安宁：回乡之后，我该做什么？今后我又该做什么？

轮船在大海上颠簸，孙中山的心绪像那起伏汹涌的海浪一样，始终不能平静。他就像那艘轮船，终于在不平的心绪大海中走完了全程。

轮船到达香港之后，他换乘一种中国的沙船赴香山县的金星港。

快到香山的途中，船只要经过一个小小的海岛。清政府的厘捐局在这道必经关口上，设置了一个检查关卡，以检查为名，专门搜刮过往旅客的钱财。

沙船的船长已多次目睹和亲身遭受厘捐局的搜刮，知道那班家伙的厉害，因此，在船只快要到达小岛时，就提醒船上的旅客说：

“各位对厘捐局老爷的检查一定要忍耐。否则惹恼了他们，吃亏倒霉的还是我们大家。”

旅客们听了，心里未免有些担心起来，可又无法躲避，只好随着船只，硬着头皮往老虎口里钻。

孙中山看看快要到家，不久就能见到父母亲人，心里越来越兴奋，并没注意到船长的叮咛和告诫。

船只到达小岛，便停了下来。孙中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问，原来是要接受检查，心里的气就来了。

约摸过了十几分钟，孙中山等得都有些焦急了。这才见一批吏员大摇大

摆，慢条斯理地走上船来。

这些家伙一上船就吆三喝四，一副耀武扬威的架势。他们在旅客眼前晃来晃去，不怀好意地打量一番。接着，便翻箱倒筐，任意打开旅客的行李。看到一些像样的东西，就当成是“违禁品”没收。他们翻呀，查啊，翻过来倒过去，没完没了。一些“晓事”的旅客于是给他们塞了不少东西，一面满脸堆笑，说了不少好听、客气的话，他们才停住了手。然后提着“违禁品”和客人们送的“礼物”趾高气扬地上岸去了。

孙中山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叹了口气，默默地收拾被弄得乱七八糟的箱子。刚收拾好，正待上锁，只听一阵吆喝，又跳上来几个吏员，其中一个大叫道：“统统打开行李，接受检查！”

旅客们都知道这些家伙蛮不讲理，一个个赶紧敞開箱子，打开提包，等候检查。

孙中山没有动，刚才不是检查过了吗？怎么又要检查？正在想着，一个吏员走到孙中山的跟前，大喝道：

“你聋了么！叫你打开行李，快让我们检查！”

孙中山忍住气，回道：“我的行李已经检查过了。”

那吏员把头一歪，斜眼瞧着孙中山，鼻子里又哼了一声，大模大样地说：“你知道他们检查什么，我们又是检查什么吗？看来你不知道。让我来告诉你：他们检查收的是本地的海关税，我们这次检查，收的是厘捐税。这下你知道了吧！快把箱子打开！”

说着，那吏员又用脚尖在孙中山的箱子上踢了踢。

孙中山只好把箱子重新打开。那吏员伸出手来，毫无来由地一阵乱翻，看看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便转身走了。

这第二批刚走，大家还没来得及整理，第三批关吏又出现在甲板上，一个个身佩弯刀，气势汹汹的样子，好不吓人。

他们一上船，也不管旅客的行李有没有打开，就大声命令道：

“统统打开行李，挨个检查！”

旅客们都站着没动，吆喝的那家伙一看，见大家的行李都敞着，忙自我解嘲似的说：

“各位很自觉，配合得很好，我们不会为难大家的，很快就能检查好。”

孙中山又好气又好笑，就说了一句：

“我们都接受了两次检查了，何必再检查一次呢！就免了吧！”

“那可不行。前两次征收的是关税和厘捐。我们这次是查禁鸦片的。”

说完，几个关吏走上前来，又在早已凌乱的箱子、提包里一阵捣鼓。

孙中山站在一旁，轻蔑地看着那些家伙捣腾行李的丑像，心想：查吧，让你们查。这都第三次了，该完了吧！

旅客们都与孙中山抱同样的想法。一等第三批关吏离去，一个个唉声叹气，赶紧将行李整理好，并催着船长开船。

船长苦笑一声，说：“还没完呢！”

怎么，还有一道检查？大家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正在诧异之中，第四批关吏已出现在小岛的路口上。

这一次，关吏们全都穿着军服，背着军械，样子更是怕人。一上船，就凶神恶煞般地喊起来：“统统打开行李！”

孙中山压抑很久的愤怒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的眼睛像要冒出火来，狠狠

地瞪着他们，厉声责问道：

“你们又想干什么？我们都被检查三次了，还想查什么？”

“查什么？老子们是查禁私运火油，保护公众安全的！你小子竟敢质问起我们来了！找死呀！叫你打开你就得打开！”一个关吏恶狠狠地说。

孙中山不吃这一套，他一听“火油”二字，更是气得火上加油，讥讽地回答：

“衣箱内也能窝藏火油吗？真是笑话，连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那些关吏又羞又恼，不禁涨得面红耳赤，像块臭猪肝似的。但他们自恃权势在手，就是蛮不讲理，一定要孙中山打开箱子接受检查。

孙中山热血沸腾，愤怒的烈火熊熊燃烧。他理直气壮地护住自己的箱子，毫不示弱，一动也不动。

孙中山的不满和不愿接受检查似乎正合这帮关吏的心意，他们相互瞥了一眼，发出一阵会心的奸笑。

有位怕事的旅客忙上前来劝孙中山，说：“小伙子，你就打开箱子吧，否则，你会给我们大家找来麻烦的。”

孙中山哪里肯让步，勇气十足地说：“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等到了港口，我们都去控告这帮家伙。只要官厅有点公正，就不会随意放过他们，叫他们受到应有惩罚。”

那旅客苦笑一声走开了。心想，你这小伙子也太天真了。这世道官官相护，哪有什么公正可言？

这时，那几个关吏已带着船长离开了船，往岛上走去。

旅客们知道船只被扣，当天走不了，不禁唉声叹气，议论纷纷。有的旅客就埋怨起孙中山来，怪他不懂事，逞一时之气，连累了大伙，更多的人则把愤怒转向了那些敲榨勒索、任意坑民的关吏，纷纷说：“不能怪这小伙子。这帮家伙就是要找碴子弄钱，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会找出别的借口来的。这世道就这样，有什么法子！”

孙中山气得要喷出火来，他激愤地高喊：“中国掌握在这样的贪官污吏手中，我们难道能容忍么？难道就任其胡作非为，坐视不问么？”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孙中山和旅客们都笼罩在黑暗之中，动弹不得。

直到第二天早晨，船长才放了回来，在被迫交出“罚款”之后，才得到允诺：准许开船。

被耽搁了一夜的沙船，终于慢慢驶离了那恶魔般的小岛。

宣传新思想

回到离别了五年的家乡，孙中山感到分外亲切和温暖。家乡的一切是那么的熟悉，勾起了孙中山多少回忆……

回忆之中的家乡，与眼前所见到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山还是那样的山，田还是那样的田，饶瘠而无生气，村中的道路还是那般坑洼狭小，村里的住房还是那般低矮破旧。乡亲们依然生活在愚昧落后之中，许多贫苦人家依然连白薯也吃不饱；进了村塾的孩子们依然整天念着那些根本不知所云的文字；先生手里照样拿着戒尺，孩童们战战兢兢的，一遍一遍地读，一段一段地背。

眼前的一切，使孙中山默默慨叹。与檀香山所见到的景象比比，更使他黯然神伤，忧虑不已。一种迷惘惆怅的心绪笼罩在心头，使他精神萎靡，心灰意冷。一连好多天，他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干。

这天，他躺在床上，闷闷地发呆，然后，又拿起一本书，毫无心绪地翻着。翻了没几页，又换一本，还是看不下去。他丢下书，想睡一会，可又睡不着。他想起他读过的一些书，想起他在檀香山见到的一些事，华盛顿、林肯的影子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夏威夷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干涉的激昂场面清晰地推到他的面前，满场的“夏威夷是夏威夷人民的夏威夷”的口号，似乎震耳欲聋，他似乎又在对杜南山说那关于从政与行医并行不悖的话……

他憬然有悟，不禁一阵脸红，猛地坐起来，“我不能这样无所事事，不能这样消沉下去。我应该尽我自己的力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孙中山像换了个人似的，终于摆脱了突然的辍学和凋敝的现实在他心中留下的阴影，以一种朝气蓬勃的姿态，昂扬奋发的热情面向生活，走向生活。

他开始帮助父母做农活。这些农活，很多都是他曾经做过的，做起来特别熟悉，又特别亲切。他还学会了一些过去没做过的话，譬如耕田犁地。他在父亲的指点下，一手执鞭，一手扶犁，兴味盎然地看着那一大块一大块的泥土，在铁犁前面有节奏地翻转过去，形成一条条高低起伏的犁道。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他的心情却很振奋，怅然若失的情绪顿然无影无踪，随之而来的是劳动的充实感。

听说乡里的里正、副乡长陆星甫、杨汉川有较好的国语修养，孙中山便常去向他们请教，并从他们那借了不少古书来读。空闲的时候，则带领青年朋友到小门溪泅水游戏，学枪法，习体操。而在各种活动中，孙中山总不忘同乡亲们谈心聊天，一面介绍檀香山的风俗人情，讲述他所见到的许多新鲜事；一面抨击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风俗的恶劣，宣传社会改革的必要。

每当孙中山讲述的时候，他的身边总围聚了不少人。他们一个个睁大眼睛，钦羨而好奇地听着看着孙中山的滔滔不绝的议论，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孙中山越说越来劲，越说越兴奋，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提出一些济世利民的措施和方法。

孙中山的丰富见识和热情鼓吹，赢得了村民们的钦佩。他们甚至推举他为“宿老议员”，在不少事情上都乐于听取他的意见。这在一个因循守旧、长者为尊的封建宗法统治下的落后农村，显得是多么的不容易，同时也表明了孙中山在除旧立新的介绍与宣传方面是多么的不遗余力。他的工夫没有白费，他的努力得到了一些应有的回报。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的思想越来越敏锐，感触越来越多，宣传得也越来

越激烈。他看见乡村市场上零零落落货物稀少，便十分生气，就对乡亲们说：“如此衰败的市场，叫人如何能买到想要的物品。政府为什么不提供一些便利商业的措施呢？”

官衙横征暴敛，巧立各种名目向人民征收繁多的重税，孙中山回乡后，经常看到那些衙吏出出进进，不停地搜刮民脂民膏，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对那些因交纳税务后而愁眉苦脸的人们说：“衙吏每年要来好多次，每次你们都须交纳衙门规定的什么税钱。既然这样，收了钱的衙门就应该为你们做点好事，修桥补路啊，建造学校啊，都行。可是却连一件也没见到过！你们出的钱到哪去了？全跑到‘天子’那儿去了，这种专收钱不做事的天子和他的官府，是多么腐败啊！”

乡邻们当然都知道孙中山说得对，说到他们心里去了。可是他们却又害怕，怎么能直斥官府非议天子呢？那可是重罪啊，弄不好还会掉脑袋灭门诛九族哩。他们一声不吭，默默地听着，然后竟悄悄走开了。能最后听到底的，只是孙中山的一些年轻朋友。

在孙中山的年轻朋友中，有几个同乡成了孙中山意气相投的好朋友。他们共是四人，除了孙中山，另三人分别是陆皓东、杨鹤龄和杨心如。

四个人都对现实不满，常常在一起议论时弊，设想一些改除旧俗的方法。有一次，他们甚至商议起筹集钱款，购买一些剪刀，鼓动大家一起剪掉辫子的事。他们谈得非常激动，恨不得把辫子甩到大海里去。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终于没有办成。但是，孙中山从这些热血沸腾、充满求新愿望的同龄人身上，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其中，最使孙中山倾心和激奋的是陆皓东。陆皓东自小在上海长大，跑的地方多，见的事憎也多。头脑灵活，勤奋好学，而且能诗会画，多才多艺。孙中山与他形影相随，整日处在一起，经常在山丘、树下一起看书谈心，交流思想，谈论社会政治问题，十分投机。

一天，陆皓东提着个行囊来向孙中山辞行。孙中山非常奇怪，就问：

“你去哪里？怎么说走就走。”

陆皓东愤愤地说：“鬼知道呢？昨晚回家，乡长来告诉我，要我一早去县城报到。”

“做什么？”

“不大清楚。据说是抽我们去当几天兵勇，接受什么检查。”

孙中山还在沉思，陆皓东却匆忙走了。

陆皓东一走，孙中山干什么也没了心思和劲头，仿佛像抽去了一半魂，他天天去陆皓东家打听，问陆皓东回来没有。

四五天后，陆皓东回来了。孙中山忙问他这几天都在县城干了些什么？

陆皓东把行囊一摔，气呼呼地说道：“干什么？给那些当官的家伙装门面摆样子去了。”

然后，他喘口气，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孙中山。

原来，地处沿海的广东，为了抵御外人侵略，受朝廷命令，办起了团练，就是从各地抽调青壮年，组成队伍，以备防守疆土之用，为了检查团练操办的情况，朝廷派了一个阅兵大臣来香山县检查，准备在濠乡头举行阅兵仪式。香山县官府从来没正儿八经地办过团练，却采用虚报兵额的办法把经费弄到自己腰包里。这次得知上面要来人检查，便急急忙忙向各乡抽丁，冒充兵勇，拼凑成一支人马给阅兵大臣看。

“那是支什么样的队伍！”陆皓东越说越气“一大半都是些烟鬼，要饭的。一个个衣冠不整，怪模怪样。队伍根本就没个队伍的形状，乱七八糟。放枪的时候，更是丑态百出，有闭着眼的，有扭着头的，好几次差点没打着人。可那些当官的，一个个装模作样，不动声色地坐在那儿，检阅得还怪起劲怪高兴似的。真气人！”

“竟有这等事？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不成样了。”孙中山愤愤地说。

两人都在生气，然后又从这次拼凑成军的事，推想到清政府大概所有的军队都是一个样：腐败无能，没有战斗力。那高大的虎门炮台，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要不了五六十个强壮男儿，就能一举攻破。

这样想着，他们浑身充满了力量，他们紧握拳头，一副跃跃欲试，一展身手的样子。

砸像出走

孙中山回乡之后，所见尽是些不能如意的景象：田地里稀稀疏疏，村庄里冷冷清清，乡亲们衣衫褴褛，愁眉苦脸，孩童们面黄肌瘦，衣不遮体。面对这凋敝和衰败，孙中山那年轻、火热的心就不能平静。他苦恼，他不平，他想改变这一切，可不知如何改变，只能把苦闷和不平藏在心底。只有在与陆皓东等朋友们的交谈中，郁积不平之气才稍稍得到一些抒发。可是，这样的议论又有什么用？于是，短暂的舒畅之后，又陷入了长长的痛苦之中。

总该做点什么！这一想法在孙中山的潜意识里，悄悄地扎下根来。

一天，孙中山与陆皓东又在村头读书聚谈。正谈得起劲，突然见乡长领着几个村民往北极殿去。孙中山便问陆皓东是怎么回事，陆皓东没好气地说：“还不是去整修那无用的菩萨！”

“整修菩萨？”

“是啊！几乎每年都要弄一次。每次都整修得焕然一新。村民就为这，也还得摊派不少钱呢，没钱的，就出工。”

“走，看看去。”

孙中山站起身，拉起陆皓东就走。

他们来到北极殿，看乡长指挥着那几个村民正在忙乎。刷的刷，描的描，修补的修补，干得是那样的专注认真。中间的北帝像已修整好，一副活灵活现的样子，两眼圆睁，嘲讽似的望着孙中山。

孙中山的心里真不是滋味。花许多人力物力来修复这样一堆泥塑木雕，究竟有什么意义？贫穷的愚昧的人们啊，为什么不能为自己做一点有益的事呢？我该怎样去唤醒人们不再供奉这些烂泥朽木，唤醒他们不再为虚幻所迷惑？

他这样想着，默默地退了出来。陆皓东跟在后面，看孙中山那沉思难受的样子，也就一声不吭。

突然，孙中山回过头，对陆皓东喊道：“我有个主意，你敢不敢同我一起做？”

“为什么不敢！你说吧！”

“等乡长他们把北极殿修好之后，我们找个机会把它砸了，给那些信奉神像的人一记猛掌，使他们从那被迷惑的虚幻中摆脱出来。”

“我跟你干。不过，砸像的时间最好选在中秋节。那天人多，影响大，对大家更有震撼力量。”

“好，就定在那天。”

孙中山作出了这一决定之后，就像即将面临一场大战似的，兴奋而紧张。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搅得他夜不能寐，饭也吃不香。他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时间的缓慢难熬。

终于，等来了中秋节。那天一吃过早饭，孙中山就同陆皓东一起来到北极殿。

北极殿里已是烟雾缭绕，烛光摇曳，几个老头老奶早把月饼、水果等安放在供桌上，开始弯腰撅屁股地跪拜起来。一面拜，一面喃喃有词，脸上的表情无比虔诚，各种动作做得规范有度，一丝不苟。磕了几个响头之后，站起身，拈起一束香，就烛上点燃插在香炉里。

孙中山立在他们的身后，默默地看了一会，心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辛

辛辛苦苦弄出点好吃的东西，自己还舍不得吃，却要送来供奉这些泥菩萨，多么可怜而可悲啊！他心里不禁一阵心酸，于是，就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对那几个老人说：

“敬这些泥菩萨管用吗？”

几个老人惊愕地看着孙中山，不明白小伙子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位老人愣了愣，回答道：

“怎么不管用？心诚则灵啊！”

“老伯，你的心不是很诚吗？可是这堆泥菩萨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你老人家不还是终年吃苦受累，过不上一天舒坦日子吗？”

“不，小伙子，话可不能这么说。能不能过上好日子，那是命中注定，强求不来的。我们供奉北帝，求不到福就罢了，只求它暗中保佑，为我们消灾免祸。无灾无祸，也就是最大的福了。”

孙中山听了这一席话，不禁觉得好笑，深知这些老人的愚昧和麻木程度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通的，这更激发和坚定了他砸毁神像的决心，就直率而干脆地说道：

“这泥东西能保佑什么？它连自己都保佑不了，哪还能保佑你们！”

几个老人听了孙中山这话，更是惊呆了，简直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看供桌前的神像，一句话也说不出。

就在这时，又进来几个村民，一个个提着装着供品的篮子。

孙中山看看时机已到，便一步跨上供桌，右手紧紧抓住“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手”，然后，扭回头，向底下那些望着他发呆的村民们说道：

“你们信不信，这泥东西连它自己都保不住。如果不信，就看看它能不能阻挡我折断它的手指头。”

说着，孙中山用力一拽，只听“啪”的一声，神像的手指头立时折断了，只见断开处是一个小小的窟窿，里面的木头、泥巴和裹在其中的烂稻草一起露了出来。

村民们都惊呆了，尤其是那些老人，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到的一切。

这时，孙中山举起右手，用他手中那只掰下的泥指头去戳神像的脸，轻蔑地说：

“你们看哪，我折断了它的手指，它还照样对着我笑。这种无用的东西，如何能保佑我们村民？”

话音刚落，他便把泥指往供桌上一摔，泥指啪地落在地上，碎成几块，扬起一阵不小的灰雾。

那几位老人这才清醒过来，忙喊道：“快下来，快下来！”

孙中山没下来，陆皓东却又跳了上去。他们用木炭，在专司生育的“金花娘娘”的脸上一阵乱画，画成个又花又丑的大花脸，最后，干脆连它的一只“耳朵”也扯了下来。

北极殿里顿时一片嘈杂和混乱。老人们就像是自己犯了弥天大罪似的，吓得心惊肉跳，手足无措，跪在地上连连向神像叩头作揖，嘴里一迭声地念叨着：“罪过！作孽！罪过！作孽！罪过！作孽！”

其他人则议论纷纷，以一种惊异和迷惘的目光打量着孙中山和陆皓东，好像不认识这两个小伙子似的。

孙中山和陆皓东见目的已经达到，便跳下供桌，呵呵大笑着，扬长而去。

孙中山大闹北极殿、砸毁神像的事，立即在翠亨村传了开来。一些没有

亲眼见过的村民，都不大相信，他们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相继到北极殿去察看，察看之后，就在殿门内外，三五成群地小声议论。于是，人越聚越多，全村几乎有一半人都来了。

孙达成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忙赶到了北极殿。他向来胆小怕事，老实忠厚，一听说儿子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又气恼又害怕，当孙达成一出现在北极殿时，聚集在殿前的人们，一起把目光投向了孙达成，一些人便张口骂起来。

“这样的疯小子，是怎么管教的？竟然把神像给毁了，真是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那是出洋的好结果！如此胆大妄为，亵渎神明，只有受过洋教的人才做得出。”

“神殿刚刚花钱修复，就弄得这样一塌糊涂。一定得罚他们把神像修理好。”

人们三言两语，你一句，我一句，向孙达成兴师问罪，横加指责。孙达成看看神殿的神像，自觉理亏，只好一个劲地赔不是，又连连说：“我赔，我赔。修复神像需要多少钱，由我出，由我出。”

“光修殿还不行，这本来就是孙家做的好事，孙家自然得出来收拾。毁坏神像，神是会发怒的，弄不好还会给我们大家带来恶运。你那小子必须离开村庄，或许能使我们躲开灾难，否则，出了什么事，我们还要找你算帐。”

村里一个颇有身份的老人这样说道，其他的人也跟着附和起哄，叫嚷起来：

“对，一定要让这小子离开！”

孙达成又是诺诺连声：“叫他走。我一定叫他走。”

孙达成气得头昏眼花，颤巍巍地回到家，一见孙中山就光火，厉声训斥道：

“你干的好事，让我在村人面前丢尽了脸。你给我滚！”

孙达成一向喜欢机灵的孙中山，只因这次的祸闯得太大了，才破天荒发这么大的火。

母亲在一旁看了焦急，问道：“你叫孩子滚，他能去哪呢！”

孙中山一直默不作声。他已从砸像的兴奋中走了出来，陷入压抑与沉重之中。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破除迷信之举不仅没有唤醒愚昧的人们，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无情指责，甚至以必须离开村庄作为毁殿砸像的代价，而这代价则意味着承认对自己的惩罚，更意味着自己承认失败。他不想走，他不愿意走，可是，父亲的态度又是那样的坚决，他怎么忍心让他老人家再生气呢？

“让他去香港吧……”孙达成说道。

第二天一大早，回乡还不到半年的孙中山又被迫离开了家。

他望着寂静的村庄，暗暗发誓道：我迟早会回来，我总有一天要唤醒那些愚昧的人们。

入教弃财

孙中山因为闹殿砸神像，触怒了强大的传统势力，在无可奈何之下，离开家乡，来到了香港。

到香港之后，孙中山先进了拔萃书室，在这家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中等学校里修习英文。由于他已有很好的英文基础，觉得学校的课程已不能满足自己，于是不久就退了学。

这是 1883 年 11 月至 12 月之间的事。

到了这年年底，原先与孙中山一起砸像而被迫出走上海的陆皓东，也来到了香港。两位朋友一见面，分外高兴，谈起毁殿的事来，都感慨不已。

一次，俩人谈起信仰问题，孙中山便向陆皓东介绍了基督教，并向朋友表明他自己崇奉基督，还希望受洗入教的信念。

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发了一番感慨。他认为西方比中国进步，英、美政府和他们的人民相处得那么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信奉基督，以忍耐、顺从和牺牲自己、拯救他人的精神面对生活，面对一切。

孙中山对基督教的理解与信奉自然有些幼稚，显然是陷入另一种无用的迷信。然而，无论如何，基督耶稣的献身精神深深打动了。正是这种献身精神，才使得孙中山对基督深信不疑。

陆皓东睁大眼睛，听着好友的讲述，一种共鸣强烈地产生了。他也喜欢上了基督，信奉上了基督，他脱口而出：

“我们入教吧！”

孙中山没想到陆皓东这么爽快、果断，十分高兴，说：

“好。咱们一起加入基督教。我认识一个很好的牧师，请他给我们主持受洗礼。”

孙中山所说的牧师叫喜嘉理，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孙中山到香港之后，常去喜嘉理所在的教堂作祈祷，因而认识他。

1883 年 12 月末的一天，孙中山和陆皓东怀着兴奋而严肃的心情，来到必列者士街纲纪慎会堂，接受喜嘉理牧师的受洗主持，加入了基督教。

孙中山神情虔诚而严肃，他默默地望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心里一阵激动。他暗自鼓励道：

“要学习耶稣，为拯救别人而牺牲自己。”

孙中山在受洗登记册上署名为“孙日新”。这“日新”一名，是取自《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话，鲜明地表达出他弃旧迎新、日有所进的愿望。

入教之后的孙中山，俨然成了基督教的忠实信徒。他激动不已，兴奋不已，一阵冲动激起他满腔的热情，他干脆搬到喜嘉理居住的纲纪慎会堂二楼，与这位美国牧师住在一起。

到了第二年的 4 月，孙中山进入中央书院，用“孙帝象”的名字登记注册。

中央书院是香港英国当局于 1862 年 2 月创办的一所中等学校，1889 年改名域多利书院，1894 年改为皇仁书院。

这是所设备完善的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认真。课程的安排十分紧凑，每日上八小时的课：上午四小时讲授中文，下午四小时讲授英文。后来，还增加了代数、几何和化学等课程。

学校的学生，大多是中国人，只有少数其他各国的学生。对于入学的年龄，学校并无严格规定。因此，低年级里有二十多岁的青年，高年级里不乏十来岁的孩童。如此大小颠倒的现象，人们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因为知识不是以年龄的大小来衡量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业有先后，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样一种学习环境，对于求学者眼界的开拓、心胸的扩大和知识的增长，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这大概就是孙中山进入这所学校的原因吧。

正是这样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促使孙中山更加勤奋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他不仅每天坚持上完八小时的课程，而且晚上也不闲着。当时有个中文教师叫区凤墀，孙中山很喜听他的课，认为他极有学问，所以晚上常请区老师辅导他的国文。区老师也喜欢孙中山的聪明、勤奋，亦乐于在空闲时辅导孙中山。

孙中山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沉浸在吸取知识的乐趣之中。

一天，他正在教室里看书。一个同学来到他身边，喊道：

“孙帝象，你的信。”

“谢谢。”孙中山接过信，一看信封，原来是大哥寄来的。他急忙拆开，展开信纸，读了起来。

大哥在信中说，由于各种原因，他的经营受到挫折。如今要重整旗鼓，另辟生意之门，但因过去的财产用了阿弟的名义，使用不便，因而十分着急。请阿弟收到信后，即去檀香山协助他。

孙中山读了信，心中很为大哥担忧，也很为自己担忧。大哥的生意垮了，谁来负担自己的学费呢！他义不容辞，必须前往檀香山，协助大哥摆脱困境。

他立即办妥了停学手续。一天也没耽搁，第二天就搭上了去夏威夷的轮船。

轮船隆隆前进，孙中山再也不觉得它航行得快，而是觉得缓慢极了。他恨不得飞到大哥的身边，可是却不能，他如今被困在这缓慢之物里，只能一步一步地前移。他必须静下心来。也只有静下心来，忍受这漫漫旅途的寂寞。寂寞中的思想却是分外的活跃。他想起了两个月前大哥给他的另一封信。在那封信里，大哥以非常严厉的口吻，责备了他的不良行为，说什么毁坏神像是大逆不道；加入基督教是走火入魔。要求他即刻断绝与基督教的关系，否则，大哥在那信的最后威助道：就要停止汇款：不再负担他的学费。而他，对于大哥的责备和威胁，只是一笑了之，没有引起丝毫的自责和愧疚。他依然每天按时作祈祷，星期天坚持作礼拜，照旧与喜嘉理牧师来往甚勤。

他把大哥的话抛到了一边，那么大哥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说说而已，任其自然吗？孙中山不得而知。但他迷迷糊糊地感到，大哥与他远隔重洋，对自己的言行，大哥怎么能知道呢？这样一想、孙中山便又着急起来。他是为大哥的生意不景气着急，“我该为大哥做点什么呢？”

在这前思后虑的忐忑不安中，终于到达了檀香山。孙中山顾不上喘口气，便一路紧赶，赶到大哥所在的茂宜岛。一见到大哥，孙中山吃了一惊。大哥的脸阴沉沉的，给人以怒气充溢的感觉，而丝毫没有生意失败的痛苦与哀愁，更没有兄弟相逢的喜悦与亲热。

孙中山轻轻地喊了一声：“大哥”。孙眉爱理不理地应了一声，然后就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孙中山看看大哥，大哥也看看他，兄弟俩像不认识似的，互相打量着，想弄清对方的心思，突然，沉默打破了，孙眉破口大骂起

来：

“你这不懂事不明理的！竟敢闹殿砸像，干出这样天理不容的事。早就同你说过，不许信什么基督教，你偏不听，居然入教做了圣徒。写信叫你断绝与他们的来往，你却当成耳边风，照样与他们打得火热！你，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

孙眉越说越气，不禁扬手在孙中山脸上掴了两巴掌。古人有句俗话，叫做长兄如父。在孙眉看来，他供阿弟吃的喝的，供他上学读书，可阿弟却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一点也不听他的话，还不该教训教训他的阿弟？

孙中山一声不吭，一动不动，无论大哥是骂是打，他都认了。但是他心中的信念，头脑中的信仰，也同样纹丝不动，并且显得更为坚不可摧，无法动摇了。

孙眉的怒火换来的只是孙中山的平静，孙眉立即清楚了，他的阿弟是不会因自己的斥责而改变主意的，因此就决定采用最后一手，来迫使他的阿弟就范。

孙眉缓了口气，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然后又看了看眼前的阿弟，像在下决心似的，终于说道：

“我的财产不能给信奉洋教的人。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主意，就请把划在你名下的财产还给我。”

孙中山出于意料地平静，他抬起头，定定地望着大哥，平和而诚恳的说：

“我让大哥失望了。我不是块经商的材料，更不是个听话的弟弟，真是抱歉。中国古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能使我信服，虽然我也愿意并尽最大的努力去按中国的老办法做事。但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的责任感不允许，因为我不能遵守已经败坏了的习惯。”

孙中山停了停，接着说：

“大哥过去所慷慨赠与的产业，我很乐意奉还，因为那本来就不是属于我的东西。说实在的，财富并不能打动我的心。金钱无疑是中国灾害之一。金钱可以用于正当的方面，也可以用于不正当的邪门。如今的中国官场上，卖官鬻爵，贿赂公行，陷人民于水火，败坏了中国的政治。”

孙中山侃侃而谈，越说越激动。孙眉见此，也就不再说什么。

第二天，兄弟俩便去了律师事务所，办理了有关财产交割的各项手续。孙中山看到所有的文本上，都由自己的名字变成了大哥的名字，心里倒觉得一阵轻松，心想：

“今后我就不会有什么不安了，我可以自由地从事改良国家的事业了。”

孙眉的心却有些沉重起来，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做法是否合乎情义，是否有伤兄弟之情。他拿着写有自己名字的财产文契，看了看显得轻松自然的阿弟，仿佛才认识他似的，突然觉得阿弟长大了，成熟了。他不能再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阿弟了。

“始有志于革命”

孙中山又来到了茄荷蕾埠的商店。他望着商店，里面的摆设依然还是他原来设置的样子。他想：何不再动一动，怎么能老是一副旧面孔呢？

可是店员们像没听见他的话，一动也不动。反而阴阳怪气地说：“我们可没那闲功夫，要弄你自己弄吧！”

孙中山只好作罢。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一向对自己客客气气的店员，态度何以如此冷淡。

而这只是刚刚开始。孙中山在店中受到的冷遇和闷气越来越多。他想去看看帐本，管事的说：“我不敢有劳大驾，还是我自己来吧。别碰了几天又走了，叫我如何管这帐？”于是，就让孙中山做些杂碎苦役，而这些活，正是他们过去不让孙中山干的。

孙中山从他们的神情态度中，终于明白过来，这是一帮势利的东西。孙中山气坏了，他本来就不想在店里工作，是大哥硬要他来的。“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窝囊气，我可受不了。我要回国，回香港继续求学去。”

这样想着，孙中山一气之下就从店里跑走了。他找到他的姐夫杨紫辉，请姐夫帮助自己回国升学，说：

“我受不了那帮势利小人的鬼气，可我又不能因这一点小事去惊动哥哥。我走了之后，你要好好帮助我大哥。我的大哥，不就是你的大哥吗？”

杨紫辉听了孙中山的话，很受感动，就竭力劝说孙中山不要走，并且说他实在拿不出足够孙中山回国的钱。

孙中山也就不再多说，悄悄地离开了茂宜岛，来到了火奴鲁鲁。

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孙中山，只得在街头徘徊，为无钱回国而惶恐焦急。正在这时，他碰见了他在意奥兰尼学校求学时的同学钟工宇。

老同学不期而遇，两人都喜出望外。孙中山便同至钟工宇的住处，在那里暂住了下来。到了晚上，两人躺在一张床上聊天，孙中山这才把自己的境遇告诉钟工宇，并请他帮忙，借些钱给自己，好尽快回国。

钟工宇非常同情孙中山，也非常乐意帮他的忙，只是那时的他，刚刚开始经营一间裁缝店，每月的收入不过才五块钱，哪里拿得出那一大笔款子呢？

钟工宇陷入了沉思，“谁能帮这个忙呢？”突然，他想到了当年奥阿厚书院的教师英兰谛文牧师。这位老师是个热心人，当年又十分赏识孙中山，他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第二天，两人便来到英兰谛文开办的寻真书院。孙中山把自己的情况一说，英兰谛文立刻答应下来，说他可以在他的朋友中筹款，一定帮孙中山回国求学。

英兰谛文牧师的热心肠果然大获成功，他筹到了足够的款子。孙中山十分感激，不知道如何感谢这位可敬的老师。

钟工宇也拿出了五块钱，那是他一个月的薪金，并诚恳地对孙中山说：“你可以在我的店中随意选用你所需要的衣物。”

孙中山感动至极，也就不再客气，在同学的店中，挑选了几样他需要的东西。

正当孙中山即将离开檀香山的时候，孙眉闻讯赶来了，但是任凭孙眉如何劝说，孙中山也不肯改变离檀回国的决心，说：

“船票已经买好，不能退的。”

“那我没钱给你。到时可不要怨我。”孙眉见阿弟执意要走，心里多少有点后悔和难过，但他却不愿把这心情表露出来，反而说了如此强硬的话。

“我不要你的钱，我也不会怨你。”

孙中山回答得十分干脆。

就这样，孙中山搭乘轮船，途经日本，辗转回到了香港。

孙中山回到香港，大约在1885年的4月底。他立即返回中央书院，继续学习。可是不久，他就接到了父母带来的口信，要他回家成婚。

孙中山暂时还不想结婚，然而他一向敬重父母，他不肯违背他们的意愿，使他们伤心。于是，接到信后，孙中山便匆匆赶回了翠亨村。

其实这成婚的事是孙眉的主意。孙眉见不能留住阿弟在檀香山助他理商，又生怕阿弟在外不知还要做出什么“非礼”的事来，就想以成婚缚住阿弟的手脚。同时，他也想弥补点什么，来平复自己对阿弟内疚的心理。因此，孙中山刚离开檀香山，孙眉就给家中汇了几百块钱，请父母迅速为阿弟操办婚事。

作为父母，当然也在为孙中山的婚事操心。孙眉的提议正合他们的心意，于是便紧锣密鼓地办起来。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事操办得极为迅速。孙中山回家还不到半个月，便举行了结婚典礼。

婚礼的那一天是1885年的5月26日，新娘是本县外莹村商人卢耀显的女儿，名叫卢慕贞。夫妻俩结婚之后，生有长子孙科和女儿孙姪、孙婉。

婚后两个月，孙中也离开了翠亨，再次返回中央书院。一年之后，也就是1886年的夏天，孙中山从这所中学毕业。

自从孙中山出走香港，到他回乡结婚的这一年多里，也即1883年12月到1885年的6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便是持续了一年多的中法战争。这场战争对年轻的孙中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他“有志于革命”的开始。

早在16世纪，法国传教士就到越南活动。其后，法国人不断向越南渗透。到1862年逼迫越南订立《西贡条约》，标志着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开端。法国人并不满足，继续向越南大举进犯，1883年6月又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自此，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在侵略越南的进程中，始终觊觎着中国。因此，当法国人在迫使越南人屈服之后，立即把侵略矛头就指向了中国。

1883年12月16日，驻守在越南的清廷军队，遭到法国侵略者的进攻，奋起反击，中法战争于是爆发。

到了次年5月，互有胜负的中法双方在天津谈判并签订了《天津简明条约》，满足了法国侵吞越南和打开中国西南大门的侵略要求，双方暂时休战撤兵。

到了8月初，法国人又挑起事端，法国海军遂进犯基隆，向基隆猛烈炮击。基隆守军奋起抵抗，击伤敌舰两艘，击毙击伤登陆法军一百多人，打得法军狼狈溃退。

在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自中法战争开始后，一直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基隆一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学生，同时也使他们沉浸在忘乎所以的兴奋之中。他们买来酒菜，为胜利干杯，一起举着酒杯，哈哈大笑，高喊着：

“中国当然是会胜的。如今这班洋鬼子该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厉害了！”

孙中山当然非常关心战争动态，每天博览香港的各种中外报刊，对战争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与那些人的盲目乐观不同，对战争前景并不看好。他认为，法国人有铁甲舰，而我军只有木制的沙船；法国人有新式的炮和精干的炮手，而我军只有很难放一响的破枪；更何况，我们的兵……他不禁想起陆皓东冒充团丁以应检阅之急的荒唐事——是没有纪律的军队，是一群东拼西凑而成的乌合之众，怎么能保证必定取得胜利呢？

孙中山的冷静分析，却招来了人们的非议。那些为些微胜利而忘乎所以的人，竟斥责孙中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奸细”。

孙中山并不想为自己辩护，“还是让事实来证明吧。”

8月23日，重新布置后的法国军舰，向马尾港发起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福建水师仓促应战，虽然奋勇还击，终因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而遭惨败。福建水师七百余名官兵殉难，十一艘战舰和十九艘运输船被击毁。马尾造船厂也同时被轰毁。

孙中山得知马尾港惨败的消息，心情十分沉重，再次对那些盲目乐观的人说：

“木头船是经不住炮击的，我们应当制造铁的船只。对于这一点，我们不相信怎么行呢？”

侵略者的卑劣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人民，到处驱逐法国传教士，焚毁天主教堂；旅居国外的许多华侨，纷纷捐款回国，支援抗法斗争，香港各行各业的工人、商人也纷纷罢工、罢市，抗议法国侵略者的无耻罪行。

9月中旬，一艘参与侵略战争受创的法国伤舰，开到了香港船坞，要求修理。住凭舰上的法国人忽而威胁，忽而利诱，中国工人也毫不为之所动，他们决不愿意为这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服务，决不能为他们修好了军舰让他们再来打中国人。

不久，又有法国商船到了香港，码头工人宁肯饿肚子、也不肯为他们卸货。

这些爱国举动和同仇敌汽的精神，使孙中山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很快从沉痛中振奋起来。他看到了“中国人已经有了相当觉悟”，“还有种族的团结力”，不是没有办法的。

在国家面临危亡的重要关头，年近七十的退役老将冯子材挺身而出，率军赶往广西前线，毅然指挥了1885年3月的镇南关大战。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冯子材身先士卒，勇敢杀敌，团结各路将领，重创法军，收复谅山。法军在镇南关的失败，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倒台。

可是，令人不解和愤慨的是，捷报传到朝廷，昏庸和怯懦的清政府不仅没有一鼓作气把法军赶走，却唱出了“乘胜即收”的论调，卑怯地要求法国政府立即议和。

1885年6月9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法国人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都得到了。打了败仗的法国竟然成了战胜国。

战争的结局深深刺痛了孙中山的心。朝廷的腐败和卖国行径，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痛感如不改革中国的政治，国家就必然要走向灭亡。

孙中山从此立下了推翻清政府腐朽统治的决心，立下了革命救国的远大

抱负。

学医南华

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毕业了。

今后的路该如何走？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孙中山颇费了一番踌躇。

他清楚地知道，按照世人通常所走的，有四条仕宦之道：一是应试中举；二是投笔从军；三是有人保荐；四是拿钱买官。四条为宦之道，都离不开钱。提起这些，孙中山自是嗤之以鼻，深恶痛绝。

他也曾想过进军事院校。中法之战给予他的刺激太大，他想学些军事本领，学些制造武器和军舰的技术，以便在战争中打败外国侵略者，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可是，进陆军学校，须得经清政府允许。而要得到这允许，不知得送多少门包和贿赂。孙中山哪愿做这样的事？进海军学校，可福州的海军学校已被轰毁，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海军学校。

一些朋友见孙中山左右为难，打不定主意，就劝他报考神学院，将来做一名传教士。

孙中山摇摇头，说：

“基督教虽为我所信奉，但传教士却不是我所愿做的。”

最后，孙中山的眼前渐渐浮现了这样一幕惨状：在福州海战中受伤的一些中国官兵，因得不到救治而痛苦地死去。他的耳畔似乎响起了非常熟悉的声音：那是在檀香山时，杜南山老师笑着对孙中山解释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孙中山豁然开朗，他终于明确了自己的抉择，那就是做一个医生，用医道来为人们服务。因为医术是救人于苦难的学问和本领，只有行医才能最有利于社会。

孙中山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喜嘉理牧师。牧师赞同他的选择，并主动将孙中山介绍到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读书。喜嘉理牧师给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孙中山的情况，并请院长减免他的学费。

孙中山十分感激，拿着喜嘉理牧师的引荐信，来到了南华医学堂。

188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二十岁的孙中山迈进了南华医学堂的大门。他找到院长办公室，轻轻敲了敲门。门里传出声音：“请进！”

孙中山推门进去，只见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身材高大，微微发胖的中年人，他的脸庞红润，鼻梁高高凸起，头发稀疏，已有谢顶的趋势，给人以威严和精明强干的印象。

“您就是嘉约翰院长吗？”孙中山恭敬地问道。

“是的。你有什么事？”嘉约翰院长应道。

“我想进南华医学堂学习，是喜嘉理牧师介绍我来的。这是牧师给您的信。”

说着，孙中山走上前去，将那封信呈交给院长。

嘉约翰看过信，热情地说：“欢迎你来这里学习。”接着又向孙中山简单介绍了学校的情况。

原来，广州博济医院是1835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二十年之后，也就是1855年，开始附设南华医学堂。每年收取二十元的学费。一开始只招男生，到1879年才兼收女生。学校所开设的二十多种课程，都是从西方医学教科书翻译过来而作讲授的。

“关于学费”，嘉约翰院长最后说：“我很抱歉，不能为你减免。本校的学费标准已经很低，而且，我也不能破这个例。”

孙中山很坦然地说：“减免学费，那是喜嘉理牧师的一片好意。至于我个人，并不想使院长为难。”

嘉约翰看着眼前这个彬彬有礼而性格刚毅的中国学生，心里不禁有了点好感。

孙中山进了南华医学堂。他所在的班级共十六名学生，其中女生四人。同学当中，很多人的年龄都比孙中山大，但他却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他既勤奋肯钻研，又兼天资聪慧，记忆力特强，所以对学习不感到有什么困难。他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平时不声不响，少言寡语的他，一遇到问题，却敢于挺身而出，直陈不平，而且议论滔滔，言辞凿凿，叫人不得不为之折服。

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

南华医学堂作为一所新式的西医学校，却有个奇怪而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男女同学不但座位分开，泾渭分明、中间还得用帐幔遮住；学习妇科时，教师只带外国学生和中国女生实习，中国的男生却不允许参加。

孙中山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十分不满。刚进学校不久，他就对男女同学分座提出了意见，要求去掉教室中的帐幔，可是教师并不睬他。孙中山知道传统势力的庞大和顽固，何况分座对学习没多大影响，他于是也就不再坚持。可是到妇科实习时，他和其他的中国男生都被排斥在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国男生在妇科诊室和产房里进进出出。其他的中国男生都心安理得，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可孙中山看不惯，他觉得这是非改不可的不正常现象。于是，他向任课老师提出了参加妇科实习的要求。

那任课的外国老师以奇怪的眼神看了看孙中山，用不容置辩的口气，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为什么不能参加？”孙中山追问道。

“因为这是医院的规定，我只是执行规定而已。”

“这规定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能改呢？”

“如果真是不合理，修改的权利也不在我，那是医院的事。”洋老师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那好，我找院长去。”

孙中山掉过头，气冲冲地来到院长办公室，劈头就问：

“同是学生，为什么要歧视我们，不许我们到妇科实习？”

嘉约翰院长吃了一惊，正想发火，一看是喜嘉理牧师介绍来的那个学生，便捺住性子说道：

“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外国男生一样，被准许参加妇科实习？”孙中山毫不畏惧，把他的不满再申述下一遍。

“为什么？”院长不禁觉得有些好笑，“你们中国人不是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吗？我们这样做，正是尊重你们的习惯。”“男女授受不亲确是我们的习惯。但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应该加以改正。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不好习惯，都应该改。”

“我们中国人学习医术，就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治病救人，是不应区分什么男女的，难道中国的妇女有病，我们这些中国的男医生就可以不救吗？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遵守那不合理的习惯，置病人于不顾，任其遭受病痛折磨而死去？想必院长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孙中山这一番议论，征服了嘉约翰院长。他实在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年轻的中国学生，竟然会有这样深刻的见解，竟然使自己想不出什么话来驳斥这个年轻人。他静静地看了孙中山一会儿，像是在下决心。果然，院长站起身，痛痛快快地说：“上次减免学费，我没为你破例。今天，我愿意为你破这个例：从现在开始，允许你们中国男生参加妇科实习。”

消息传出，同学们个个欢欣鼓舞，而对于孙中山的胆大识高，能言善辩，则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仅如此，孙中山的学识也是令那些同学刮目相看的一个重要方面。

孙中山到了南华医学堂，当然是以攻读医学为目标的。可是他在学医之余，聘请了一位国文教师给他讲授中国经史，并且，在他的床壁前面，摆放了几层成排的书，那是整整一套二十四史，表明孙中山对国学仍是一往情深，用力甚勤。

然而，不少同学都以为孙中山摆放那一大堆的书不过是装璜门面、沽名钓誉罢了。一天，有个叫何允文的同学，看了看孙中山的那几层成排的书，就从中间抽出一本，来考问孙中山。他以为一定能把孙中山问倒，出出孙中山的洋相。

孙中山哪会不知同学的用意，心想，该给他们点真东西瞧瞧。因此，当何允文一开口提问，孙中山就回答起来，而且是极为迅速、流畅。何允文和其他的一些同学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这才知道孙中山藏书并不是做样子，果真每本都认真读过。

这时，孙中山也有些得意，说：

“我有个雅号，你们知道吗？”

“雅号？什么雅号？”何允文连忙问。

“那还是我在中央书院读书的时候，由于我爱读各种各样的书，尤其是诸子百家，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通天晓’”。

“通天晓”，何允文不禁喊起来，“通天晓，果然名副其实，名副其实。”

孙中山谦虚地说：“通天晓我可不敢当。不过我确实喜欢读书，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

这件事一传开，再也没有谁认为孙中山是迂腐和虚伪的了。同学们见到他，就喊：“通天晓，最近又在读什么书？”

服膺达尔文学说

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学习了一年，就转学到了香港西医书院。

西医书院是刚刚创办的一所用英语教学的医科大学。它的创办者是香港议政局议员、律师兼医生的何启先生。1887年2月，何启用他已故妻子雅丽的遗产，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到了8月，又决定在医院内设立西医书院。书院以掌院为执行院务首脑，初由史特渥地博士充任，下设教务长，由孟生博士和康德黎博士先后充任，推李鸿章等为名誉赞助人，何启为名誉秘书。此外，有各科教师十多人，多为专门学者和医生。

西医书院设立后，就派人去广州招生。其中的一条要求是，要招收能懂中、英文字的学生。

孙中山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去报了名。他在注册簿上的署名是“孙逸仙”。“逸仙”，是“日新”的粤语谐音。这个名字，是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区凤墀，在1886年为他改的。

孙中山转学自有他的看法。首先他认为西医书院是学制五年的本科大学，师资力量较高，教学设备亦较完善。这对他求知学医很有好处。

其次，或许是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也有苦恼，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苦恼。那就是广州这地方不如香港思想开放，说话较为自由，可以尽力鼓吹革命。在南华一年，孙中山就常因同学之中没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他而苦恼。

南华时期，孙中山虽然很受同学钦佩，被同学门誉为“通天晓”，但是他又被同学称为“大话书生”，提起这“大话书生”，也是有来历的。

孙中山读书不忘救国，他始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广交社会各界人士。孙中山结交人士的方法很特别，亦十分慷慨。一旦身上有点余钱，他就招集各种人士外出喝茶聚餐，不论是教师、同学，还是工人、商贩，都在招纳聚会之内。一入座，孙中山便侃侃而谈，大谈中国的种种旧礼俗旧习惯应当革除，大谈中国的现状是如何危险。同人应当起而自救。他只顾自己谈得起劲，也不问别人是不是理解，是不是赞同，甚至也不问别人是否在听。他讲啊讲，那些人茶足饭饱就坐不住了，有的借口有事提前走了，有的甚至什么也不说就悄悄溜走了。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对着满桌的怀盘狼藉空叹连声，感慨不已。

有一次，又是这样的情景，人们都走了，只剩下了孙中山一个人在那里空自慨叹。突然，他发现还有一个人坐在对面，静静地陪着他。就问道：

“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呢？”

“因为你说得太好了，让他们走吧，我愿意一直陪着你。”

“真是太感谢了。请问你的尊姓大名？”孙中山很受感动，他终于有了一个知音。

“免贵姓郑，名士良。”

“郑士良。”孙中山连忙绕过桌子，走到郑士良面前。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郑士良当时与孙中山同在南华医学堂读书，于是一起返校。途中，两人相谈十分投机，彼此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

“你知道同学们给你起的外号吗？”郑士良临分手时间道。

“知道，他们都喊我‘通天晓。’”孙中山不无自豪地说。

“不，不是这个，是另一个。”

“另一个？”孙中山奇怪极了。

“是啊。他们还把你称作‘大话书生’”，郑士良说着，不觉有些生气，“他们不理解你的追求，你的理想，竟把你的主张宣传说成是大话。我就愿意听这样的‘大话’。”

“那好。我是‘大话书生’，你就是‘大话听众’了。”孙中山的豁达与幽默，郑士良更为钦佩。两位朋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有了郑士良这个真诚的朋友与知音。孙中山孤寂的心稍许得到了一些安慰。但这毕竟不能满足他的热望、他的追求，孙中山还是向往香港的自由与活跃，他相信在那里会找到更多的朋友与知音。

于是，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郑士良得知孙中山转学的消息，非常吃惊，立即来为孙中山送行。

他们默默地坐着，一直坐到了很晚很晚，该说的都已说了，只有分别的痛苦，在他们的心中逐渐弥漫开来。最后，郑士良噙着泪水，紧握着孙中山的手、真诚地说：

我曾加入会党，认识不少有志工人，以后有什么事，我可以招徕一批人为先生效力，听从先生指挥。”

孙中山用力摇了摇朋友的手，也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

“谢谢，谢谢。咱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孙中山怀着与好友依依惜别的心情，赶赴香港，开始了他在西医书院的学习生活。

孙中山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投身到学业之中。他不仅刻苦钻研各门医学课程，积极参加学校设置的大量实验和实习活动，而且仍把课余的大量时间放在阅读书籍之上。在这期间，孙中山阅读的书籍种类更为多样广泛，除了中国古代的大量典籍之外，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等各种各样的书，都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兴趣。他常常读书读到深夜，当很多同学都一觉醒来，仍然看见他还捧着书本，一副专心致志、不知疲倦的神态。

一天，孙中山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看着看着，他的筷子停住了，嘴巴也停止了嚼动，一口饭含在嘴里含了半天。他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最后，他干脆放下饭碗，一口气把那本书读完了。

孙中山读的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于达尔文及其所提出的理论，孙中山钦佩之至。他热憎地在同学之中推荐达尔文的书，使不少同学在他的影响下，阅读起达尔文的著作来。然后，他们一起交流读书的体会，孙中山抑制不住内心对达尔文的崇敬之情，热情地称颂道：

“达尔文真是了不起，他的功劳，世界上的许多皇帝都比不上他呢。”

同学们都认为孙中山说得对，说得好，都对达尔文的理论十分信服而推崇。

而孙中山的头脑里，却在思考着更深的问题，要把他所了解到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加以比较加以印证：

“按照进化论中的天然公理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我们中华民族到底是优者还是劣者？是适者还是不适者呢？”

对于这样一个含混不清的问题，孙中山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和很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要做个优者适者。大自然中的优胜劣汰规律。不同样适合于人类社会吗？

随着学业的增进，随着知识的丰富，随着视野的开拓，孙中山变得日益

成熟起来。他开始感到基督教所传的经文也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比如，人们不能享受现实的幸福，还能到什么地方去享受来世的快乐？天堂在哪里？地狱又在哪儿呢？

渐渐地，孙中山对基督教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与虔诚，虽然他并未放弃耶稣，但是他的宗教观念已大为淡薄了，他把他的热情与信念转向了哲学、政治，尤其倾心和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

孙中山的信念有了转变，他的言行举止也相应有了改变。在西医书院读书期间，每到寒暑假，他总要回故乡翠亨看看，尽力为家乡做些实事。

有一年暑假，孙中山回到翠亨。他看到家乡治安混乱，村民们因常常受到盗匪骚扰而惶恐不安，村中道路杂草丛生，一派萧索荒凉景象，他心里感到十分难受，于是决心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孙中山说做就做。他组织起一支青年护庄队，不仅安排村中的一些小伙子进行夜间放哨、打更防盗，而且一马当先，亲身参加武装巡逻。白天，则在村中发起了修桥、补路、洒扫街道的各种公益事项，每一项他都踊跃参加。

结果，短短几十天时间，村里的治安和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村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对孙中山赞不绝口，至于毁殿砸像的事，人们早就淡忘而不计较了。

除了整顿乡村的治安和卫生之外，孙中山还把他所学到的科学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向老农介绍科学选种和施肥等农学知识，并考察土壤，试验种植桑树。孙中山的学识与实干精神，更受到了人们的赞赏。

孙中山从这些实践活动中，感受到改良社会的巨大乐趣。他孜孜不倦地做着这一切，力图为人们多做实事，多做好事，但是，现实却不能使他满意，甚至使他愤愤不平。

有一次修路，因为涉及到邻村土地，引起了纠纷，孙中山只好呈请县令出面协助解决，当时的知县李征庸表示同情，答应届时协助解决。可是，当下一个假期来到，孙中山满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便兴冲冲地赶回家。一问，才知土地的问题不仅没解决，连解决问题的知县李征庸也不知被挤到哪去了。现任县令杨文骏花了五万元买到了县令职位，这家伙对上是奉迎拍马的好手，对下是搜刮民财的饿狼，号称“剥皮杨”。

孙中山一听，愤愤不平，对于腐败的朝廷，他已完全失去了信心。这是个无可救药的政府，而“中国无良好政府，办事必不能成”。

孙中山这样想着，更激发了他进行革命，改造中国的愿望和决心。

反清“四大寇”

转变信念的孙中山，在努力学习与躬身实践的同时，革命的志愿越来越强，对革命的宣传鼓吹越来越活跃而激烈。

只要一有空余时间，孙中山便借助香港的自由氛围，“以学堂为鼓吹之地”，无所顾忌地向同学们“大放厥词”。

他常常对同学谈起太平天国的佚事，讲述太平天国许多领袖的英雄事迹；尤其推崇洪秀全，把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极表惋惜。与此同时，他自诩为“洪秀全第二”，表达了要担负起太平天国英雄未竟事业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决心。

因此他常常在同学面前抒发对满清朝廷的强烈不满，号召人们要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对于中国目前的危机状态，作为中国人应当奋起自救，不要只沉迷于医道医术之中。

孙中山振振有词，公开宣称：“作医生尽其医术，不过只能救几条人命；而从政反满，则能将无数人民从黑暗、痛苦中拯救出来。所以我这一生，将以反满抗清作为最大的事业，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是属于我可做的了。”

很多同学望着不倦鼓吹、激情澎湃的孙中山，不禁觉得好笑，以为孙中山大概患有癫狂症。有的则视孙中山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生怕连累自己而避之唯恐不及。有的甚至对孙中山施加威胁，并煽动一些同学来反对他。

其中就有一个家伙，自恃是清廷大官的子弟，恶狠狠地对孙中山嚷道：“大清皇上治世有方，恩泽四海，世人无不感恩戴德！你竟敢反对皇上，信口雌黄，当心你的下场。到时招灭九族，后悔就来不及了。”

孙中山不屑一顾。他和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当众回击这个无知狂妄的官僚子弟。

过了几天，学校举行了一次集会，老师和同学都参加。孙中山来到入群前面，对着老师和同学大声说道：

“满清政府腐败不堪；恰如江河日下，很快要完蛋了！如此黑暗的政府，只能带给人民以灾难和罪恶。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宁可被杀头，也不能像这位纨绔阔少”——说着，孙中山用手指着那官僚子弟——做大清王朝的孝子贤孙！”

孙中山的当众演说让不少同学畅快，叫很多老师、同学惊讶，更使那位官僚子弟恼羞无状，尴尬难捺，因为香港已经不是清廷管辖范围，他又怎能拿孙中山怎么样？

孙中山与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都是非常的开心。在西医书院那几年，孙中山利用课余、假日、于香港、澳门两地来往甚勤，旨在交结有识之士，共同寻找救国真理，探索革命道路。其中香港有三人最与孙中山志趣相投，无所不谈，有“四大寇”之称。那三人是杨鹤龄、尤列和陈少白。提起尤列，孙中山与他的相识还有段趣事。那还是在南华医学堂时，一天傍晚，孙中山和郑士良上街买荔枝，等掏钱时却发现口袋空空，便与小贩说：“今日忘了带钱，明天来学校找我们取款。”可小贩不愿意，郑士良就有些火了，说：“我等不是那赖帐的人，决不会少你一个钱的。”小贩仍是不肯，于是双方争执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引得行人都围拢来看是怎么回事，尤列便是那围观的人之一。他正好与他的族叔、孙中山的校友尤裕堂到博济医院探访朋友路过那里。当下尤裕堂代付了荔枝钱，并一同回校。

那天晚上，几个人以荔枝当晚餐，侃侃而谈。孙中山谈兴大发，高谈爱国救国等一套宏论，使尤列大开眼界，钦佩不已。从此往来渐密，结为知己。

尤列那时在广州算学馆读书。毕业后，经考试，来香港任华民政务司书记。到达香港之后，他便去拜访孙中山。朋友相聚分外高兴，谈得更来劲，尤列拉住孙中山的手往外就走。孙中山很奇怪，问道：“拉我去哪？”尤列只管走，说：“带你认识个好朋友。”“谁？”“到时你就知道了。”

尤列带着孙中山来到歌赋街，进了一家名叫“杨耀记”的商店。孙中山不觉有些好笑，但他不作声，默默地跟在尤列后面进入店里。

房间里已有不少人，见二人进来，便一齐站起来。尤列连忙介绍道：“这是我在广州算学馆的同窗杨鹤龄。”说着，他把指向杨鹤龄的手又转向了孙中山，“这是我的好友孙中山。”

孙中山与杨鹤龄都没说什么，两人对视了一眼，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把个尤列笑得莫名其妙。他看看孙中山，又看看杨鹤龄，终于恍然大悟：“啊！原来你们早已认识。”

于是大家一齐笑了起来，房间里充满了相聚的快乐和欢畅。

孙中山与陈少白的相识，则是因了孙中山的国文老师区凤墀的介绍。

陈少白在广州格致书院就读。一次有事要去香港。临行前，区凤墀对他说：“你去香港，我可以给你介绍个人，你一定与他很合得来的。”说着，区凤墀写了封介绍信。

陈少白一看所介绍的人叫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到了香港，一办完事，陈少白就去找孙中山。

孙中山见是区老师介绍的朋友，又见陈少白丰姿俊美，风度翩翩，心里自是十分高兴。两人谈了一会儿，陈少白的不凡谈吐和敏捷才思，使孙中山更是高兴，就想与他多谈一会，便提议：

“我们去逛逛公园吧！”

陈少白对孙中山也很有好感，孙中山的提议正合他的心思。

于是就随孙中山到了植物园，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

两人开始交谈，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刻停歇，他们发现，对时局的看法，对方与自己竟是那样的一致，对国家的前途，对反满抗清，对方与自己竟有相同的志向与抱负。

孙中山舍不得与陈少白分手，他还想再多谈谈，可是天已昏暗下来，就问道：“这次来香港，住几天再走吧？”

“不，只呆一天，明天就要走的。”陈少白显得也十分惋惜。

两人终于站起来，握手告别。孙中山握注陈少白的手，心想：“如此志趣相投的朋友，以后一定要设法多在一起谈谈。”

过了一段时间，陈少白因为家境困难，遂来香港开辟新路，打算半工半读，将学业坚持下去。

孙中山便劝陈少白学医，说：“医学是很有用的。同我一起学医吧。”

可陈少白却不大喜欢医科，犹犹豫豫地，老下不了决心。于是，孙中山干脆自作主张，替他报了名。

一天，陈少白又来孙中山宿舍谈天。正在兴高采烈之时，孙中山突然说他有事需出去下，请陈少白稍等一会。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孙中山又匆匆跑回宿舍，煞有介事地说：

“少白，康德黎博士要见你呢。”

“找并不认识他，他更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见我？”陈少白很觉诧异。孙中山也不回答，只是笑，抓住陈少白的手，就往外走，径直来到了教务长办公室。

孙中山便把陈少白介绍给康德黎博士。

康德黎满面笑容，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来我校学习。”

原来是这么回事。陈少白待要埋怨孙中山，可事已至此，也就只好不说了，就连忙回答：

“敬请博士今后多多指教。”

两人出了教务长办公室，孙中山高兴地说：“这下好了。你这一来，今后我们大家可以多谈了。”

陈少白故作嗔怪地说：“你倒好，为了联络‘同党’，真是用心良苦，不择手段啊！”

就这样，陈少白转到了西医书院，比孙中山低两个军级。

陈少白进了西医书院后，便与孙中山一道，常去杨鹤龄父所开的“杨耀记”商店聚会畅谈，共商革命大计，自然又结识了杨鹤龄和尤列。

由于四个人情趣相同，具有共同的志向抱负，孙中山便提议立约盟誓，以表共同革命的坚定信念。

孙中山的提议得到了其他三人的一致赞同。尤列自告奋勇、立即提笔起草，草成后由其余三人一一看过，都觉满意。于是再由陈少白用白纸誊正。誓词的原文如下：

宣誓人 XXX 等精诚宣誓，天地鉴容，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此誓。

戊子年九月初五日

尤列，广东省顺德县人，乙丑正月廿七日出生，二十四岁。

孙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人，丙寅十月初六日出生，二十三岁。

杨鹤龄，广东省香山县人，戊辰六月初十日出生，二十一岁。

陈少白，广东省新会县人，庚午七月廿五日出生，十九岁。

宣誓书的签名，是按年龄大小依次排列的。他们立誓的目的，只想驱除满人，恢复大汉中华，实行共同理想，还没有具体的革命纲领。

签过名后，四人整肃衣冠，点燃香烛，同时对天盟誓。仪式虽然简单，但却十分严肃而隆重。宣誓完毕，四人又到西医书院拍照留念。

可是这件事竟被杨鹤龄的哥哥注意到了。他便半骂半讽地对他的弟弟说：“鹤龄，你们四人在搞什么名堂！遮遮掩掩地在谈论推翻满清政府的事，简直就是四大寇！万一被清廷知道了，那可是要杀头的。”

孙中山听了这话，很是坦然。他对其他三人说：“洪秀全揭竿起义，失败被清廷贬为寇。我们四人的志向正和洪秀全一样，我们也正是反清四大寇。这没什么好害怕的。”

从此，“四大寇”的称呼就在他们的亲戚朋友中传扬开来了。

“ 只想推翻清廷 ”

孙中山与尤列、杨鹤龄、陈少白志同道合，结为反清“四大寇”，他们的交往更密切，为了便于相聚交谈，杨鹤龄在“杨耀记”内专门开辟了一间房子，作为他们相会的固定地点。

于是，他们常常风雨连床，畅谈竟夕，纵论天下大事，筹划中国前途，抨击清朝的黑暗统治，提出了“勿敬朝廷”的口号。

有一次，四人又聚在一起。孙中山意气风发，高谈旧事，说到激动处，不禁声调昂扬，满脸胀得通红。就像在面对千百人作演说一样。

尤列静静地听着，忽然用手指着孙中山的脑袋，忘乎所以地说：

“这个人的头脑是与洪秀全一模一样的。”

孙中山听了，愣了一愣，随即回击道：

“你是游智开。”

众人听了，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游智开是当时的广东巡抚。“尤”与“游”同音，所以大家都被孙中山机智的回答给逗乐了。

“四大寇”的名声传了出去。许多人一见到他们，便窃窃私语：“四大寇来了。”然后就悄悄避开，生怕他们发表反清言论会牵连到自己。但是，也还有一批人赞赏他们的勇气与胸襟，赞同他们的见解，与他们来往十分密切。

这些人当中，主要的有郑士良、陆皓东、杨衢云和吴景良。

郑士良在孙中山转学香港后不久就辍学了，他返回家乡惠州，开设了一家药房，取名为“同生药房”。此后，他便利用他的身份和工作之便，积极联络会党人士，不久即被推举为三合会首领。

陆皓东曾与孙中山在香港呆过一个时期，后赴上海读电报学堂。1890年毕业，即被派到安徽芜湖电报局工作。

郑士良与陆皓东都是孙中山的老朋友。两人常去香港、广州小住，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尤其郑士良还向孙中山提供了中国秘密结社的情况。对孙中山帮助很大。

杨衢云与孙中山相识，大约是在1891年。

一天，孙中山上街，看见一个青年在与一个英国士兵打架。只见他三拳两脚，干净利落，一下就把那英国兵打倒在地。孙中山和围观的人一样，感到十分痛快，很佩服那年轻人，敢跟洋人硬碰硬。

正在这时，赶来了几名警察，把那青年扭送到警署去了。

孙中山甚是不平：明明是英国人酗酒闹事，凌辱中国人，为什么反把挺身仗义、打抱不平的好青年抓起来？于是，孙中山立即赶回西医学校，请康德黎博士出面保释那个青年。康德黎倒也热情正直，随即与孙中山一同赶往警署，把那青年保释出监。

孙中山这才知道那青年叫杨衢云，比自己小五岁。杨衢云对孙中山的热心相助很是感动，愤慨地说：“英国佬欺辱我中华之人，我就是看不下去，就要打抱不平。”他狠狠地叹了口气，又接着说：“英国人之所以这样横行霸道，都是因为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所以才被人欺侮。”

孙中山没想到杨衢云既有一身好武艺，见识也相当深刻，出语不凡，更觉得高兴。于是邀请他去宿舍谈论救国大计。两人从此便成了知心朋友。

孙中山不仅是在自己的宿舍、在“杨耀记”内谈论革命、鼓吹反满，有时甚至在同学的家里，他也高谈阔论，而且言辞激烈，情绪昂扬，使得同学的家长都注意到了他。

譬如孙中山与同学关景良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去他家里聚会。关景良的母亲黎氏在雅丽氏医院工作，很喜欢孙中山刚直、活泼的性格。她见孙中山穿着过于狭窄的长衫，就经常与他开玩笑，笑他是“气死件作”（在旧社会，广州市民称殡仪馆工人为件作佬）。

孙中山也不生气，一笑了之。可是饭后闲聊，他便成了主角，总是听他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不仅言词激烈，而且透露出远大的志向与抱负。

每当这种时候，黎氏总是默默地注视着孙中山，心里很是惊奇。一次，她忍不住向孙中山问道：

“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

“不。”孙中山一口否定。

“想做钦差大臣？”

“也不。”孙中山又否定了。

黎氏不禁笑起来：“那么是想做皇帝了？”

孙中山还是否定了，他沉思着说：“什么官我都不想做。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只想推翻清廷。这事业比做皇帝更伟大、更辉煌！”

黎氏听了，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孙中山，像是不认识他似的，并带着惊叹的口吻说：“啊呀，没想到你还是个胆大包天的‘孙悟空’啊！”

孙中山不但要学孙悟空大闹天宫。一心推翻满清政府，而且他的性格亦似孙悟空活泼好动，喜欢嬉戏打趣，幽默调皮。熟悉孙中山的人，就干脆称他为“孙行者”。

136 有个化学老师叫何燎然，喜欢在学生面前大谈佛偈，常说什么“不有而有，有而不有”，一副假道学模样。孙中山心里很不以为然，一听到这样的话，总是捧腹大笑，把个何燎然先生笑得莫名其妙。而在同学中间，孙中山则常常学着何燎然的样子，说，“不有而有，有而不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陈少白入学之后，与孙中山住一宿舍。在他们的房间里，除了两张铁床，其他地方都堆满了书籍。他俩十分要好，一起读书，一同吃饭，晚上常常聊到很晚。彼此有什么问题，都一起商量解决。

但是，这两个好朋友也喜欢互相戏弄，打来打去。谁吃了亏，谁就发脾气）另一个也不相让，于是常常推推搡搡，以至用书本、杂物做武器，抛来掷去。他们的宿舍的窗口，正对着伦敦教会道济会堂的天井和厨房。因此，他们抛掷的“武器”，便不时落到会堂里去，弄得道济会堂的人十分恼火。有一次，竟然连煤油灯也从窗口飞了出去，道济会堂的主持拿他们没办法，只好亲自到学校去“告状”，请求老师对他们严加管教。然而，不管是学“孙悟空”闹天宫，一心只想推翻清廷也好，还是如。“孙行者”般活泼好动、嬉戏打闹也好，都丝毫没有影响孙中山的学业。

1888年春天，就在孙中山转入西医书院不久，他的父亲孙达成因病去世了。在父亲病重期间，孙中山赶回家乡，为父亲煎汤送药，整日守候在父亲的病床前，极尽为儿的孝敬之心。

父亲去世了，孙中山十分伤心，大哭了一场。他站在父亲的灵柩前，为自己不能挽救父亲的生命而内疚而自责，更激发了他学好医术救人性命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

孙中山的学习更勤奋更刻苦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西医书院的几年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第一学年，获全年级第三名（应考者十三人）。化学、物理和生理学三科成绩优异。

第二学年，名列全年级第一（应考者九人）。

第三学年，主要在雅丽氏医院从事临床实习，工作积极，获得极佳的评价。

第四学年，名列全年级第一（因同学多未能逐年升级，应考者仅五人）。

第五学年，名列全年级第一（应试者四人）。在毕业考试当中，十二门课程有十门获优等，总成绩称“最优异”。

1892年7月23日，西医书院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孙中山以全校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他的毕业执照上，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

香港西医书院掌院，并讲考各员等，为给执照事：照得孙逸仙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发给执照，仰该学生收执，以昭信守。

教务长康德黎博士，亲手把毕业执照发到孙中山手中。他在毕业典礼上的简单致辞中，热情地赞了孙中山。称赞他的勤奋好学，称赞他的聪慧与才智。

康德黎博士为西医书院能培养出孙中山这样优异的学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毕业典礼之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特地邀请了五十人，举行了一次庆祝宴会。

这对于孙中山来说，是多么巨大的荣誉。

行医受挫

二十六岁的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但是，这个高才生，却不能在香港行医。

原来，在香港医学局看来，西医书院的课程并没有完全按照英国的标准设置，因此，它的毕业文凭就不能承认，它的毕业生也就没有行医香港的权利。

对此，孙中山愤愤不平，可是又没办法去改变现实。无可奈何之下，就打算在香港开设一家药房，于是让陈少白代他草拟一份招股章程。

康德黎博士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孙中山这样做很不妥，因为在英国，医生的地位很高，是社会的“上等人”，做买卖的自然不能入流，于是，就亲自赶到孙中山那里，劝他不要这样做。博士带点生气的口吻说：

“用你的名字开药房？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要知道，你是西医书院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应该自爱才是。”

孙中山无话可说，他理解老师的一片苦心，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然而，康德黎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也并不足劝劝就了事，他非常关心孙中山以及另一名高才生江英华的前途，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与地位，为他们四处奔走。最后请香港总督罗便臣驰书英国驻北京公使，托英国公使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陈述孙中山、江英华两人“识优学良，能耐劳苦”，“请予任用”。

李鸿章给了英国公使一个面子，即覆函表示同意，说：二人可来京候缺，每人暂给月俸五十元，授予“钦命五品军牌”。

孙中山非常感谢康德黎博士的大力举荐。京城人多，各色人物都有，在那里一定可以结交更多的有识之士，使他们与自己一样，向往并从事“医国事业”。

于是，孙中山改变了原来在香港、广州活动的打算，同意与江英华一道上京赴任。

康德黎博士见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心里十分高兴，就亲自带领两位得意弟子直奔广州。

到达广州之后，他们住了下来。因为是北上赴任，必须向李鸿章的哥哥两广督李瀚章领取军牌。这本是件小事，很快就能办好的。但他们上总督府求见，却被门吏挡住了，要他们三天后再来。他们只好等着，白白等了三天。憋得孙中山一肚子气没处发泄。

三天后，总算见到了李瀚章。李瀚章阴阳怪气，打了几句官腔，又对孙中山、江英华教训几句，然后让他们去办理有关手续。

手续十分繁琐，跑这跑那，跑得孙中山身上直冒汗。最后，衙吏还要他们填写一张表格。孙中山拿起表格一看，表格要求填出三代明细履历。“这不是侮辱人格么？”领取军牌的是我，为什么还要填上祖父与父亲的情况？

孙中山原本就因为等啊、跑啊憋了一肚子气一肚子火，这下一齐爆发出来。他把表格掷还给衙吏，掉头就走了。

于是，孙中山想到了澳门。还是在西医书院读书时，有一年假期回家经过澳门，曾经为当地绅士、镜湖医院董事曹子基、何穗田的家人治过病，那是久治不愈的一种病。孙中山经过详细诊断，采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很

快使病情有了起色。等开学返校再路过澳门时，孙中山又根据病情对用药作了调整，终于使病人迅速恢复了健康。大家对孙中山的医术赞叹不已，赞他“妙手回春，华佗再世”，并热情地发出邀请，希望他毕业后来镜湖医院就职。

如今，香港难留，北上又不成，孙中山便决定去澳门碰碰运气。

孙中山到了澳门，来到镜湖医院。由于他在镜湖医院留下了好印象，立即被聘任为这个医院的主治医生。

镜湖医院是一家慈善医院，专用中医中药给病人治病。孙中山的受聘，使他成为这家医院的第一个西医医生，因此，医院打破了专用中医中药的惯例，开创了中西医兼用的薪的格局。

但是，受聘于镜湖医院，并不能使孙中山满足。他想自己开一家医院，单独行医。而这个愿望，在孙中山到达澳门之后不久，就实现了。

1892年12月18日，澳门大街出现了一家中西药店。它是孙中山开办的。为了开办这家药店、实现自己单独行医的愿望，孙中山四处奔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最后通过老朋友杨鹤龄，终于说通澳门豪富、杨鹤龄的七妹夫吴节薇同意作担保还银人，向镜湖医院贷款本银二千元。才解决了开办药店的最根本的资金问题。

中西药店的出现，结束了中国籍西医从未在澳门开业的历史、孙中山成为中国籍西医在澳门开业的第一人。

中西药店是办起来了，但是它的前途如何，却令孙中山十分担忧。他的一些朋友也对孙中山能办好药店、收回投资持怀疑态度。一家颇有影响的医学杂志《中华基督教医学报》曾刊文指出，说行医治病，“在香港或者上海这样的地方机会尚且有限，何况别处？”

机会有限，并不是说中国人很少生病，而是由于迷信、愚昧和偏见在作祟，使得很多生病的中国人，常常不是是求医而求神明，或者只相信中医而忌讳西医，甚至心甘情愿地投向巫婆和江湖骗子的圈套中。

孙中山决心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精湛医术来改变人们的观念，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这方面，他有过一次亲身实践。

1892年春天，在孙中山即将从西医书院毕业的时候，孙眉从檀香山汇来一大笔钱，要给家里盖座新楼。为此，孙中山特地赶回翠亨，亲自设计建筑图样，将1885年孙眉所建的一所房宅加以扩建，建成一幢中西式结合的两层楼房。新居落成，孙中山亲笔写了一副四字对联，张贴在大门两旁，对联云：“一椽得所，五桂安居”，表达了孙中山新居落成后的欣喜之情。这幢楼房，就是今天供人参观的“孙中山故居”。

这里要说的，是楼房即将竣工时发生的一件事。

建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为楼房砌一道围墙。几个被孙中山请来的工人，在工地上已连续干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工人上长了一个久治不愈的大疮，虽然疼痛，但他仍然坚持出工做活。

一天，庭院外传来了“咚、咚、咚”的竹筒敲击声，工人们一听都知道是来了江湖医生，都催促那位生疮的工人去找江湖郎中治一治。

生疮的工人已备受折磨，听说来了江湖医生，就像盼到了救星一般，连忙跑出去喊住那江湖郎中。其他几个工人也都放下手中的活，一起出来看热闹，看看江湖医生是如何治病的。

江湖医生摸摸那工人的腿，又看看他的神色，知道那工人的心情很焦急，

就说：

“这个大疮有奇毒，再拖下去就麻烦了。我包你治好，但得付五两银子。”工人们一听都一起嘘起来，“啊呀，这么贵呀！除个小疮就要花这么一大笔钱！你该不是敲竹杠吧？”

生疮的工人面有难色，再三恳求说：“医生你就行行好，便宜一点吧。”

“不行不行，没有这么多钱，我是不会替你治的。”那江湖医生丝毫不肯让步。

工人们便一边嚷，一边帮着说，声音越来越杂，越来越响。惊动了正在屋里看书的孙中山，他便走出院子来，想看个究竟。当问明白是这么回事之后，就对那工人说：

“我是个医生，你有病为什么不叫我来替你治？”

那工人见东家这样说，倒显得不好意思，不知如何回答。

一旁的江湖医生却被激怒了，立即大声嚷道：“你小子竟敢与我抢生意，难道你以为我治不好他的病？老实告诉你”他顿了顿，从袋中取出飞砣，恶狠狠地接着说：

“我一飞砣打断你的脚，也能替你治好。”

话音刚落，他便把手中的飞砣晃了几晃，眼睛紧紧盯住孙中山。

那飞砣是个酒杯大的圆锥状铁球，连着铁索，是打人的一种凶器。

工人们都惊呆了，一起注视着孙中山，看他如何应付这种场面。

却见孙中山转回身去，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跑进正厅，一转眼工夫又噔噔地跑了出来。大家都在纳闷，只见孙中山用左手的长抽遮住右手，比画成一副开枪射击的架势，又听见他大声说道：

“你那一点雕虫小技算什么。我一支‘对面笑’（手枪）打死你，也能叫你起死回生。”

工人们实在没想到孙中山还有这一手，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又一起把目光投向江湖医生，只见那江湖医生吓得脸色苍白，手足无措，木鸡似的站着。

孙中山的母亲、姐姐这时也都出来了，她们怕闯出什么祸事来，连忙上前劝阻。

那江湖医生见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便趁势溜走了。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看江湖医生走了，才好奇地问道：“阿弟，你从哪里弄来的手枪？”

孙中山哈哈一笑，露出手指，把刚才那姿势又做了一遍，说，“姐姐，你看，这不是手枪吗？”

大家都一起开心大笑起来。

孙中山立即为那工人治疮，并说：“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保证把你的毒疮治好。”

果然，那工人的毒疮不久就治好了。

回想起这一段经历，孙中山既获得了勇气；又获得了启迪。他深深懂得，面对人们的迷信、愚昧，只有用无畏的精神、高尚的医德和优良的医术才能打开局面。

孙中山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自愿充当镜湖医院的义务医生，不收取任何报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人们对医生的好感和信任。

而对于自己开设的中西药店，孙中山更是“德”字当先，以优质、真诚的服务赢得病人的心。他始终以一种友好而善良的态度为病人治病。收取费用十分合理公道，对一些贫穷者甚至赠医送药，分文不取。

不久，中西药店的名声就传了出去。人们都知道中西药店有位姓孙的医生、医德既高，医术又好，有了病，都乐意来中西药店找孙中山医治。

孙中山的医术很高，尤其擅长外科手术。有一次在镜湖医院，他为一个病人开刀，取出一块大如鸡蛋、重一两七钱多的肾石，这在当时，手到病除是极其罕见的。

而且，每逢有什么大手术，孙中山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总是请康德黎博士来帮忙。而康德黎总是有请必到，他乐于帮自己的学生。因为孙中山有一种“易于使人们注意他”的天性，“一种吸引人们亲近他的磁性”。

由于有老师的帮忙，孙中山的手术做得干净利落，从未失过手。按当时的习惯，医生做手术时，允许人们坐在一旁观看。这就使得人们能亲眼目睹孙中山动手术时的风采，尤其是当人们亲眼看到孙中山从病人肚腹中取出肾石时，都惊讶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

于是，孙中山行医不到两三个月，就声名鹊起，被人们誉为“国手”、“神医”。孙中山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上门求医的人数极多，达到了“户限为穿”，也就是踏破门槛的地步。

孙中山的声音越来越高，引起了澳门岛上葡萄牙籍医生的妒嫉。他们以孙中山没有葡萄牙政府准予开业的证书为借口，开始是阻拦、禁止孙中山为葡籍人治病；接着又明确告知各个药房，除了葡籍医生外，不准为他国医生开的药方配药。

这样一来，孙中山的行医便遇到了严重的阻碍，他开出的药方，在澳门竟拿不到药。他愤慨，他多方奔走，极力为自己争取应有的行医的权利，但是最终却没有丝毫的结果。“刚刚打开局面的孙中山猝然遭受挫折，面对无可挽回的现实，他不得不摘下中西药店的牌子，关闭了店门，迁往广州，另谋生路。

借医“医圆”

澳门行医处处掣肘、备受窝囊气的孙中山，于 1893 年春天，将他的事业转到了广州。

在挫折面前，孙中山并不灰心，更不气馁，他有的只是愤慨，有的只是不平，有的只是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做到底的决心。

当然，心挣之余，孙中山也有一种深深的悲哀与惋惜。他给那么多人看过病，解除过他们的痛苦，可是当他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时，却没有人敢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更不要说为他伸张正义。孙中山知道他们都是些好人，一些善良的人，他们只能把不平与同情埋在心底，却不敢大声疾呼地表达和发泄出来。

孙中山不禁感到孤独，感到一种被抛弃的悲哀。由此，他便体会到，医术救人只能医体，不能治心，医术所济的范围、功效实在有限。在这困难的时候，他更怀念他的好朋友郑士良，他心想，要是澳门有像郑士良那样热心干救国、忠诚于事业的人该多好啊！

可是，这样的人在澳门一个也找不到。行医既已受挫，又找不到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对这样的地方，孙中山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孙中山到了广州之后，在西关基洗创办了东西药局。为了扩大影响和便于城内患者治病。又在双门底（即今北京路北段一带）的圣教书内设了一个医务分所。与此同时，他还在香山县石岐镇与人合资开设了东西药局支店。

谁也没有料到，受挫后的孙中山，在广州的事业比在澳门时更为发达了。

开业之后，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尤其是孙中山医术精湛、服务态度又好，自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病人。

孙中山治病时，对病人十分亲切，态度也很认真。对于病人的要求，他总是想方设法，尽可能给予满足，对那些生活贫困的病人则特别优待。见到这样的病人上门求诊，孙中山往往先冲上一杯牛奶，让病人喝了，歇口气，神气略定，然后才开始诊断。到最后，不仅免收诊金，而且赠送药品。病人接受了这般优良的服务，自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在广州行医，孙中山由于三天两头来回奔跑，一会儿到西关，一会去双门，一会儿又去石岐，实在是十分疲累。但孙中山并不因此懈怠，而是尽心尽意地对待每一个病人。一旦遇上什么特殊情况，他都及时地予以主动而热情的处理，尽到一个做医生的责任和义务。

——一次，孙中山从广州赶往石岐。将到石岐时，他远远地听到一个女人凄惨的哭声。走近一看，在嚎陶大哭的女人的身边，直挺挺地躺着一个男人，一动也不动。孙中山连忙询问是怎么回事，一边对躺着的男人作了一番观察。

那女人痛不欲生地说：“我与我男人一早来地里干活，没想到他就突然这样死了。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叫我们今后可怎么活啊！”

孙中山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忙和声细语地安慰那妇女，说：

“别伤心，你丈夫并没有死。我是个医生，他的病我大概可以治好。”

“真的？”那妇女止住哭声，既惊又疑地问道。

“是真的。你去村里喊几个人，把你丈夫抬到我的诊所去。要快一点。”

那妇女答应一声，踉踉跄跄地向村里跑去。不一会喊来几个村邻，大家七手八脚把昏迷过去的男人抬到了镇上。、孙中山来不及喘口气；急忙拿起针筒、注上药液，给那男人打了一针。、不一会儿，那“死”去多时的男人

开始有了动静。只见他颤动了一下，发出一声长长而微弱的叹息，然后慢慢睁齐了眼睛。像作了一场梦似的、惊奇地望着房间，望着面前的孙中山和泪痕满面的妻子。

那妻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看自己丈夫，那张熟悉的面孔上又有了血色，再摸摸丈夫的手，温热有力。这是真的，丈夫还好好的，他死里逃生了！

那妻子扑通一声，一下跪倒在孙中山面前，连声说：“谢谢救命恩人！医生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一辈子也忘不了。”

孙中山连忙扶起那妇女，心里也热乎乎的。

没多久，孙中山便以他的医术和医德征服了病人的心，他的名声随之在广州、香山一带传扬开来。于是，找他治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两广总督衙门的官轿，也常常抬着他延入府中为他们的家人治病。

尽管孙中山对贫困者常常赠医送药，但由于找他治病的人相当多，开业一年下来、孙中山竟有一万多元的收入。想想当时李鸿章授予孙中山。江英华“钦命五品军牌”，月俸才不过五十元，相比这下，这一万多元，该是多么可观的一笔收入。

可是，金钱并不能动摇孙中山从事“医国事业”的信念，他更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台赚钱的机器。无论是在澳门，还是在广州，孙中山通过自己的行医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医国”比“医人”更为重要。因此，他并不满足做一个治疗人体疾病的良医，他更为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痼疾”，他要“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亦即通过行医，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甚至与官绅经常往来，以了解社会的黑暗，了解社会上层的罪恶，从而寻找并开出“医国”的药方。

譬如两广总督李翰章，对于广东、广西的每个官职，都标出相应的价格，然后明目张胆地加以出卖，由此而大发横财。翠亨村一个青年，并没有什么功劳，只是因为家中有钱和善于溜须拍马，短短几年里就提升到相当于西方军阶准将的职位。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他的每次提升，总要捎带上他那个在远地一个鸦片窟里当厨子的兄弟，原来，每次战役之后，他都臆造一些勇敢的“事迹”，以他兄弟的名字报告上去，而上司也竟然信以为真，嘉奖不误。突然有一天，这个从来没有闻过火药味的厨子，竟从公报上读到自己的名字，并且已经在清廷的军队里，得到了一个相当于上校的军衔。

有一天，孙中山的诊所里来了一个病人。那病人从肩到时，从臀部到膝盖，浑身上下，满是伤痕。孙中山看了之后很觉奇怪，就问道：

“你的这一身伤是怎么来的？关节又怎么会变硬的？”

那病人一连声地叹气，又不住地摇头，久久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才稳住悲愤而委屈难耐的心情，说：“我这是被县衙门打的，是跪铁链跪的。”

县衙门为什么要打你？为什么要罚你跪铁链？”孙中山又追问。

病人于是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孙中山。病人是个船夫。一天早晨，他正沿着河岸朝家中走去。突然，一队兵勇迎面而来。不由分说，抓住他便拉到新会县县衙里，并立刻被按倒在地，屁股上挨了整整两百大板。

打过之后，县官才拿着官腔问道：“你招是不招？”

船夫已被打得疼痛难忍、晕头转向，这一问，更使他如坠云里雾里，他看着县官，回覆道：“你们为什么要抓我？要我招供什么？”

“你是海盗。为什么抓你，招供什么，难道你还不清楚。”县官似乎振

振有词。

“我是海盗？真是笑话，你们可以去村子里打听打听，我不过是个规规矩矩的普通船夫，怎么就成了海盗！县老爷可不能冤枉我。”

船夫听说自己被认定为海盗，知道那是罪该处死的，吓出了一身冷汗，说话的口气倒也强硬起来。

可这回答不仅不能使县官相信，反而激怒了县官，给船夫招致了更大的苦头。县官顿时把脸一沉，厉声喝道：“大胆狂贼，竟敢狡辩！就让你尝尝跪铁链的滋味。”然后，一声吆喝：

“来呀，铁链侍候！”

几个打手拥上前来，将船夫的膝盖按倒在锐利的铁链上。

船夫整整跪了一夜，直到次日中午才被放开，两个膝盖跪得鲜血淋漓。

县官重新升堂，对船夫问道：“滋味不错吧！想清楚了没有，招还是不招？”

船夫十分坚强，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声回道：“我不是什么海盗，我没什么好招的！”

县官气急败坏，狠狠地下令道：“看来你还没尝够刑罚的滋味，来人，给他上竹杠。”

几个打手走上前，将船夫的双臂拉直，迫使他的双膝跪在地面上，然后将一根竹杠横搁在船夫的大腿上，两头各坐了一个打手。两个打手一起一伏，竹杠像跷跷板似的上下摆动。阵阵剧痛传遍了船夫的全身，他立刻昏死过去。

但是事情并没完。船夫被投进了监狱，等他身体稍有恢复，县官又给他施刑逼供，然后他又是昏死过去。如此三番五次，将船夫拷打、折磨得不成人样。

到最后，县官又不明不白地，突然将船夫释放了，什么解释也没有。

讲到这里，船夫愤愤地说道：“为什么放了我？还是看我太穷，任凭他们如何用刑，我是一个铜子没有。有的，就是这条命。”

船夫的经历，使孙中山深为震惊和愤慨，这样黑暗的社会，这样的贪官污吏，人们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和说话的权利，人们的生命财产没有丝毫的保障。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前不久亲眼见到的一幕。

那是在方耀提督建立的屠杀场里。十几个刚被抓来、准备第二天处死的“犯人”在大声地呼喊：“冤枉啊，冤枉！”

提督的师爷却无动于衷，厉声训斥他们：“乱叫什么！你们若是好人，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

入提督府出诊正好路过那儿的孙中山，见到栅栏里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心里觉得非常难受。这样的人怎么会是犯人？又怎么够得上处以极刑？就问那师爷：“这些人在送来之前，可曾经公堂审问过？”

师爷根本不愿回答，但他知道孙中山是提督请来的医生，不便得罪，就有些不耐烦地回道：“这些犯人都是由地方士绅送来的，确实是人人皆知的歹徒，哪里用得着审？”

耳闻目睹的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的心：黑暗社会如此荼毒生灵，他作为一个医生，又有何作为？他只能治好船夫身上的伤痛，却不能使船夫免于遭受那样的伤痛！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辜的人被任意残杀，却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可是，更重要的工作，更值得做的工作，应该是后者啊！

孙中山决心要不遗余力地去从事那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医国”。

广交志士

孙中山行医广州不久，便声名远播，甚至被人绘声绘色地誉为神医。神医之说自是表达了人们对孙中山的感激之情，他的医术高超确是有口皆碑，这里不妨引用一则当时刊登在广东中西日报上的鸣谢启事以作证明：

孙逸仙先生学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内治与外施并美；统中西而探奥旨，针砭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诸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惟牙齿之灾，竟稳晨宵之痛。疾俨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捣之心，星霜屡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境遇先生略施小技，力圭调和，著年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缘报端，用志不忘，聊摭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精良，抑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尔。武泌谨启。

由这则鸣谢启事可知，孙中山竟是一位各科全能的医生，连别人束手无策的严重牙病，他也能手到病除。

但是，黑暗腐朽的现实社会，使得孙中山不满足于只做个医治人体疾病的医生，而促使他去履行自己的一贯理想与抱负，即更为坚定而迅速地去从事“医国”事业——推翻满清政府。

可以说，从孙中山一踏上行医之途，他便是借行医为名，行“医国”之实。他在行医过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革命事业，随时注意交结有志之士，播下革命的种子。而到了1894年春，也即孙中山在广州行医一年时，孙中山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放在了革命工作上，俨然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孙中山这时的革命工作，主要是以行医为掩护，广泛交结各界的有志之士，吸收他们为自己的革命同志。因为，要推翻满清政府，仅仅靠自己，靠几个人是决不能完成的。

1894年，一心想着医国事业的孙中山干脆卸去了管理药店的重担，一方面请区凤墀的女婿尹文楷医生主持医务工作，一方面又把药店的财务经营交给一个伙计负责。无事一身轻的孙中山，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物色革命同志的工作中去了。

孙中山从伙计那儿提了一些钱，然后拎起医包，就踏上了外出交游的路程。

孙中山走了很多地方，从南到北，从城市到乡村。只要遇上可以交谈的人，他就向他们揭露和抨击社会的黑暗与腐败，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宣传推翻满清政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旅费用完了，他又回药店去取，然后重新踏上交游征途。他四处奔走，风尘仆仆。有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他便在农民家里过夜，或在大树下歇息；肚子饿了，便喝一口凉水，吃一口自己所带的干粮。真可以称得上是风餐露宿，不辞辛劳。累一点，苦一点，他并不觉得受不了。他吃过苦，受过累，能习惯，能坚持。尤其是当他想到，他的苦累是为了使广大的劳苦大众尽快地摆脱苦难时，他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备感幸福。

为了交游，孙中山受了很多苦累。为了物色同志，孙中山更是煞费苦心，动了不少脑筋，花了不少心血。这期间，由于伙计不善经营，竟把孙中山的诊费收入统统投入了买卖，现金不足，使得孙中山的日常开销也难以维持。

但孙中山并不介意，因为，对他来说，最要紧的是“医国事业”。

广东水师广丙军舰管带程璧光患有胃病。他听说孙中山医术高超，便亲自登门求孙中山给他医治。

孙中山交游去了，不在店中。尹文楷医生接待了他，并愿意替他医治。可程璧光不肯，他执拗地说：

“我只相信孙先生。待他回来时，请通知我一声。”说完就走了。

过了几天，孙中山回来了，尹文楷将程璧光的事告诉孙中山。孙中山这时已不大接受医务，无暇替人治病，可一听说程璧光是位海军人才，估计今后革命必有大用，就马上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孙中山拎着医包，亲自上了程璧光家。程璧光胃病又在发作，疼痛难忍，听说孙先生送诊上门，又惊又喜，连忙迎出门来。一见孙中山的面，便爽快地说：

“鄙人小病，何劳先生屈驾送诊。实是愧不敢当，愧不敢当。”

孙中山连忙还礼，诚恳地说：“程先生是海军军官，长年坚守舰上，为国效力，落下胃疾，我等理应为守卫疆土的勇士尽一点绵薄之力。”

程璧光听了孙中山这一席话，更受感动，连忙把孙中山让进屋里。

孙中山打开医包，立即给程璧光切脉问诊。仔仔细细地观察、检查了一番。同时，孙中山又不厌其烦地向程璧光解释他的胃病的起因及必须注意的事项。

“程先生的病是因饮食不正常而起，饱一餐，饿一顿，自然有伤肠胃。今后，一定得注意定时定量进餐，不要吃冷辣食物。”

程璧光望着孙中山，眼中透出感激的光。只见孙中山开好药方，又建议道：

“程先生除了吃药之外，还须进行辅助治疗。以后每天清晨须到野外散步，吸吸新鲜空气，增强胃部的活动机能，这样才可望彻底治愈。”

程璧光连声称谢。只听见孙中山接着说道：“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清晨必定散步半个小时。如果程先生没有散步的习惯，我可以陪程先生。”

“不敢当，不敢当，孙先生工作繁忙，怎么能耽误先生的宝贵时间呢！”程璧光连忙谢绝。

“不必客气。散步对我也有利。就这么定了，明天早晨5点半，咱们东郊见。”

第二天一大早，孙中山便来到了东郊，过了一会，程璧光也来了。两人沿着野外的小路，并肩漫步，呼吸着清晨的凉爽而散发着清香的空气，两人的精神都不觉为之一振。

他们边走边聊，显得越来越投机。

“程先生，听说你是程奎光的哥哥，是吗？”

“是的，奎光是我的弟弟。”

“噢，我和奎光先生早有来往，他可是个很有作为的人啊。”

“孙先生过奖了。”程璧光并不知孙中山这句话的真正含意。

“不，不。奎光先生确实是个很有作为的人。如今我们这个国家黑暗如墨，已走向了穷途末路。奎光先生对目前的现状极为不满，乃至有志于改变这样的黑暗社会。这不是大有作为又是什么？”

程璧光听了，大惊失色，怔怔地望着孙中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孙中山停了停，又接着说：“以程先生的阅历与见识，肯定会接触到这

个社会更多的黑暗和腐败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想必程先生也是反感的，不赞同的。是不是？”

一席话送到了程璧光的心里。他想起了自己所亲见亲历的许多事，不禁愤愤地说：“这世道确实太不像话了！”

孙中山不想一次说得太多，又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便打住话头，说：“我们明天再聊吧！”

此后一段时间，孙中山天天陪程璧光散步。俩人相处得越来越亲近。孙中山通过聊天，纵谈时事，批评社会，不断地向程璧光灌输革命思想。程璧光则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被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和崇高抱负所打动，内心深处升腾起强烈的爱国激情，终于成了孙中山的好朋友。

孙中山就是这样不辞辛劳而真心实意地去物色、结交各界的革命同志。从澳门到广州之后，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陆续结交了左斗山（基督教徒、店主）、王质甫（传教士）、魏友琴（教员）、程璧光（海军军官）、程奎光（海军军官）等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新朋友，并且经常聚集在一起，在广州圣教书楼后座的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的南园抗风轩（今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南馆）等处谈论时政，谋求救国办法。

在广交新朋友的同时，孙中山开始考虑如何发动革命等一些具体事宜与问题。一次，他在香山轮船上就与陈少白商量“将来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样造反”。要造反，必须学会使用武器。于是，孙中山在自己的家乡，亲自试验炸药的威力。

在翠亨村孙中山住的楼上，有个小陶缸，里面装着白色的药粉。家里人都不知道它的用途，只是姐姐孙妙茜按照孙中山的嘱托，偶尔把它拿出来晾晒一下。

一天，孙中山回到家，从陶缸里掏出一些药粉，搁在一块白布上面，小心地包扎好。然后走出家门，来到刻有“瑞接长庚”的闸门旁，把布包放在一块大石头上，仔细地看了又看，最后挥手让乡亲们退后。

乡亲们都十分奇怪，不知孙中山在搞什么名堂。忽然听到孙中山说：“看看炸药的威力怎样！”人们一听，都赶忙躲得远远的。

突然间，只见火光一闪，轰隆一声巨响，在翠亨村上空回荡。等硝烟散去，人们跑去一看，发现在那块七尺多长、一尺多高的长石上，现出了一道新的裂缝。

这火光，这响声，这裂缝，成为孙中山开始实施革命行动的标志。

与此同时，孙中山的几个老朋友也开始行动起来。

陆皓东将翠亨村的田产变卖，与尤列等合资，在顺德县北水乡创办兴利蚕子公司，作为联络会党的秘密场所。

郑士良到处奔走，广泛结纳会党，联络防营，取得了显著进展。

第三章 革命征程

闭门修书

1894年1月底，孙中山悄悄回到了故乡翠亨村。

到家之后，他便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铺纸研墨，奋笔疾书，做起文章来。孙中山是要上书李鸿章。

原来，在1893年冬，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等人聚会，讨论救国的方法。大多数人鉴于“外患之日起”，主张“治标”，“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与众多人的意见不同，孙中山主张“治本”，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经过连日讨论，最后大家都同意孙中山的主张。

虽说孙中山主张“驱除鞑虏”以救国，但在他的头脑里，却也存在着不妨先维新改良的愿望。

孙中山经过几年的辛苦努力，物色到的革命同志仅十人左右。在这有限的几个人当中，除了程奎光、程璧光是海军军官外，其余的都是些白面书生。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孙中山不禁自问：仅靠这几个手无寸铁的秀才，造反能成功吗？能够迅速拯救中华于水火之中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于是孙中山想到，倘若朝廷中有既识时务又掌握大权的人，首肯并实行自己的救国主张，也未尝不是挽救贫弱中国的一条好途径。就像一个人生了大毒疮，治疗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开刀割除，剔秽去腐；一种是投以药石，使它自行排脓，长出新肌。前一种办法干脆彻底，但代价很大。后一种办法效果虽然慢一些，但较为稳妥。毒疮终究是要排除的，在动刀之前，为什么不投以药石治一治？如果证明药石无效，再动刀切除也为时不晚。

那么，朝廷中谁是那既识时务又掌握大权的人呢？孙中山略一思索，“李鸿章”三个字浮现在他的脑中。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朝中手握重权的汉族大臣。他经营“自强求富”的洋务、海军几十年；对教育又热心，是自己就读过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对人才也是赏识的，他曾经同意自己上京候缺。记得在西医书院的毕业典礼上，康德黎博士热情称赞李鸿章是“中国之俾斯麦”。想到这里，孙中山的眼睛不禁一亮：俾斯麦，是普鲁士王国的首相。他推行“铁血政策”，先后发动多次战争统一了德国。在出任德意志帝国宰相期间，他又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如果李鸿章真是这样一个有志于国家强盛的俾斯麦式的铁腕人物，对于多灾多难、贫弱不堪的中国来说，那将是多大的一件幸事啊！

孙中山于是打定主意，给李鸿章上书。说不定这个“俾斯麦”能采纳自己的意见，玉成己志，贫弱的中国或许就有救了。主意已定，孙中山什么人也未告诉，就悄悄地回家了。他要把自己的主张、见解好好整理一番，要写出一份有分量的国事陈情书来。夜已深了，翠亨村的人们早已入睡，家人也都已安歇，孙中山却仍然坐在铜质煤油灯前，一边思考，一边不停地写着。

“……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于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惟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
写到这里，孙中山手中的笔不觉停了下来。“在于什么呢？”他苦苦地

思索着，多少往事一齐涌上心头。

一天，孙中山给一位穷困潦倒的秀才看病。闲聊之中，孙中山感觉到那位秀才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不但国学很好，博古通今，而且涉猎极广，天文地理都懂。孙中山甚是钦佩，但心中又觉奇怪，“这样有学问的人，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呢？”于是问道：

“先生的学问如此渊博，处境怎么又这样窘迫呢？”

秀才满脸的无奈表情，他苦笑一声，愤愤说道：“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先生见到的是我一个，其实，比我有才华而潦倒的人，何止成百成千！”

孙中山确实不大明白，他瞪大眼睛，再问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秀才深深叹了口气，缓缓答道：“是因为人不能尽其才。这样的不正常现象，自古以来就有，像古代的屈原、贾谊、杜甫，既有才学又有抱负，可有谁真正能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才能呢？到了今天，这现象就更为严重了。”

孙中山听了，感触甚深。

想起这件事，孙中山激动得热血沸腾，“这种埋没人才的现象不改变，国家如何能强盛？”他觉得房间的空气像要凝固了一般，就站起身，走到窗子前，双手推开窗户。一阵凉风吹来，使孙中山感到舒服了许多。他从窗口往外眺望，外面是灰蒙蒙的一片，只看见几棵衰败而苍老的树影，在深夜的风中瑟瑟颤抖。在树影的后面，被黑暗所笼罩着的，孙中山知道，那是他辛勤劳作过的土地。

说起那土地，孙中山又想起了一件事。

一天，孙中山在家休息，应邀到邻村出诊。他出得门来，走在田间的小道上，看见好些土地野草丛生，一派荒凉景象。他联想到官府苛捐杂税，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只能在痛苦中苦苦度日。他心里十分难受：多好的土地啊！为什么要撂荒呢？怎样才能不荒芜，多打粮食，让人们能吃饱一点呢？

孙中山边看边想，低着脑袋，信步走去，不知怎的，他竟不知不觉转回了家中。家人一见，便问：“你给人看病，这么快就回来了？”

“啊？我还没去哩。”孙中山像从梦中醒来，连忙稳住心绪，往邻村赶去。

有一次，孙中山打算从韶关坐船到英德去，因为错过了开船的时间，只好去搭货船。从韶关到英德，通常的船费是五六钱银子。孙中山为了赶时间，愿意出二两银子，可即使这样，那些船夫仍不肯让孙中山搭乘。因为他们害怕载了旅客，河道上的水警会强收贿赂，甚至扣留船只，任凭孙中山如何恳求，也不敢答应。到最后，无可奈何的孙中山只好假说自己是英德知县的亲信，可以保证免受水警的勒索。

这时，一位船主立即表示，只要孙中山给四两银子，就愿意让他搭船。孙中山这才上了船，虽然他赶路的要求实现了，焦急心情暂时平静了，但是随之却激发起他对国家的一种更为灼热的焦急之情。他坐在船头，感慨不已：过省有关，越境有卡，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商贾怨毒，货物不畅，中国怎能富得起来？假如中国效法西方国家，关卡无阻碍，保商有善法，多建造轮船、铁路，那么，货畅其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家如何不强盛？

想到这里，孙中山许多模糊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清晰，逐渐形成了一幅完整的治国蓝图。他兴奋无比，连忙回到桌前坐下，新坐在椅子上。他提起毛笔，饱蘸浓墨，略一沉吟，飞快地接在后面写了下去：

“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廓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船利炮坚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经过十多天的闭门写作，凝神推敲，一篇长达万言的《上李鸿章书》完成了。

孙中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顿觉轻松。

北上求见

孙中山在家一门心思撰写《上李鸿章书》，却急坏了他的朋友陈少白。

孙中山回家后，药店的事务全由伙计管理。那伙计等了几天，不见孙中山回来，不知如何把药店维持下去，就给当时在香港的陈少白捎了个信，说“孙医生失踪了，药局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请即来药店帮忙。”

陈少白接到信，立刻赶到广州，果然不见孙中山的影子。于是就留了下来，替孙中山维持店里的事务。

可是一连等了十多天，仍然没有一点孙中山的消息。陈少白也不禁着急起来，孙中山到底上哪去了呢？

到了十六天头上，孙中山突然出现在药店门口。陈少白一见，又喜又怨，没好气地问道：

“这么多天，你上哪去了？你知不知道，把我都给急死了！”

孙中山满脸笑容，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我问你，这些天你到底干什么去了。”陈少白似乎怨气未消，非要问个明白不可。

孙中山一扬手里的纸卷，高兴地说：“写这个去了。”说着，他打开纸卷，递给陈少白。

“你看看，帮我修改修改。”

陈少白接过纸卷，一眼扫去，“上李鸿章书”几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他抬头看看自己的朋友，一丝敬佩从心底升起。

陈少白也不再说什么，拿起《上李鸿章书》就进了房里，认真地读起来。读着读着，他不禁深深地为孙中山的见解所折服，心情也越来越激动，甚至大声叫起好来。

陈少白对《上李鸿章书》作了点文字改动，又再读了一遍，便怀着兴奋与满意的心情出来同孙中山说：“我们应该尽快把这篇东西送到中堂大人手里。”

“是啊，是要快一点，越快越好。”孙中山对陈少白的建议深表赞同。

但是，要会晤李鸿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他们又都不是官场中人。因此，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上书计划，孙中山不得不四处找人，疏通障碍，走起了迂回求见的道路。

孙中山了解到前任澳门海防同知魏恒和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熟识，就请魏恒给盛宙怀写信，再请盛宙怀写信，常信往见盛宣怀，然后，再由盛宣怀介绍会晤李鸿章。盛宣怀 1870 年入李鸿章幕，深受李鸿章信任。孙中山估计，如果能得到盛宣怀的推荐，会晤李鸿章应该不成问题。

孙中山按照计划，立即行动起来。他先去求见魏恒，又拿着魏恒的信求见盛宙怀；盛宙怀也不推辞，即为孙中山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信，并且将魏恒的信一同附上。

1894 年 2 月，孙中山和陆皓东从广州乘轮船，一同前往上海。孙中山之所以请陆皓东与自己同行，一方面因为陆皓东是他最好的朋友，一方面则是因为陆皓东对上海较熟。他们还要在上海找些熟人，写些引荐信，然后再去天津会见李鸿章。

孙中山和陆皓东到达上海之后，立即去拜访了郑观应、王韬，请他们协

助引见。

王韬原是太平天国的状元，在当时很有声名，曾创办香港《循环日报》，又是上海格致书院院长。他一向重视洋务，主张改良。王韬十分赏识孙中山，亲自执笔为《上李鸿章书》润色。然后，他给李鸿章幕下一个相识的管文案的老夫子罗本禄写了 165 介绍信，想通过罗的帮忙让李鸿章会晤孙中山。

郑观应与西医书院的创办人何启是中国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这两人都对孙中山产生了深刻影响。孙中山之所以有改良救国的愿望，不惮周折上书李鸿章，与他们两人的影响不无直接关系。

对孙中山影响最直接的是何启。孙中山就读西医书院之日，正是作为学校名誉秘书、法医学和生理学教师的何启大力主张维新变法，为中国改革救亡大声疾呼之时。孙中山既有志于改造中国，醉心西学，关心时势，景慕何启便是很自然的事。

在西医书院读书期间，孙中山利用课余假日，经常往来香港、澳门；每年寒暑假从香港回家乡，亦必经澳门。每到澳门，孙中山常去拜访郑观应，与他畅怀交谈，议论时事。郑观应十分赏识孙中山，曾收孙中山的两篇文章辑入其主编的《盛世危言》之中。当时孙中山关于改良农业、注意培养人才的主张，正是受了郑观应思想的启发。

现在，孙中山又带着他的《上李鸿章书》来见郑观应。郑观应一看，欣喜之至。立刻提笔给老朋友盛宣怀写了封介绍信，信中的言辞十分恳切朴实，对孙中山的赞誉之情充溢在字里行间。信是这样写的：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衣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郑观应放下毛笔，又看了一遍，然后将信郑重地交到孙中山的手上。孙中山非常感动，一边接过信，一边连声道谢。

郑观应地却诚恳地说：“孙先生此去是为国家奔波，是为民尽力，这样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应该受谢的是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

孙中山、陆皓东告别郑观应，搭上了去天津的轮船。孙中山的衣襟里揣着好几封介绍信，心里热乎乎的。迂回求见的道路看来十分顺利，求其帮忙的几个人都热心引荐，这不禁使孙中山对必能见到李鸿章充满了信心。

轮船在大海上上下下颠簸，它虽然行进得很慢，但是，却是在一步一步靠近目的地。坐在船舱里，孙中山的头脑里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演习会晤李鸿章的情景，一遍又一遍地温习要向李鸿章说的话；又设想，如果李鸿章拒绝自己的建议，该如何为自己申辩，该如何去说服李鸿章接纳自己的意见。

孙中山一面想着，一面又不时地与陆皓东说上几句。陆皓东也十分兴奋，不断地为孙中山出主意想办法。商量着求见时的一些具体细节。就这样，他们竟在不知不觉中到达了天津。

第二天，孙中山和陆皓东便见到了盛宣怀。当时，盛宣怀正在天津筹办东征转运。他很客气地接见了孙中山和陆皓东。孙中山先拿出几封介绍信，交给盛宣怀。盛宣怀读过，对孙中山很有好感，就要拜读《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忙把自己的手稿递了上去。盛宣怀读着读着，不禁赞叹道：“好，说得好！”

于是，盛宣怀在信封上批上时间和“孙医士事”的字样，热情介绍孙中山去见李鸿章。

紧接着，孙中山又去找了罗本禄，呈上王韬的介绍信。罗本禄让孙中山回去等着，他将立即向中堂大人呈报。请孙中山过两天再来听回音。

孙中山到达天津的时间，是1894年的6月。这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李鸿章在芦台督师练兵。先是盛宣怀向他报告了孙中山求见的事，并请求中堂大人接见孙中山。

李鸿章把眉头一皱，问道：“孙逸仙是个什么人啊？”

“是个二十多岁的医生。”盛宣怀回答。

李鸿章冷笑一声，说：“这样年轻的医生，也懂治国？真是天大的笑话！”

盛宣怀忙说：“孙医士写的陈情书我看过，确实很有见解。”

李鸿章却有些不耐烦了：“我现在哪有时间来见他。以后再说吧。”

然后是罗本禄呈上了孙中山的陈情书。李鸿章既已知道这事，也不看孙中山写的是什么，就交待罗本禄：“这事先搁着，等打完仗以后再说吧。”

孙中山和陆皓东兴冲冲地去讨回音，罗本禄把李鸿章的答覆告诉他们。

孙中山一听，简直惊呆了。他失望之极，就像一盆冷水从头灌下，浑身上下一片冰凉。

而这冰凉，倒促使孙中山从改良的梦想中清醒过来。

创建兴中会

孙中山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对孙中山是个极大的打击。但这又是值得庆幸的，它使孙中山对改良救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陆皓东辞别罗本禄回到旅舍，心情都非常沮丧。他们默默地对坐着，什么也不想说。过了许久许久，孙中山突然对陆皓东说道：“既然我们无事可做，我们何不来番游历，先转转天津，然后去京城看看朝廷的虚实动静？”

对于孙中山的建议，陆皓东立刻表示同意。

于是，孙中山和陆皓东便携手在天津和北京考察社会和政治形势，并且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他们在天津考察到李鸿章的底细，知道他是由“军功”而升官发家的。然后又凭着戈登和其他外国人的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而扶摇直上，提升为总督、大臣，以至尊为傅相。

他们在考察中了解到李鸿章中饱私囊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敲榨勒索那些请求提升任命的各地文武官员的钱财。

他们在天津考察到贪官污吏是怎样影响和阻碍中国抵御外侮的工作。当时，炮舰的官员实际上享有走私的专利权。一个海军青年军官告诉孙中山，他已经愤然辞去了职务。原因是他不得不签署一个几吨煤灰的受货单，而这受货单是作为购进火药来订约和付款的。

孙中山和陆皓东在激愤和不满中又来到北京，而京城“政治之齷齪”更甚于天津，“百倍于广州”。

1894年7月1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对从朝鲜返航的清舰“济远”、“广乙”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这一年正好是西太后六十寿辰。她从正月便开始准备盛典，根本不把对日作战放在心上，却命令各省府县先期到京点景。孙中山、陆皓东考察到，从京城西华门到西郊颐和园，沿途搭建彩坊、戏台、乐亭等共六十余处，花掉银钱无数，朝廷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

孙中山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齷齪。”

从考察当中，孙中山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到朝廷的黑暗与腐败，更坚定了他要推翻满清朝廷的决心。他感到不能再延误时间，应该抓住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有利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孙中山决定到檀香山去，在那里创立一个革命组织，“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然后回国发动起义。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游历了天津、北京等地后又回到上海。他请求郑观应的帮助，弄到了出国护照，从上海启航，经日本抵达檀香山。

到达檀香山之后，孙中山开始着手组织革命党。他先往茂宜岛去见大哥孙眉，将自己的打算全都说给大哥听，并请求他的支持。

孙眉这时的思想已有了很大转变。他被孙中山的反清政治主张所折服，也被弟弟炽热的救国之心所感动，当即表示支持孙中山，并准备拨家产变卖相助。

孙中山得到大哥的支持，精神更为振奋，他满怀豪情，在檀香山华侨中极力鼓吹革命。

檀香山是广东华侨集中的地方，华侨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比较雄厚。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香山县和香山附近各县，不少人与孙中山一家有同乡、戚属、同事和朋友关系。他们对孙中山甚是敬佩，纷纷响应他的宣传和主张。

正当孙中山组织革命团体的活动迅速进行的时候，日本分兵两路，大举进犯中国。11月7日攻占了大连。这天恰好是西太后的寿辰，她在皇极殿接受寿礼，大搞庆贺活动。到了22日，旅顺又失陷，日军在旅顺野蛮屠杀当地居民，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擢发难数。

消息传来，华侨们义愤填膺。

孙中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游说，觉得成立革命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正埠的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住宅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孙中山、何宽、李昌、邓荫南、宋居仁、许直臣、侯艾泉、钟木贤、夏百子、李杞、刘卓、刘寿、刘祥、程蔚南、郑金、郑照、黄亮、黄华恢、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曹采、陈南等二十余人。

孙中山坐在桌子的中间，手里拿着事先拟好的《兴中会章程》。其他二十多人围着长桌坐着，一个个神情严肃，激动无比。

孙中山被推为大会主席。他提议将他们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接着便大声宣读《兴中会章程》：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会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余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限，奠我华夏……

这章程是孙中山草拟的，并已读过无数次。可是，当他面对他的同志宣读这一段文字时，他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与愤慨，他把对祖国、对同胞的深情厚意，与对满清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怒控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并通过他那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声音传达出来。

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他的激情、热望，他的语调、声音，深深打动了会场中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他们望着宽额隆准，脸圆口方，浓淡适中的眉毛下，双目炯炯有神的孙中山，不由得激情澎湃，热泪纵横。

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提出了创立兴中会的目的，是“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章程》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会议一致通过了《兴中会章程》。

章程规定，本会干部由全体会员“公举”，“凡会内所议各事，当照舍

少从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体现了民主主义思想。

章程规定，凡入会之人捐银五元，另设义捐，为武装革命筹备经费。

根据章程规定，会议选出刘祥、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为管库，李昌、郑金、黄亮、李禄、李多马、邓荫南、林鉴泉等八人为值理，决定会址设在“华人消防所”二楼。

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举行宣誓仪式。与会人员一起起立，每人把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跟着带读的李昌高声朗诵誓词；

“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神明鉴察。”

这一宣誓方式，是模仿了当时欧美各国和檀香山人们在法庭上作证的方式，目的是为了坚定会员入会的志向，使他们忠诚不渝。

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也按仪式加入了兴中会。

兴中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比较正规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派人在茄荷蕾、百衣等地建立分会，会员总数约一百三十多人。他还在美籍老师英兰谛文任教的学校里对二十多名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请了一个曾在中国、南洋当过教习官的丹麦人教练兵操，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

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方面屡屡失败，先后失去众多城池，津京也岌岌可危。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上海的宋跃如催促孙中山回国，相机举事。

孙中山接到宋跃如的信，即作回国准备。他计算了一下会员的会费和入会股金，两项不足二千美元，远远不够举义的费用。因时机迫在眉睫，急于返国，焦灼万分。

这时，兴中会干事邓荫南知道后，立即把自己的农场变卖了，把所得款项全部交给了孙中山，表现了投身国事义无反顾的崇高志向。

孙眉见孙中山为经费着急，毅然把农场的几百头牛，以六至七美元一头的低价出售，以此作为起义的献金。

这样一来，孙中山总共筹得了一万三千美元的经费。

1894年12月下旬，孙中山与邓荫南等几位志士由檀香山出发，经日本抵达香港。

筹备广州起义

孙中山在动身回国前，与兴中会的同志商讨了起义地点。孙中山认为，选择起义地点必须考虑三个条件：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并因此提出“以广东为最善”的意见。兴中会采纳了这一提议，决定以广东为革命举义发祥地。

发动起义，必须要有大量的同志参加。于是，孙中山到了香港之后，立即召集旧友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与他们讨论扩大兴中会事宜。他们决定分头行动，联络同志，筹建兴中会总会。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活动，他们租下香港中环士丹顿街 13 号楼房为总会所，以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兴中会总会成立大会于 1895 年的 2 月 21 日举行。

成立大会通过了修订过的《兴中会章程》，修订后的章程比檀香山制订的章程有很大进步。它公开抨击清王朝“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造成全国“盗贼横行，饥谨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另外，还制定出十条更具体更详细的章程项目，它们是：一、会名宜正；二、宗旨宜明；三、志向宜定；四、人员宜得；五、交友宜择；六、支会宜广；七、人才宜集；八、款项宜筹；九、公所宜设；十、变通宜善；

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尤列、杨鹤龄、黄咏襄、朱贵全、余育之等数十人参加了兴中会。

香港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谢缵泰等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也加入了兴中会。

成立大会之后，各人分头行动。陈少白赴上海找郑观应，谋求他的支持，并希望从上海找到一些同志，再回广州。

孙中山则同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分赴广州秘密串连，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朱淇、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等数百人陆续参加。

与此同时，孙中山仍借着行医的招牌，积极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向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共同谋划举事计划。

杨衢云、谢缵泰、黄咏襄则留在香港筹措经费、募兵、购运枪支。

孙中山在扩大组织、联络同志的同时，还注意争取国际友人和外国政府的理解与支持。

就在孙中山到达香港不久，在一次慈善团体举办的宴会上，经康德黎博士的介绍，孙中山认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

梅屋庄吉在香港中环大马路 28 号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孙中山认识梅屋后，即直接到照相馆去拜访梅屋。

梅屋见到孙中山，非常高兴，热情而又客气地对孙中山说：

“请照一张相吧。”

照过相之后，孙中山并没有走的意思，就与梅屋亲切地交谈起来。

“康德黎老师对我说过，梅屋先生是爱中国、关心亚洲人前途的人。对此，我十分相信。”

“孙先生过奖了。关心亚洲前途是我们亚洲人的责任。”梅屋谦虚地说。

“但是，睡着的人太多了”，孙中山突然提出问题来，“怎么办呢？所

以欧美各国人都称中国为睡狮。如果是狮子，只有醒过来才有用。睡着的虽然还不是整个中华民族，但眼睛被蒙蔽，不管事的人实在太多了。”

孙中山缓了口气，又接着往下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根源完全在于满清朝廷的腐败政治。不改变这种状况，将来沦为白种人奴隶的命运就在等着我们。”

孙中山越说越激烈，他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梅屋。梅屋也不时插上一两句，提出一些问题。他们热情地交谈，忘了时间，忘了吃饭。从谈话中，孙中山了解到梅屋有办法弄到武器，并可以把它隐藏起来，于是问道：

“梅屋先生，不打倒清朝政府，中国是没有前途的。梅屋先生，你能不能帮助我们的事业？”

梅屋踌躇了一会，随后爽快地说：

“感谢你！我很高兴，我的志向和你一样。你发动吧，我以资金帮助你，虽然不够，但我愿意多方寻求办法。这是日本人的仗义精神。”

两个人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发誓，我要干，梅屋先生。”

“从今天开始，我是属于你的。”

孙中山取得了梅屋的支持后，萌发了寻求得到日本政府援助的念头。于是，他从3月初开始，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走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对此，中川曾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原敬写过两封信，谈及此事。

3月4日，中川写信给原敬。信中写道：本月1日，经友人介绍，有清国人姓孙名文（西洋医师）来馆。其人乃企图颠覆现政府人物之一。孙文来馆目的，意在向日本提出武器援助要求。云现广州戒备森严，举事困难，且又缺乏武器，望能为其筹措枪炮二万五，短枪一千等，当中川用问此起义的目的及方法时，孙文答：起义者乃兴中会，即振兴中国之会，其中亦有哥老会等。但未说明其党员人数。只云，一旦举事，必四方响应，“统领”为康有为、吴君（原驻神户领事，号汉涛）、曾纪泽之子等四人。中川又问：成功之后，谁为“总统”？孙文答：未及考虑。若能承诺前项武器要求，则立即四方募集党员。

到了4月中旬，中川又给原敬写信，继续提出孙中山要求武器援助的事。可日本政府有他自己的算盘，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又转而通过谢纘泰与《德臣西报》主笔黎德和《士蔑西报》主笔邓肯联系，取得了这两家英文报纸的支持。

1895年4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不得不派李鸿章为代表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消息一传出，举国震惊。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割让台湾、反对投降的斗争。

孙中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紧布置起义事项：

他派郑士良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派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等县绿林；又派人联系潮汕、惠州的会党和广州三元里的乡团。

孙中山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设立了机关和接待站，接纳往来同志，贮藏文件、武器；还在广州河南洲头嘴设计了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了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另外还购置了两只小火轮作为运输工具。

兴中会决走将广州作为起义地点，还决定采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决定邀请何启代表兴中会起草宣言。

但是，在如何攻占广州这个问题上，兴中会的干部却有分歧意见。

一开始，孙中山提出了“外起内应”的战术。他以太平天国时代刘丽川动用七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上海为例，认为攻占广州的人，贵精不贵多。他说，今日的广州自不能与昔日危如累卵的上海相比，但如果有敢死队员百人，攻克广州的事也就可以成功。因为城中重要衙署，仅是都统、总督、巡抚、水提几处。这些地区虽然有武装警备，但防卫松懈。起义时，只要以五人为一队，配备机械炸弹，由府署攻入官眷住房，制服长官，使全城群龙无首，无发号施令的人。同时派人预伏城中重要街道，倘城外清兵闻变入援，即以阻击。援军不知虚实，必不敢冒死上前。必要时候，更可以将横街小巷房屋炸塌，使援军通行不便。这样，以五人一队进攻衙署，二三十人埋伏要道抵御援军，二三十人占领西门、归德门两处城楼，再以一二十人围攻旗界。任务完成后，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

兴中会的其他同志认为人少力薄，过于冒险，建议将“外起内应”的战术改为“分道攻城”。约定时日，各地会党、绿林、民团，分顺德、香山、北江、潮汕、西江，香港几路，会集羊城，同时举事。

孙中山经过深思，打消了自己的设想，服从众人的意见。

可是，起义的几千人马，突然驻扎广州城，不仅驻地难找，而且难保不招致防营缉捕的怀疑。如果稍有不慎，秘密泄漏，后果将不堪设想。

大家又开始讨论起来。经过讨论，兴中会决定利用重阳节作掩护发动起义。

重阳节是粤俗扫墓的日子，无论什么人都要回省城去，那时来往的人多，参加起义的人混杂在人群中进城，就不易被人注意了。

于是，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就把起义的时间定在 1895 年 10 月 26 日，即农历九月初九。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起义工作进展得顺利而迅速，声势颇为壮观，筹备的事项也很周密。孙中山认为这时应召开一次会议，公举一位会长来领导广州起义。大家都同意孙中山的意见。

10 月 10 日，兴中会召开了会员大会，选举会长，也称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意即总统。

结果，孙中山当选。大家都来到孙中山面前，同他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并预祝起义取得圆满成功。

孙中山握着那一双双温暖而热情的手，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但他义无反顾，他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首义失败

孙中山当选为伯理玺天德之后，决定偕陈少白、郑士良等返回广州，主持起义。

这时，杨衢云忽然害怕起来，畏葸不前，不肯去广州冒险。孙中山与其他人都鼓励他，最后他才答应在阴历九月初八的晚上，带领三合会三千人搭夜船到广州，天亮到岸，便立即发动起义。孙中山于是把银行里的存款和在香港的所有军械都交给了杨衢云，让他起义时带往广州。

又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又对孙中山说：“前天商议的办法，都是很好的。但我在香港主持一切，不可以没有一个名分。因此，我想请你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我，以后到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让给你，你看如何？”

孙中山听了十分惊讶，也很不高兴，觉得事情还没开始，同志之间就有了地位之争，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但孙中山毕竟是个无私而坦荡的人，他沉思了片刻，回道：“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可是，这个总统的名义是大家推举的，所以你要当，也还是得请大家来商量才行。”

“那什么时候开会商量？”杨衢云迫不及待地追问。“就今天晚上吧。我先去同其他几位说一声。”

孙中山马上约见了郑士良、陈少白，同他们商量这件事。郑士良听了非常恼火，大声嚷道：“这是不能答应的。让我一个人去对付他，非杀了他不可！”

陈少白却很冷静，他摇摇头，不紧不慢地说：“怎么能这样做呢？杀了杨衢云，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们还能起事吗？依我看，不如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假如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都是无所谓的。”

孙中山点头称是，觉得陈少白的意见很符合自己谦让的打算。郑士良见陈少白说得有理，心里虽是愤愤不平，也不再说什么。

当天晚上，兴中会再一次召开联席会议。孙中山从革命大局出发，主动提出把总统让给杨衢云，因为事前已同大家商量好，自然没遇到障碍，一致通过了。

第二天，即10月13日，孙中山便先行赶到了广州。过了两天，郑士良、陈少白等数人也抵达广州。在香港，只留下杨衢云主持工作。

10月25日晚，广州附近各路队伍，打着大书某族省墓灯笼，云集广州。

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他们准备在各要点施放炸弹，各路人马听到炮声即同时发动。

10月26日，天刚蒙蒙亮，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他们准备以青天白日旗为旗帜，以“除暴安民”作口号，以红带缠臂做标志，大举进攻。卫队的一百多名战士身藏利器，在起义总机关的四周待命。

就等孙中山一声令下，起义队伍即刻就出击了。可是，孙中山却没有按时回到起义总机关。陈少白、郑士良等兴中会同志一个个焦急万分。

原来，孙中山忽然接到汕头、西江两军报告；道是“官军戒备，无法前进。”这一突变情况使孙中山预感到事情出了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孙中山正在紧张地思考，又接到杨衢云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

杨衢云之所以发这份电报，造成这种不能如期率队伍参加起义的结果，完全是因为他的私心所造成的。

杨衢云取得了总统的名义后，首先编了一支总统卫队，规定卫队队员与各队领队待遇一样：即先发饷，给手枪，又每人发与钟表。这样做引起各队领队的的不满。在偏僻地方试枪时，各领队又发现他们的枪支有好有坏，而卫队的枪支，却是支支精良。领队们本来就有意见，这下更是议论纷纷，吵吵嚷嚷的要求更换坏枪，否则，初八晚上决不带队开赴广州。到了这时，杨衢云哪里再有枪支可换？而领队们又不肯让步。一时间，杨衢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可奈何，只得电告孙中山。

孙中山哪里知道这些情况！他只知道问题更为严重了。他赶忙拿着两份电报，急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这时已经是上午8点多钟。

陈少白看了电报，大惊失色，连忙说：“凡事过了期，必然走漏风声。假如还硬要发动起义，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只能暂时把事情压下去，等待以后的机会了。”

孙中山觉得陈少白说得有道理，便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等候命令。接着，又发急电给杨衢云，称“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孙中山意识到形势十分危险，但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同志的安全。他连忙对陈少白说：“你赶快走吧，我留下来处理一些事情。”

当晚，陈少白匆匆忙忙搭轮船回香港了，孙中山则同郑士良赶到咸虾栏张公馆焚毁文件，贮藏枪械弹药，布置同志转移。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整个过程中，孙中山始终镇定自若，临危不乱，给郑士良以很大的鼓励，使郑士良感到孙中山“毕竟不愧为领袖”，一副大将风度。

却说这时的两广总督已经是谭钟麟。这是个年迈昏聩的官僚，对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始终没有察觉。重阳节这天上午，他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

谭钟麟看罢，并不在意，只是一笑了之。心想：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都没弄清，岂不是捕风捉影？

谭钟麟正在暗自好笑，又见省缉捕统带李家焯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市面上外地人突然大增，行迹可疑，听说可能是要造反。

“党首是哪一个？”谭钟麟并不相信，以一种自负的口吻问道。

“孙文！”

“孙文？”谭钟麟仰面大笑起来，边笑边说：“孙文乃狂士，好作大言，岂敢造反？”

李家焯尴尬地站立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他闷闷地退出总督府，心里并不服气。于是，他派了一些侦探去监视孙中山。

这一天，孙中山仍和平常一样，镇静自如。他同区凤墀老师准时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娶媳宴会，途中见兵弁很多，知道情况异常，但他依然谈笑自如，旁若无人。

区凤墀却很诧异，向孙中山问道：“今天的兵弁为什么这样多？”

孙中山微微一笑，说：“是来侦探我的行迹的吧！”

区凤墀大吃一惊，忙问：“为什么？”

孙中山反而问他：“行人都说我孙文举事，你没有听到吗？”

到10月27日，事情终于败露了。

事情出在朱淇的哥哥朱湘身上。朱湘是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务。朱淇起草了起义的《讨满檄文》，朱湘得知后，生怕连累到自己，便冒用朱淇的名义向李家焯告发。

李家焯连忙报告谭钟麟。谭钟麟一听，惊得汗如雨下，一副狼狈相。呆了一阵才缓过神来，连忙调兵遣将，加强广州防卫，并派李家焯领兵搜索双门底王家祠和咸虾栏张公馆，把守各处关口和码头。

这时，孙中山和陆皓东正在河南一个秘密机关里，听到清兵出动搜索的消息，连忙布置转移。陆皓东自告奋勇，要去云岗别墅焚毁兴中会名册，以免落入朝廷之手。孙中山同意他前往处理，并与陆皓东约定：事完之后，黄昏在水鬼潭埠头会台，然后一同离开广州。

陆皓东立即渡江赶到北岸的云岗别墅，焚毁了兴中会名册。正要撤离，清兵已把云岗别墅重重包围了。

除了陆皓东，被捕的还有程耀宸、程奎光、程怀、刘次、梁荣等人。

这天黄昏，化装成商人的孙中山到了水鬼潭埠头。他等了很久很久，仍不见陆皓东的影子。他知道好朋友凶多吉少了，迫于风声越来越紧，只好独自登上一只事先备好的小汽艇，在弯弯曲曲的小水道里拐来拐去，终于躲过敌人的盘查，朝香山县唐家湾方向驶去。

杨衢云虽是接到孙中山“不要再来”的电报，但七箱军械早已经交给“保安”号轮船，若是起回，又怕事情败露。于是只好硬着头皮，仍派朱贵全、丘四带领二百人随船赶往广州，同时复电孙中山：“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

28日清晨，“保安”号轮船刚刚抵达广州，等候多时的南海县令李征庸及巡勇管带李家焯即挥兵上前截缉。起义者们的七箱枪支，全被杂货积压在下面，临时根本无法拿出，朱贵全、丘四等四十多人无奈，束手就擒；木箱内的二百多支手枪和弹药，也尽被查获。

广州起义至此即告彻底失败。

陆皓东被捕后，被押到南海县县衙，县令李征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妄图逼使陆皓东供出同党而一网打尽。然而，陆皓东坚强不屈，横眉冷对李征庸，嘲笑似地对他说：

“你虽严刑加之于我，但我肉痛心不痛，你将奈我何？”

11月7日，谭钟麟令营务处将陆皓东、朱贵全、丘四三人绑赴刑场杀害。

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在营务处受责六百军棍，病死狱中。闻知陆皓东牺牲，孙中山极为悲痛，称他是“命士之英才”，“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接着，清政府下令对孙文、陈少白、杨衢云、朱浩、汤才、王质甫、李杞、侯艾泉、夏百子、莫亨、吴子材等十余人悬赏捉捕。

孙中山被列在缉捕名单的最前面，赏银也最高，为花红银一千两。另外，清朝总理衙门向亚洲、美洲、欧洲各国清使馆发电，通缉孙文。

再说孙中山于10月27日晚上到达唐家湾之后，马上改坐轿子赶到澳门。过了两天，从澳门搭船去了香港。

到了香港之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会合，搭船前往日本，终于摆脱了清廷的追捕。

伦敦被禁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清政府悬赏花红银一千两通缉捉拿孙文，在通缉令上还把孙文的“文字”加上三点水，故意写作“汶”，把革命家当作洪水猛兽，以示痛恨。两广总督谭钟麟还打电报通知香港，日本、新加坡、伦敦等地的驻外使馆，密切注意孙文的行踪，相机捉拿归案。

孙中山此时并不气馁，斗志更坚。但国内已经很难呆下去，他被迫逃亡国外。在一个月黑的夜晚，他乘船悄然离开了广州，经澳门到达香港，后来，又匆匆与郑士良、陈少白等人一起会合，抵达日本，在神户上岸后，他买了一张日文报纸，看见上面有一条日文新闻，标题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当时，反清起义并不用“革命”两字。孙中山颇感新奇，边看边小声念叨着“革命，革命，革命党”。他碰了碰坐在身边的陈少白：

“你看，日本人称我们为革命党。”

少白凑过来看了这则新闻说：“这不比以往用的‘发难’‘起事’一类的词更好吗？”

孙中山思忖片刻说道：“革命二字，出于《易经》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本人称我们为革命党，意义甚佳。”

“那我们以后就称为革命党吧，这比‘会党’一词更有战斗性。”陈少白建议道。

“好吧，称为革命党。”孙中山点头微笑。

1895年11月，孙中山到了日本横滨。这时，他毅然剪去了头上的辫子，换下了清朝的服装，表示与清朝反动政府的彻底决裂。在横滨，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横滨分会，有几十名华侨参加。

年底，孙中山离开日本，重赴檀香山。檀香山本来是兴中会的创始之地，但是由于广州起义失败，不少会员灰心丧气，会务也基本陷于停顿。孙中山虽然竭尽全力加以整顿，不辞劳苦地奔波鼓动，也重新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并且成立了“练兵会”，作为训练武装干部的组织，但最终由于革命风气不盛，因而进展迟缓。

为了扩大兴中会的力量，孙中山考虑到在檀香山暂时难有大的发展，便将注意力移向了美洲大陆，因为美洲大陆的华侨，远比檀香山群岛的要多，孙中山决定前往开展宣传工作。

在准备启程前往美洲的前夕，孙中山漫步在檀香山街头。这里气候温和，树木葱笼，奇花烂漫，碧波荡漾。但美丽的风景提不起孙中山的兴致，他一边走，一边想着去美洲大陆的计划。突然，一辆载着四五人的马车，迎面奔驰而来。孙中山一惊，仔细一看，车上坐的竟是他香港读医科大学时的老师康德黎夫妇和随员。他乡遇故知，孙中山喜从天降，他忘却了礼仪，来不及打招呼，抓住车扶手，敏捷地跳上了马车的踏脚板。

康德黎夫妇正在全神贯注地欣赏太平洋的热带风光，给这位“不速之客”吓了一大跳。同车的日本保姆，以为来者是日本人，忙用日语问道：“先生，你要干什么？”

“我是孙逸仙”，孙中山满脸笑容，用英语问候，“老师，您好！”

康德黎夫妇定睛一看，果然是他的学生孙逸仙！只不过他已经穿了西装，去掉了辫子，留了胡须。

老师夫妇转惊为喜：半年以来时时悬念的孙逸仙，现在竟平安地出现在

自己的面前。

康德黎异常高兴，连忙招呼马车停下，急切他说：“我离开香港前两天，有人告诉我，说你在檀香山，没想到今天竟不期而遇。”

师生畅快地交谈着。康德黎告诉孙中山，他这次是回国休假，途中登岸游览小憩，真是巧遇。孙中山也将自己即将启程赴美，再打算到英国的计划报告了老师。康德黎一听，马上将他在伦敦的住址告诉了孙中山，相约在伦敦会见。

谁也没有料到，当孙中山后来在英国伦敦蒙难，生命濒于危急的时刻，檀香山街头的这次奇遇，对帮助孙中山逃出死地，竟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896年6月，孙中山到了美国。他首先在太平洋东岸的旧金山登陆，然后横穿美洲大陆，一直到大西洋西岸的纽约。沿途每到一地，总要留住十天半月，向当地华侨痛陈国民危困的惨状，宣传革命救国的道理。但是，孙中山发现，美洲华侨对革命的冷漠状况，比檀香山更甚。他奔波各地，活动了几个月，但响应他革命号召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如此，孙中山自己却认为，这是为革命而播种，是辛勤的、艰难的播种，革命的种子总是要发芽、生长的。

1896年9月底，孙中山离美赴英，到达伦敦。他一踏上伦敦的土地，就警惕地左顾右盼，注意有没有人跟踪他。当时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悬着的心才开始轻松一些。

但是，他完全没有料想到，他的一举一动，早被一位受雇于清公使馆的碧眼高鼻的英国私家侦探尽收眼底了。10月2日，也就是孙中山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关于他活动的情报，已经送到了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参赞、英国人马格里爵士的办公桌上。

10月11日，星期天，上午10时许，孙中山按照事先约定，准备去看望住在覃文省街的老师康德黎博士。走到半路，忽然发现从后面赶上来一个穿着中国服装的人。那人注意地盯住孙中山，突然用英语向他探问：

“您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孙中山见是一位本国人发问，便用广东话与其交谈起来。

“听您口音，好像是广东人？”

“是的。”

“啊，我们还是同乡呢。”那人顿时热情起来，又进一步问：“您尊姓？”

“姓孙。”

“敝人姓邓，名廷铿，就住在前面不远。”

孙中山打量了他一下。只见他三十多岁年纪，身高体壮，脸上却瘦得双颧突出，两只黄眼珠显得捉摸不定。他衣着整齐，看上去既不像中国留学生，也不像做买卖的。不管怎样，在远离故国的伦敦大街上遇到这么一个同乡，还是值得高兴的。于是孙中山道：

“你府上在哪里？”

邓指着对面街不远的房屋说：“那里就是。”

孙中山不知不觉地和邓一起走到了波德兰区49号。

这时，又一个中国人出现了。邓向他介绍说：“这位孙先生是我的同乡。”

那人显得十分热情，对孙中山连拉带劝：“到我屋里坐坐，抽根雪茄，喝杯红茶，叙叙乡情呀！”

孙中山因事先和康德黎老师有约，便极力推辞。这时候，从

楼房里又走出一个满面虬髯的大汉，也非常客气地请孙中山到楼里坐坐。说着，他们一边一个挽住孙中山的胳膊，不由分说把他拉了进去。等孙中山回头去找邓廷铿时，他已不见了。

孙中山一进门，便听见“呼”的一声，大门被迅速关上了，又“咔嚓”一声上了锁。孙中山看见大厅里有好几个中国人正看着他，便大声发问：“你们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

“走，到楼上去再说！”那两个大汉变了脸，语气也强硬起来。他们挟持着孙中山，带到三楼的一间空房子里，把他往里一推，便锁上门扬长而去。

不一会儿，一个碧眼黄须的英国老头儿走进屋里，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孙中山说：“对你来说，这里就是中国。”这句话，他一连说了两遍。孙中山这才明白，这里是中国驻英使馆，他被秘密绑架了。

“你是什么人？”孙中山用英语问道。

“我是马格里爵士，是贵国使馆的参赞。”

孙中山前几天曾听康德黎老师谈起过，就是眼前这个马格里，以前在上海参加过华尔的“洋枪队”，是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不由得对他怒目而视。

马格里得意洋洋地说：“你就是孙文？”

“是的，我是孙文。”

“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来电，说你乘轮船来这里，让我们扣留你。”马格里凶相毕露地说。

“为什么？”孙中山气愤地问。

“你是贵国政府通缉的要犯，你一到伦敦，我就雇了侦探社的便衣跟踪了好几天，现在终于把你捉到了。我刚才已经打电报给贵国，你必须在这里等候总理衙门的覆电。”说完，马格里不怀好意地冷笑一声，出门去了。

孙中山在房中焦急地踱步徘徊，透过窗户，凝视着蔚蓝色的天空，双眉紧锁，思考着应付窘况和脱逃的办法。

蒙难脱险

孙中山被囚于清政府驻伦敦公使馆的楼上，心中不免焦急。心想，革命大业未成，不能就此束手待毙，一定要设法逃出去，首先要把被绑架的消息告诉老师康德黎博士。

于是，孙中山疾步走到门边，请看守喊来马格里。

孙中山问：“我被你们扣留在这里，能不能让我的朋友知道？”

“不行！”马格里一口回绝，“但是，你放在旅馆中的行李，可以写个便条，让这里的人去为你取来。”狡猾的马格里企图用这个办法搜索孙中山的行李，看看能否取得机密文件或其它有价值的东西。

孙中山识破了马格里的诡计，告诉他：“我不住旅店，只有康德黎博士知道我的住址。”

于是，孙中山写了一张纸条，说明他已被幽禁于中国使馆，请将他的行李送来。孙中山要马格里将这张纸条交给他的另一个老师孟生博士，请孟生转交给康德黎。

马格里接过纸条一看，皱着眉头说：“不能说被禁。”

孙中山又重新写了一张纸条。马格里假意答应转交，拿着便条走了。他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一个木工，乒乒乓乓地给门上加了一把新锁，又用几根铁条把窗户钉得结结实实。

几个小时后，马格里又派来一个叫柯尔的仆人，对孙中山进行搜身检查，将他装在口袋里的钥匙、铅笔、小刀、纸张等搜索干净。

马格里对这个仆人严厉地说：“不论孙文给你多少钱，你都可以收下，但是他给你的任何一张纸片，你都必须直接呈送给我。”

“知道了，照你的吩咐办。”柯尔答道。

晚上，马格里又在囚禁孙中山的房子门外加了两个门卫，日夜监视，让他插翅难飞。

夜间，周围一片寂静，只有门外的看守在走廊上走路的声音不时传入耳中。孙中山静静地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盯着天花板出神，寻思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出去。

一连几天，孙中山都是在焦急中度过，他见行李始终没有送来，便知道了马格里这只老狐狸的当。他买通看守，悄悄弄来了纸和笔。这几天，他多次请求柯尔帮助送信，但柯尔不是拒绝，就是把信交到马格里手里。

孙中山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他只得将身边仅有的两张纸裁成几块，都写上给康德黎博士的求援信，然后用纸条裹着硬币，打开窗子，把几张纸条从窗外向街道掷去，希望能被过路的人拾到，按纸上的地址去送给康德黎博士。他想，只要有一架纸条送到，就有营救的希望了。

但事与愿违，可能是力度不够，几张裹着硬币的纸条全被使馆的人捡了去。随之而来，整个窗口都被封死了。

正当孙中山无计可施，十分苦闷的时候，马格里却酝酿着一个更加恶毒的阴谋：他准备和一家轮船公司商量，包租该公司的船只押送孙中山回中国。

按照英国的法律，未经英国政府的许可，外国使馆是不能随便捕人的。马格里认为，如果能得到一份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的书面证明，他们执行“租船押送孙中山回国”的阴谋就会比较顺利。如果此计不成，就把孙中山当作疯子，堵上嘴巴，捆起手脚，装在一只大木箱里偷运回国。

这时候，邓廷铿又在孙中山的面前出现了。

邓廷铿装着十分抱歉的口吻说：“前几天强迫孙先生到此，实在是公事公办，没有办法，请孙先生海涵。”

孙中山坐在椅子上，面色威严，没有吭声。

邓廷铿继续谦恭地说：“兄弟今天前来看望，实在是想表达下我的个人感情。”

“你如果真的是为友谊而来。则打算怎样援助我呢？”孙中山不紧不慢地问。

邓廷铿提出：“我为孙先生想了一个办法，你可以写一封信给龚照瑗公使。信中须要竭力表白本系良民，并非乱党，只因朝廷官吏诬陷，使我遭受嫌疑，因此，亲自来到使馆，请求昭雪。”

孙中山情急之中，未多思索，按照了邓廷铿的意思，写了一封信。邓廷铿高兴万分，拿着这封信，连招呼也未打就匆匆下楼去了。

这时，孙中山大声叫了起来：“中计中计！”

孙中山之所以再次坠入邓廷铿的奸计，在当时实在是以为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因为如果被押送回国“正法”，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华侨中，都会给革命运动带来重大的损失。

第二天，仆人柯尔照例给孙中山送来了食物和煤炭。这一天，已经是孙中山被囚的第六天了。经过多日的观察，柯尔看出孙中山是个好人，孙中山也感到柯尔富有同情心，心地比较善良。

柯尔看着孙中山愁苦的面容，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孙中山说：“我实在是个好人，并不是他们所说的疯子。我是中国的国事犯，现在被迫流亡海外。”

“什么是国事犯？”

“你听说过阿美尼亚人的事吗？”

柯尔点点头。

孙中山知道英国人对基督教怀有特殊感情，就向柯尔解释道：“现在中国的皇帝要杀害我，正如土耳其苏丹要杀害阿美尼亚人一样。土耳其苏丹仇视阿美尼亚族的基督教徒，所以要杀害他们。中国皇帝仇视中国的基督教徒，也要杀害他们。我是一个中国基督教徒，而且曾经尽力谋求改革中国。凡是英国人都同情阿美尼亚人，像我这样的情况，如果让英国人民知道，也一定会同情的。”

柯尔显然被感动了，问：“不知道英国政府能不能给予援助？”

孙中山很有把握地说：“英国政府一定乐于相助，这是不用说的。我的生命，现在其实是系在你的手上，你如果能让外界知道这件事，我的生命就能够保存，否则，只能任其杀害。”

孙中山略微停了一下，继续说道：“请你再三想想：我们是以崇拜上帝为重，还是以尽职雇主为重呢？”

柯尔明白了，点点头走出去了。

第二天，柯尔继续送煤进来，加完煤后，用手指指煤篓走开了。孙中山拨开煤块一看，有一个纸团。打开来，只见上面写着：

“我可以替你送一封信给你的朋友，不过写信时要小心，当心监守人的眼睛。他们在锁孔中监视你的行动。”

孙中山赶紧在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暗藏的名片，躺在床上给康德黎写了

几句话，交给了柯尔。

善良的柯尔在另一位英国女仆的帮助下，冒着被使馆解雇的风险，终于把孙中山被诱捕囚禁的消息告诉了康德黎博士。

孙中山失踪后，康德黎博士十分焦急。一接到孙中山被绑架的亲笔信，马上找到孟生博士，一齐商量营救的办法。

他们首先报告了伦敦警察局，要求警方干涉此事，遭到婉拒。接着，他们又赶到英国外交部，那些官员也都模棱两可，不肯马上交涉。为了抓紧营救，康德黎急忙赶去雇私人侦探，日夜监视中国使馆，防止他们把孙中山暗中转移。

孟生博士赶到使馆求见，出来接待的是一个翻译，此人正是邓廷铿。孟生开门见山他说：“我要见一见孙逸仙先生！”

邓廷铿故作惊讶：“什么孙逸仙？这里没有此人！”

当天夜里，康德黎博士又赶到伦敦最有名的《泰晤士报》社，揭露中国使馆的违法行为，碰了钉子，只得又到其他报社奔波求援。

第二天，《地球报》用“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发表了这个消息。当天，《中央新闻》、《每日邮报》的记者纷纷来访康德黎。次日，伦敦的各家大报又以特大标题，竞相报道了中国公使馆这一丑闻。

消息传开，舆论为之大哗，英国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英国公众拥到清使馆门口，高呼“释放孙逸仙”的口号。有人愤怒地声称，如不放出孙逸仙，就要捣毁清使馆。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只得派遣代表向清使馆提出交涉。英国首相兼外交部大臣沙利斯堡还向清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按照国际公法和惯例，迅速释放孙逸仙。

10月23日，被非法囚禁了十二天的孙中山终于被释放了。当他从使馆出来时，伦敦的街头人山人海，热情的英国公众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了，他们纷纷向孙中山挥手致意，热情地齐声欢呼：“孙逸仙！孙逸仙！”

此情此景，充满着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无限感慨，无限激动。回到旅馆，记者们蜂拥而至，把孙中山团团包围起来。孙中山慷慨陈词，详细揭露了清政府这一卑劣的绑架阴谋。英国各报继续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个事件的始末。

这样，这次卑鄙的绑架事使清政府的腐朽和残忍本性更加臭名远扬，中国革命家孙逸仙的名字瞬间便传遍了全世界。

潜心研读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绝不会因为经历了一次死亡的危险就畏直不前，孙中山虽然在伦敦遇险，差点被杀头，但丝毫没有削弱革命意志。正如他在获释第二天给伦敦各报主笔所写的声明那样：“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孙中山反思自己的革命经历，深深感到自己的才智和学识还不足以应付实际斗争的需要，便决定暂留伦敦，这样做一方面能比较从容地思考一下今后的计划，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潜心研究，并实地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情况，进一步探求救国的真理。

就这样，孙中山开始了一段在异国读书、研究的生活。在这期间，他几乎天天都泡在博物院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几乎对一切都感兴趣：外交、法律、矿物、农业、畜牧、机械、政治、经济等，各种书籍都看，而尤其重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他这样日夜苦读，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的。后来他曾说，他所学的一切学问，都是“革命之学问”，凡任何有助于增进革命知识和能力的，他都认真去研究，作为组成他的“革命学”的素材。

清使馆对孙中山的动向仍然十分关注，他们继续委托侦探社监视孙中山的行动。该侦探社 1897 年 4 月 18 日向使馆的报告，今天读来是很有意思的：

“他（指孙中山）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谭文省街 46 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他不变的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的为要吃些点心，就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6 月 24 日，侦探社又报告说：“此人经常地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在那里停留至下午 7 时或 8 时。”

这些报告，成了孙中山当年居留伦敦时刻苦读书的真实记录。

康德黎博士后来也与友人谈到过：“孙逸仙在伦敦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浪费过光阴。他时时都在工作，他所读的书，各方面都有……孙逸仙在今日的中国，是一个获得最广博最高尚教育的人，这是无疑的。”

孙中山曾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他爱好读书，甚至在危急情况时也矢志不移。

有一天晚上，阅览室里的读者都走了，孙中山已经十分疲倦，就伏在桌子上休息一会。这时，他晚饭还没吃，摸摸口袋，生活费已经所剩无几。就在他准备出门买面包时，进来了三个中国留学生找他讨论问题。一位稍微年长一些的学生见他满面倦容，关心地问：

“孙先生近来身体怎样？”

“不错！”孙中山打起精神回答。

伦敦的中国留学生与孙中山的关系比较融洽，知道他生活困窘，便时常接济他。这时，其中另一位中国留学生笑着说：

“恐怕又是囊中羞涩了吧。”

孙中山拍拍口袋说：“今晚还能过得去。”

说完，那三位同时笑了起来。他们拉着孙中山去吃饭，又共同凑了三四十英磅送给他。

可是不到三天，孙中山就把这笔钱几乎都用来买了新书，其中有许多关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在孙中山看来，为了探求救国的道理，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一两顿饭不吃不要紧，学习比吃饭更重要。

孙中山在英国这一时期，除了通过读书研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接触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说外，还找机会认真地观察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

他经常专门抽空到英国宪政俱乐部等处考察调查，跟流亡伦敦的各国革命者交流经验，商讨问题。他看到英国虽然富强，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却十分悲惨。伦敦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竟遭到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

对于英国社会的这些现实情况，孙中山感触颇深。他设想通过一些办法，避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祸害”。他的社会经济观点——民生主义，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他决定采取民生主义，与民族、民权两个问题同时解决，初步形成了三民主义的主张。

由于当时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不多，距离中国又路途遥远，孙中山决定离英赴日，就近谋划中国革命。他离开伦敦，又一次横渡大西洋，经过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于1897年8月中旬再次到达日本横滨。

在横滨，孙中山结识了两个日本朋友，一个叫宫崎寅藏，一个叫平山周。他们都是听说中国革命家在伦敦蒙难的传奇事件后，慕名前来求访的。他们和孙中山一见如故，畅谈革命，终日不倦。

宫崎寅藏是日本著名的浪人。他比孙中山小五岁，号白浪滔天，相貌雄伟，蓄一口长髯，他是一个游侠式的人物，性情豪爽，交流广泛，行踪不定。有钱的时候，他狂歌善舞，挥金如土，为朋友的急难解囊相助，可以一掷千金；无钱的时候，他就沿街说书、卖艺、唱浪花节来维持生计，蓬头破衣，如同乞丐一样。就是他，后来写了著名的《三十三年落花梦》。

平山周是个二十六、七岁的日本青年，英俊倜傥，性格耿直，也和孙中山很谈得来。

通过宫崎和平山的介绍，孙中山又结识了刚当上日本民党领袖的犬养毅，以及大隈重信、萱野长知、头山满、山田良政等日本朝野著名人士。后来，山田良政还亲自参加了1900年的惠州起义，在惠州附近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牺牲。

宫崎和平山都住在东京。临别的时候，他们都劝孙中山采用化名暂留日本，以摆脱清使馆密探的追捕，并邀请孙中山到东京去，以他们华语老师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回答说，是暂留日本还是潜回国内，他还要再仔细考虑一下才能决定。

于是，宫崎和平山把自己的地址留给孙中山，便依依惜别地回东京去了。

过了几天，孙中山来到东京。他先找到平山周，告诉他已经决定暂时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平山周听了十分高兴，马上陪孙中山来到宫崎寅藏家里。

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宣传，他们议了很长时间，最后商定让孙中山住在位于东京市中心银座的对鹤旅馆。他们给孙中山换上了一套崭新的日本服装，便走出门来。

宫崎和平山陪着孙中山，沿着车水马龙的大街向旅馆走去。在日比谷公园附近，孙中山看到一所华丽的住宅座落在一个幽雅的花园之中，便随口问

平山周：“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东京大名鼎鼎的中山候爵的府邸。”平山周告诉他。

来到对鹤旅馆，由平山周给孙中山登记。孙中山当时的姓名是孙文，或称孙逸仙。由于事先没有商定化名，平山周犹豫了一下，想想刚才经过中山候爵的住宅，便随手写上了“中山”二字。可是，中山是日本人常见的姓，应当再有个名字。

平山周正踌躇间，孙中山接过平山周手中的笔和登记簿，又加上了一个“樵”字。于是，孙中山又有了一个新的化名：“中山樵”。

进了房间，孙中山风趣地对宫崎寅藏和平山周说：“我小时候，从六岁起就上山砍柴，真是一个中国的山樵啊！”

“中山先生”，宫崎寅藏第一个叫起孙中山的新名字，诙谐地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也正需要您这位中国的山中樵夫来披荆斩棘啊！”说罢，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援菲计划

在日本，孙中山和菲律宾独立党曾有过一段动人的交往，那是孙中山住在横滨的时候。

夏夜，横滨的气候十分怡人。海风呼呼地吹着，把白天的暑气化为乌有。滨海的沙滩上、大道边和树荫下，到处是纳凉的人们。

孙中山无暇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阴凉，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正汗流浹背地在绘制一张中国地图。这不是普通的地图，而是一张别具匠心的《中国现势地图》。在地图上，他把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强占的铁路，一一着色标明，以便看图的人触目惊心。为了唤醒有志之士起来革命，他还为这张地图写了一个后记，内容是：

近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

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愤为友，乘时报国，舍科第之辞章，而讲治平之实学矣……

孙中山时而又停下笔端，思索着下一次武装起义的计划。忽然，门外的日本侍女叩了叩门，轻轻地说：“中山先生，有人找您！”

孙中山打开房门一看，门口站着三十来岁的汉子，又黑又瘦，上唇蓄着一字型的浓密胡子，手里拎着一只皮箱，脸上露出极度疲惫的神色，两只乌黑明亮的眼睛却显得十分深邃、坚毅。

“您就是孙逸仙博士吧？这么晚前来打扰您，十分抱歉”，那人说着一口不熟练的日语，自我介绍道，“我叫彭西，来自菲律宾。”

“哦，您就是那位菲律宾独立党的著名宣传家彭西先生？久仰！久仰！”孙中山和来人紧紧握手，热情地将客人住屋里让，“快请，请屋里坐！”

彭西此次来日本，负有重要的使命。几个世纪以来，菲律宾一直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1896年，二十九岁的中菲混血青年阿奎那多领导独立党起义，参加的民众有四十万人，与西班牙统治者进行了顽强的战斗。

后来，美国也企图取代西班牙，要把菲律宾作为它的殖民地。美国政府向菲律宾调派了军舰，对阿奎那多诤称，要帮助菲律宾独立，美国军队攻下了马尼拉，占领了大片领土，打垮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势力。

1898年6月，阿奎那多在卡维特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并被选为总统。但在年底，美国又与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决定西班牙退出菲律宾，由美国取代殖民统治。菲律宾共和国对此提出抗议，要求美国政府要求承认菲律宾独立，被美国拒绝。后来，美国竟完全背信弃约，向菲律宾革命军发动突然袭击。

在阿奎那多领导下，菲律宾革命军奋起保卫民族独立，勇敢地抗击侵略者。由于武器缺乏，便决定向亚洲各国求援，并派彭西到日本购买军火。

彭西到了横滨，得知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正在横滨，并了解到孙中山与日本朝野人士有所交往，也一定会同情菲律宾的独立斗争。于是，经多方打听，找到了孙中山的住处。

彭西与孙中山走进内室，在席子上坐下来，两人一见如故，亲切交谈起来。

“孙先生，见到您真是万分高兴！我早就听说你的高明医术和革命业绩。从经历上来说，我们是十分相似的。我以前是马德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从事过医生这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后来也和您一样弃医革命，现在正为自

己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战！”彭西不愧是一位宣传家，说起话来亲切感人。

“你们的斗争，早已引起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注目。我们中国的革命党人和菲律宾独立战士应该结成紧密的同盟，这样，亚洲革向的力量就可以大大加强。”

“孙先生，您这个主意太好了！”彭西不禁兴奋地站了起来。

孙中山接着转了一个话题，关心地问：“听说贵国近来的独立战争进展十分顺利，是吗？”

“是的。我们已经取得了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胜利，正在与美国侵略军战斗。”彭西把国内情况向孙中山作了介绍，然后提到了这次来日本的使命，“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大量军火，独立党的领袖阿奎那多派我到日本购置军火。然而，事情并不顺利……”

彭西告诉孙中山，日本政府正和西方列强谈判修改条约，需要美国的支持，因此拒绝向菲律宾出售军火，形势非常复杂。彭西恳切地对孙中山说：“我得知先生与日本进步人士有联系，因此冒昧请求先生协助购置军火。”

孙中山听了，毫不犹豫地表示：“你们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胜利，将是所有东方人的胜利！我们的革命事业应该是互相支持的。购置军火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

“谢谢！非常感谢！”彭西一边连声道谢，一边从身边取出一叠支票，连同皮箱一起交给孙中山，“这是购置军火的款子，请点收。”

为了帮助菲律宾独立军购买军火，孙中山到处奔波。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找到了宫崎寅藏的住处，后来又把平山周找到一起商议。孙中山把菲律宾独立军想购买武器的事，详细告诉了他们，请他们帮忙。孙中山说：

“我们一旦帮助他们争得了菲律宾的独立，接着便可凭借菲律宾同志的力量支援我们的武装起义，掀起一场风暴。我决心带领我们的同志和部下去帮助他们打仗，希望你们也来和我们一起，速其成效。”

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素来景仰孙中山，他俩见孙中山态度坚决，便赞成道：“好，来它个痛快的，先干他美国一家伙。”

由于中国革命党人和支持他们的日本友人都受到日本当局的监视，不能直接出面购买军火。必须找一个与中国革命党没有联系、不受当局注意的人来办这个事情。于是，他们三人又找到犬养毅，商议请民党干事、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秘密帮助。

孙中山一面秘密地托人联系购买军火，一面与彭西相商在武装斗争中互相支援的具体计划。最后决走，当菲律宾独立军向美国侵略者大举反攻时，孙中山亲自率领兴中会员取道小吕宋埠赴菲律宾，和独立战士并肩作战。

菲律宾独立党领袖阿奎那多接到彭西的报告，对孙中山计划助菲独立，而后菲助中国革命成功的想法，极为赞同。为了支援中国革命，阿奎那多决定赠给孙中山十万日元作为革命经费，并命令彭西亲自把这笔赠款交给孙中山。

兴中会得到这批赠款后，在开展各项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当年秋季，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时报》；派史坚如赴长江一带，联络会党，扩大兴中会组织；派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接待会党的机关；策动惠州、广州军事行动等方面的费用，就是用的这笔款子。

经过暗中联络，中村弥六向枪炮商大仓会社购买了大批军械，包括子弹六百万发、步枪一万枝、大炮十一门、望远镜七架以及火药压榨机和大批制

造弹药的材料，雇三井会社的“布引丸”船潜运赴菲，预定驶至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附近的一个岛屿，由独立战士接收。孙中山还聘请了三名富有战斗经验的日本军官，随船赴菲律宾帮助独立军训练部队。

1899年7月19日，阳光洒满海面，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布引丸”轮在门司港启航了。孙中山站在码头上，一直到渐渐远去的轮船终于消失在视野里，悬着的心才松了下来。

不幸的是，几天以后传来了噩耗：“布引丸”轮在浙江马鞍岛附近海面遇到了台风，不幸触礁沉没。船上的十二个人，包括三名日本军官，全部丧生于狂风巨浪之中。

孙中山并不灰心，他与彭西商议，用剩余的七万五千比索，又设法买到了第二批军火，雇船取道台湾运往菲律宾。美国政府发觉了这一次活动，向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决定，取缔枪支船运出口，援菲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孙中山对菲律宾人民反美斗争的支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行为，在旅日的亚洲各国革命志士中引起了反响，得到大家极高的评价。这种真诚的协助精神，在中菲友谊史上，留下了可贵的一页。

之后，孙中山与彭西仍不断来往，互相关心着两国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后来彭西还写作并出版了《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书。书中写道：“孙逸仙善于把远东各国的共同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因此，他成为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

初晤康梁

1898年夏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流亡之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则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变法维新运动，死气沉沉的中国大地似乎出现了一线生机。孙中山虽然远在日本，却十分密切地注视着国内这场政治运动的发展和命运。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激于不甘亡国灭族之义愤，便通过上书请愿、开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广造舆论，鼓动变法维新。逐步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1897年11月，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年底，康有为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写道：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形势日趋严重。天下皆知朝廷软弱无能，人民正在酝酿造反起义，如再不图强变法，皇上与诸位大臣，即便想苟且偷安，维持短暂的歌舞升平也不可得了……

康有为的这些言词使光绪皇帝深为震动，他表示“不作亡国之君”。1898年1月，光绪命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李鸿章、荣禄等传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4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倡议在各省、府、县成立分会，呼吁变法救国。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任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在皇帝身边办理文书。之后，光绪又命各省总督巡抚推荐人才。康有为的弟子及志同道合者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都被举荐上来成为皇帝左右近臣，参与变法工作。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政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出现了史称戊戌“百日维新”的高潮。

孙中山和他在日本的朋友们经常聚会议论局势，有一天晚问，他和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一直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只见孙中山双眉紧锁，不无忧虑地说：“光绪皇帝是个傀儡，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肯定不行！”

“听说西太后在光绪下令变法的第四天，就将光绪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和革职回家了，这明显是与光绪对着来的嘛！”陈少白愤怒地说。

宫崎寅藏突然站了起来，面对孙中山，以探讨的口吻说：“孙先生，贵国的维新派人士只顾颁布变法条文而不重视抓军队，变法能够长久吗？”

孙中山默然不语，担心着国内局势的变化。

果然不出所料，煊赫一时的“百日维新”很快就流产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根本不能容忍光绪和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西太后实际掌握着朝廷大权，她在将翁同和革职的同时，又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还决定10月到天津阅兵时拘禁光绪，另选幼主。

光绪获悉后，先后两次与康有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袁世凯的身上，他是荣禄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9月18日，这是一个风雨之夜，谭嗣同悄悄潜入袁世凯的驻地，力劝袁世凯发动兵变，除掉荣禄，然后率兵进京勤王，对西太后实行兵谏，不许她干预朝政。

谭嗣同表情严肃，声音低沉而又坚定地说道：“报国恩，救君难，除旧党，建大业，全在此举！未来天下大政，将在阁下掌握之中，国家前途，系于阁下之手。”

阴险狡猾的袁世凯表面附和，当即回答道：“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禄如杀一狗。”

但是没有想到，9月20日，袁世凯就跑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入京见西太后禀报了此事。西太后恼火万分，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缉捕维新派，所谓“新政”全部废除。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从炙手可热的皇帝亲信一变而为朝廷“钦犯”。康有为逃出北京，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到了香港，梁启超则避居在日本使馆。

孙中山听到这些消息后，便和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平山周商量，请他们助一臂之力，帮助康有为和梁启超脱险。

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一批日本朋友，早就打算帮助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于是，便立即行动起来。宫崎寅藏悄悄来到香港，找到了康有为，并掩护他到了东京。平山周则到了北京，在公使馆见了梁启超。为了掩护梁启超潜逃，平山周要梁启超脱掉汉服，换了一身和服，乔装打扮后，先到天津，再乘船到了东京。

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东京后，孙中山考虑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加起来不过七八十人，而且多数属于康、梁的维新派，如果双方能够合作，彼此坦诚相待，对兴中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便决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去慰问，以示自己的诚意。

孙中山委托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去转达他的意向，但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宫崎寅藏对康有为说：“你们同在日本流亡，应该联合为好，可以坐在一起谈谈。”

康有为十分傲慢地回答：“我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交往，恕不能相见。”

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得知此事，便出面周旋，约定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四人，一同前往他在早稻田的寓所晤面。当孙中山带着陈少白来到寓所时，康、梁二人尚未到。等了一会儿，只见梁启超一人匆匆赶来，吞吞吐吐地解释说：“康有为先生因有其他事情不能来，实在抱歉。”

“既然康先生有事，我们先谈谈也行”，孙中山十分大度地说，“梁先生快请坐。”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先寒暄几句。待侍者端来茶水后，犬养毅对孙、陈、梁说：“我不大熟悉中国的语言，先离开一步，你们聊吧！”

孙中山与梁启超就双方合作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交谈。临别时，梁启超说：“今天所谈内容，关系甚大，必须与康先生商量后，再为答覆。”

孙中山紧紧抓住梁启超的手，动情地说道：“此事不宜久拖，盼尽快答覆。”

两天时间过去了，康、梁方面毫无回音。孙中山不免焦急，便吩咐陈少白：“你再去拜访一次，听听他们的想法。”

陈少白这时已十分恼怒，摆摆手说：“先生干脆算了，我看康有为根本就不赞成革命，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生还记得大同学校的事吗？”

原来，孙中山与康、梁在此之前就有过断断续续的交往，发生过一些令孙中山不愉快的事情。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与孙中山是同乡，有一段时间还同时住在广州城里。当时，康、梁就已有了一点名气，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孙中山在圣教书楼挂牌行医，相隔不过几条马路，彼此一直没有什么来往。孙中山

在确立了反清思想后，曾把一切敢于改革政治的人，都当作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很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1893年的冬天，孙中山听书楼的一个伙计说康有为常来书楼买书，就托他转告康有为，说想和康氏见面结交。但此时的康有为正踌躇满志，看不起孙中山，竟然对那个伙计说：“要他写一个拜见老师的帖子，称自己为门生才行。”结果结交未成。

胸怀大志的孙中山是不会计较这些小节问题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为扩大影响，在日本横滨办了一所学校，孙中山取名为“中西学校”。因为教员缺乏，孙中山、陈少白又希望与改良派联系，便委派一名校董到了上海，聘请梁启超到日本主持学校的校务。梁启超不大愿意干这个差事，便与康有为相商。康有为另派了他的学生徐勤和另外二人，来中西学校执教。

孙中山看到康有为派人来到横滨，十分高兴，便委托徐勤当了中西学校的校长。谁知徐勤当校长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康有为的意思，把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并挂起了康有为亲笔书写的门额。即便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动气，也不去追究。他想，既然将学校交给他们办，改一个校名也无碍大局。

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遇到了一件使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他抽空到学校去看看，走进教员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教员们都上课去了，无意中瞥见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不得招待孙逸仙！”孙中山觉得有点奇怪，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有几个兴中会员听到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跑到学校要和徐勤算帐。徐勤推辞说：“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啊，字条绝对不是我写的，我可以发誓。”兴中会员们继续和徐勤论理，双方僵持不下，后被孙中山制止了。过了几天，经过暗中了解，才知道这件事背后大有文章。

康有为自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后，受宠若惊，对光绪真是感激涕零。他得意洋洋地在公开场合对人说：“变法要想成功，必须要从京城开始，必须要依靠朝廷的王公大臣。”他听到一些康门弟子在横滨与革命党人交游甚密，担心对他的前程不利，就在私下里向徐勤等人透露说：“要不了多久我就将受到重用，你们应该与那些革命党人断绝往来，否则将会受他们的牵累。”

由此可以看出，在康、梁的眼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乃是背叛朝廷的危险人物，不但不能与之伍，还要寻找机会对他们加以瓦解。正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徐勤才在学校里极力排除孙中山的影响，并且以各种理由，将赞成孙中山革命主张的教职员排斥出大同学校。就这样，一个兴中会创办的学校竟成了改良派的机关！孙中山以后也就不到这个学校来了。

这些往事，孙中山当然是记忆犹新。陈少白在激愤之下提到大同学校的事，确实令孙中山心绪难平。但他考虑到时过境迁，应以大局为重，要多做工作，促使康、梁改弦易辙，不能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恩恩怨怨上纠缠不休。他耐心地开导陈少白：“变法维新已经失败，或许他们会改变原来的观点。他们刚来日本，我们还是主动一些吧！”

在孙中山的耐心劝说下，陈少白无可奈何地再次登门拜访康、梁。他决心帮助孙中山，说服康有为，顺利实现两派力量的合作。

合作受挫

为了谋求改良派的合作，孙中山不计前嫌，多次主动接触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双方能坐在一起，共谋大业，但均遭到冷遇。孙中山当时尚没有看清康有为这个保皇派的嘴脸，总以为彼此都流亡日本，思想上应有很多相通之处，即便有些分歧，也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于是，仍然以积极的态度促成与康、梁的协作。

陈少白理解孙中山的一片苦心，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再去访问康有为。来到康的住处，刚进院门，就遇到徐勤。徐勤知道陈少白肯定是来找康有为的，连忙说：“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

陈少白本来就不十分情愿见到康有为，听罢转身就往回走。这时，梁启超在屋里叫道：“少白，请回来！”边说，边跑出去拉陈少白进了屋子。

陈少白一打量，康有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除梁启超外；还有王照、梁铁君等人，似乎正在闲谈。陈少白与康有为相视点头，正欲作礼节性的问候，忽然王照站起来向陈少白诉苦道：“请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这种情形，实在是忍受不了——”

话还未说完，康有为便气愤地命令梁铁君：“把他拉出去！”

陈少白看出其中必有奥秘，因不了解情况，也不便开口询问，便坐在圆桌旁，礼貌性地问道：“康先生这几日过得好吗？孙先生要我转达他对你的问候！”

康有为余怒未消，强装笑容回答：“感谢孙先生，过得还好。”

陈少白对康有为、梁启超谈了他的来意，说道：“满清政府，已经不可救药，康先生也需要改弦易辙了。今日中国的局面，不经过革命，国家不会出现生机。”他见康有为沉默不语，继续说道：“先生以前于清朝政府，不可谓不尽力，但是他们现在倒要杀害你，你又何苦死心帮助他们呢？”

康有为听后，呷了一杯茶，摆出一副大清忠臣的嘴脸，以虔诚的口吻说：“当今皇上是英明的，必有复辟的时日。我感受皇上的知遇之恩，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只有鞠躬尽瘁，尽全力鼓动各路人马起兵勤王，帮助皇上瀛台脱禁。其余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陈少白又劝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当今之世的大丈夫的话，那末你就不能为了皇上待你的好，就把国家都不要了。所以，孙先生想请你出面，与你们维新变法之士联合，就是希望先生不要因私而忘公，因报皇恩而甘愿亡国。”

康有为无言以对，还是不停地重复皇上如何如何的好。康有为拒绝了孙中山的合作要求，宁愿充当光绪的奴仆，也不愿在革命团体内充当重要的领导人物。这时的康有为，实际上已经成了革命党人和历史前进的绊脚石。陈少白和他谈了三个多小时，康有为主旨不变，谈判毫无结果。

几天以后，陈少白断定王照等人在康有为手下肯定受到压抑，或者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便通过平山周趁康有为师徒们外出时，把王照请到了犬养毅家里，询问了他和康有为的情况。王照便把康有为出京的经过和伪托皇帝衣带诏的谎言揭露出来，写了洋洋数千字。

在平山周的帮助下，王照脱离了康有为的控制，向各界人士广为宣传康有为的伪托皇帝衣带诏之事，使得康有为在日本声名狼藉。日本政府给了他

九千元旅费，令他离开日本。康有为无可奈何，很不光彩地离开日本到加拿大去了。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仍然保持联系，每个星期都要聚会几次，梁启超与康有为略有不同，在孙中山面前，他表现出一副革命的姿态，表示双方可以“合作”，甚至讨论了两派联合组党的计划，由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当时，梁启超问孙中山：“如果这样安排，那康先生将置于何地呢？”

孙中山答道：“他的弟子是领导人，作为老师，地位不是更加受到尊重吗？”

梁启超觉得有理，便推荐由陈少白和徐勤共同起草联合章程，至于联合后的名称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明确意见。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频繁接触和联合的动向，引起了康门弟子中一个顽固分子麦梦华的不满，他给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写了一封告发信说：“梁启超正在渐渐进入孙中山的圈套，先生应该尽快设法解救。”

康有为当时正在华侨中进行保皇宣传活动。他先在加拿大创立了所谓的“保皇会”，在华侨中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住他就要亡国，同时，以光绪皇帝的教师等名义进行欺骗，蒙蔽了不少人，华侨捐了不少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他从加拿大到了新加坡，接到麦梦华的告发信，非常恼火，便回信骂梁启超“没有志气，跟在他人的尾巴后面，实属无耻”，责令梁启超“痛改前非”，把梁启超和他的门徒骂得哑口无言”。

康有为还不放心，又派人专程到日本催梁启超到檀香山去发展保皇会组织。梁启超不敢抗命，立即起程。动身前，梁启超还信誓旦旦地向孙中山表示：“此行决不改变原来商讨的改组新党的计划。”他还请孙中山给他写几封介绍信，以便到檀香山与兴中会的人联系。

孙中山信而不疑，给他哥哥孙眉和其他兴中会干事写了信，要他们热情接待梁启超。

梁启超于1899年底到了檀香山，由于孙中山的引荐，受到了兴中会员们的热烈欢迎。可是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梁启超在离开日本之后，屈于康有为的压力，加之与孙中山联合的思想基础并不牢固，其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拿着孙中山的亲笔信，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宣传“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主张，诱惑侨商加入保皇会，捐了不少钱，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员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还到茂宜岛去访问孙眉，孙眉殷情招待，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叫他的儿子孙昌、侄儿孙科拜梁启超为老师。

当时，檀香山刚刚闹过一场瘟疫，美国殖民当局为了控制疫情，到处纵火，使当地华侨财产受到一定的损失。许多侨民怨恨清政府腐败无能，没有力量保护本国的侨民。梁启超灵机一动，借此机会鼓吹道：“大家出资出力，帮助起兵勤王，保救光绪皇帝复辟，变法维新，将来一定能够抗御外侮，保护海外侨民利益。”

在梁启超的欺骗宣传下，很多的兴中会员受到蒙蔽，加入了保皇会，连兴中会的主要干事，还有孙中山哥哥孙眉也误入了圈套。仅半年时间，募款达十万元之多。半年后梁启超回到日本时，孙眉还让其子孙昌跟他到日本，入了保皇派的大同学校。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向康有为献策：“在内地发展保皇会，也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如果广东的地盘全部落入孙中山的手里，我们便无立足之地

了。”康有为十分赞赏梁启超的这个主意，赶紧派他的门徒赴两广地区发展保皇会，企图把那里的会党全部抓到自己手里来。

孙中山在日本听到这些消息，气愤至极。他先写信给檀香山的兴中会党人和孙眉，劝他们头脑要清醒，不要受骗。但会员们受毒已深，不以为然。兴中会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接着，他又写信指责梁启超背信弃义，然而这已无济于事，已经大上其当了。

康有为、梁启超利用孙中山希望扩大革命力量的迫切之情，从背后给了孙中山好几刀。孙中山逐渐看清了保皇党人的真面目。后来，他在总结这段时间和康有为、梁启超的交往关系时，十分痛切她说：“广州起义失败以来的五年时间，实在是革命进程中最艰难困苦的时代。当时有保皇党的出现和破坏，他们为虎作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甚至比清廷更难对付。”

孙中山决心和保皇党人分道扬镳，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抵制保皇派的进攻，发展革命力量。他一面准备策动新的武装起义，以实际行动与保皇党人划清界限；同时，他认为要彻底揭穿保皇派的真面目，还必须要从政治上、理论上和保皇派决裂。为此，孙中山号召国内外的革命派组织，大力创办报刊，利用舆论工具与保皇派进行斗争。

由此，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进行了一场为时十多年的大论战。

惠州起义

1900年，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极其困难的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兴中会的许多同志信心不足，每向前迈进一步都须付出极大的努力。革命正处在一个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闷时刻，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

还是在去年秋天，他就派陈少白由日本到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孙中山亲自购买印刷机和铅字，派人送到香港。报纸出版后，大力鼓吹反清，发挥了很大作用。孙中山又派兴中会员史坚如等人，回到国内，深入长江流域，联络哥老会等帮会各首领。并派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机关，接待会党，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珠江流域的三合会、洪门会等地方组织串连起来。年底，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洪门会的首领在香港聚会，讨论合作，决定各会合并，成立一个大团体，名为“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宫崎寅藏携带着总会长的印章来到日本，亲手交给了孙中山。宫崎寅藏高兴地说：“孙先生现在已经是公认的革命领袖了！”孙中山接过印章，便与他商谈起今后的行动计划。

他们首先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都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国夺取一块地盘，国家已形成被瓜分的局面：俄国占领了长城以北，英国占领了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法国占领云南和两广地区，日本占领了福建，美国则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势力范围内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同时，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

在国内，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入和影响的不断加深，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的殖民活动也猖狂起来。中国的北方，义和团运动大规模爆发，不仅直接危及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而且使清政府失去了控制能力。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对宫崎寅藏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想利用这个时机组织武装起义，你看如何？”

宫崎寅藏表示赞同，建议道：“请先生再考虑成熟一些，作出布置，将各方力量调动起来，不能匆忙行事。”

孙中山经过认真考虑，命令郑士良到惠州，召集会党群众发动起义，再让史坚如去广州召集同志响应。

1900年夏，孙中山率领同志前往香港，准备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不料船到香港时，英国政府不准他上岸，整个计划只好临时改变。孙中山就在一只舢板船上与兴中会的几个骨干人员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决定将起义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要陈少白等人到香港筹备军需接济，史坚如仍在广州组织策应。孙中山则坐原船回日本，转渡台湾，组织人力与武器的补充。

根据起义计划，郑士良在惠州发动起义，占领惠州以后，即与虎门数千名志士会师，攻取广州，然后挥师北上，直捣清廷老巢。

9月28日，孙中山与支援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山田良政等到了台湾，准备招收军事人员。当时，台湾仍为日本所占领，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认为中国的北方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利用孙中山反对清政府的行动，可以向中国内地扩展本国的势力，便派出官员向孙中山表示“同情”中国革命，可以相助。

孙中山特地拜访了儿玉，向他们讲述了攻打惠州，直取广州的计划，请

求援助。儿玉心怀鬼胎，要革命军从惠州北上，再由厦门经福建省向北进军。儿玉说：“如果这样，我将在海丰、陆丰供给武器。”

儿玉不仅是现职台湾总督，还是日俄战争时的日军总参谋长，是位武功赫赫的大将。孙中山得到儿玉支持的允诺，心里感到踏实多了。接着，孙中山又提出借款作为军费，被他们拒绝了。

后藤说：“孙先生，借款要订契约，多少年之后要加息偿还。孙先生现在进行的革命，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所以谈不上借款。”

儿玉将军说：“如果大军挺进到海丰、陆丰，我们就在那里提供武器。革命军拿着武器到厦门，那里有台湾银行的分行，在分行地下金库里，大约有二三百万元日元银币，因为是革命，可以抢劫嘛。”

孙中山对儿玉的建议大为惊讶，但听儿玉答应提供武器，而且相当于两个师的装备，也就不再提借款之事了。

儿玉与后藤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用心十分险恶，他们表示支援孙中山，以至建议革命军进军厦门后“抢劫”日本银行金库，实质是要制造借口，使日本能名正言顺出兵夺取厦门以至整个福建省。

惠州起义的烽火如期点燃了。郑士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以惠州的三洲田作为起义地点，然后沿海东进，直趋厦门。待郑士良率众攻到厦门后，孙中山即与之会师，然后回师广州，组织革命政府。

10月6日，郑士良组织了六百壮士，以会党为主力，揭竿而起，成功地举行了惠州起义。首战便旗开得胜，夜袭沙湾，一举成功。杀敌四十余人，夺枪四十多支，弹药数箱，还俘虏了三十多人，革命军声势大振，继续向隆镇挺进。

隆镇由清副将杜凤梧带领一千多名清兵把守，他们占据险要地点，死死堵截阻击。革命军装备很差，大多数人没有枪弹，手持长矛、木枪，分左右两翼，乘守敌没有防备，匍匐上山，夹击敌军。清军惊慌失措，不堪一击，杜凤梧被活捉。这次战斗，缴获洋枪七百余支，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匹，军势更为之大振，参加起义的人数激增到六千人。

10月17日夜，革命军整队向白芒花进发，在那里和惠州派来的五六千清军打了一仗。革命军只有一千余支洋枪，却打得清军四处逃窜。几天时间，革命军就占领了新安、大埔、惠州、平海等地。两广总督德寿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六神无主，赶紧抽调人马前去镇压，连续几次战斗，均遭到失败。

革命军的队伍在日益壮大，进军途中，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拥护。沿途百姓在路旁摆出酒食犒赏战士，有的还燃放爆竹庆祝胜利，大批群众纷纷要求加入革命军队伍。21日抵达三多祝时，革命军迅速增至二万多人，声势浩大。这时，革命军即时将队伍整编，同时等待粮食、弹药的补充和孙中山的指示。

清政府见镇压不行，就改为劝降。他们派出广州起义中的兴中会叛徒陈廷威，到香港找到陈少白，被臭骂了一顿。陈廷威又找到另一重要成员议降，拿出清廷议和的三个条件，被孙中山当即回电拒绝。

孙中山得知革命军连战俱捷，不胜欣喜，他四处奔走，寻求外援支持郑士良的起义军队。他一方面打电报催促东京的宫崎寅藏，要他将先前菲律宾宾独立党未能运走的军火，赶快运至惠州沿海供应前线；另一方面催台湾总督儿玉，请求履行事前的约走。

可是，两条线索的回答都令他大失所望。宫崎复电说，菲律宾独立党购

买的军火，因交涉没有成功，无法送至前线。至于儿玉的态度，则突然发生了转变，原因是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变化：山县内阁告终，伊藤博文出任总理大臣。他从扼杀中国革命运动的立场出发，严禁向革命军供应军火，更不准军事人员援助孙中山。因此，不管儿玉对孙中山的许诺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表示现在无法实行前约。

孙中山整个的援助计划就这样完全落空了。于是，他赶紧派日本人山田良政到三多祝大本营找到郑士良，交上一封手书：“政情突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

郑士良接到这个消息，嗟叹不已，但又不甘心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他召集了军事会议，和备位起义军首领商议。仗，已经打了几十天，不仅给养无着落，弹药也用光了。清军正在以优势兵力围攻，与其束手就擒，不如自行解散。10月22日，郑士良率领一部分革命党人退往香港。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在退回台湾时，由于迷路被清军捕获，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再说潜伏在广州的史坚如，在惠州起义后，为按时响应起义，卖了一部分家产作为活动经费，但几次谋划都未成功。他与其他响应起义的人商议，决定用炸药炸死两广总督德寿以牵制敌人。史坚如认为，“德寿一死，清军必然自相惊扰，既可解惠州的危险，广州也可乘机起义，大事可成！”

史坚如托他的朋友在两广总督署后花园德寿卧室的附近租了一所民房，悄悄地把两百磅炸药运到了那里，用了几天工夫，挖了一条地道，直通督署花园，把炸药埋到了德寿的住处。天亮时，史坚如点燃引线后，便快步出门，准备乘去香港的船，但没有听到爆炸声。他又一个人悄悄折回地道里，潜伏了一昼夜，第二天早上又点燃了药引。这一回炸响了，轰塌了八间房子，德寿从床上震出数尺之外，但没有炸死。

史坚如不相信，亲自坐轿到现场观察，被营勇捉住，拘押到南海县署。县令命令衙役严刑拷打，逼问：“同党有多少？首领是什么人？”

史坚如回答：“同党有四万万，首领就是我。”

敌人又用烧红的铜钱在他背上烫，继续逼他招出同党。史坚如还是坚定地回答：

“我只有一个同党。”

史坚如宁死不屈，于11月9日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二虚岁。

孙中山对他的牺牲，深为悲痛，说：“坚如是为共和殉难的第二个健将，他的死是革命前途的一大不幸。死节之烈，浩气英风，成为后死者之模范。”

惠州起义就这样失败了，孙中山心思重重地离开了台湾。他认识到，单纯军事上的进攻，一心依赖外援，起义是难以成功的。但这次起义过程中，倾向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与五年前的广州之役有所不同，这又给孙中山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和信心。

联络学界

惠州起义失败后，由于清朝政府的通缉，加之港英当局对孙中山的禁令没有解除，孙中山既无法进入内地，也难以利用香港作为谋划革命的大本营，只好返回日本，等待时机。1900年11月，孙中山到横滨，重新过着流亡政治家的生活。

孙中山重返横滨之初，身边只有尤列和郑士良二人。尤列在几年前来此联络华侨，一直侨居在这里，孙中山抵达横滨以后，就和他住在一个寓所里，朝夕相处。郑士良自惠州起义失利解散起义军余部后，也经香港回到横滨，追随在孙中山的左右。兴中会的其他骨干成员，陈少白仍然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杨衢云则不顾清廷追缉的危险，自愿留住在香港，以教书度日。

杨衢云是兴中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正在香港一所学馆的教室里给学生上课，突然，一位三十多岁的陌生人闯进学馆，走到教室门口，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对准杨衢云连开两枪。杨衢云未来得及反应，便中弹仆倒在地下。当学生们冲出教室捉拿凶手时，凶手已经逃走。该杀手名叫陈林，是清廷两广总督德寿花钱雇用他来行刺的。杨衢云被人救起，血流不止，立即送往香港皇家医院，第二天清晨，在医院病逝。

孙中山得知杨衢云被刺身亡，悲痛异常。他召集了横滨的同志，为杨衢云举行追悼会，同时向中国和海外发了讣告。在孙中山的倡议下，不少同志解囊捐款，共得二千余元，转交给杨衢云的亲属，以表达对亡友的哀悼和革命同志遗孤的关怀。杨衢云之死，使孙中山失去了一个政治上的挚友，也使兴中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同年8月，奉命去香港进行组织联络工作的郑士良，一天晚上去参加友人的宴会，在回寓所的途中，突觉头晕，随即倒地死亡。后来有人说是中风死亡，也有的说是清政府派人在食物中下了毒药所致。

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接连失去了两位忠诚的革命战士，兴中会的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孙中山面对战友凋零，组织涣散。举目回顾，前途茫然的现实，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没有被困难吓倒，决心调整计划，重新布署。

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他与尤列再次讨论了今后的打算。孙中山对尤列说：“针对目前的情况，我们的革命事业要实行两个方面的计划，一是联络学界，一是开导华侨。”这个新策略的确立，对孙中山跳出兴中会的狭小天地，而在更宽广的背景下思考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调整组织力量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实，早在1899年，孙中山便开始和中国留日学生接触。当时正是孙中山与梁启超谋求兴中会与维新派的合作之际。那时，为数不多的留日学生中，一些有志改革、关心政治的青年很乐意与孙中山交往。但那时孙中山并非主动与留学生交往，并且，那些最早与孙中山接触的留日学生，多数是倾向维新改革的有志之士。因此，孙中山没有过多地用心接触留日学生。

孙中山主动与留学青年接触，是从支持创办《开智录》开始的。《开智录》是留日学生用油印出版的旬刊，规模很小。1900年夏天，孙中山为了支持它出版，曾经捐助印刷费二百元，改用铅字排印，从而扩大了这份刊物的影响。

然而，孙中山真正把接触留日学生作为革命的新策略，则是从1901年开始的。他最早接触的一批人是1901年成立的“广东独立协会”成员。他们与

孙中山的联系虽然可能出于同乡感情，共同语言多一些，但交流的内容却是主张广东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等政治性问题。孙中山及兴中会的一些会员对这批学生接待热情，对他们的活动也多方予以赞助，后来，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成了具有反清革命理论思想的激进分子。

此后，孙中山与东京留学生也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有过直接与间接的交往。他资助经费支持留学生创办《国民报》；署名赞助章太炎等人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率领横滨华侨数十人去东京赴会；当《湖北学生界》创刊前，该刊的几个发起人都曾得到孙中山的指导。该刊出版后，各省籍的留学生纷纷创办以省区命名的刊物。这些受到孙中山支持的刊物，是当时最激进的宣传阵地，在促进留学生的思想进步与演化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03年4月，沙皇俄国拒绝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新要求，企图永久霸占东北。日本留学生五百余人在东京举行大会，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行。会后，中国留学生们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从事军事操练，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清政府害怕留学生闹事，请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东京拒俄义勇队。义勇队便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并在宗旨上将拒俄御侮更改为革命排满。不久，又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一是鼓吹，二是起义，三是暗杀，并分派人员回国到各省策动起义。

但是，留学生的拒俄运动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效。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然而实际上缺乏坚实的领导核心和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在思想上虽然痛恨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也认识到满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但仍然寄希望于政府抗俄。一旦面对清政府的压制和内部队伍的分化，军国民教育会即不知所从，陷于瘫痪，以致留学生运动处于群龙无首的困境。

后来，取而代之的有各省的留学生同乡会。但同乡会的地域观念浓厚，各自为政无法统一。当时的留学生会馆号称管理全体学生，然而它仅仅是一个事务性机构，不具有统率的作用，没有号召力。

这一切，使得中国留日学生虽然已经高呼起“革命不可避免”的口号，但却无法在革命思想指导下形成革命组织，留学生运动实际上出现了人自为战、省自为战的状态。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意识较强的那些留学生唯一能够选择的革命英雄。孙中山则抓住这个时机，在留学生中加强宣传发动工作，与留学生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拒俄运动前，来拜访孙中山的人数不多，可称志同道合的则更少。拒俄运动后，情况完全不同，留日学生来访者络绎不绝。由于从东京到横滨的学生往来频繁，孙中山的寓所里经常是座无虚席。

一天晚上，中国留日学生何香凝和廖仲恺一同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他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他们早就渴望能见到孙先生，但是一直没有会面的机会。孙中山在聚会上谈到：“中国积弱太甚，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

留学生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何香凝与廖仲恺拦住孙中山，有点腼腆地问道：“孙先生，改日我们再登门请教可以吗？”

孙中山亲切地说：“欢迎你们来。”并告诉了他的住址。几天以后，何香凝、廖仲恺按地址来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了孙中山。这是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孙中山热情地与他们握手、问好。刚一坐下，

话题就从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开始了。

孙中山与他们谈得很融洽，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戊戌政变、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非进行反清革命不行。何香凝、廖仲恺听孙中山说了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非常佩服，十分赞成。

后来，他们又到“下宿屋”去过两次，对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薄之力。孙中山指示他们：“你们可以先在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何香凝、廖仲恺便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的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孙中山在与留学生接触中，除了向他们分析形势，讲述革命道理外，还希望他们参加结社，等待时机。当时私费留学生中有的想学习军事知识，由于清政府禁止他们进入日本军事学校学习而感到失望，便请求孙中山给予帮助。

孙中山向来重视武装斗争，十分支持这些学生的想法。他结交了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在东京的一个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以日野为校长，聘请了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传授军事知识及枪炮火药制造方法，尤其注重散兵战术和以寡敌众的夜袭法。

入校学习的学生共有十四人，入校时，由孙中山主持宣读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的誓词后来成了同盟会十六字纲领。

正是在孙中山的刻意努力下，相当多数的留学生已经在思想上由爱国逐步转向革命，并开始向孙中山靠拢，其中一批思想激进的活跃人物更把孙中山看作革命的前驱。革命思潮在留学生中迅速扩大，进而影响到国内和世界各地。

痛斥保皇党

惠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处于十分不景气的状态。檀香山兴中会为保皇派所左右，香港兴中会人员星散、会务停顿，唯有《中国日报》一块宣传阵地苦苦支撑，横滨兴中会名存实亡，南洋兴中会寂然无闻，台湾兴中会无所表现。

但这时保皇派在海外的活动却极为猖狂，他们积极创办报刊，进行反对革命的宣传。在横滨有《新民丛报》，在檀香山有《新中国报》，在新加坡有《天南新报》，在加拿大有《日新报》，在旧金山有《文兴报》，在纽约、香港、澳门都有报纸，其阵势远非兴中会所能比。他们针对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发表各种谬论，宣扬保皇立宪，歌颂清帝的“圣明”。

各地华侨对“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说法，一时真伪莫辨，多受其欺骗。1900年前后，各地兴中会组织倒向保皇会或被分化瓦解者不在少数，连檀香山兴中会也被拉了过去，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一度上当受骗。

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篇累牍发表了长达十多万言的《新民说》一文，提出所谓“提高人民思想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主张，用荒谬的逻辑把清政府的昏愤无能，归咎于人民愚昧，企图混淆视听，达到保皇的政治目的。

9月，康有为在《新民丛报》发表《辩革命书》一文，居然把人民反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革命说成是“生内讧”、“创大难”，表现出他对革命运动的畏惧与仇视。

10月，梁启超又发表了《警告当道者》一文，为腐朽的清王朝出谋献策。

其它各地的保皇报纸也随声附和，竭尽全力，进行各种欺骗人民的蛊惑宣传。

1903年9月26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自1896年离开檀香山，已经相距八年时间。故土重来，风光依旧，依然是迷人的海浪、沙滩和整洁的林荫大道。但所见所闻，却使孙中山大出意外。檀香山各埠兴中会会员在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宣传下，思想上已完全模糊了革命与保皇的区别，很多人都奉行君主立宪主义。在行动上，他们拥护保皇党，并以保皇党为革命党。在组织上，兴中会已沦为保皇党的附庸。不少兴中会员又加入了保皇会，而兴中会的名称则很少有人提到。

种种景象，使孙中山百感交集。檀香山是孙中山的第二故乡，亲朋故旧，为数众多。这里也是孙中山组织华侨、建立海外兴中会的始创之地，具有革命发祥的象征意义。仅仅八年时间，竟被保皇派破坏得面目全非，这不能不使他彻夜难眠。

同年12月，孙中山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长期以来，我们只注意发动武装起义，没有抽出精力谋划海外华侨中的宣传组织工作，使得保皇派如此猖狂，这个失误是无法推辞掉的。”由此可以表明，孙中山这时已经从现实教训中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巩固海外组织的重要性，并且要把革命宣传活动放在重要位置上来考虑。

孙中山首先来到夏威夷群岛第二大埠希炉，着手恢复兴中会组织。兴中会会员毛文明，任希炉教堂的宣教师，曾经组织过演说会，宣传革命大义，驳斥保皇派。听说孙中山已到檀香山，立即派人将中山先生接到希炉。孙中山的到来，在希炉引起震动，群情踊跃。孙中山在毛文明的安排下，到希炉的

日本戏院发表了演说，听众达数百人之多，戏院内座无虚席。演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即就有十余人加入了兴中会。于是，希炉开始建立了兴中会革命团体。

在希炉的第一次成功演说，给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在檀香山的华侨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03年12月中旬，孙中山应兴中会骨干李昌、何宽的邀请，返抵檀香山正埠火奴鲁鲁，受到各界华侨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火奴鲁鲁的荷梯里街戏院和利利霞街戏院举行的两个欢迎会上，分别发表演说，比较系统地开始了反击保皇论调、宣传革命主张、教育华侨的斗争。

孙中山的每场演说，听者都达数千人，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地的报纸新闻中称誉孙中山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演说家。每次讲完以后，孙中山都站在台上，对听众说：“诸位侨胞还有不明白我讲的内容吗？如有，请提问。”听众中提问题的人很多，孙中山均当场迅速地给以耐心的回答，直到弄明白为止。

孙中山在这两场演说中，对于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清政府难以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是反对专制、免遭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革命胜利后如何建立民主共和国等问题，作了重点阐述。孙中山庄严宣告：“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万万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清王朝。”

在演讲中，针对保皇派认为民智未开、中国只能立宪不能革命的论调，孙中山历数了清王朝实行的种种专制愚民政策。他面对着数千名凝神听讲的群众，在讲台上斩钉截铁地说：“昏昧无能的清朝政府，断难实行君主立宪政体。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

孙中山有意控制了自己演讲的节奏，稍微停顿了几秒钟，又抑扬顿挫地说道：“关于革命成功之后的政体，中国各大行省如美国的各个州，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位治理众人之事的总统。”他手臂向前一伸，兴奋地说：“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雷鸣般的掌声在戏院里久久回荡。孙中山的演说使保皇党十分恐慌，他们利用宣传工具，加紧了对革命党人的攻击。在梁启超的授意下，保皇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新中国报》的一名副主笔充当打手，在报上诽谤孙中山，甚至不顾法律责任，诋毁孙中山的名誉。他们也发表演说，从中阻挠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活动，抵消他在华侨中的日益深刻的影响。

孙中山针对保皇派报纸的欺骗宣传和煽动攻击，决定针锋相对，加强革命舆论宣传，反击保皇毒焰。孙中山有一亲戚程蔚南，其时正在檀香山正埠经营一份宗旨不明的旧式报纸《檀山新报》，孙中山准备以此为基础加以改组。程蔚南欣然同意，积极准备改组事宜。于是，孙中山一面致书聘请主笔，一面亲自撰文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与保皇派的《新中国报》展开了笔战。

针对华侨中深受保皇派“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论调，孙中山首先写了《敬告同乡书》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文章剖析了康、梁组织保皇会的真实目的只是从个人境遇出发，报“知遇之恩”。孙中山请大家读一下康有为所著的《最近政见书》。在这封书里，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

孙中山以幽默的笔调尖锐地指出：“康有为的保皇心迹已说得如此明白，大家再要说他是以此来实行革命，这不是诬害他吗？”

在保皇派阵营中，梁启超能言善辩，才华横溢，是一个有名的笔杆子。他写的文章很有迷惑性，在各地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谬论，欺骗了众多的华侨。

孙中山在文章中对梁启超的言论进行了分析批驳。指出，梁启超在人心所向、思潮急激的形势下，忽而革命，忽而保皇，忽而爱真理超过爱老师，忽而爱民众超过爱皇帝，就如病人说梦话一般。其实，他与康有为是一鼻孔出气，比康有为赤裸裸的保皇更加恶毒。孙中山在文中对康、梁痛加驳斥道：

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如敌国。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总之，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

孙中山在檀香山以革命思想反击保皇谬论取得了显著成果，保皇会心犹不甘。《新中国报》的副主笔在该报发表《敬告保皇会同志书》进行反扑，与孙中山争夺华侨。为此，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报书》，针锋相对，逐条批驳。揭露保皇党标榜“爱国”，其实“所爱之国为大清国”，“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并批判了所谓革命可召瓜分的谬论，认为“若人心日醒，发奋发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

孙中山还在文章中批判了先行“立宪君主”才能“立宪民主”的谬论，指出凡事应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如同中国初造火车应取最新样式一样，破坏专制政治后也应该采取民主共和的“善政”。

孙中山在檀香山与保皇派的激烈论战，使不少华侨认清了康、梁的保皇面目。华侨中不少以往对保皇派认识模糊而误入保皇会者，纷纷登报脱离保皇党。至1903年底，在檀香山的正埠火奴鲁鲁和希炉两地，已基本肃清了保皇党的流毒。很多受骗的爱国华侨读了孙中山的文章以后，耳目为之一新，重新集结在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之下。

檀香山再次成了革命党人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据点。

加入致公堂

孙中山在檀香山击溃了保皇势力，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组织后，情绪饱满，抽空回到了茂宜岛与阔别多年的家人团聚。在家中，孙中山一面为亲友治病，一面在亲友中做革命宣传工作。

母亲杨氏见孙中山常年在外奔波，十分劳累，心疼地劝他：“革命的目的在于救人，行医的目的也是救人，同样都是救人，你何必东奔西跑？”

孙中山听后一笑说：“母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革命能够救中国亿万大众，而作为一名医生，只能救很少的人，我志在革命，一定要坚持下去。”

孙眉也在一旁说道：“我弟弟奔走革命多年，应该始终如一，岂能轻易变更，半途而废。”

母亲见孙中山弟兄意见一致，也就不加劝阻了。

一天，孙中山的舅舅杨文纳来看望孙中山，二人便聊起来，孙眉也在座。孙中山说了他想去美洲的想法，不无顾虑地说：“美洲是保皇党的巢穴，特别是加拿大、美国，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保皇会遍及各埠，开展工作难度比日本更大。”

杨文纳建议道：“要想到美国活动，最好先取得夏威夷的出生证书，因为保皇党很可能在暗中运动美国有关方面阻止你登陆。”

孙眉赞成杨文纳的意见，只是孙中山对此举有点犹豫。杨文纳劝说道：“古人成大事者，多能因势而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救国，何必拘泥于在什么地方出生呢？”于是，孙眉找到了几个广东老乡作证，在茂宜岛取得了该地的出生证明。杨文纳又建议孙中山：“如今保皇党机关在美洲各大城市都有，倘若能与洪门会人士合作，对你的工作将极为有利。”舅父的话正合孙中山的心意。在此之前，孙中山就有加入洪门会的想法，他认为革命党与洪门会志同道合，应联合他们共同行动。

洪门会又名天地会或义兴会，在美洲则多称致公堂，创于清康熙年代。明朝灭亡后，明末的一些忠臣义士，出于对满清残暴统治的不满，屡起反抗，誓不为清廷服务，便创设了这样一个组织，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哥老会、三合会都是它的支派。哥老会在长江沿岸各省，三合会流行在福建、广东一带。在南洋、美洲则称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凡有华侨居住的地方都设分堂，成员很多。

孙中山听从了舅父和哥哥的建议，从茂宜岛回到檀香山，由洪门会的一位头目介绍入会，加入了致公堂。檀香山致公堂为孙中山入党特地开台演戏，举行拜盟仪式，由主盟入封为洪棍，即相当于军职元帅。

1904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赴旧金山。果不其然，檀香山的保皇党分子探知孙中山将赴美，即电告旧金山的保皇党设法阻止他入境。

旧金山的保皇党找到清廷领事何佑，由何佑向美国海关处发出照会：“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

当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港口，海关人员检查护照时，发现他持有夏威夷的出生证明，就先把他留在船上，然后向清领事何佑说明。何佑极力阻挠说：“孙某生长在广东省香山县，所持护照必为伪造。”海关处一时难以定夺。就把孙中山拘留在码头上的一间木屋子里。

根据美国海关规定，凡是中国旅客护照有问题的人，或原船遣回，或拘禁在这间木屋里。海关处将此事报告了移民局，移民局勒令离境。

孙中山正焦急无奈，从同时被拘禁的一位侨胞手里的《中西日报》上偶然见到了“伍盘照”这个名字。经过回忆，他想起九年前广州起义失败出国时，有人给他写过介绍信，要他在旧金山有困难时可找伍盘照。这封信一直放在他的行李箱中。

于是，他给伍盘照写了一个便函：“现有十万火急事待商，请来木屋相见。”伍盘照见信后，当即到码头来见了面。孙中山述说了事情经过，并取出当年那封信。伍盘照看过后表示：“我一定设法协助。”

伍盘照一面以清领署顾问的身份与领事何佑周旋，一面访问了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等人。伍盘照说：“孙中山既已加入洪门会，本埠致公堂应该出面上诉。”

黄三德已经接到檀香山致公堂发来的准备接待孙中山的电文，听说孙中山入境受阻，便带了一名致公堂的顾问律师来到码头的木屋见了孙中山，并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顾问律师向移民局声明：“孙某乃檀香山籍民，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故被本国政府指名通缉。如今中国领事阻止他入境，其实是损害了檀籍人居留美国的权利以及美国可以容留国事犯的法律。”律师同时向华盛顿的政府有关部门上诉。致公堂又将一幢楼房向保单公司具保五百元，将孙中山保出，等待结果。

孙中山住在致公堂公所，与上下关系都处得比较融洽。三个星期以后，旧金山移民局奉华盛顿工商部的电令，放孙逸仙入境。保皇党和清领事企图阻挠孙中山入境的阴谋宣告失败。

孙中山依托致公堂，在旧金山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首先建议黄三德改组《大同日报》。该报是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原由保皇派分子欧榘甲任总编辑，欧在报上发表攻击孙中山的言论。黄三德听从了孙中山的意见，取消了欧的总编辑资格，请孙中山推荐的革命党人、留日学生刘成禺接任。刘成民主持《大同日报》后，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指导下，使《大同日报》成为旧金山的革命号角。

接着，孙中山便与黄三德、伍盘照商量，要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这是当前的首要工作。孙中山说：“可以将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多印刷一些，向美洲、南洋等地的华侨广为散发。”黄三德积极联系，请《中西日报》社义务印刷，邮费由致公堂捐助。《革命军》一书共印了一万多册，华侨极为欢迎，在此书激发下，革命情绪普遍高涨。

在此基础上，孙中山便着手发展兴中会组织，同时在华侨中筹款。他把在檀香山印好的革命军需债券向华侨推销。在兴中会的筹饷大会上，孙中山系统地宣讲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和主张，号召爱国华侨购买革命军需债券，支援兴中会在国内起义。当场即有人踊跃购买。

在孙中山到来之前，旧金山的洪门会员由于受保皇党的迷惑，不少人参加了保皇会，忘记了“反清复明”的宗旨，旧金山致公堂似乎成为单纯的华侨互助团体。由于孙中山加入致公堂，洪门会获得了新的政治生机。为了使这一历史性的反清大团体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孙中山向首领黄三德等人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使会员们在明确会议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一方面使它能够正本清源，肃清保皇党的流毒和影响，另一方面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同时为准备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军饷。

致公堂首领们非常赞同孙中山的主张。黄三德说：“美洲洪门会员约有十五万多人，如能动员起来，不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孙先生还需费力操持才是。”

孙中山满口答应：“我愿意亲自到美洲的各埠演讲，争取更多的华侨支持革命。”

孙中山着手为洪门会编写了新章程，共分八章六十七条。新章程发挥了“两反一维护”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革命精神，即反对满清卖国政府，反对保皇党破坏革命，维护国外同胞的生活安全。它一方面保留了一般民间团体的团结互助的会例，一方面注入了革命性的政治内容，甚至把兴中会的纲领引列其中。如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逐异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致公堂这一古老的民间组织，能在自己的章程里写上这样鲜明的政治口号，确实是别开生面。这就把洪门会原先单纯的“反清复明”的封建性的宗旨，上升到民主革命的新高度，使这一组织能在革命战争的风暴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孙中山帮助洪门会改组的过程中，保皇党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利用各种手段，造谣诬蔑，血口喷人，攻击孙中山，诽谤革命党，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达到目的。孙中山以中国革命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的声望，取得了海外广大侨胞的信赖，并一跃而登上了声势浩大的致公堂组织的最高层，从而把他的革命思想、政治纲领透渗到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中，这是保皇党所无法企及的。

1904年5月，孙中山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一行从旧金山出发作巡回演讲，途经洛杉矶、华盛顿、费城、芝加哥等几十个城市，最后到达纽约，在美国绕了大半圈。每到一处，黄三德都组织洪门会新会员的入盟仪式，孙中山则发表演说，宣传致公堂反清的宗旨和今后革命救国的政治使命，驳斥保皇谬论。辗转数月，使这些城市中的华侨倾向革命的逐渐增多，政治大宣传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纽约，由黄三德介绍，孙中山结识了美国友人麦克威廉斯。麦克威廉斯建议孙中山写文章，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孙中山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因为中国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夕，革命风潮将以日益增长的威力与速度出现在中国大地，为了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并希望得到各国道义上、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持，有必要向欧美国家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不久，他离开纽约到达美国的中部城市圣路易，用英文写成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很诀，美国朋友麦克威廉斯便在纽约出资印成一万多册单行本，书面用汉字自题“革命潮”三字。此书后来由旅日华侨学校的二位教员译成中文，以公民俱乐部名义，印成中英文合刊单行本，分销海外各地，影响很大。

孙中山的这篇文章，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政论文献，代表着中国当时的先进政治观点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的原因和必胜的条件，以及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该文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远东”，“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他说，“纠纷的根源在于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而“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孙中山申明，“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决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己”。文章警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殖民政策只会给自己带来危

险与灾难，支持清政府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孙中山在文章中还把清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对立关系从历史和现状上作了说明，指出满清王朝是用残酷屠杀数百万人的血腥手段建立起政权的，而且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统治之下，中国人民所经受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孙中山以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立场，从阶级实质上总结了清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统治人民的十一类政治特点，进而指出：当前，全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国人民有信心把满清君主政体经过革命改变为中华民国，因为满清政府不仅政治上已经彻底腐朽，而且军事上也不足以与革命派匹敌。因此，满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对于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政治前景及其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孙中山作了如下的描述：

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

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也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

尽管孙中山在这篇文章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非常恳切地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和同情，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孙中山在揭露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对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血腥统治，在经济上的残酷压榨，在生存权利上的任意迫害杀戮等罪恶方面，则是全面而深刻的。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推翻和埋葬腐朽的清王朝以及想瓜分中国的外来侵略者。这一点，孙中山代表四万万同胞，喊出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定要结束封建制度和殖民统治，创造一个新时代的愤激之声。

访第二国际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离开纽约，前往英国伦敦。

在旧金山任《大同日报》主笔的湖北学生刘成禺，写信告诉正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贺之才等人：“中山先生正在伦敦，你们可与之会晤。”并给他们写了会见孙中山的介绍信。

贺之才等人是1903年冬季由湖北当局派出留学的。他们倾向革命，热心国事，早就仰慕孙中山，渴望见面求教。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后，这几个青年学生读书之余总是经常谈论革命，清使馆发现后曾将他们管禁过几个月时间。现得知孙中山正在伦敦，贺之才就把刘成禺写的介绍信连同约请中山先生赴比利时的邀请函一起寄给了孙中山。

隔了一段时间，贺之才收到了孙中山的回信：“因外出作短暂旅行，未能及时答覆，请原谅。承蒙邀请，愿意来比利时一游，见面再叙。”

贺之才知道孙中山资金缺乏，就和留法、留德的学生联系，共同筹集了一笔经费寄给孙中山，并约定了来比利时的日期。

1905年5月初，中山先生乘船到了比利时的奥斯坦德码头。中山先生身穿皮领大衣，健步下船登岸，贺之才等三人已在码头迎接。中山先生紧紧握住贺之才的手。贺之才介绍旁边一位青年：“这是朱和中，是留德学生，特地从柏林赶来拜见先生。”孙中山忙说：“谢谢，你们辛苦了！”贺之才又指着另一位说：“这位叫李蕃昌，是我的同学。”中山先生点头致意。

走出码头，四人先乘马车来到了一个小旅店，稍事休息，又转乘火车到了布鲁塞尔。在车站受到二十多名留学生的列队迎接。孙中山十分高兴，亲热地与他们来到早已由他们安排好的寓所。

此后，孙中山与贺之才等人连续畅谈三日三夜。这些意气风发的留学青年，聚集在一起，亲聆革命首领的教诲，个个情绪激昂。

第三天晚上，留学生们设宴招待孙中山。几杯香槟酒下肚，大家谈兴正浓。孙中山站了起来，热情洋溢地说道：“革命的方略已定，请各位再发表关于建国的想法。”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孙中山见夜色已深，请大家暂停争论，胸有成竹地说：“已经讨论了三天三夜，今晚应该作一结束。”

贺之才问：“先生有何想法吗？”

孙中山笑了笑，望望大家兴奋的脸庞，以征求的口吻说：“我提议组织一个革命团体，名称待定，愿意参加的可宣誓。”

朱和中当即答应：“我辈既然决心革命，什么都可以牺牲，还害怕宣誓吗？”

孙中山高兴地说：“好吧，我做监誓人，就从你开始！”他吩咐贺之才：“拿纸笔来，我先书写誓词。”

孙中山接过纸笔，便一气呵成写出：

立誓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宣誓书写好后，朱和中与贺之才相视一笑。孙中山问：“你们笑什么？”

朱和中答道：“康有为、梁启超常说先生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可见康、梁是在诬妄先生。”

孙中山慨然一笑：“我也读书破万卷。”

于是从朱和中开始，逐一宣誓。此后，又有人陆续前来宣誓，一共有三十余人。誓书交贺之才收存。孙中山还与他们商定了暗语：

问：从何处来？

答：从南方来。

问：到何处去？

答：到北方去。

问：贵友为谁？

答：陆皓东，史坚如。

至于秘密手式，则用骈指交勾握手法。

在布鲁塞尔，孙中山还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那便是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那是 1905 年 5 月的一天，孙中山西装革履，目光炯炯有神，与中国留学生贺之才一道，来到第二国际书记处。

第二国际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 1889 年创立的，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工人运动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泛滥起来。对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在一间光线充足、陈设豪华的会客厅里，第二国际书记处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胡斯曼会晤了孙中山。在座的除了贺之才之外，还有闻讯赶来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记者桑德。

贺之才介绍说：“这是中国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特来拜会二位书记处领导。”

宾主互相寒暄了几句，孙中山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布鲁塞尔，是我欧洲之行中的计划之一，主要目的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加强革命的宣传工作，同时扩大我革命党的影响，今天拜访二位，是为了请求你们接纳我们的党为第二国际成员。”

孙中山流利的英语和不凡的气质使王德威尔得、胡斯曼暗暗吃惊。他们二人目光对视了一下，又会意地点点头。继而，胡斯曼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那么，您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

孙中山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风趣地说：“此行就是与你们联系，向你们介绍我党的情况嘛，也许是我们党的影响还不大，没能引起第二国际的重视吧。”

“孙先生，那就请您先谈一下你们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纲领，好吗？”王德威尔得说。

“好的。我们的目标和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说完，又用英语对这几句话作了通俗的解释：“尊敬的主席和书记同志，我们革命的目标，第一就是驱除帝国主义走狗满族统治者，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是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第三是核定地价，由国家照价收税，必要时照价收买。”

孙中山话未落音，王德威尔得插话说：“亲爱的孙同志，请您再谈谈贵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组织形式吧。”显然，他们对孙中山所谈的话题兴趣不大。

孙中山略微皱了一下眉头，没有显露出任何不愉快的神色，继续侃侃而谈：“中国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些不一样。他们虽然目前还没有像欧洲工人那样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可中国工人一点也不笨。他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先进的机器来进行生产，但是要避免机器生产的种种弊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记者桑德出于职业敏感，似乎对孙中山所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他迅速地作着记录，抬起头问了一句：“请问孙先生，你对于你的祖国很有信心，是吗？”

孙中山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实现社会主义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时，我们将已经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

孙中山瞟了第二国际书记处的两位领导人，接着说：“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

看来，第二国际书记处的这两位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因此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孙中山的演说，而很少插话。胡斯曼只顾低着头在一个精致的大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而王德威尔得可能是由于昨夜没睡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呵欠。

“亲爱的孙中山同志，关于您要求加入第二国际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能给予肯定的答覆，这需要在第二国际和有关会议上慎重地研究。我看以后再说吧。”胡斯曼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伸出手来，同孙中山和贺之才握了握。这等于是下了一个文明形式的逐客令。

从第二国际书记处的办公楼里出来贺之才便愤愤地对孙中山说：“这两位老爷，对我们中国的革命事业采取这样冷冰冰的态度，跟他们谈了半天，我看是嘴上抹石灰——白说了。”

“既然他们答覆说要慎重研究，那我们只好耐心等待以后再说吧。”孙中山还是不无希望地说。

等了一些日子，果然等不到第二国际书记处的答覆，孙中山十分失望。

布鲁塞尔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当即报道了孙中山与王德威尔得和胡斯曼的会谈。从而扩大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国际上影响。虽然会谈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但孙中山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革命党人却有着很重要的启迪作用。它表明了孙中山在主观上很早就认为自己领导的革命运动带有社会主义性质。

失望之余，孙中山又在谋划着下一步的行动。这时，他又收到了宫崎寅藏的来信，知道国内和东京反清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便决定结束这次欧美之行。他先在法国巴黎作了短暂停留，便从马赛港起程，再次返回日本去了。

孙黄聚会

1905年7月，孙中山乘轮船重返日本。

屈指算来，孙中山流亡海外，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这是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啊！他抛妻别子，奋不顾身，远涉重洋，奔走呼号于亚洲、欧洲、美洲各地。虽然腐朽的清王朝已经千疮百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要彻底推翻它，还须要有雷霆万钧之力才行，少数人的努力显然是无济无事的。

在漫长、炎热的印度洋航程中，孙中山经常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大海，凝神思索。他回顾了十多年来的革命经历，深深地体会到，要革命必须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成了空话。因此，发现爱国人才，延揽革命志士，组成革命大军，便当然成为这次东返的迫切任务。

孙中山这一次重返日本，整个革命形势正发展到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

在国内，自清政府1901年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又有所加深，社会经济日益凋敝，清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苟且偷安，成为帝国主义的鹰犬，不但割地赔款，助纣为虐，甚至与帝国主义分子结合在一起，镇压、剥削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生计日益艰难。有志之士中，都萌动着救国的热望，革命风潮此伏彼起。

自1902年起，各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如兴义三合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纪堂与原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领导的广州起义，王和顺为首的南宁地区农民起义，陆亚为首的柳州地区农民起义，黄兴和马福益领导的华兴会的长沙起义等等。

革命派一方面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一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革命的报刊书籍遍及国内外。上海、广州、长沙等地以及海外的东京、香港、南洋、美洲，创办了一百多种报刊，有日报，也有期刊，发行最多的达二万多份。通过这些进步报刊和宣传介绍革命的书籍，揭露了清政府对内残酷统治、血腥镇压，对外屈膝求和、出卖国家主权的种种罪行。同时介绍西方民主学说和革命历史，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加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一书在国内流传时，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争相传阅，孙中山先生的形象以及他为革命事业的奋斗精神在很多人心中扎了根，有的青年人恨不得立即破浪奔走海外，去跟随孙中山。

这一时期，革命团体也逐步兴起，在上海有蔡元培、章太炎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对俄同志会”，有龚宝铨等人的“光复会”。在长沙，有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在武昌，有刘静庵等人的“科学补习所”。在东京，有“共爱会”、“拒俄义勇军”（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等）。

就在孙中山返回日本的前后，各地起义会党和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有的因起义失败，有的为寻求真理，有的因彷徨观望，都纷纷到了日本。加之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日益增多，日本便成为当时革命力量汇聚的中心。

革命形势的迅速进展，广大人民的日益倾向革命以及许多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的出现，自然提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需要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使大家的目标和行动进一步一致起来，将革命运动更有力地推向前进。应该说，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孙中山最近一直思考的革向行动计划的最终落脚点是完全一致的。

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多，倾向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个人分散的力

量握不成拳头，形不成大气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华兴会的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虽然先后到了日本，但华兴会那时还缺乏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纲领，并且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会员们常以“湖南团体”自称，不能成为团结全部留日学生的核心。因此，许多人已在自发地商议，打算成立一个新的具有广泛凝聚力的革命组织。1904年底黄兴与湖南、云南、直隶、江苏、河南等地的一百多名留日学生组织了“革命同志会”，想藉此突破地域的限制，实现范围更广阔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则联合一部分各地来的留日学生，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从刊名和成员来看，也在尽力突破地域性团体的狭隘圈子。

稍后，黄兴、宋教仁认为革命的同志日渐增多，想成立一个会党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就找到熟悉留日学生情况的湖北官费生、安徽休宁人程家桢，与他相商此事。

程家桢是当时在日本的老资格留学生，从1899年入帝国大学农科学习至今。他参加过励志会、青年会，联名发起了拒俄义勇队，又是学生军和军国民教育会本部的主要成员。作为留日学界的著名活动分子，目睹过留学界的分化组合情况，并且他又是留学生中最早拜访孙中山并与孙中山有通信联系的少数人物之一，不仅熟悉孙中山，而且十分钦佩孙中山。他深知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界还难以找出一个能担任领袖的人物，便告诉黄兴、宋教仁：“最近接到孙中山先生从美洲寄来的信，他很快就要到日本来。孙先生为革命奔走多年，在海内外名声大震。我们何不等孙先生来到日本之时，奉孙先生为领袖，率领我们归国起义，以成大事呢？”

黄兴、宋教仁感到此话有理，他们也早就渴望见到孙中山，于是便接受程家桢的建议，盼望着孙中山早日到来。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到了日本横滨，一百多名留学生前来欢迎。几天以后，他又到了东京，首先去新宿访问老朋友宫崎寅藏。一见面，他就惊喜地对宫崎寅藏说：“真没想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增加了这么多人。”

宫崎寅藏一边安排孙中山休息，一边微笑着回答：“是啊，你来的正是时候，他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你呢！”

“你看这么多留学生中，有没有非同一般的学生？你有没有发现可以共图大事的英才？”孙中山急切地问。

“看你性急，贵国人才辈出，风云际会，怎能没有英才？”宫崎寅藏思考了一下说：“目前仅在东京，贵国留学生就有一万五千余人，其中颇有些英雄有为之士。依我所见，那位黄兴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好男儿，将来他可以成为你得力助手。”

“黄兴？他是什么样的人？”孙中山急切地问。

宫崎寅藏便向孙中山叙说了黄兴的情况。

黄兴字廛午，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874年生，比孙中山小八岁。他的父亲是湘中有名的读书人，很早就死了。黄兴早期受过较长时间的封建教育，十九岁中了秀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他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黄兴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汉族传统的民族主义在他思想上有着深刻的影响，看到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他感到极大的愤慨，产生了反满的思想。1902年，黄兴被清朝政府派到日本经文学院速成师范学习。和许多留学生一样，黄兴只得从事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宣传，对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来说，未免远水救不了近火。他性格比较实在，不多发言，但他把问题看清楚后，意

志就异常坚决。1903年，俄国强占东北三省，黄兴参加了“拒俄义勇军”。回国后，黄兴于1903年11月在长沙与一班志同道合者创立了华兴会并担任会长。他们联合了湖南哥老会头目马福益，计划于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举行起义，后来因为会员暗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遭当局搜捕而失败。

以黄兴为首创立的华兴会，是众多会党中成立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的一个革命团体。成立时，并没有成文的政治纲领，但他们主张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则与兴中会是一致的。在革命方法上，华兴会一开始就提出进行武装起义，他们主张从条件比较成熟的本省做起，不依赖别人，不消极等待，又尽可能争取和外省取得联系，避免孤军作战。

华兴会的成员，大体上都是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联络运动的对象，除学界以外，主要是会党和军队。

宫崎寅藏对黄兴和华兴会的情况看来知道得比较多，他对孙中山说：“黄兴虽然才三十来岁，可胸怀大志，文武双全，在日本留学生中深罕众望。去年华兴会在长沙密谋起义虽然失败，但仍不气馁。目前，他正在日本进行活动，联络同志，图谋再举。在他周围，还有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青年英才，实属难得。对先生您来说，这不是雪中送炭吗？”

“黄先生现住在哪里？宫崎君请快带我前去拜访他！”孙中山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

“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按说，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等着吧。”宫崎劝说道。

“革命哪能分年龄大小，讲究资格？还是劳驾你赶快带我去见他！”孙中山不以为然，连连催促宫崎动身。

“黄兴先生住在神乐坂。”宫崎见孙中山求才若渴，如此性急，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告诉孙中山：“黄先生早就对你十分钦佩，他知道你要来日本，已经来我家打听了几次。今天你们二位风云聚会，真不知他如何高兴啊！”宫崎说着，便急忙穿好衣服，和孙中山出门去找黄兴。

到了神乐坂黄兴住处，宫崎推开门一看，地上一大堆拖鞋，一帮学生围成一圈，正在热烈地谈论着。宫崎见屋里人多，便要孙中山在门外等着。他向屋里喊：“黄先生！黄先生！”

黄兴应声跑了出来。宫崎指着孙中山说：“你看谁来了？”

黄兴一眼认出来了，这正是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声名远播的兴中会首领孙中山先生，不禁脱口喊道：“啊，孙先生，你终于到了！”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当天中午，在东京有名的中国菜馆凤乐园楼上一间僻静的雅座，孙中山、宫崎寅藏和黄兴等人一边饮酒，一边畅谈。黄兴身材魁梧，相貌奇伟，留着浓密的短须，显得十分威武豪迈，性格却十分笃厚朴实。虽然与孙中山初次会面，可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

“论今日之形势，我以为当以联络人才，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为第一要义。如若各自号召，各自为战，则必然会形成秦末二十余国的互相争斗。如果各国列强乘机干涉，则中国必亡无疑。”孙中山不无忧虑地对黄兴说。

黄兴点点头，说：“先生所见极是。”

孙中山继续说下去：“此时若有数十百个有识有胆的俊杰之士出来联络、主张，一切革命前之筹划，革命后之建设，皆有人才分任司理，则革命一旦

成功，即可成立文明民主之新政府，天下大事从此定了！”孙中山十分兴奋，推心置腹地谈出自己的见解。

黄兴对孙中山的看法深表折服，兴奋地说：“先生所虑，与我如此吻合。现在，东京聚集着全国十多个省的留学生，如能联合起来，何愁清朝不灭、革命不成？”

随后，当孙中山提出兴中会、华兴会和其他革命组织要抓紧时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时，黄兴十分赞同。他们商量好了华兴会和兴中会合并的具体方案，共同举杯祝贺这次成功的会晤，才尽欢而散。

第二天，孙中山和黄兴来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晤了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青年革命志士。宋、陈二人也都是湖南人。宋教仁年轻英俊，才华横溢，谈吐不凡，在留学生中很有威信。陈天华用通俗文字写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和邹容写的《革命军》一样，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孙中山和这些年轻人披肝沥胆地交谈着。看着这些中华新秀，孙中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成立同盟会

孙中山与黄兴的会晤，导致并加速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址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班的成员。除甘肃省没有留学生外，全国各地十七个省都有人参加。到会的还有热心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人。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

孙中山当场发表了演说，说明了实行革命大联合所必要讨论的问题，如名称、政治纲领等，演说约一个小时，后由黄兴组织与会人员签名，以示正式加入组织。

接着讨论组织名称。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的主张称“对满同盟会”，有的认为本会属秘密性质，不必明用“革命”二字。孙中山表示“革命的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在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为“中国同盟会”。

关于组织宗旨，孙中山提出采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当讨论到“平均地权”时，有人提出了疑问。孙中山为此解释了很长时间，获得了通过。

在讨论中国同盟会领导人时，黄兴提议推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可不必经选举手续，大家一致赞成。于是，由总理拟定盟书，经会议公推由黄兴、陈天华两人审定。誓词全文如下：“联盟人某某省某某县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渝此盟，任众处罚。天运某年某月某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某某。”大家签署盟书，由孙中山领头，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发誓。在干部未选出之前，各人盟书暂由总理保存，孙中山盟书由黄兴保存。

誓毕，孙中山又分别散发会员暗号。孙中山还规定了会员相见的握手方式秘密口语——

问：何处人？

答：为汉人。

问：何物？

答：为中国物。

问：何事？

答：为天下事。

孙中山与会员一一握手礼，并欣然道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会议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热烈。忽然房后传来一声巨响，原来是由于全场人数过多，动作活跃，此房后部木板倒塌。孙中山风趣盎然地笑道：“这真是颠覆满清、革命成功的预兆。”众人鼓掌欢呼。

最后，会议推定黄兴、陈天华、马君武、宋教仁、汪兆铭等八人组成会章起草小组，约定在成立大会上提交讨论。

预备会议的圆满成功，为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孙中山到达日本横滨起，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在日志士的联合。这说明经过民主革命思潮的洗礼，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在这一联合过程中，孙中山作为联合动议的首倡者，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受到众人的拥戴和推崇，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民主革命派中的领袖地位。他的名字，从此真正地超越自我、超越狭隘的兴中会小团体而成了

中国民主革命派的象征。

黄兴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被公推为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而孙中山也把他看作具有号召力的领袖。孙黄并称的时代开始了。

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正式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这是孙中山到日本后第一次在盛大的留学生集会上公开露面，也是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夕，由他向广大群众宣布他们政见的重要政治活动。这一天，留日学生蜂拥而至，人数之多，出乎意料。到会的有一千三百多人，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几百人站在街旁仰望着楼上听孙中山演说，成为东京留学生及华侨空前的盛大集会。

在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了富有政治远见和强烈鼓动性的重要演说。一开始他就热情洋溢地对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做了充分的估计。他说：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

接着，他就充满民族自豪感地说道：“中国的文明，产生于五千年前，这是西方人所不信的，但后来有很长时间趋于保守，让西方人赶上了。但最近十多年来，思想界变化速度很快。以此速度推断，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在文明上，有的可能达到西方的水平，有的甚至可能超过西方。”

孙中山指出了中国迅速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

“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济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济即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乎，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

“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己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能事半功倍乎？”

孙中山在讲演中，热烈地号召中国人民要齐心协力，不惜一切代价，下定决心，谋求独立而建立共和。

孙中山的讲演持续了三四个小时，慷慨淋漓，句句打动人们的心坎，一再激起人们不绝的掌声，连参加大会的满族留学生也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支持革命党的主张。到会的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听了演说后，觉得中国的革命定能成功，对于亚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也会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8月20日下午2点，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一所日本朋友的寓所里正式召开，三百余名会员全部到会。

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会章草案，共三十条，经讨论修改后通过，会章以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宗旨。总部设在东京，在国外设分会。

最后，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这项建议，获得与会者鼓掌通过。至于具体的改刊办法留待下次讨论。后来，该报被定名为《民报》。

会议开到下午5点，在全场大呼“万岁”声中宣告结束。

大会选出的同盟会东京本部的职工是：

总理孙中山执行部：

庶务黄兴，后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相继主持。

书记（初定马君武，未就）田桐，后孙中山又增派胡汉民、但焘、李肇甫三人。

内务朱炳麟、匡一。

外务程家怪、廖仲恺。

会计（初定刘维焘、未就）谢延誉，后由何天炯继之。

经理谷思慎、程克。

评议部：

议长汪兆铭议员董修武、熊克武、于德坤、王琦、吴鼎昌、张树柟、冯自由、梁慕光、胡汉民、田桐、吴崑、但懋辛、周来苏、胡瑛、朱大符、范治焕、吴玉章、康宝忠。

书记朱大符兼。

司法部：

总长邓家彦。

判事张继、何天瀚。

检事宋教仁。

同盟会本部的机构，分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实际上，这是按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组建本部机构的，任当时，无疑是最为民主的权力制约机制。可以说，同盟会东京本部最初奉行的建构原则及其组织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兴中会存在的类似秘密会党的家长制色彩，改变了以往革命小团体存在的领导机构组织不健全的缺陷。它的产生，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一次理性飞跃。

遗憾的是，同盟会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坚持最初的“三权分立”体制，后来司法部被取消，评议部的立法职能被削弱，实际上实行的是“总理负责制”。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上了历史舞台。孙中山曾经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回顾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

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中，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眇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以三民主义为旗帜

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十六个字，是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誓词的继续和拓展。初次使用于1903年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的入校誓词中，后来一直为孙中山坚持使用于他所创建的革命团体。就此而言，中国同盟会与兴中会，尤其是兴中会后期的组织活动，在思想体系中是一脉相承的。

同盟会的宗旨，是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1905年11月29日由《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而成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正式发行。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对他的十六字纲领作了进一步阐述，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鲜明地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之后，孙中山又发表了一些著述，如1906年他与黄兴、章炳麟制定的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军政府宣言》——即《同盟会宣言》，同年12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对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虽然还有许多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有了这一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后，大大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促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

余惟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甘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怡化焉。

在孙中山看来，欧美的民族、民权、民生是历史的三个不同时代形成的。而中国现时则正处于欧美的民生主义时代。他认为，中国需要首先同时解决民族、民权二个时代的任务，紧接着再解决民生主义任务。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在二十世纪同时解决民族、民权主义，而后开始实行民生主义，所以这是与西方国家所大不相同的。他说：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邪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去之易……近时志士舌焦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姜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闻纵能比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未轨者，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迹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孙中山所说的这段文字，就是指将欧美三个历史时代的任务，在我们中国，于二十世纪一道完成。这就是孙中山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结合他多年对欧美社会的政治研究和社会考察而具体形成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

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其目标是推翻满族人当权的政府，重建汉族人当权的政府。在十六字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体现这种“民族主义”思想。从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时序来看，民族主义思想萌发最早。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

他，更不是要尽灭满洲民族。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因此，“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孙中山在阐述“反满”这一战斗口号时，在相当程度上扬弃了不少革命党人所持有的单纯“种族革命”的观点，并把少数掌握政权的满洲统治者与一般满族人民加以区别，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种族复仇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同时，反对腐朽卖国的清王朝也包含了打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内容。但是，他毕竟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的主张，因而不能科学地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本缺憾。

“创立民国”体现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也就是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认为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仅有民族革命还不能解决问题，推翻满清王朝的同时，还必须推翻君主专制。他认为君主专制主义是恶劣政治的根本，中国沿袭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社会的国民所能忍受的。他表示，“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告诫革命者，不能存有任何一点同情皇帝的思想，把国家当成是私人的财产，彼此相争，弄得国家四分五裂，自亡其国。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比较完整的共和国要求，同改良派的君王立宪主张截然对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战斗意义。但是，他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政体，而没有进一步提出清除这一政体赖以存在的社会阶级基础，即推翻地主士绅阶级的统治。

在提出民族、民权主义的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从关怀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出发，希望避免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的祸害，建立普遍幸福的一种主观社会主义，它的具体体现就是“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超越同时代革命者的最突出最有光彩的部分，也是孙中山作为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对国运民生殚精竭虑之所在。孙中山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则越突出，比如英国：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种社会问题，欧美已经积重难返。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候，要同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以免后来再来一次社会革命。他认为，欧美之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针对社会经济发达后地价高涨，地主垄断土地，危害民生的前景，他主张核定地主土地的现有地价，而将此后地价中因经济发展而增值的部分收归国有，这就是“平均地权”，这个办法并不包含稍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孙中山以为实行这个办法就能造成一个“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社会，这自然只是一种空想。但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也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人民苦难的真挚同情，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符合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生活改善的愿望。因此，不但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在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众多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推动了资产阶级反清爱国斗争不断向前发展，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广泛宣传，使保皇党人大为惊慌。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肆意攻击歪曲。

于是，孙中山又亲自领导同盟会中的一批有思想、有文采的热血青年，以《民报》为阵地，展开了对保皇党的反击。

在这段时间内，《民报》发表了很多战斗力强、有气势、有文采的重要文章。如朱执信的《论满政府欲立宪而不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心理的国家主义》，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等，堪称是革命的强音。孙中山曾口授汪精卫写成《革命不致招瓜分说》一文，驳斥了保皇党的“革命招致瓜分”的谬论。文章指出：如果不革命，国家越来越弱，反而会引起瓜分。帝国主义来了怎么办？回答是：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真是论理精辟，气势恢宏。

在《民报》的影响下，革命思潮席卷全国，革命刊物也瞄准了《民报》所指的方向，“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

在武装斗争的前线

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一面加强宣传发动工作，积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时还把极大的注意力集中在策划和组织反清的武装起义上。

1907年以前，孙中山以日本为中心，往返于南洋各地，宣传三民主义，发展革命组织，并指导国内的革命运动。清政府对孙中山既恨又怕，他们认为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主要是孙中山所起的作用。要想使革命风潮烟消云散，则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心腹之患。于是，清廷加紧了对孙中山的迫害。清廷驻日公使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企图使革命派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

1907年3月，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到了越南河内。在河内，孙中山计划发动一欠以广东的潮州、广西的钦州、廉州、广东的惠州为一线的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孙中山原计划在这几个点同时发动，彼此声援，给清政府以重创。但事态发展并没有按预期计划进行。

1907年5月22日，潮州黄冈起义首先爆发。起义军在赶制军旗、筹集军械时，有几个当地的乡绅向清政府告密，清军前来剿捕，起义军乘机先发。七百名起义者在晚上趁着月色攻入黄冈县衙，成立了“军政府”，但是，在清朝大队人马的围攻下，起义军只坚持了一周便失败了。

6月初，惠州党人在离城二十里的七女湖揭开战旗。一百多人面对众多的清军，显得势单力薄，终因孤立无援，在苦战了十二天以后，弹尽粮绝，只得将枪械埋于地下，宣布解散。

三个月以后，钦州、廉州一带的起义发动起来了。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孙中山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已经拿起武器的农民方面，却把希望寄托在镇压农民暴动的清朝新军的“反正”上。9月1日，几百名起义志士在五光山正式发难，四天以后攻占了廉州的防城。这时，假意许诺反正的新军统领背信弃义，派兵攻打起义军。起义军战斗十分勇敢，终因腹背受敌，寡不敌众，防城起义又告失败，义军退入广西边陲的十万大山。

过了三个月，孙中山又在广西边防要塞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了武装起义。如果从兴中会时期的广州起义算起，这已经是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第六次武装起义了。

镇南关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中，是广西通往越南河内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中法战争中，老将冯子材曾在这里重创法国侵略者。战争结束后，清军在这里重建了两层的关楼，还在关隘周围的山峰上，用大石块筑起了坚固的炮台。特别是镇北炮台，地形最为险要，山路陡峭，易守难攻，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孙中山选择在这里起义，主要是考虑到既便于从越南直接接济声援，又可与防城起义失败退入十万大山的队伍汇合。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孙中山亲自在河内设立了起义指挥部，部署这次起义。计划首先占领镇南关要塞，然后攻取南宁、桂林，占领广西，再分道进攻湖南，广东、江西，最后直捣北京，推翻腐朽的清政府。

1907年12月2日凌晨，孙中山派革命党人黄明堂率领同志八十多人，以绳索吊越断涧危崖，奇袭镇南关。革命军的炮声突然惊破了清军的好梦，等到他们在一片慌乱之中拿起兵器的时候，起义军在炮台哨官、同盟会员李福南的策应之下，很快就占领了镇北、镇中、镇南三个要塞炮台，缴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还有许多弹药。天亮以后，起义军的青天白日旗

在炮台上飘扬。士兵们还用旗语互相庆贺胜利。

镇南关大营的清军发现炮台让起义军占领了，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过了几个时辰，才拼凑起数百人向炮台攻击。打了半天。清军死伤累累，未占到便宜，便急忙调集援军，再图反扑。河内总部于当天上午接电：镇南关已被占领。孙中山大悦，兴奋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快作准备，我将亲赴战场！”

第二天，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负责人，带着一批同盟会员和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大尉狄氏等二十余人，从河内乘火车去谅山。

车厢里，没有其他乘客。中山先生由于久居河内，出门不多，今日驰骋于原野之中，又值镇南关起义捷报传来，心情舒坦地说：“我只有一个宿愿，就是先攻占中国最南端的镇南关，军队万里，施旗堂堂，然后贯穿中国的腹地，再出中国最北端的山海关。一到山海关，即可把爱新觉罗皇帝送到满洲老家去了。”

中山先生说完，哈哈大笑了一番。池亨吉将中山先生的话译给法国军官狄氏听，狄氏手臂一挥，三呼“快哉”！

傍晚时，孙中山一行到达那模村，在农家稍作休息，便请当地老百姓带路，点燃火把登山，至九点时抵右辅山。第二天，当孙中山冒着清军的炮火，来到镇北炮台时，正值起义军与清兵交战。起义军战士顿时士气倍增，越战越勇，很快就打退了清兵的又一次进攻。

黄明堂指挥起义军列队奏乐欢迎孙中山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孙中山望着战火硝烟中的起义勇士们，十分高兴地把带来的食品、水果分给大家。与起义军的官兵们一一握手。孙中山高兴地站在一尊德国重炮旁边，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简短演说：

“同志们！感谢大家这次奋勇举旗起义！我们要同全国同胞一起，把压在百姓头上的满清皇帝推翻，建立新的富强的共和国！四万万同胞都成为国家主人翁，享受独立自由之幸福。外国人再不敢欺侮我们了，大家都有田地耕种了！同志们！我们就要直向南宁、广州，北去长江，和全国同胞打到北京去！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是最得民心的军队，到处都会有人民来帮助，力量最大！清军必败！革命必胜！兄弟此次入关，就是和大家一起奋斗，使革命事业达到成功！”

孙中山说话既坚定有力，态度又和蔼可亲，起义战士听着孙中山的演说，都兴奋地鼓起掌来，气氛非常热烈。

随后，孙中山不顾危险，又亲自到镇中、镇南两个炮台视察，慰勉官兵，起义战士士气高涨。当孙中山回到镇北炮台时，清军又开始发炮攻击了。

“轰！”一颗炮弹呼啸而来，落在炮台前面不远处爆炸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弹片和被炸弹炸碎的石块、泥土，像一阵旋风似的猛烈泼洒过来。

敌人这次由于来了援军，攻势十分猛烈。配合着大炮的密集轰击，一二千敌军黑压压地朝炮台冲来。冲在最前面的，是敌人的竹梯队、药包队和马刀队，嘴里狂喊乱吼着，直往上冲。

起义军的大炮和机枪、步枪打响了，敌军中黑烟翻卷，乱成一片，很快躺倒了许多人，没被炸死的敌人刚溃退下去，又被敌军的督战队头目赶着回来，只得硬着头皮朝前进攻。

“先生，还是请您到炮台下的石室里去休息一会，这里十分危险！”戴近视眼镜的胡汉民一再劝告孙中山。

“我到镇南关，就是为了亲自参加战斗，怎么能从火线上撤下呢？”孙中山拒绝了。他拿起望远镜，命令炮手发炮，炮弹击中镇南关大营，孙中山高兴极了。接着，他又请法国退职军官狄氏指点，亲自燃放大炮。看到炮弹准确地敌阵中爆炸，他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想起自己这十多年被逐海外的流亡生活，以及为革命劳苦奔波的一幕幕场景，再回头左右环视这战斗的现场，孙中山兴奋感慨地说：“我这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亲自参加反清战斗啊！自反满清政府二十余年来，今日始得亲手发炮轰击清军！”

忽然，清军两发炮弹几乎同时落在炮台边上爆炸了，好几名战士被弹片击中，在孙中山身边倒了下来，有的当时就牺牲了，有的负了重伤。孙中山和黄兴也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落了一身碎石。

孙中山从地上站起来，发现身旁一名战士右胸中了一颗弹片，鲜血不断地从伤口流出来，已经昏过去了。孙中山连忙把他抱起来，解开衣扣，检查伤口，鲜血沾了一身。他喊胡汉民拿来药箱，亲自为受伤战士仔细包扎。这个伤员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孙中山亲自为自己包扎，十分感激，吃力地说道：“孙先生，我快不行了！您不要管我，要注意敌人的炮弹！”

“弹片打在右胸，你这伤可以治好，不会死的。我是个外科医生，你放心好了！”孙中山亲热地安慰伤员。包扎好以后，孙中山看到他的伤势很重，便马上命令两个战士把他送到越南境内去及时治疗。

孙中山一边为伤员包扎伤口，一边大声激励战士们勇敢战斗。经过一个多时辰的激战，清军在炮台前的山坡上丢下几百具尸体，余下的纷纷退回去了。

下午，孙中山和黄兴亲自带领几十名战士夺回了炮台附近的重要据点弄尧村。这是一个地势险要的小山村。村里的几十户人家都是壮族同胞。孙中山带着起义战士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宣传革命。当他看到村民的生活十分贫困时，满怀信心地对他们说：“我们革命党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满清王朝，那时大家都可以自由地生活，不受压迫，不受欺负了。”

壮族同胞听了孙中山的宣传鼓动，便与起义战士们亲热起来，村里有好几个青年参加了起义军，来炮台参加作战。还有不少农民兄弟主动给起义军送来干粮和水，还有的送甘蔗给战士们解渴。

傍晚，又有大批清军增援部队开到，并分兵占领了炮台附近的马骊山、四方岭、凤尾山、尖山等高地，架起大炮对起义军占领的炮台猛烈轰击。经过两三天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战士已牺牲了十几个人。

按照原定计划，起义军在镇南关与防城起义退驻十万大山的部队会合，然后会攻龙州。由于路途较远，十万大山的队伍未能及时赶来。孙中山与黄兴等人检查了一番枪械弹药，发现有些炮已不能使用，战士们的枪支也不多，弹药也越打越少，难以长久坚持。孙中山与黄兴商量，最终决定连夜下山，赶回设在越南的起义总部机关筹办粮饷，运来接济。

夜色苍茫，孙中山舍不得离开这战斗的土地。他感慨万千地说：“我十二年未踏上祖国的大地，现在高兴地踏在这个山上，真不愿离开。再说，看到同志们在这里浴血奋战，我怎么能离开他们呢？”

几天以后，正当孙中山返回河内，忙于洽谈借款和购置粮饷时，从前线传来消息，起义队伍经过数场血战，寡不敌众，被迫于12月9日撤离了镇南关，退往越南境内的燕子大山里去了。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毫不气馁，他继续在两广和云南边境燃起起义的烽火。1908年3月发动了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4月发动了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发动了广州的新军起义。这几次起义虽然集中了不少同盟会的精英，但都以力量悬殊、遭受惨重的损失而失败。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挫折，一次又一次的流血牺牲，使得一些革命者感到灰心丧气了。但孙中山坚信，革命形势正在成熟，只要继续奋斗，定然胜利在望。

血溅黄花岗

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政治局势发展得很快，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迅速激化，革命时机也正在日趋成熟。但同盟会的部分领导人和一些同盟会员对形势认识不足更由于多次战斗起义均告失败，特别是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使他们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以为推翻清朝的统治，似乎难于成功。有的革命党人悲愤至极，不愿从事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希望侥幸获胜，纷纷组织暗杀团体，进行个人恐怖活动。

但是，孙中山并不泄气，也不灰心，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成功的时机日益逼近，中国的命运已悬于一线。国内民心已经大变，新军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时机已算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对形势所作的判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孙中山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反复思考，决心在广州进行一次有充分准备的，同时也是破釜沉舟的起义。

1910年6月，孙中山到日本横滨，约黄兴谋划此事。轮船刚靠岸，黄兴立即跳上船去，两位革命领袖久别重逢，顾不上寒暄，很快就进入正题，谈起组织起义之事。之后，又秘密地在一家旅馆里对各种重要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取得了一致看法。

黄兴临走时问孙中山：“哦！对了，钱！您有钱吗？”

孙中山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海外为武装起义筹款，便回答：“是的，我有。”说着，把装满钱的皮箱指给黄兴看。

黄兴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像想起什么事情，又止住了脚步，说：“哦！对了，我最好还是给您留点，说不准有什么事就需要用。”他也顾不得点数，留下几束钞票给孙中山，就步履匆匆地走了。

当时房间里只有日本朋友萱野长知在场，他目睹了这两位革命领袖的情谊，说：“孙先生，你们二位对待金钱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所能做到的，这是难以达到的终生不渝的感情所体现的境界。”

孙中山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第二天，孙中山放心不下，化名潜往东京，秘密召集了黄兴、赵声等同盟会骨干，讨论再次起义的时机问题。

7月19日，孙中山来到马来西亚北部的槟榔屿。就在这一天，他的母亲杨氏在香港病逝。孙中山接到这个噩耗，十分悲恸。孙眉这时经济已经十分拮据，无钱下葬。孙中山只得急切地筹借了一千元港币汇去给母亲办了后事。夫人卢慕贞得知孙中山已由日本抵达槟榔屿，带着两个女儿孙姪、孙婉，由香港来到槟城，与孙中山团聚。孙中山久不见亲人，他摸了摸孩子的头，十分内疚地对夫人说：“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你们受苦了。”

卢慕贞看到孙中山消瘦的脸庞，心疼地说：“革命的事，我帮不上大忙，你多保重吧！”

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主持召开了一次由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和国内外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出席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等地的同盟会会员代表。会上，针对一些革命党人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情况，孙中山豪情满怀地鼓励同志们：

“一败何足馁。在以往的多年里，我屡遭失败，几乎在这个世界上无存身之地。与今日相比，其困难要大百倍。当前，革命风潮已经兴盛，华侨的

思想已经开通，从今而后，所虑的是我们有无战斗的勇气和周密妥善的计划。我们要鼓起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事。只要我们作好充分准备，革命便可成功！”

孙中山的信念强烈地感染和鼓舞了大家，黄兴、赵声等都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主张。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确定了仍把广州作为起义地点，先作好筹集巨款的准备工作。并决定起义仍以广州的新军为骨干，因为广州的新军中有着较好的基础。另外挑选五百名革命党人充当“先锋”。计划在占领广州以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在长江流域各省运动清军反正，届时响应，会师北伐。

孙中山认真总结了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发动这次广州大起义之前，他作了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孙中山除了布置广东的准备工作外，还派人到广西和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发动，同时通知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同盟会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孙中山风尘仆仆地到海外华侨中筹款，共得二十万元左右。

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召开了重要会议。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已经组成了一支拥有八百余人的“先锋”队，运送了七百多支枪和三百多颗炸弹到广州，在那里设立了秘密据点三十八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已大致联络就绪，新军、防营、巡警等方面都有专人负责发动联络。

统筹部会议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预定于4月13日在广州发难，拟定了十路进袭的战斗计划。由于赵声曾经担任过新军标统，军事知识和指挥经验更为丰富，统筹部任命赵声为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

不料，就在4月8日这一天，一名叫温生才的同盟会员，在统筹部不知情的情况下，枪杀了清廷广州副都统孚琦。这一偶然事件，使广州的清军加强了戒备。加之原计划从国外购买的一批武器还没有运到，因而起义时间只能向后推迟。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小东营五号建立了起义指挥部。由于出现内奸告密，广州全城戒严，敌人四出搜捕，这一来，许多“先锋”队员和军械也未能按事先计划从香港进入广州。

此时，形势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重重困难的处境下，黄兴于4月26日召集会议，决定坚持发动起义的既定方针，将原来拟定的十路进袭计划临时改为四路，集中兵力攻打总督府衙门，并决定次日举事。

黄兴在会上对大家说：“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

林时爽接着表态：“黄兄有此志，我们就绑在一起拼命吧！”

喻培伦表示：“现在是非动手不可了，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先锋队员中，不少人是远渡重洋，潜返内地，本来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作生还的打算，这时也极力赞成立即起义。

4月阶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爆发了。黄兴负责进攻督署，他所带须的队伍主要是四川、福建、广东花县和华侨中的革命党人。当天，队员们以白布缠臂作为标志，脚穿黑色的树胶鞋，以吹螺角为号。

下午4时许，黄兴集合队伍动员，随即给每个先锋队员发一个大饼、一条毛巾和枪械炸弹，立即装束起来。这时，正巧朱执信赶到，就剪去身上穿

的长衫，一道参加起义。

下午 5 时 30 分，黄兴率领队伍从小东门指挥部出发，直攻两广总督衙门。林时爽手执螺角吹起进军号，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

当黄兴率部扑入两广总督衙门时，见有少数卫队守卫，便开枪射击，当场击毙了清兵管带全振邦。随即冲进二门，击破了敌卫队，直奔后堂。黄兴本想活捉两广总督张鸣岐，谁知这个狡猾的家伙已经丢下老父妻妾，仓皇逃到天平街的水师提督公所搬救兵去了。

水师提督李准指挥清军抵抗，林觉民受伤被俘。黄兴在督署不能停留，在室内点了一把火，率部队冲出来。行至东辕门，与李准调来的清军卫队接火。林时爽向清军高呼：“我等都是汉人，应当同心协力，恢复汉土。”

敌人向他开枪射击，林时爽中弹牺牲。黄兴在反击中右手被子弹打伤，他迅速将队伍分为三路发动进攻，自己率领十余人出大南门，准备接应防营起义队伍，再转攻水师公所。行至双门底，遇到了防营的起义队伍，但由于他们没有缠带白布标记，双方互相射击，造成误会。年仅 26 岁的方声洞在误战中牺牲。

队伍且战且走，人员逐渐分散，形成人自为战的局面，到最后只剩下了黄兴一人。他退到一家小杂货店里，隔着门板在缝隙中持双枪左右射击，击毙了七八个敌兵。

喻培伦等人担负进攻总督衙署的后门。在同盟会员中，喻培伦是有名的炸弹大王，曾因试制炸弹，伤了一只手，战斗中，他奋勇异常，仅用两个炸弹就将督署的后墙炸开了一个大豁口，队伍蜂拥而入，从前门中击，转攻水师公所。在莲塘街北口，碰到水师卫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喻培伦一行分散在东西两边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拼死阻击。喻培伦登上屋檐，向清军猛投炸弹，连续打退敌军的几次冲锋，击毙敌军不计其数。

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到半夜，因众寡悬殊，只好且战且退，分散退却。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向敌人猛投，使敌人落魄丧胆。但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弹尽力竭，最后被捕。

起义的战斗坚持了一昼夜。在激战中，只有黄兴一支队伍孤军作战，原计划的其他三路并没有出动。等赵声、胡汉民于起义的第二天早晨到达广州时，战斗已经结束。广州郊区及邻县响应起义的队伍，都被清军镇压了下去。

战斗结束后，敌人立即审讯被捕的革命党人。喻培伦在受审时，为避免牵累别人，冒名王光明。他怒斥敌人，慷慨激昂地宣告：“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1912 年 2 月，孙中山感其威武不屈，英勇战斗，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追赠他为“大将军”。林觉民被捕后的表现也异常英勇坚定，张鸣岐、李准亲自提审，他在刑堂上演说，侃侃而谈，讲到时局激愤处，捶胸顿足。他告诫清廷的官吏们洗心革面，革除暴政，建立共和国。敌人无可奈何，几天后将他杀害，也年仅二十五岁。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烈士们殉难的情节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所表现的崇高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却是相同的。这次起义中，先后牺牲的共有八十多人。

事后，有人收殓死难烈士的遗骸，共得七十二具，广东人民把他们合葬于城郊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孙中山后来痛切地写道：

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

成矣。

这次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在这以后，革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黄花岗之役，有如一声春雷，震动全国，不过半年，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全国大起义的风暴就降临了。

辛亥风云

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千疮百孔、腐朽不堪的清王朝犹如日渐下沉的破船，终于在这一年被革命的怒涛所吞没。

就在孙中山领导多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劳动群众由于不堪忍受清朝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地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革命形势继续在高涨。1907年至1910年间，仅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省的一些州县，就先后发生了九十多起饥民暴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0年4月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

湖南在1909年发生水旱灾荒，粮食歉收。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以致米价由往年每升二十文左右飞涨到八十多文。这种被内外反动派扩大的饥荒威胁，使得长沙市城郊的劳动人民以及外地流入的灾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十多万灾民靠吃树皮野菜度日。

1910年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有个桃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拿出家中仅有的八十文钱去买一升米，因为其中有几个大钱在市场上不能通用，粮店拒收。傍晚，当她东挪西借将钱凑齐到了米店时，米价又涨了上来，不得已只好空手返回。在绝望中，全家四口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投水自杀了。

街坊邻居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流泪，凑钱给他们下葬，处理后事。大家愤愤不平地议论此事。一位年轻力壮的男人说：“咱们去砸掉这家米店，出出这口气！”

邻居们一呼百应：“现在就去干！反正这日子也设法过了！”

邻居们无人组织，一窝蜂来到这家米店，撞开店门，砸了柜台。大家还不解恨，又一齐哄到官衙，要求巡抚下令降低米价。巡抚竟然派兵镇压，杀死三人，打伤了几十人。

这时，灾民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头聚集起来。他们见官府以武力镇压饥饿的人民，群情更加激愤。大家手持木棍、菜刀，捣毁了长沙城内的一百多家米店，将店内的粮食通通抢光，放火烧毁了清朝巡抚衙门、巡警局、大清银行、日本领事馆、洋行和教堂。

长沙的这一行动，震动了全国。

1909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还普遍发生了反抗捐税的群众运动，“官逼民反”、“绅逼民变”的情况到处皆是。1910年5月，山东莱阳知县借口筹饷，强加捐税。乡民要求用备荒的仓米代捐，但后来发现仓米已被官吏们私吞。乡民七百多人在塾师曲诗文的带领下，要求清算仓米和减轻捐税，遭到拒绝，酿成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参加的起义，队伍发展到五六万人。这片反抗的怒火，很快就延烧到附近的几个县。

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和遍及全国城乡各地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彼此呼应，斗争烈火，熊熊燃烧，形成了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的宝座推到了火山口上。人民要求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愿望日益强烈，老百姓中盛传着这样的歌谣：

不用掐，不用算，
宣统不过二年半。
今年猪吃羊，
明年种田不纳粮。

时间到了 1911 年 5 月，也就是同盟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以后的十几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这时，清朝政府已经日暮途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它面对的全面危机中，严重的财政恐慌已成为无法摆脱的最突出的难题。巨额赔款的支付，每年大量外债的偿还，庞大军费的开支，以及花费无度的官僚机构的维持等等，使得国库空虚，难以支撑。怎么办？对腐朽的清朝政府来说，主要的办法唯有继续不顾一切地举借外债，来填补这个越来越大的窟窿，以图苟延残喘。

但是，借洋人的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借债必须要有抵押品作为担保。清政府在历年举借外债时，已经差不多把什么都押出去了，那么，再拿什么作为抵押呢？帝国主义列强看中了我国的铁路。他们愿意将大笔款项借给清政府，要求在中国享有修建铁路的权利。因为铁路投资数额庞大，利率收入高。同时，随铁路投资而来的，还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各国投资兴建铁路所经的地区，一般就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很有兴趣。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为了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便大量出卖铁路主权。然而，各地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纷纷要求收回路权。

当时，中国的铁路，大部分都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只有少量的自主铁路，是由政府官办经营和兴建的。然而，清政府实行的借债筑路的卖国政策，使得这少量的自主铁路实际上也处在帝国主义债权国的控制下。自 1905 年前后起，随着民族觉醒的到来，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路权、要求商办的热潮。几年内，江苏、浙江争办沪杭甬铁路，四川争办川汉铁路，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争办粤汉铁路，都获得了程度不等的胜利，办起了铁路公司，当地的绅士、商人乃至普通居民也募捐集款，有的省份已开始修建部分线段。在上述几省商办铁路热潮的鼓舞下，北方的直隶、山东、河南乃至边远省份云南也先后开展了收回路权的斗争。一个全国性的争路商办高潮迅速形成。

帝国主义列强不甘心失去控制铁路的权益，便采取种种方式，逼迫清政府收回商办成命，仍然采取借债筑路的办法。清王朝不敢违抗洋人主子的旨意，只得遵命照办。

1911 年 5 月 5 日，清廷官吏石长信，在朝廷的示意下，上奏本章，建议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只隔了三天，清廷就于 5 月 9 日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诏令。诏书上说：“干路修建延误已久，应当立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留准商民量力而办外，其余以往批准干路的各项决定，一律取消。”这一纸诏书，对持有铁路商股的人说来，无异是晴天霹雳，人们都很清楚，所谓国有，其实它只是使铁路一转眼就成为列强囊中之物的借口而已。这个诏令一出来，便把清朝政府历年来在铁路问题上对全国商民的一切承诺顿时撕得粉碎，也使它的卖国面目暴露无遗。

清朝政府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地下达了这份诏令呢？原来，就在 4 月 15 日，它们已经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清政府向四国借款一千万英镑，以五厘利息计算，条件是出卖粤汉、川汉两条已经答应交由商办的铁路。现在要想尽快签定这笔巨额的借款合同，先决条件自然是把铁路收归国有。

5 月 20 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奉旨在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上正式签字。

全国人民对卖国而腐朽的清政府的愤怒，经过长期的积累，早已达到极

点。对清政府的一纸命令便强行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的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以及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行为，痛恨至极。

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的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发起了保路运动。他们向清朝政府叩头请愿，乞求“收回成命”。与此同时，各省的广大人民突破请愿运动的形式，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

这次保路风潮，四川最为激烈。6月，成都等地各阶层的人民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提出了“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机关”的口号。8月，成都举行了数万人的保路大会，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表示抗议，各地人民闻风纷纷响应。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把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张澜等五人骗进督署，加以逮捕。这一无耻行动，立即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抗议，要求释放各位代表。狠毒的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了三十二人。从城郊赶来的农民也有数十人被杀。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赵尔丰的疯狂镇压没能使人民屈服，斗争反而更加炽烈。很快，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各县人民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起义，猛烈冲击了清朝政府在四川的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的后期，同盟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天杰和龙鸣剑这两名同盟会员都是四川荣县人，是同盟会在四川的重要活动分子。龙鸣剑是留日学生，在东京就参加了同盟会。8月，他们二人联络哥老会，成立了保路同志军，在荣县举行起义，率众一千多人出发去攻打成都。

出发前，龙鸣剑正好遇到留日学生中的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回到荣县。龙鸣剑十分高兴，对吴玉章说：“你回来就好了。我们必须组织人民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队伍临行时，龙鸣剑发誓说：“此行不捷，我不再入此门！”

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失败后，又转战别地，到了9月，攻下许多州县。进军途中，龙鸣剑不幸病故。王天杰率部回师荣县时，荣县知县和当地的土豪劣绅一听到消息就都逃走了。

王天杰找吴玉章商量。吴玉章深思熟虑地说：“应当宣布独立，自己管理县政。”其他同志也都赞成吴玉章的意见。

9月25日，吴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城内召集各界人士开会，由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正式独立，并推荐另一个同盟会员蒲洵主持县政。在一片欢呼声中，荣县的革命政权建立了。从此，荣县成为革命党在西南的势力中心。在荣县独立的影响下，彭山、眉州、青神等十多个州县相继独立。

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它有力地鼓舞了湖北、湖南等地革命党人的斗争。与此同时，国内各地群众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人民抗捐税和发动其他斗争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中国人民和清朝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更加深刻广泛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已经为期不远

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清王朝的末日终于到来了！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它正处在长江和汉水汇合处，溯长江西行，不远处就是洞庭湖口，再往前经三峡可入四川，向东可顺江直通上海，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与北方各省的交通也很便捷。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外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比较早就侵入到这里，中国的近代工业也较早就出现在这里。

湖北的教育原来就比较发达，这里有著名的两湖书院。来此求学的青年很多，同盟会中的黄兴、宋教仁都曾在武昌求学，湖北派遣出洋的留学生也较多。发达的交通和教育，使得武汉较早地接受了革命的新思想，海外留学生中的革命宣传也很容易输入。

在武汉，任湖广总督多年的张之洞，对训练新军十分热心。清政府不愿意让外省的官吏拥有重兵，只准许张之洞成立一镇、一混成协，也就是以张彪为统制的第八镇和以黎元洪为统领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湖北新军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它的战斗力仅次于北洋六镇，在南方各省中是最精锐的一支部队。

新军士兵中，读书识字的人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家庭一般比较贫穷，加上军队生活的艰苦，军队官长的压迫虐待，因而新军士兵很容易接受革命新思想。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初是抱着各式各样的动机投入军营的，后来有的人接触了革命思想，便将手中握有的武器作为后来发动起义的基础。有的人则是一开始就具有追求革命的思想，投入军队以后，便在士兵中做宣传联络工作。清政府万万没有料到，他们原来准备用来镇压革命的力量却一大批一大批的转到革命方面来了。武昌起义的主力，正是这批湖北新军。

1911年5月以后，在川汉、粤汉铁路沿线的保路风潮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武汉的革命风潮一直在奔流沸腾着。当时湖北有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一是文学社，另一个是共进会，它们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这两个革命团体一直秘密地在清政府的新军中秘密地宣传革命道理，进行组织活动，新军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很大，倾向革命的士兵越来越多。在一万六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军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兴起后，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会中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时机已趋成熟，便准备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武装起义。

文学社与共进会这两个革命组织，原来各自分散进行革命活动。文学社以及它前身的领导成员，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他们长期埋头在新军士兵中从事革命工作，最初以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的第四十一标为基地，逐步扩展到湖北新军各部，几乎没有中断过。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归国的留日学生。他们最初在学堂、会党、新军中都发展革命力量，经过一些波折，后来也集中力量在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们和同盟会本部联系得更加密切，所以1911年春天后在新军中发展得很快，在工程第八营和炮队第八标中的影响更大。

1911年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国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举行联合会议，进一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推选出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

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等人为军事筹备员。同时，在汉口设立了政治筹备处，草拟文告，制造旗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

根据原先的议定，起义将于10月6日举行，这一天是农历的中秋节。后来由于准备不足，起义日期只好向后推迟。这时，武汉的空气十分紧张，清廷当局听到传闻，说革命党将在中秋节起事。湖北的清朝官吏颇为震惊，但无法探知实情，只好故作镇静，其实恐惧的心理日甚一日。他们害怕中秋有变，特地下令各标营于农历八月十四日提前过中秋节，所有士兵不准外出，不准过量饮酒，一律在营房休息。并加强戒严，派出军队巡逻。军队的兵器也多收置在楚望台的军械库，令工程营戍守。局势如此险恶，孙武与刘复基等人商量，决定改在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八日）按原定计划举行起义。为加强保密，起义指挥机关的驻地也作了改变。

激战前夕的形势真是瞬息万变。10月9日下午，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这天中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准备起义时使用。下午，一名同志进屋观看配制炸药。进屋时，嘴里吸着的纸烟未灭，无意中一个火星落在配药的面盆内，立刻引起熊熊大火，发生爆炸。孙武的脸部当即被烈焰烧成重伤。同时，浓烟大起，直透窗外，邻居高呼火警。孙武用一件长衫把面部盖着，由人扶着到德租界的同仁医院治疗。俄租界警察闻讯赶来，在室内发现文件、钞票、旗帜、名册等，知道这里是革命机关，派警察严密监视。这时，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在武昌，见起义计划已经泄露，情势紧急，立即发出命令，通知革命党人于当晚十二点起义，以鸣枪炮为信号；各军听到南湖炮声后，立即从原驻地拔队，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当天晚上一直守候在总部机关等候消息。离午夜12点还差半个小时，楼下突然传来猛烈的敲门声，军警随即破门而入。刘复基知道是清廷当局前来搜捕，挺身而出，站在楼梯口就往下猛掷炸弹，可炸弹没有响，于是军警一拥而上，刘复基等人赤手空拳，全部被捕。蒋翊武因为头拖长辫，身穿长衫，像个乡下的老百姓，没有被看守人员注意，乘机逃脱了。其余的人都立即被押解到督署，等候审讯。

这一来，起义的指挥枢纽便被破坏了。午夜12点，由于南湖炮队接到命令太晚，准备不足，士兵们已经睡熟，没有发炮，各营也无法响应。原定的起义计划便流产了。

清廷当局捕获刘复基等人后，连夜会审。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彭楚藩。

充任审讯员的湖北督练公所总办铁忠，见彭楚藩身穿宪兵制服，问：“你是革命党吗？”

“不错，我是革命党！”彭楚藩响亮地回答。

“你们有多少同党？”

“同胞四万万，你还不知道吗？”

“你们约好几时起事？”

彭楚藩大声地说：“就是今天。唉！可惜我没有杀着你们。”

彭楚藩第一个被杀害了。接着又提审刘复基。刘复基说：“你们何必东问西问，我既入了你们的虎口，难道还指望活着出去吗？”

铁忠便对身旁的武昌知府刘树屏说：“这也不是个好东西，索性结果了他。”

刘复基被推出大厅时，见外面挤满了群众，便大声喊道：“同胞们！大家努力啊，只可怜我的受苦受难的同胞啊！”说时，眼泪便不住的流下来。

被提审的还有杨洪胜，他是在给工程营运送炸弹后被清廷发觉被捕的。提审时，他已负重伤，一上堂便骂：“好！只管杀，我只怕你们也有这一日！”

彭、刘、杨三烈士相继就义。到杨洪胜被害时，已是10月10日清晨了。

三烈士就义的消息，传遍武汉三镇。10月10日这天，城门关闭，军警戒严，如临大敌。总督瑞澂想斩草除根，大肆搜捕，弄得人心惶惶。新军中的革命同志纷纷表示：与其就缚，不如今晚一齐动手，还可死里求生。于是暗中密议，设法联络。工程营的总代表、革命士兵熊秉坤前往第二十九标、三十标，商定当天发难。炮兵八标及其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都跃跃欲动，纷纷进行着秘密的准备。

10日晚上大约7时左右，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已经被发难的紧张气氛笼罩着。点名过后，后队二排的一个排长已经听到风声，先去该排三棚巡查，看到革命士兵金兆龙武装齐备，正在擦步枪，便厉声问道：

“你这么晚了，还武装整齐，又擦步枪，想干什么？”

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说：“防备！”

那个排长大怒，说：“你想造反吗？”说着，就上前扭住金兆龙。

“造反就造反”，金兆龙一跃而起，大喊一声，“此时不动手，等待何时？同志们，反吧！”

革命士兵们一拥而上，开枪打死了这个反动排长。此时，全营吆喝声，玻璃碎片声，长官弹压呵斥声，同时并作，真是人声鼎沸，声震天地。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闻声赶来，一面开枪，一面高呼：“你们均有家小性命，均有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作不得，要家灭九族咧！赶快各回本标，本官决不究其罪责。”

无人理睬他们的嚎叫。熊秉坤从楼上将痰盂、花盆、板凳等物向他们砸去，另外的革命士兵开枪击毙了阮、黄二人。其他官长纷纷逃跑，有的翻墙而逃，有的躲进厕所。

熊秉坤鸣笛集合了四十多人，把清朝政府的肩章撕掉，臂缠白布，与金兆龙一起率领队伍冲出了营房。

就在这紧要时刻，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楚望台军械库已经得手。熊秉坤大喜，局面立刻急转直下了。楚望台是湖北省的总军械库，是从外面购买的或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武器都放在这里。革命党人当然把这里作为重要夺取目标，清廷官吏也势在必守。这里离工程营驻地只有一千多米，熊秉坤等人在营内发动起义的枪声，立刻就传到军械库。当天守库的左队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罗炳顺、马荣等人正准备响应，监视官李克果召集士兵讲话，说道：

“如果有空着手来此抢劫军火的人，你们要抵抗，这里责任重大！”

罗炳顺说：“我们没有一粒子弹，用什么来抵抗？”

李克果令军械库主任将库门打开，搬出了两箱子弹，分发给各位兵士。兵士们得到子弹后，立刻朝空中放了一排枪。

李克果等人见势不妙，与工程营左队官佐急忙越墙而逃。

于是，楚望台军械库被革命士兵占领了。熊秉坤率领工程八营的四十余人来到楚望台，与罗炳顺、马荣会合。他们把库门大开，库内储存的军械弹药由革向士兵自由取用。

不久，周定原又率领一队战士到达。熊秉坤集合队伍，以总代表兼大队

长的名义发布命令。他说：“本军称为‘湖北革命军’。今夜作战，应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以清廷的督署为最大目标。今夜的口号为：同心协力。”

这时，武昌城内的步兵、炮兵等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应，陆续来到楚望台军械所。距楚望台最近的三十标最先到达，其次是测绘学堂，再后来的是二十九标，四十标也有少数人跑来会战。

熊秉坤命令工程八营的金兆龙等人立即夺取中和门，迎接驻在武昌城南的炮八标进城。炮八标全标均留驻武昌，人数众多，拥有山炮多门，火力强大，声威压人。炮八标进城后，大大改变了武昌城内双方的力量对比，对武昌起义的成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当晚 11 时左右，汇聚而来的各路起义士兵共有三千多人。这时，进攻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湖广总督衙门。起义士兵都明白，如不攻克督署，都要被杀头。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在天明以前把总督衙门打下来。

总督衙门位于武昌城内的西南角，两面靠近城墙，一面同第八镇司令部隔街相望，周围全是一丈多高的围墙。正面的巷道狭窄，进攻时兵力难以展开。湖广总督当时所能掌握的兵力大约也有三千余人，这还不包括分布在城内的武装警察和宪兵营、旗兵营，实力与新军起义部队差不多。因此，要攻下总督衙门，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开始，工程八营充当主力，分成两路向总督衙门进攻，由于火力不足，难以向前推进。待到炮八标入城以后，战斗形势有所改变。炮队立即凭借楚望台阵地、蛇山阵地和保安门城上，猛烈轰击督衙和第八镇司令部，炮弹落处，一片哭喊，起义军战斗力明显加强，士气大振。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分成三路：右路由蔡济民率领，中路由马荣率领，左路由熊秉坤率领，分别向督署进攻。

但是，进攻不大顺利，清军的机枪轮番扫射，死死地扼守住阵地，起义士兵倒地受伤的很多。工程营的两个士兵趁着夜黑，伏在地面向前匍匐前进，悄悄摸到敌人的机枪下面，突然狂呼跳起，夺到机枪就转向清军扫射。

这天晚上，正下着小雨，天色漆黑。清军的机枪难以发挥火力，但起义军的炮兵也难以瞄准轰击。蔡济民等人找来衣被，浇上煤油点燃，霎时火焰上升，使督署目标暴露无遗。炮兵利用火光，选择督署的旗杆作为标准点，试射后取得标准距离，即迅速用排炮不停地向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轰击。督署大堂、签押房等处和第八镇司令部的马房，都被炮火轰毁。步兵乘机猛攻，先占领了第八镇司令部。

瑞澂见大势已去，赶紧找人在右墙根打开一个洞，带着铁忠和他的家人，仓皇爬出去，躲到停泊在长江上的楚豫号军舰里去了。

张彪仍然带着辎重八营和消防队，凭借望山门城楼作负隅顽抗。这时，督署衙门已是一片火海，清军士气大落，无心恋战。当熊秉坤率领敢死队猛扑过来时，这个平日凶狠的第八镇统制只得率领残兵渡江退守。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夜，武昌城内的清政府势力已经基本消灭，起义军终于占领了武昌全城。只见满城的兵士都在臂上缠着白布，威风抖擞地行走在街上，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武昌的局势。

11 日，革向战士又占领了汉阳，并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12 日，又攻占了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革命，终于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

海外归来

武昌起义的成功，汉阳、汉口的占领，使整个武汉三镇沸腾起来。蛇山上下，黄鹤楼头，江汉关前，龟山脚下，到处是欢呼的人群。长期被封建统治压抑的激情，如火山一样喷发而出，人们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庆贺着武昌起义的胜利。

占领汉阳以后，革命军随即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谁来担任新政府的都督？看来，革命党人对此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当时，直接领导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者，在起义前有的就受伤或者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孙中山这时远在海外，黄兴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也分散在香港、上海等地。起义的士兵和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弹痕遍地的湖北谘议局前，热烈地期待着新的军政府的产生。

谘议局内，新都督的人选难以决定，起义的指挥者们正在激烈地争论着。有人提出“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适，可以请他来当。”这一建议，立刻得到在场人的赞同。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在海军供职。甲午战争之后，得到张之洞的赏识，任用他到湖北训练新军。八年间，由马队管带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这个人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过同情，因此，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向对他颇有好感。可是，像这样一个清廷军官，对革命是坚决反对的。

兴奋而又缺乏经验的革命党人此时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让黎元洪当了都督。黎元洪开始坚决不肯应承，后来被迫答应。原谘议局局长汤化龙则做了军政府的民政总长。这样，武昌起义的一部分领导权，便落到了一批封建官僚、政客的手里。新政府里塞满了一大批旧人物。

非常滑稽的是，革命军拿出写好的安民布告，要黎元洪签字时，黎元洪舌头打着颤，含糊不清地说：“莫害我，莫害我。”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签了字。

于是，这个布告便在全城张贴了：

中华民国政府鄂都督黎布告：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勿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于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吾汉家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努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持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黄帝纪元四千六百 九年八月二十日。

这是中华民国开国第一次发布的文告，很有历史意义。由于当时人们普遍渴望汉族光复，建立民国，因此，当布告贴出后，观看的人不计其数，都以先睹为快。布告署名是黎元洪，一些人惊异地说：“没想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当时，这也可以起到一些安定人心的作用吧。

“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分

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很快便在全省领导或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首先响应的是湖南、陕西两省，继而江西、山西军政府也宣告成立。到 11 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市中，已有十四个省脱离清廷独立，其他各省的反清斗争也风起云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之中。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北部科罗拉多州进行宣传募款活动。10 月 12 日，他从美国的一家地方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电讯，心情兴奋极了。多少年来，他为之奋斗，翘首盼望的起义胜利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夜晚，孙中山躺在床上，床头灯发出柔和的灯光，照着他激动得有些发红的脸颊。他将这条消息又看了一遍，其实，原文已经能背出来了。他一边看，一边想，无尽的思绪在脑海里翻腾着，往事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从 1906 年冬天到 1911 年的春天，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但是，十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在黄花岗之役中，革命力量损失惨重，真是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革命党同志中间，包括一些重要的骨干分子，产生了悲观的情绪。

失败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令孙中山更为担忧的是，在武装起义失败的同时，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严重的分裂。这是孙中山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同盟会中有一些领导人对孙中山大加攻击，一时纷纷嚷嚷，不可开交。过去和孙中山有些隔阂的章太炎，联络了一些人，声言要开大会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刘师培、张继等人创办了《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还大肆攻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10 年，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东京重新成立了光复会，谩骂孙中山，造成了许多地方同盟会组织的大分裂。

一个革命家，在他最需要人帮助扶持的时候，还有什么比朋友、同志的背离更使他伤心呢？孙中山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仍然忍辱负重，毫不气馁地为革命奔走呼号。他坚信自己所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同盟会中的多数人是理解并拥护自己的。为了进一步集聚力量，他一面到南洋、欧美等地鼓吹革命，试图东山再起，一面往各地筹集资金，抚恤死难烈士家属，为再次起义准备军饷。

在美国，旧金山是一个华侨集聚之地，孙中山曾经多次来到这里活动。为了加强对美洲华侨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1910 年 3 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主持成立了“美洲同盟总会”，将美国几十个城市的同盟会分会联合在一起。

为了打开局面，不断扩大力量，1911 年 6 月孙中山再次到达旧金山，经过努力，促使美洲同盟总会和洪门致公堂这两大组织，消除门户之见，尽释前嫌，不再听信清政府旧金山领事的挑拨。美洲同盟总会会长李是男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都十分信赖孙中山，经会商后达成协议，于 6 月 18 日分别刊登布告，通知美洲各埠所属的同盟会和致公堂实行联合，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在旧金山，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担任了同盟会员加入洪门的介绍人。

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在旧金山发起成立了“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则称“国民救济局”，首先在旧金山及其附近地区宣传募款，号召广大华侨踊跃捐资，以助革命大业。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和捐款渠道，孙中山建议选派四个同志，分成南北两路，从旧金山出发，到纽约集中后再分道返回旧金山，向全美华侨集居的大小埠头解释革命宗旨，扩大革命组织。孙中山第一个自告奋勇担任演说员，

和同志黄三德一道于9月2日沿北线出发宣传。沿途的华侨亲切地称他为“孙文大哥”。

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工作，并不总是顺利的，也有不少华侨态度冷淡，有的甚至还予以嘲笑和攻击。每到一处，除了发表演说，孙中山一有空就有就登门访问一些有影响的当地华侨。有些资本家老远看见孙中山来了，马上关起店门，给他一个闭门羹。

一天上午，孙中山走到一家华侨洗衣馆门口，正准备进门访问。突然从屋里走出一个中国人，手里拿着熨斗，气势汹汹地指着孙中山的鼻子说：“你不准进来，我不听你的‘大炮’！你要敢进来，我就用这个熨斗擲你！”

孙中山没有生气，反而对那个华侨很诚恳地笑着点点头，走向隔壁的一家华侨商店去了。

随行的同志十分气愤地说：“这个侨胞的态度，真叫人受不了！”

孙中山宽宏大量地笑着说：“这些遭遇是我早已预料到的，没有什么关系。人家不了解革命道路，责备两句是不足怪的。在南洋，在欧洲，我都碰到过这样的人。有些人时间长了，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就与我交了朋友。”

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在孙中山所到之处，绝大多数华侨是爱国的。孙中山的演说极富感染力，有的连老农民、老园工也停下活来听他宣传革命道理。许多侨胞听了孙中山的宣传，纷纷解囊捐款，特别是工人更为踊跃。有的失业工人，生活已很艰难，还借钱捐款。

有一天，一个中年洗衣工拎着一袋钞票，来到孙中山下榻的旅馆，把二十多年的积蓄往桌上一放，未等孙中山开口问他姓名，便匆匆告辞走了。

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次又一次使孙中山感动万分，一路的辛劳、委屈，也顿时化为乌有。

孙中山在海外募集的革命捐款，一批又一批地汇到同盟会的起义指挥机关，而他自己却经常囊空如洗，生活十分清苦。他不计较这些个人的荣辱得失，也没有闲暇考虑安排自己的家庭和生活。颠沛流离，云游海外，为的是早日实现自己的夙愿——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如今，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自己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孙中山想到这些，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他索性穿衣下了床，在房间里踱着方步，有时直愣愣地盯着窗外出神，静静地思考着。

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要马上回国直接指挥这场革命战争？孙中山踌躇良久。如果这时即从太平洋秘密回国，那么，二十多天后就可以到达上海，亲自参加摧毁清王朝的战斗，以慰平生之愿。经过再三考虑，孙中山预计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将会碰到很多外交、财政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担心某些帝国主义列强支持清政府，还可能趁机直接干涉中国革命。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办理外交和财政借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于是，他决定立即中止在美国的演说筹款计划，绕道欧洲回国。

一个星期以后，孙中山经芝加哥来到纽约，到纽约后，他立即向美国一些政界和财界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他还派人转告日本驻美代理大使植原，希望日本政府不要支持行将崩溃的清政府。在纽约期间，孙中山获悉胡汉民、朱执信等同盟会的骨干正在相机争取广东反正，便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其归降。

在纽约呆了十余天，孙中山又一次横渡大西洋。于11月10日来到伦敦。十五年前，他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这里被清使馆秘密绑架，从九死一生

的危境中幸而脱险。现在，他以中国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在这里积极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孙中山首先通过美国朋友咸马里的介绍，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给清政府贷款的问题。银行团代表答覆说：“这件事，只有外务大臣才能决定，我们作不了主。”孙中山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道森，就此问题向英国外务大臣交涉。孙中山提出了三条要求：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政府援助清政府，取消英属各地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

英国政府对孙中山的要求，虽然表面上表示同意，实际上是在应付。孙中山还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分别与四国银行财团和汇丰银行代表商洽贷款，答覆是：“银行财团借款给中国，只能与新政府交涉，但必须等你回国后成立了正式政府才能具体洽商。”看来，这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拒绝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离开伦敦，于11月21日又来到了巴黎这个美丽著名的城市，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比恭，要求法国政府承认中国革命的新政府，没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答，只有少数人士表示同情。他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会晤，要求给中国新政府贷款，遭到拒绝。他还谋求与当时正在巴黎访问的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苏诺夫会见，也被置之不理。

孙中山满怀希望地到处奔波，到处求援，却到处碰壁！跑了一个多月，他遇到的不是冷眼讥讽，就是蛮横拒绝，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自慰的成果。事实上，从中国共和政府的成立，到以后反对军阀的斗争，乃至一直到孙中山逝世，他都没有得到英、美、法、日等列强的支援。相反，他们支持的是他的敌人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之流。孙中山到了晚年才认识到“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

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不断接到国内黄兴等人一再催促他尽快回国的电报，便匆匆离开法国，从马赛港搭船回国。

12月21日，船到香港，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专程从广州到香港迎接孙中山。老战友重逢，无比亲切。胡汉民告诉孙中山：“目前革命确实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袁世凯在北方手握重兵，居心叵测。先生如去上海，各省必定推举您为总统。但先生手下无一兵一卒。怎能成大事？先生不如留在广州，训练精兵数万，然后肃清强敌，使国家真正统一，建立共和政府。”

孙中山听了，思忖了一会，毅然地说：“你的话不无道理。但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统一的革命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政府必然倾覆，袁世凯也未必能支撑长久。况且，目前上海、南京正处在前方，如果我不去首当其冲，就是避难就易，有负于四方同志的期望。”

他打住话头，停了片刻，继续以坚决的口吻说：“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决非他人所能胜任。”

孙中山还说服了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与他一起北上，共同担起建立共和国政府的重任。

12月25日晨，一艘由香港开往上海的海轮，徐徐驶进了黄浦江。孙中山万分激动，站到船舷旁，兴奋地眺望着黄浦江两岸的景色。自广州密谋起义失败后，他亡命海外已经整整十六个年头。多少艰难，多少曲折，多少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为国捐躯！现在，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轮船慢慢地靠上了三马路外滩的海关码头。码头上早已聚集了一行欢迎的人群，有同盟会员、新闻记者、外国领事、地方官员、富商绅士，还有很多市民、工人、学生。

欢迎的人群看到孙中山站在甲板上，顿时人头攒动，声浪喧哗：

“欢迎孙先生海外归来！”

“孙中山！孙中山！”

孙中山此时身穿黑色西服，神采奕奕，举帽挥手向欢迎人群致意。他和胡汉民步上码头石阶，和前来欢迎的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领导人紧紧握手，互相问候。

十余名记者将孙中山团团围起来，个个都手提快镜头摄影机，争相拍照，不断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请问孙先生，听说你这次从海外带回了大笔巨款和军舰，有这回事吗？”一个带眼镜的外国记者向孙中山发问，因为社会上对此早有传闻。

“我这次回国，分文未带”，孙中山微笑着回答，“所带回的，革命精神而已！”

一个记者拥到孙中山面前，有礼貌地问：“孙先生，现在南方的革命军正和清政府的代表在上海会谈，请问先生对此有何意见？”

孙中山已经知道，一个星期以前，在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和立宪派共同策划之下的南北议和，已在上海英租界正式开始。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迫使南方的革命势力与袁世凯妥协。他一听记者问对待此事的态度，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革命目的不达，决无议和可言！如果要议，那只能商议推翻清王朝，尽快实现全国的统一和民主共和！”

孙中山回到上海，使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党人精神为之大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政府，就在孙中山来到上海以后诞生了。

第四章 动荡时世

就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由海外归来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国。各省都热烈欢迎，函电如雪片般飞到上海，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敬仰和对建立共和国的期望。

南京的各省联合会委派广西马君武、山西景耀月、安徽王竹怀、江西王有兰等六人为代表，专程来上海欢迎孙中山。

上海更是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各主要街道均悬挂旗帜、张灯结彩以示欢庆，上海军政和各界人士分别召开欢迎大会。12月26日，黄兴、陈其美在哈同花园举行宴会欢迎孙中山；27日，各省代表联合会的代表在静安寺路斜桥总会欢迎孙中山；29日，同盟会本部举行欢迎大会，30日，广东旅沪同乡会设宴欢迎孙中山，31日香山旅沪同乡会也设宴欢迎。

中国同盟会本部的欢迎大会在南京路外滩汇中饭店举行。当孙中山步入会场时，众皆高呼：“向孙中山致敬！”接着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孙中山含笑点头表示致谢。主持人致欢迎词后，孙中山神态庄重，发表演讲：

“本会持三大主义，倡导于世。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二者虽已将达，而欲告大成，尚须多人之努力。况民生主义至今未曾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着力。”

这是孙中山在国内首次发表三民主义演说。演讲时，孙中山精神焕发，声音爽朗洪亮，清晰地回荡在会场里，强烈地打动着人们的心弦。

就在同盟会本部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的那天上午，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会议，到会代表十七省四十五人，有效票是十七票。开票结果，孙中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顿时，军乐声大作，代表们起立欢呼：“中华共和国万岁！”

当天下午3时，消息传到同盟会本部会场，人们欢腾起来，起立欢呼。在热烈的掌声中，孙中山不停地向大家挥手致谢。全上海也沸腾起来，彩旗迎风飘扬，爆竹响个不停，晚间彩灯齐放光辉。

1912年元旦，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孙中山离沪起程，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身着黄褐色呢质军服，头戴嵌有红边的军帽，在数千人的欢送下，登上了专列。上午11时，列车徐徐离开上海，鸣炮声、欢呼声响彻云霄。

龙盘虎踞的六朝古都南京，家家户户都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真比过年还要热闹。一大早，老百姓就互相传说着孙中山来宁的消息，全城万人空巷，不是在街上，便是跑到下关火车站去欢迎孙中山的到来。下午5时，披红挂彩的专列客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孙中山神采奕奕地下车走上站台。顿时，等候已久的群众欢呼起来。下关附近的炮台和军舰齐放礼炮二十一响以示欢迎。孙中山坐上一辆披着绣花彩绸的敞篷马车，向街道两旁的各界人士频频招手，缓缓地向临时大总统府驶去。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原来的清朝两江总督的衙署，这里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当天，临时大总统府的大门外搭起了两座彩门，松枝翠柏和各色纸花衬托出庄重热烈的气氛，九盏贴金的大红宫灯悬挂在彩门上。

晚10时，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正式举行。只见总统府的礼堂里灯火辉煌，各省代表，革命军官和国内外有关方面人士、新闻记者等济济一堂。主

席台正中贴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十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当孙中山健步来到会场时，“共和万岁”的口号顿时响了起来。孙中山登上平台，高高地举起双手，鼓掌致谢。雄壮的军乐和二十一响礼炮过后，代表公推景耀月致颂词。接着，孙中山面向墙上的五色国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全国人民宣誓：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宣誓毕，在热烈的掌声中，景耀月手捧红绸包裹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印”授予孙中山。孙中山神情庄严，双手接过大印，当即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上用印，由胡汉民代为宣读。

宣言明确地指出：“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宣言规定了对内的方针：“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的方针是：“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必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月2日又发布了《改历改元通电》，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之年元旦。”

于是，一个划时代的崭新的共和国在东方正式诞生了。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开展组织政府的工作。1月3日，他主持召开由各省都督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的选举会，选举出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提出了设立行政各部及其职责范围的方案，并提出了各部总长、次长名单，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孙中山任命了下列人员：

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

海军总长黄钟英次长汤芑铭

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晨组

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

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

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

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

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

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孙中山同时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黄兴任参谋总长。

这份任职名单，从形式上来看，各部总长名额的分配是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由同盟会员任总长的只有陆军、外交、教育三个部。但各部次长除汤芑铭外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实权主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从实质上看，南京政府是一个由革命派居于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府。孙中山为了履行“尽扫专制之流毒”的诺言，在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立即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

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孙中山命令各官厅焚毁刑具，废除刑讯体罚；赈济灾民；保护华侨；严禁贩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仆名分，宣

布赋予广大妇女具有同男子完全平等的各项权利。

在除旧布新方面，严禁鸦片；取消官场中“大人”、“老爷”的称呼；限期剪辫；禁止赌博；禁止缠足，废止跪拜礼节。

在刷新吏治方面，严禁官员循私枉法，改革官制，求贤任能。

在改革教育方面，提倡普及教育，取消在学校祭礼读经，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这五项作为教育方针，培养共和国民。

在发展经济方面宣布政府兴办实业，鼓励发展工商业，奖励华侨投资。

这些法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对于稳定全国局势，保护人民的某些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制定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政府在立法建制方面最重要的成就，在中国法制史上也是重要的一件大事。虽然这部“临时约法”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但它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在当时，它是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心中的一面旗帜。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只有三个月时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可孙中山在这期间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却是无法估量的。他的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平民化的生活作风，在历史上也一直被传为佳话。

推翻了清朝政府，人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才合适呢？孙中山为此还颇费了一番脑筋。很显然，清朝的官服和满族的服饰人们是不愿穿的，再将明代的汉族服饰恢复，也不合适。于是，孙中山亲自找缝纫师傅商量，提出设计思想，做成了一套四个口袋的便服，称为“民国服”，自己带头穿上，很快流行全国，孙中山衣着十分朴素，春秋季节总是穿一套灰色的民国服。冬天到了，也只是再加一件普通的呢大衣。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临时政府的官员，无论官阶大小，都穿着同样的制服。

孙中山的生活十分简朴，流亡海外如此，当大总统期间也如此。他年轻时酒量很大，后来在海外生活拮据就把酒戒了。当大总统以后有时要出席宴会，为了表示礼节，祝酒时也只是微微沾一点。伙食上，他很随便，不讲究吃喝，不准厨师做饭超过规定的标准，有时来客人吃饭才准许另加几个菜。由于他公务烦忙，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就在办公室吃点面包点心。有时忙到深夜，饿了就喝一杯牛奶而已。

孙中山的办公室在总统府西花园后面的一幢平房里。陈设简单，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一个小书橱和一套沙发。就在这间普通的屋子里，孙中山签发了许多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民主革命的政策法令。他的卧室就在离办公室不远的一所光线很暗的老式瓦房里。卧室里一张中国旧式棕床，一张三抽屜办公桌，地板上铺着草毯。由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孙中山规定，从总统到总长，一直到一般职员，每人除供给自宿外，每月只发给军用券三十元。财政总长陈锦涛曾感慨地对人说：“我当了财政总长，还远不如清代一个司员华贵！”

孙中山虽然做了大总统，但他未曾给自己的亲属安排做官，也未曾在老家置一点产业。广东党政军各社会团体在孙中山当大总统的第二个月，曾纷纷给他发来一百多封电报，要求孙眉当广东都督，教育总长蔡元培也认为合适，表示支持。孙眉是最早的兴中会员之一，在檀香山时，为支援革命倾家荡产，对革命做过很大贡献，后来迁居香港九龙，仍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但孙中山认为孙眉当一个地方的大官不大适合，经营实业才是用其所长，便给兄长孙眉写信，劝他不要当此大任。

孙中山工作之余，喜欢到街上转转，或到附近的农村看看。借机体察民情，了解最真实的社会情况，但他出门不带警卫。有些同志担心大总统的安全，认为南京才光复，人员极其复杂，总统不宜一人出门。孙中山每逢人劝，总置之一笑：“我在海外二十年，从来不害怕危险。临时大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又不是皇帝，出门讲什么排场呢？”

有一天，同盟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孙中山准备到会讲话。因为他独自步行前去会扬，没有带卫士，门口站岗的士兵不认识大总统，将他拦在门外说：“今天孙大总统来开会，别人不许随便进去！”

孙中山笑笑，说：“孙中山总统不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吗？”

卫兵有些不耐烦地说：“你赶快离开，要不给孙大总统知道了，小心挨打！”

孙中山和气地对卫兵说：“大总统是老百姓的公仆，怎能随意打人呢？”

说着，孙中山掏出名片给卫兵看。卫兵一见，慌忙立正敬礼。看到孙中山进门后，卫兵感动得流下眼泪。

民国初立，百废待举。总统府里经常召开重要会议。一次会议休息期间，孙中山刚在休息室坐下，侍卫队长郭汉章进来报告说：“大总统，有一位姓肖的老人，八十多岁，特意从扬州赶来见你。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事，已经磨了半个小时了，卫兵们拿他没办法。”

孙中山连忙对待卫队长说：“那快请他进来呀！我不是说过多少遍了吗？任何人想来见我都不要阻拦，何况还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快去！就说是我请他老人家进来！”

一会儿，郭汉章扶着那位老人进了总统府，来到休息室时，孙中山已经在那里等候。只见那位老人须眉皆白，手扶一根拐杖，身体看上去还结实。孙中山正打算迎上前去握手，那老人却急忙把拐杖一扔，跪下向孙中山行三拜九叩之礼。

孙中山慌忙把老人扶起来，挽着他的手请进屋里。老人有些昏花的双眼不时地朝孙中山打量，激动得双手微微颤抖着。

孙中山又亲自为老人端茶让座，询问家庭情况和扬州老百姓的生活，最后才问老人的来意。老人说：“我没有别的事，只是想来见见大总统，看看民主共和同皇帝的朝廷有什么不一样。”

孙中山和蔼地解释说：“老人家，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就像是黑白两种颜色，完全不一样。在民主国家，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我这个大总统只是全体国民的公仆而已。总统在职一天，就要为全体国民服务一天。”

“国民公仆？”老人感到十分新鲜，问道：“那么，这公仆还可以更换吗？”

“当然可以换。美国总统是四年选一次，我们今后也要这样办的。”

老人听了，激动地扶着拐杖走到孙中山面前，又问：“大总统如果离职不当了，那他做什么呢？”

孙中山握着老人的手，诚恳地说：“大总统离了职，就回到老百姓中去，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我孙中山随时准备去当老百姓！”

老人怔住了，两行泪珠从布满皱纹的脸上挂下来了。

谈完话，孙中山把他送到门口，命令郭汉章派人用车送老人到旅馆去。

老人告辞了孙中山，高兴万分，不停地小声述说着：

“我真的见到孙大总统了！”

“我总算是见到民主了！”

南北议和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公使团授意下，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接着，帝国主义又配合袁世凯，迫使清政府再三让步，终于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向他交出一切军政大权。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反动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身于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其伯祖父、父亲、叔父都是镇压捻军农民起义的刽子手。1895年，袁世凯接受清朝政府的命令训练新组建的陆军，从而逐步掌握了军权。后由于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被提升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主持编练北洋军，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1908年，光绪、西太后相继死去，袁世凯在官场斗争中失意，被逐回原籍养病。

袁世凯是个大野心家。在老家彰德，从外表上看，他身着布衣，头戴笠帽，经常在小溪边钓鱼，似乎已无心于官场权力。其实，他内心深处无时不在惦记着朝廷的动向，等待着重新出山的时机。武昌起义的炮声惊动了袁世凯，他预感到时局有变，却一时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这时，他的一个故旧找来为他献计说：“袁大人何不乘机把清朝政府的军政权力夺过来，然后以此与革命军抗衡。如果革命军方面推你一统中国，大业不就告成了吗？”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觉得此计正中下怀，觉得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但他却又并未立即起程北上。

1911年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要他迅速前往赴任。袁世凯在第二天上奏朝廷说：“因老毛病尚未好清，不能立即到任。”袁世凯以此作借口，是因为他知道朝廷对他仍然没有放权，如果革命形势没有更大的发展，他是掌握不了多少实权的。

这时，在前线为朝廷督师的是陆军大臣荫昌，袁世凯觉得如在荫昌手下，自己的结局尚不可测。他虽然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但军事指挥的实权在荫昌手中。

革命形势果然发展很快。湖南、陕西、九江相继独立。湖北前线的清军在汉口外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清廷慌了手脚，只得在10月27日将荫昌调回，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给予湖北军务全权。袁世凯的“老毛病”这时便霍然好了，立即进驻湖北，亲自督师与革命军作战，11月1日，攻入汉口。

于是，袁世凯在清政府内部的声望顿时陡增，朝廷只得把他看作唯一可以依靠的南天柱石。在这几天内，山西、云南又相继独立，朝廷更为恐慌。就在袁世凯让北洋军攻入汉口的同一天，他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

这时，狡猾的袁世凯仍然没有北上就职，他还要再看一看，如果他就任了内阁总理大臣，能不能有效地应付各方面局势。11月4日，他派人在石家庄刺杀了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消除了他的一个重要的心腹之患。同时，他又暗中派人与南方的革命军联系。他还想看一看，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政府对他是否支持。

11月13日，袁世凯到京入朝，见了隆裕太后，表示效忠清皇室。15日，英国外交大臣致电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

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这一来，袁世凯心里就踏实了。16日，他就公布了内阁名单，一些关键性的位置大多由他的亲信担任，如陆军大臣王士珍、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杨士琦等。这一来，清政府的大权事实上已经集中在袁世凯的手中。

袁世凯取得清政府的全部权力、控制住北方局势后，如何对付南方的问题便成为放在他面前的最头疼的问题。已成燎原之势的南方革命力量如何对待呢？他知道，如果单用武力强行平定南方各省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所拥有的以北洋六镇为骨干的军事力量难以完成这个巨大的行动；更重要的是，人心已去，全国人民反对清政府，拥护共和的情绪如此强烈，决不是靠武力就能压制下去的。但是，如果不使用武力，又不可能使南方各省屈从于他的意旨。

因此，袁世凯绞尽脑汁，决定剿抚兼施，软硬并用。先依仗自己手中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队，集中给首先起义的武汉以沉重打击，给革命军造成压力，再通过各种渠道，同南方开始议和。在议和中，利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巨大声势一步一步地逼迫清廷退位，再以清政府退位为条件，换取南方各省对他的让步，乃至最后夺取全国的最高权力。

袁世凯清楚，革命党不会轻易地接受他的要求，于是就施展了阴险诡诈的反革命两面手，一方面在战场上发动猛攻，以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又虚伪地表示愿意与革命党人谈判议和。

清军占领汉口后，袁世凯就命令各军停止前进，并写信给黎元洪商议和谈。黎元洪覆信袁世凯，劝他赞助革命军，并表示：“如果你能与我们共扶大义，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你就可以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便派道员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到武昌议和。

黎元洪召集各部长、参谋在议事厅接见刘、蔡二人。但黎元洪当时并不能完全支配湖北军政府的实权，革命党人中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第一次接触没有什么结果。

这是袁世凯预料之中的事。他决定进一步对革命军施加压力。11月21日，北洋军第六镇渡过汉水，进攻汉阳，27日占领汉阳。武昌局势十分危急。当袁世凯的部下冯国璋打算乘胜渡江攻取武昌时，袁世凯又打长途电话予以制止。

就这样，袁世凯以软硬兼施的反革命手法，加上英帝国主义又出面施加压力，果然把软弱的革命党人诱进了他所布置的圈套，不少人被他的“和平”伪装所蒙蔽，主张与他妥协，以求早日结束战争，使革命早日“成功”。

1911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的光复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上，在立宪派的策动和部分革命党人的赞同下，竟作出决议：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

12月18日，南方中央军政府外交代表伍廷芳与北方代表邮使部大臣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开始谈判议和。

谈判正在进行过程中，孙中山回国了。孙中山回国首先面临的不是率领革命军对清政府反动势力继续作战，而是南北议和的局面。踏上祖国的土地，孙中山一开始对议和之事颇不以为然。他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好。他认为：“袁世凯是个巨奸大憨，把建立民国的大任托付给他，是靠不住的。”

但是，孙中山和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有早日实现共和与统一的愿望。因此，在内心深处，他又想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避免流血，

结束战争，建立民国。

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支配下，在他担任了临时大总统以后，他一面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并制定出北伐的计划，但同时，又委派伍廷芳为民国全权代表，继续与北方和谈。并表示：在清帝退位、宣布共和的条件下，袁世凯可以继任总统。

袁世凯的目的本来是利用革命势力威胁清政府以取得权力，因此，对孙中山被选任为临时大总统极为恼火。他又耍了一手，一面峻使北洋将领姜桂题等四十七人联名通电，誓死反对共和，主张君主立宪；一面召回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以中断谈判相威胁，企图迫使南方革命势力作出更大的让步。

孙中山在创立民国、坚持民主共和的原则立场上毫不退让。

1912年1月11日，他下令出师北伐。13日，革命军在津浦线上首战告捷，在宿州等地击败清军，占领了兵家必争之地徐州。

在安徽、河南、湖北等地的战场上，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手中没有实力，加之革命党人内部妥协思想占统治地位，使得北伐战争难以进行下去。

这时，同盟会组织已经分崩离析，无法发挥重要作用。领导层的大多数人都极力主张与袁世凯议和，结束战争。担任陆军总长的黄兴曾写信给胡汉民和汪精卫，担心经费无着，战争打不下去，赞成议和解决。拜倒在袁世凯膝下的内奸汪精卫，更是别有用心地极力主张议和，甚至攻击孙中山：“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各方舆论几乎都赞成议和，妥协已成为一个潮流。帝国主义者都极力支持和扶植袁世凯，把他看成是新的代理人。在政治上，他们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经济上不提供任何贷款，甚至不断调兵遣将，表示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干涉，催迫孙中山尽快与北方达成协议。

由于中外反动派的相互勾结，加之革命党内外几乎是一致地要求妥协，孙中山无力改变现状，一筹莫展，只有步步退让了。

1月22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将议和条件提交各省代表会议复决，向袁世凯提出了五条最后解决办法：“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二、袁世凯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照会达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孙中山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五、袁世凯被选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才能授受事权。”

这五条议和办法，虽然不是袁世凯所想得到的全部，但却为他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成果提供了条件。

宣统退位

孙中山将答应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公布后，袁世凯有些被动。若不接受这些条件，又没有别的对付办法；若接受这些条件，清帝还没有同意退位，而且，要清帝退位还得费一番脑筋。

气数已尽的满清王朝虽然明晓得大势已去，但他们决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满洲贵族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坚决反抗，以良弼等人为首组织了宗社党，保护清室，阻挠共和。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军将领联名通电，表示拥护共和，以此胁迫清王室移交权力给袁世凯。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良弼被炸事件。有一个叫彭家珍的同盟会员，带了几颗炸弹，在良弼住宅附近守候。良弼回家时，彭家珍上前向他连扔了两颗炸弹，良弼当场重伤，两天后一命呜呼。彭家珍自己被碎石反弹击中头部，受重伤牺牲了。

良弼被炸事件使满洲贵族吓破了胆，也给袁世凯找到了逼宫的借口。他私下威胁庆亲王奕訢说：“最近一段时间京城不断出现暴举，足以证明革命党的势力已进入朝廷的心脏了，这以后的祸变将防不胜防了。”

时隔不久，隆裕太后又接到了北洋将领的联名通电。

至此，清朝皇室自感无力回天，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军阀共同提出的优待条件，表示同意退位。优待条件是：

清帝退位后，尊号仍存不废；每年费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暂时居住宫禁之内，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情设卫兵保护；王室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等。

1912年2月12日。清晨，清王宫东华门外，戒备森严。四个身体魁梧的侍卫武官，穿着清一色的新军制服，佩着军刀，早早地便来到了乾清宫，笔挺地站立着。不一会儿，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十名国务大臣进宫来了。按规矩，他们先在乾清宫门内东南角上的廊子里落座，这里是王公大臣们入朝候旨的地方。

过了好些时候，终于来了个太监，通报说：“太后已至后殿，请各位大臣上殿。”

十位国务大臣起立，习惯地套了套头上的翎顶和身上的袍套，从廊子里出来，向殿里走去。他们走到离宝座一丈远的地方，横列一行，面向宝座站定。这时，只听见一个太监呼道：

“请太后御驾！”

一会儿，从后殿走出两个太监，分站在宝座两旁。这时，隆裕太后才领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慢慢地上了殿。

众大臣忙向帝后跪下行礼，隆裕太后轻轻摆了摆手，说道：

“不必行旧礼了，今天改改，行鞠躬礼罢了！”

于是，群臣站了起来，向帝后鞠了三个躬。隆裕很不自然地点了点头作为还礼。礼毕，隆裕落座在正中的宝座上，宣统皇帝溥仪坐在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

胡惟德上前一步说道：“总理大臣袁世凯因身体欠安，未能亲自见驾，

所以叫胡惟德带领各位国务大臣到宫里来给太后请安，给皇上请安。”

隆裕太后点点头，说了声：“好。”接着又说道：“袁世凯深受皇恩，为国家、为皇室也出了不少力，如今议和能使南北满意，做到优待皇室，支撑局面到现在，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皇上按照议和的条件，把国家的大权……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去办共和政府。今天就颁布诏书，宣布退位。”

御前太监把最后三道诏书放在隆裕太后面前，她看了几行，泪水便糊住双眼。正在这时，太监总管小德张急匆匆地从养心殿门外跑进来，跪在太后面前禀报道：

“禀太后，醇亲王载沣、恭亲王溥伟进宫来了，他们一路破口大骂……”

“骂啥？”隆裕太后忙擦了擦眼泪问道。

小德张望了望太后和立在宝座两侧的十名国务大臣，欲言又止。

“你尽管说吧！”隆裕太后口气很硬。

“他们骂……袁世凯……是内奸，他们反对下退位诏书，要进宫来，和……太后……对辩……”

“你给我派人截住宫门，不让他们进来扰乱！”隆裕太后斩钉截铁般地说道。这样的口气，她还从来没有过。说完之后，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向优柔寡断，今天竟然能说出如此果断的话来。

小德张刚应声而去，隆裕太后又接着看那退位诏书，眼泪又一下涌出来。她实在不忍再往下看下去。她觉得，此刻手里拿的不是一张诏书，而是大清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她实在不愿意把它奉送出去，但又无可奈何。她看了一眼在她两侧垂手恭立的各位大臣，似乎他们都成了一只只猛兽，睁着贪馋的眼睛，看着她手里的诏书。

突然，隆裕太后“哇”地一声痛哭起来，双手死死地抱住了那纸退位诏书。整个宫殿里，充满了恐怖、阴森的气氛，空气似乎已经凝结，仿佛这是一座已经深埋地下千百年的皇室陵寝一般。

胡惟德担心发生意外，不好向袁世凯交差。因为袁世凯与他们在一起绞尽脑汁策划的逼宫行动，现在已经到了尾声。只要他把退位诏书拿到手上，回去交给袁世凯布告全国，他的使命就算完成了。如果中途有变，隆裕拒不交出诏书，载沣和溥伟再冲进宫里一闹，把事情弄砸了，这便如何是好呢？隆裕此时也顾不得太后的身份和体面了，嚎啕大哭，呼喊道：“祖宗啊！祖宗啊……”小皇帝溥仪见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哇哇”大哭起来。

胡惟德虽然心急如火，恨不得将诏书抢到手，但他未敢妄动，故作悲伤地从眼里硬挤出几滴泪水，哽咽着对哭得死去活来的隆裕太后奏道：

“太后，大局已经如此。太后能顾全皇室，顾全百姓，袁世凯和群臣、百姓岂有不知，绝不会辜负太后的一番慈衷善意。况且优待条件已经确定，今后必然做到五族共和。敬祈太后保重。”

隆裕太后非但没有止住哭声，反而哭得更痛心了，双手仍紧紧地把那纸退位诏书捧在怀里，深怕被谁突然抢走。

这时，民政大臣赵秉钧向胡惟德递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衣袖。胡惟德恍然大悟，记起入宫前袁世凯交给他的一份孙中山发来的电报。他慌忙上前一步奏道：

“禀太后，这里有一份孙文发来的电报，臣差点忘了，该死！”

“孙文的电报说什么？”太后倏地止住了哭声，抽泣着问道。

胡惟德念道：“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 15 日下午 12 点以前清帝不逊位，

则收回优待条件。此布。总统孙文。”

隆裕太后一听，顿觉山崩地裂，石破天惊。她浑身震颤，仆地而倒，胸前的退位诏书落到地上，胡惟德赶忙拾起来，捧在手上，大声地开读起来：

朕钦奏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

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权……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胡惟德读完诏书，未等隆裕清醒过来，便带着各位国务大臣向袁世凯覆命去了。

这份退位诏书，其实是由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张謇起草的，其中的“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则是袁世凯亲笔加进去的。共和政府不是由议会选举而是由清政府任命产生，真是荒谬到极点。袁世凯的用心显然是想表示他的政权受自清朝政府，同南京临时政府无关。孙中山对这一点极为愤怒，致电袁世凯表示抗议。

清帝的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的终结。从秦始皇以来绵延两千一百三十年的君主制度也宣告结束。

中国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宋教仁被刺

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接到了袁世凯宣布政见的电文。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当天，孙中山便向参议院辞去临时总统职务，并推荐袁世凯为下届临时总统候选人。在辞职时，为了防范袁世凯背叛共和国，附有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奠定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

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又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孙中山的这一决策，实质上是对袁世凯的妥协，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从时代的要求来衡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错误。可惜孙中山当时没能看透这个问题。但他对袁世凯还是有所警惕的。除了提出自以为很有效的三项办法外，他估计袁世凯不肯轻易离开他的巢穴，便亲自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为特使，北上迎袁世凯南下。

奸滑的袁世凯一面在北京热情欢迎蔡元培等人，一面又在北京制造“兵变”，借口北方不安宁，不能南下。接着，帝国主义再次出面支持袁世凯，纷纷调兵进入北京，故意制造紧张空气。许多立宪党人、旧官僚都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奠都南京的主张，革命党内部也有很多人附议立宪派的意见。上海十多家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主张建都北京。

在帝国主义和妥协舆论的压力下，孙中山被迫再次让步，连中央临时政府设置地点也迁就了袁世凯。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告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把政权交给袁世凯。次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至此，南京临时政府不幸夭折。

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就这样被卖国贼袁世凯轻而易举地窃取了。南北“统一”了，但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统一了中国，而让地方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统一”了革命势力。辛亥革命实际上失败了！

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后，一心一意想投身实业建设，使祖国不断富强起来。他声明，今后将以民国国民的身份致力于比政治还要重要的民生主义事业。解职后的第三天，他就兴致勃勃地周游各省，走遍半个中国，到过很多城市和农村，进行调查访问和参观，号召军民精诚团结，万众一心，建设新民国，使人民免除痛苦，得到幸福。孙中山的这些活动，反映了他为祖国富强而斗争的强烈愿望，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者不谋私利、不图名位的高贵品质。

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为了麻痹革命党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家的内政纲领。8月18日，孙中山自上海乘轮船经天津赴北京。24日，孙中山抵京。

袁世凯故意隆重地按国家元首的待遇接待孙中山。他动用了天子出行的御辇，派了豪华的卫队，到车站迎候孙中山入宫。

接着，袁世凯又曲意相从地和孙中山进行了十三次会谈。孙中山开诚布公地详细谈了自己对国内国外形势的看法，谈自己对国政大事的见解。每当

孙中山讲话时，袁世凯总是洗耳恭听，待孙中山讲完之后，袁世凯又每每点头叫好，赞不绝口，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更无反对之意，甚至连丝毫不满的神色都没有表露过。

有一次会谈谈到农业问题。孙中山说：“中国以农立国，必须解决农民自身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孙中山原先以为袁世凯对“平均地权”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他知道袁世凯在家乡拥有大量土地，北洋军的高级将官也都购置了不少田产。谁知孙中山话音刚落，袁世凯立即以掌击椅，一跃而起，眉毛一扬，激动地说道：

“孙公所言极是，‘耕者有其田’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嘛！”

对袁世凯在会谈中的这种态度，孙中山虽说不无揣摩，更非全信，但总体情况他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觉得此次来北京很有必要，通过交谈，彼此了解。尤其是袁世凯一再当面向他表示对清廷专制的不满和对共和国体的拥戴，对民国大业的维护与热心，使他感到有了这个思想上的一致，那么对于国防、外交上的大计，对于各项民生实业建设，就可以求大同存小异。

孙中山根本没有看出袁世凯伪善面孔后的杀机，几天之后他打电报给黄兴，认为对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要黄兴也来京和袁会晤。9月9日，孙中山接受了袁世凯给他的“全国铁路督办”的任命，决心在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境内四通八达，成为全球第一强国。稍后，黄兴也接受袁世凯政府委任的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

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8月25日，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南北议和的前后，同盟会已走向涣散，并发生了分裂，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为了实现“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其它几个小党派合并改组而为“国民党”。25日这一天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

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是很满意，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理事长。但当时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务，便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自己则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事业。

孙中山对筹建铁路工作十分投入，几乎是全力以赴，日夜筹思，先后考察了华北、华中的北宁、津浦和胶济等铁路线。10月4日到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又设立了铁路督办办事处，进行统筹安排。同时，完成了全国各地干线分布的设计，并着手筹措经费。

1913年2月，孙中山为了考察日本实业和铁路状况，同时进行筑路借款等活动，偕同马君武、何天炯、戴季陶等人前往日本访问，先后到达长崎、门司、下关、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地。

3月22日，孙中山一行兴致勃勃地在长崎参观。他们是昨天到达这个九州岛西北部的秀丽的海滨城市的。此刻，他们刚刚参观了三菱洋行的长崎造船厂，正准备出席长崎市长的晚宴。

孙中山时而低头欣赏公园里的绿树红花，时而举目远眺海面上沐浴霞光的片片红帆，舒心地微笑着。

“先生”，马君武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笑着说，“这次与您随行，在日本走了不少地方，我发现到处都有您的朋友。”

“是啊！我自组织革命党以来，途经和流亡东瀛不下十次之多了。”孙中山很有感情地说。

“可只有这一次是堂堂正正的，袁世凯给了两万元，让您以铁路总办的身份来日本考察，日本政府对您敬如国宾，优礼有加。哈哈……”何天炯见孙中山心绪特别好，便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

“日出日没，又过去一天”，一直没有吭声的戴季陶，望着海中的落日，感慨地说，“我们此行考察，快满一个半月了。”

听此言，孙中山不由心中一动，很快收敛了笑容，把视线从远处收拢回来，深情地说道：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弹指间，我辞去临时大总统，也快满周年了。”

马君武笑了笑，说：“这一年间，先生您的变化真大。人都说，孙先生过去是口不离革命，如今则是言必谈铁路，您的心思全扑在那两条铁轨上了。哈哈……”

“说得对。”孙中山听了后，眉一扬，眼一亮，会心地笑了。

正当他们有说有笑地进入市政府迎宾馆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邮使取出一封电报，双手捧着递到孙中山面前。孙中山看了一眼电报封面，满脸笑容，说道：

“是黄兴来电，准有好消息！”

说罢，“唻啦”一声，撕开封口，抽出电文看了起来。忽然，孙中山笑容顿失，闪耀着红光的脸色刷地阴沉下来。他持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孙中山目光平视，垂着手，脚步沉重地走出门外。

急性的马君武快步跟了出去，低声问道：

“先生，出了什么事？”

孙中山这才转过身来，将纸条递给马君武。马君武急忙展开，何天炯、戴季陶飞步凑上前来，看着电文——

“宋教仁 20 日晚在上海车站遇刺，经抢救无效，于 22 日晨逝世。”

“啊！”这噩耗如晴天霹雳，三人都惊得呆若木鸡。

宋教仁是一位有头脑的政治家，是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他竭力主张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政治。他提议实行责任内阁制，准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1912 年底至 1913 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国会大选时，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提出总统可以由袁世凯担任，但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还极力抨击现政府的种种失策之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人大获全胜，在众议院五百六十九个席位中，国民党独占二百六十九席，在参议院二百七十四个席位中，也揽得一百二十三席。这次胜利非同小可，它预示着国民党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执政党，宋教仁作为执政党的党魁，大有组阁的希望。

一心要搞专制独裁的袁世凯对此又急又恨，他害怕宋教仁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自己就会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总统。因此，他一面去电催促南下活动的宋教仁来京，一面却唆使一只黑手伸向宋教仁。

3 月 20 日这一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一直下个不停。上海火车站里，宋教仁正坐在摆设得颇为排场的议员接待室里，他准备乘晚班火车到北京，距离剪票进站上车的时间，大约还有二十来分钟。

前来送行的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以及其他上海各界知名人士正在热烈地交谈着。

廖仲恺坐在接待室门口，看到接待室往进站口的拐角处，鬼鬼祟祟地飞

快闪过一个人影，心中顿生疑云，警惕地用手肘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进他的耳边说道：

“教仁兄，那边好像有坏人。”

宋教仁不以为然地朝门外瞥了一眼，轻声答道：“这类事，防不胜防。”进站的铃声响了。宋教仁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对黄兴等人说道：

“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的好消息！”

“教仁兄”，黄兴拉着宋教仁的手，深情地说道，“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宋教仁一边说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

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匆匆向验票口走出。接待室到验票口不过数十公尺远，刚走到一半，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只听见宋教仁惊喊一声“有人刺我”，小皮箱“啪”地掉在地上，宋教仁双手捂住腰部，随即栽倒在地上，鲜血从风衣里淌了出来。

火车站内警笛四起。巡捕们发现了一个持枪的人，正趁大乱之机夺路而逃。巡捕奋力追赶，凶手抢先开了两枪，击倒两个巡捕后，冲进一条小巷，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宋教仁被刺身亡后，袁世凯起先散布谣言，说此事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所致，后来又装腔作势地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严加查办。不久后，刺杀宋教仁的实情完全大白：由于谋杀宋教仁的凶犯相继被捕，在他们的家里搜出了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机要秘书洪述祖与谋杀犯来往的电文、信件多件，还有赵秉钧寄给谋杀犯的密电码一本。赵秉钧致凶犯的一封信中说：“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接寄国务院可也。”

原来，指挥策划行刺宋教仁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而主使赵秉钧的，正是袁世凯。

宋教仁的被刺，如一盆冷水浇到了孙中山的头上，他从长崎立即赶回上海，当晚就在黄兴的住所开会研究对策。当他听完黄兴关于宋教仁被刺的经过以及宋案初审的情况后，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

“袁世凯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从袁世凯的行为来看，他是想彻底铲除南方的革向党，推倒民治、恢复帝制。现在，暗杀教仁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财团借款打内战便是第二步，往后，肯定还有第三步、第四步……看来，我们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孙中山的话像一阵风，激起了在座人心中的波涛。大家原只想到宋案，未想到动兵讨袁，再举革命之计。

“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已经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黄兴说着，扫了一眼在座的人。

“不不，依我之见，对于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孙中山语气很平缓，态度却十分坚定。

“先生”，黄兴略为迟疑了一下，说道，“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单力薄，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

“各位，我认为，在今日之中国，对于像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孙中山强忍着心中的痛楚与忿满，说道：“我们不能一错再错，只有揭旗讨袁，举兵北伐，才能救党拯国。”

孙中山此时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把政权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然而，这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深夜，孙中山怎么也合不上沉重的眼皮，脑子里一直平静不下来。他坐到桌旁，拧亮台灯，展纸挥笔，含着眼泪写下了悼念亡友宋教仁的一副挽联：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孙中山把笔搁在笔架上，小心地提起墨迹未干的挽联，轻轻地挂到墙上去。他在心里谋划着行动方案，不禁出声怒斥道：

“人面兽心的窃国大盗！翻云覆雨的巨奸大贼！我马上组织军队，非去袁不可！”

兴师讨袁

刺杀宋教仁的枪声惊醒了孙中山。孙中山之所以对袁世凯妥协，一方面是迫于客观形势，另一方面是由于认识不足，对于像袁世凯这一类的政客的斗争经验不够丰富。现在，当袁世凯凶恶的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时，他便立即丢掉幻想，准备兴师讨伐袁世凯。

但是这时的国民党与辛亥革命之前的同盟会已不一样了。国民党充满了投机分子和封建官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民。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还有不少分歧意见。正当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凶残的袁世凯却先下手了。他不经过参议院通过，就向帝国主义五国银行财团签定了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合同。他知道孙中山和他已是水火不容，便借款用来扩充军队，对付革命党人。同时决定先发制人，借口国民党的几位都督曾通电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于1913年6月，先后撤除了国民党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企图使反袁的革命势力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接着，袁世凯又拟定了军事计划，分三路大军南下：第一路由京汉线南下进军江西；第二路沿津浦路南下进军南京；第三路由汴梁经颍州方面进攻安庆。

至此，孙中山已经完全清楚地看到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只能义无反顾地和袁世凯决裂。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和其他方面的革命力量不得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于是，孙中山当机立断，在责令袁世凯辞职的同时，通电各省起兵，发起了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于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二次革命”爆发。

15日，江苏宣布独立，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

18日，上海、广东分别宣布独立。

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革命性已大不如以前了。对于孙中山的决定，有的并不支持，有的则是阳奉阴违。李烈钧在湖口打响讨袁的第一枪后，孙中山一再电令广东、湖南出兵援助，可是陈炯明和谭延闿却多方借故，一直按兵不动，致使江西的革命军在北洋军水陆夹攻下，很快丢失了重镇湖口。

南方各省虽说都相继宣布独立，但各地讨袁军犹如一盘散沙，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和统一的指挥。加之他们不肯发兵北上，独立等于中立。

袁世凯却是蓄谋已久，早已调兵遣将，举兵南下。帝国主义也积极支持袁世凯，德国还派了军官，帮助对付讨袁大军。这样一来，讨袁大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占优势，一连打了好几仗都遭到了失败。

孙中山最为痛心的是南京失守。他对南京十分重视，认为南京乃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一旦战争爆发，南京是双方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只要能守住南京，必将能影响全国讨袁的战势，鼓舞讨袁的士气。所以还在江西独立前，孙中山就曾派他的表弟朱卓文几次去南京，联络第八师官兵，动员他们做好讨袁的准备。

湖口枪声打响后，孙中山曾要亲自到南京去，领导南京独立事宜。当时，南京的局势已经十分险恶，张勋的辫子兵已从山东逼近扬州，冯国璋所率领的数万人马也从津浦线追来，南京已经两面受敌。

黄兴闻讯赶来，见孙中山果真要亲自前往南京，连忙劝阻：

“先生，南京目前十分混乱，你不能去。”

“时局危急啊！”孙中山望着面前的战友，深知他是出自爱护之意，说道，“南京乃是袁贼必争之地，如果失守，‘二次革命’就等于失败，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全部付诸东流。所以，南京的存亡关系全局，务必死守。”

“先生”，黄兴被孙中山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他紧紧握往孙中山的手，说道，“你不能去！我去！我去指挥南京的保卫战……”

黄兴到了南京后，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打起讨袁旗帜。程德全不赞成讨袁，便以到上海筹饷为名，离开了南京。

南京独立的第二天，驻守徐州的第三师被张勋的部队击败，向黄兴告急。黄兴本来心情就很沉重，因为他刚接到一个密电，报告了驻守扬州的徐宝珍第四师已被北洋军收买，倒向袁世凯了。这样一来，南京就陷入了四面受敌、众寡悬殊的危险境地。

黄兴抽调了第八师的一个混成团赶赴徐州增援，在徐州外围与张勋的辫子兵接上了火。激战之后，张勋的辫子兵节节败退。正当乘胜追击之时，该团又突然接到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发来的急电，要他们赶快回头保卫南京，因叛徒徐宝珍正在向南京逼近。该团只好撤退赶回南京。这时，辫子兵卷土重来，徐州城陷落。黄兴见徐州陷落，对坚守南京孤城失去信心，于7月28日被迫离开南京。

南京城在张勋辫子兵的践踏下，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安徽的反袁军事行动，由于内部的纷争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逃。福建、湖南、四川的独立，不久也宣布取消。

孙中山听说广东讨袁军起事后，乘了一只德国轮船赶去指挥战斗。不料船到福州，就听说广东军阀龙济光宣布站在袁世凯一边对付讨袁军，广州军事也失利了。孙中山只得在福州转船到台湾，换乘日轮再次到日本。这样，“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完全失败了。

8月8日，孙中山到达日本门司港。日本的山本权兵内阁，事先已接受袁世凯的要求，不准孙中山登陆，并要逮捕他。次日，孙中山乘的日轮达到神户港。神户水上警察署的事务长带警官队登船搜查。船长是孙中山的旧友，他机警地把孙中山藏在船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船长问警察长：

“什么事？”

“船长，我们来搜一个姓孙的船客。”

“姓孙的？这样的船客我们没注意到。”

“中国的前总统逃亡在这条船上，船长不能隐藏呀！”

“不会。”船长举起一只手摇了摇，接着说，“孙总统我认识他，他从前以国宾身份来日本时我见过他。如果他乘这条船，我不会注意不到的。”

船长随即打开办公室的门让警官们进去。他镇静自若地说：“请先坐下，我拿名册给你们查对，如果还有怀疑，那就请搜查。”

“船长，我们一方面查看搭客名单，一方面还要搜查，用不了很长时间。”警察长说。

警官们在船上查了三个钟头，甚至连锚库都搜查了，也没搜出姓孙的船客，只有船长办公室和那间小屋是例外，因为要搜查船氏办公室，必须有指挥所的命令，而且船长又事先请他们喝了茶。

孙中山有惊无险，过了这一难关。

袁世凯在孙中山乘船离开福州时，就发出密令，要驻日大使馆组织暗杀团，在孙中山抵达日本时加以暗害。刺客们赶紧活动，四处探听孙中山到达日本的确切日期。

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萱野良知、犬养毅等知道了这个消息，挺身而出，保护孙中山。他们向先期到达日本的廖仲恺、何香凝等革命党人作了转告，还临时组织了“刺客击退团”进行防范。当孙中山到达东京时，日本朋友们亲自陪同，何香凝等人一起赶到火车站迎接，保护孙中山先生安全地下了火车。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日本首相山本仅兵同意孙中山在日本留居。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肆无忌惮了。他狂喜地庆祝着自己的胜利，接二连三地干出了一系列反革命勾当：国会在袁世凯的军警包围下，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俄、法、英、日等十三国驻京公使相继发出照会，承认袁世凯政权；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会中国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廖仲恺等人；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解散各省省议会；颁布新“约法”，废除《中国民国临时约法》等等。

亡命在日本的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听到这些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在国内，“民国”已是徒有虚名，“共和”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了。连日本记者撰写的北京通讯中也写道：“国会这个称之为中华民国公民行使权力之机关，民主共和国体之象征，已经因其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举行会议，已是名存实亡了。”

这时候，孙中山他们不仅因为政治上的失利和军事上的失败而负上沉重的心理压力，在生活上也是艰难备尝，甚至连衣食都发生困难。平时，孙中山经常吃红薯，喝红薯汤，生活极其俭朴。

这一年冬天，东京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有钱的人家围炉烤火，而革命党人竟不能出门。孙中山目睹革命党人流亡异邦，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自己身为党的领导人却又无力援助，深感内疚。他在给南洋革命党人写的一封信中描述道：“流亡日本之革命党人，经济困窘，衣食亦多不能顾。连日大雪，在东京之亡命党人中，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望南洋党人速筹款相助，以解困境……”

处在这样的逆境中，许多革命党人都垂头丧气，对革命的前途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孙中山则不以为然，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苦劝革命党人，振作起来，恢复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他告诫他的同志说：“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万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

这时，孙中山痛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党内人员复杂，良莠不齐，没有战斗力，革命难以进行下去，决定改弦更张，重新组织一个革命党。孙中山召集流亡东京的革命党人开会讨论此事。孙中山首先说：

“现在国民党的人，多已丧失了革命锐气，一味只知贪图富贵荣华，既怕反对列强，又怕节制资本，今后恐难有大作为。”

到会的人听孙中山这一说，都点头表示赞同。孙中山又提议说：

“我打算撤消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以团结中华有志之士，再图革命。”

接着，孙中山又宣读了他草拟的党的总章，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誓对领袖绝对服从，并在誓约者名下加盖指模。

黄兴听到这一条规定，不大赞成。他说：

“先生拟定的誓约这一条，依我之见，不仅多余，且有不妥之处，党员入党并非为某一领袖服务，而是效力于革命事业。”

孙中山平心静气地解释道：“这一条规定，我考虑了多时。回顾自同盟会以来的多次举义，尤其是讨袁之‘二次革命’，不少同志独断独行，各行其事。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我虽身负总统之职，但南北议和，我不得不让权；定都北京，又促我让步，教仁血案，我力主兴师讨袁，又不听从，迁延时日，以至于开战即败。这一系列血的教训，鉴于以往散漫不统一的弊病，此次建党，特别强调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

廖仲恺等人则同意孙中山的主张。

1914年6月22日，在东京召开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到会者有八省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孙中山被选为总理。

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到会者三百余人。孙中山在会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总理职务。他公布了手书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规定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在宪法颁布前，“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负责。”

并规定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种，各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即在起义以后到宪法颁布的时期内，首义党员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协助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通党员只有选举权。

由于许多革命党人因反对按指印、立誓约，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原同盟会中的一些重要成员，如黄兴等人也没有加入。会议讨论决定了领导机构：总务部长陈其美，党务部长居正，军务部正副部长为许崇智、邓铿，政治部正副部长为胡汉民、杨庶堪，财政部正副部长为张静江、廖仲恺。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国内支部专事组织武装讨袁，海外支部负责筹款。

中华革命党建立后，孙中山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武装斗争方面。他继续四处奔走，筹措军费，组织力量，策动讨袁起义。孙中山这种不展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为革命事业而英勇奋斗。

革命伴侣宋庆龄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困难、最感孤独的一段岁月，在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孙中山得到宋庆龄的巨大支持和鼓舞。

1913年9月的一天下午，孙中山正在闷热的屋子里看报、写文章。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两个气质不凡的年轻姑娘来到孙中山的住处，一进门就叫起来：“孙先生，你猜是谁来了？”

孙中山放下手中的报纸，抬头一看，原来是老朋友宋耀如和他的女儿宋霭龄，还有一位姑娘似乎很面熟，不禁仔细打量起来，只见她身着合体的西式服装，两只眼睛明亮有神，她向孙中山恭敬地鞠了一躬，问候道：

“孙先生，您好！”

“小罗莎！罗莎蒙黛！”孙中山猛然认出面前这位美丽的姑娘，就是老朋友宋耀如的二女儿宋庆龄，禁不住高兴地叫起来。

七八年未见，他心目中那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友谊，看到宋庆龄，不由得想起了与宋耀如从相识以来的件件往事。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又是一个民主革命者。他早年随同他的舅父到美国波士顿谋生，后来依靠亲友的资助，进入田纳西州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读书。

1886年毕业后，即归国在上海从事宗教、教育和实业方面的工作。他在上海协助组成第一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从事对非教徒的传教活动的同时，还创办了一家印刷所，取名“美华书馆”，出版大量中文圣经，并秘密印刷过不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

1994年春天，孙中山为了谋求民富国强，偕同乡密友陆皓东来到上海，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上海一个基督教布道团任布道者的宋耀如。当时宋耀如不满三十岁，由于他出身贫穷，懂事之后，在美国求学与事业上屡遭外国人的歧视，加上他回国后常在苏州地区巡回传教，目睹了江南一带老百姓艰难困苦的生活，从而对满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不满情绪。

孙中山与宋耀如有很多有趣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广东人，平时说话讲的是同一种方言，又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先后都在国外接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又同是基督教徒。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改变祖国命运具有宏大的抱负。因此，孙中山与宋耀如相以后，两人一见如故。

在相交过程中，宋耀如非常钦佩孙中山的政治见解和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他当即邀请孙中山搬到他在上海郊外新建的一栋房屋里居住，并尽其力量，支持和资助孙中山赴天津上书李鸿章，陈述改革国政的主张。不料，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置之不理。孙中山返回上海，恍然长叹，对宋耀如说道：

“如今我才知道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是难以实施的，要想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不得不采取强迫的手段。”

孙中山决定奔走海外，联络华侨，组织政党，募资金，再回国策划武装起义。宋耀如对孙中山上书失败之事也非常气愤，十分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他多方疏通关系，与友人一道设法为孙中山代领了一张出国护照，并

给了孙中山一笔盘缠，让孙中山出国到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

时隔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的军队屡战屡败。宋耀如觉得革命时机已趋成熟，便写信给孙中山，要他迅速回国，不要错过时机。

孙中山接信后，就从美国回到香港，在香港开了一间挂着“乾亨行”招牌的小商店，作为筹备广州起义的总指挥部兼补给站。次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逃往海外，宋耀如仍在上海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支持孙中山的工作。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耀如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利用自己的印刷所，为同盟会印刷文件以及革命宣传品。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组织过近十次武装起义，宋耀如都积极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筹集经费。

宋耀如共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宋庆龄排行第二，姐姐宋霭龄，妹妹宋美龄，弟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宋耀如夫妇对待自己的孩子男女平等，一视同仁，都给予新式的、正规的、优等的教育。1893年1月，宋庆龄出生于上海，幼年时在上海中西女子学校读书，性格娴静、温雅，天资聪颖。1908年，她留学美国，1913年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

在宋庆龄的童年时代，由于孙中山经常访问宋耀如，同宋庆龄也经常见面。通过一些谈话和日常的接触，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在宋庆龄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七岁那年夏天，孙中山从日本横滨秘密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停留时间不长，但曾几次与宋耀如讨论反清革命的问题。宋庆龄见到孙中山这一位不凡的来访者，被他和父亲的谈话所吸引。她听见孙中山说：

“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选择管辖我们自己的人，选择制定法律的人。我们应该有一切的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为这个目的而死。”

宋庆龄坐在一旁不声不响，听到这里，突然轻轻地应声说：

“我也要同你一样。”

孙中山立刻对她说：“不错，庆龄，你当然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我。”

宋庆龄小小年纪说出的这一句简单插话，使孙中山和宋耀如大吃一惊。宋耀如早就觉得庆龄与她姐姐、妹妹以及一般女孩子不一样，不大注意吃穿打扮，而对周围的事情却具有超过她这个年龄阶段的机智和敏感。

打这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孙中山更加尊重，逐渐发展成为对孙中山的爱戴和崇敬，并将孙中山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她经常说：“我要向孙中山那样生活。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就忘记了一切，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但却担心着中国。”由此看来，宋庆龄后来与孙中山的结合，并走上革命道路，而且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并不是偶然的。

往事历历，当宋耀如一家三人来到孙中山面前时，他倦意顿时消失，感到非常亲切，不禁喊出了宋庆龄幼年时的爱称：小罗莎。

“孙先生，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的幼名了，我已经二十岁了，是个大人了。”宋庆龄微笑着说，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庆龄小姐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孙中山让坐后关心地问道。

“我是8月底到达横滨的，在美国已经大学毕业了。”宋庆龄回答。

孙中山又向宋耀如问道：“最近肾病好点了吗？”

“好是好些了，只是坐久了不行。许久没来帮你处理英文信件了，最近一直很忙吧？”宋耀如看着孙中山消瘦的脸庞，说：“我打算让庆龄帮帮你的忙。”

原来，宋耀如夫妇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随同孙中山到了日本，帮助孙中山筹集资金，处理一些英文方面的事务。宋蔼龄在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后，正式担任他的英文秘书。

打那以后，宋庆龄在父亲和姐姐的陪同下，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从9月16日到9月25日这十天时间里，宋庆龄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孙中山七次。这样，宋庆龄很快地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1914年3月，孙中山腹部疼痛，生活不便，宋庆龄坚持要和姐姐一道去孙中山的寓所进行护理。5月以后，庆龄便单独前往孙中山住处，开始为孙中山承担更多的秘书工作。9月，宋蔼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这时，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不多，宋霭龄一离开，工作明显紧张起来。

宋庆龄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对孙中山有了更深的了解，她决心以自己的努力，为孙中山分忧。有一天，宋庆龄在处理好一批函电，整理好资料后，对孙中山说：

“孙先生，我考虑几天时间了，我想正式接替我姐姐的工作，给您当秘书。”

“你确实很适合做这个工作，但我却是个时刻和监狱、死神打交道的人，你很年轻，应该得到幸福。何况我现在已经不是大总统了。像你这样毕业于世界著名高等学府的优等生，不管是去大学任教，还是去企业任职，在美国或日本都是极受欢迎的。”孙中山婉言谢绝。

“您如果还是大总统，追随您的人一定很多，就不需要我的帮助了”，宋庆龄固执地要求说，“正因为你现在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我才愿意义无反顾地追随您革命！”

孙中山十分感动地说：“我知道您从小品德高尚，富有同情心，可是，我现在身无分文，衣食不能自顾，连栖身之所也难以固定。如果还有什么值钱之物的话，那只有这颗脑袋，袁贼正用重金收买它！您跟我当秘书，会时刻伴随着饥饿、困苦，甚至生命危险！”

“孙先生，这些我都不怕！”宋庆龄坚定地说，“我愿随同先生革命，唤醒东亚睡狮。就是刀山火海，我也敢闯。先生，请答应我的要求吧！”

孙中山沉默不语。宋庆龄继续说：“我曾婉言劝我姐姐，希望她在您眼下最需要得力助手的时候不要离开您，可是她……”庆龄感情十分真诚，略微停顿一下，接着说：“先生，您是一定要革命到底的，您的建国主张也是一定要付诸实施的。正是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我才来到您的身边，先生难道还不理解我吗？”

“庆龄！”孙中山激动得热泪盈眶，猛地转过身来，紧紧地握住宋庆龄纤嫩、白皙的双手，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你！”

宋庆龄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后，更加勤奋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所有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其它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承担起来并完成得十分出色。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他看到孙中山数十年如一日，为革命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不由得心中无限敬佩。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下，她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革命的信心和积极性也大大增强。她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她曾写信给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做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还曾默默地自言自语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孙中山在一再失败的痛苦和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中，也从宋庆龄的支持鼓舞和帮助照顾中得到了安慰。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理想。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并且开始默默地相爱。这时，由于孙中山长期奔波海外和分居，已与原夫人卢慕贞协议离了婚。

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决心与孙中山结合。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自己的婚事回到上海征求家人的意见。其时她的父母已经因为身体不好而回国内多日。当宋庆龄提出要和孙中山结婚时，遭到全家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认为这门亲事是极不合适的，双方年龄悬殊过大。宋耀如觉得自己与孙中山年龄同庚，又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现在要做他的岳父，简直是不可思议。姐姐和远在美国的妹妹得知此事，也大惊失色地表示反对，苦口婆心地劝宋庆龄改变主意。

平时温柔孝顺、极重姊妹感情的宋庆龄，不为亲人们的压力和意见所动摇，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勇敢地与孙中山结合了。

1915年10月25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先生的寓所里举行了一场不寻常的婚礼。客厅的正墙上悬挂着一幅新的耶稣浮雕。孙中山和宋庆龄胸前戴着大红绸花，并肩靠在一起，接受大家的祝贺。孙中山今天显得更加风度翩翩，英姿勃勃。端正俊秀的脸庞上，一双智慧有神的眼睛闪着幸福的光芒。他天庭开阔，挺直的笔梁下，两撇短须微微翘起。今天，他身着一套崭新的咖啡色西装，衬上紫红色领带，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宋庆龄在美国读书时就是一个有名的东方美人，今天显得格外迷人。她没有穿时髦的结婚礼服，而是头戴一顶宽边花帽，身穿一件浅绿色的薄呢大衣，外罩一件精心编织的毛线衣，惊人的美丽之中又显露出沉静的气质。婚礼简单而又隆重。双方的亲属都没有人参加，只有中华革命党的少数负责人和日本朋友参加了这个朴素的婚礼。

和田瑞律师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按照教会的程序和仪式，为这两位献身革命的中国人主持了严肃庄重的结婚礼仪。

“尊敬的先生，您愿意这位女士做您的妻子吗？”

“愿意！”

“尊敬的女士，您愿意这位先生做您的丈夫吗？”

“愿意！”

“愿上帝赐福你们，永远相爱，白头到老。阿门！”

宣誓以后，和田瑞律师带领一对新人在耶稣像前虔诚地画着十字，接着又让他们在婚姻誓约书上签了字。

当天下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新宿区百人町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里，举行了茶点会。一直到暮色苍茫时分，他们才雇了一辆马车，来到青山原宿109号的新房。

夜深了。在陈设简单的新房里，孙中山还在和宋庆龄娓娓而谈，说不完的情深意爱。忽然，孙中山走到书案前，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只红绸包裹的精美首饰盒子，双手捧着，庄重地送到妻子面前：

“庆龄，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宋庆龄看见丈夫突然变得严肃的目光，连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孙中山紧挨着妻子坐下来，低声说：“你打开看看吧。”

宋庆龄揭开红绸，打开盒子，只听她“啊”的一声，睁大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原来，盒子里装的是一支簇新发亮的袖珍勃郎宁手枪。

“庆龄，没想到我会送你这么一件礼物吧。”孙中山把手搭在妻子肩上，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我们的生命会随时发生危险。你看，这支手枪配了二十发子弹，前面十九发是给敌人的，最后一发是在危急时刻留给自己的！”

“我懂了，亲爱的”，宋庆龄靠着丈夫结实的肩头，用英语轻声而坚定地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绝不会当敌人的俘虏！”

“也许，我不该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说这些话”，孙中山脸上又浮现出和蔼可亲的笑容，说，“可是，正因为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才选择了这件不寻常的礼物送给你。从今天起，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只有这件礼物，才能表达我的肺腑之言和海一样深的爱情！”

宋庆龄听了，猛地站了起来，宣誓般地说：“先生，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一定学会打枪！”

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结合，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此后的岁月证明，这桩婚事对孙中山最后十年的革命活动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袁世凯称帝

当孙中山在日本逐步展开反袁斗争时，大野心家袁世凯正在国内步步紧逼地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为了实现其最终的帝制野心，他决定首先要使自己成为正式大总统。于是便在1913年10月导演出暴力胁迫国会选举的闹剧。

袁世凯原来以为，他扑灭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的烈火，击败了国民党的军队，向全国发出了追捕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要人的通缉令，这么一来，国会里的国民党议员一定会吓破了胆，服服帖帖地选他当正式大总统。可是，他派出去探听消息和拉选票的爪牙回来一报告，使他大吃一惊，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众、参两院的绝大多数国民党议员压根儿不投袁世凯的票，而且这些议员中的大部分人还不为金钱所动心，爪牙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上几张票。

袁世凯这下子真慌了神。如果正式大总统选不上，他这张老脸往哪搁？更重要的是他蓄谋已久的皇帝梦将难以实现。恼怒之中，他想马上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又感到不妥，因为总统尚未选举。没有国会的认可，总不能自封为正式大总统呀。

“你们可有妙计良策，嗯？”袁世凯召集手下人商议对策，向在座的人发问。

大家七言八语，有的建议再多花点钱运动运动国民党的议员，有的则认为时间来不及，还是想想别的办法。

“我看……”袁世凯急了，瞪起了布满血丝的眼睛，大声嚷道，“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还是硬的好，干脆一点。”

袁世凯的干儿子段兰贵马上附和干爹的意见，低声说道：“来硬的好，我想让拱卫军出阵。”

“妙！”袁世凯一巴掌拍在太师椅的扶手上，得意地站起来说，“告诉弟兄们，事成之后都重重有赏。哈哈……”

10月6日，选举正式大总统这一天早晨，几百名军警、侦探、兵痞等人穿上了从衣铺租来的便服，组成了所谓的公民团，直奔宣武门内国会街国会大门，另有一支便衣赶到国会后门。这两支队伍将国会团团围住，高喊：

“今天不选出大总统，不准散会，不准离开会场！”

会场内，国民党议员和其它方面社团的议员又吵吵嚷嚷了一阵时间，才开始投票选举。唱票结果，袁世凯仅得半数票，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得票必须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才能当选。

这时已近中午，议员们想趁休息之时，到外面饭馆里吃点东西。刚走到大门口，就被公民团的人挡住了：“进去，都给我进去！没选出大总统休想回家！哼！”

议员们一见这吵吵嚷嚷的阵势，特别是看到有的公民团成员便衣里面的军衣领子、袖口，知道今日事态严重，想溜走肯定不行了。

会场里乱了套，有的抗议，有的喝白开水，有的吃着早有准备的面包点心。

第二次选举，计票结果，袁世凯仅比第一次多了几张票，还是没通过。气得袁世凯在电话里骂娘。

这时，天气已晚，一些据理力争、要回家吃饭的国民党议员与国会大门口的公民团争吵起来。公民团成员凶相毕露，有少数几个人从腰间掏手枪，

威胁说：“进去！乖乖地投了袁总统的票，就可以放你回家。”

晚上9点多钟，第三次投票。还没过一袋烟功夫，大会主席就宣布：

“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

这时，许多国民党籍议员没等宣布散会，便一个个离开会场走了。

袁世凯就是这样登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0月10日，在以前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了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在天安门举行了阅兵典礼。

接下来，袁世凯又视《临时约法》为障碍，于次年的5月公布了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1912年的《临时约法》。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享有外交、财政、军事、制定宪法、制定官规官制任免官员等一切大权。并撤销国务院，设立政事堂。年底，又搞了一个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总统推荐，人名则暗藏于一个坚实的石室里面。选举时，只要将名单取出唱和一下就算通过。根据这些规定，袁世凯就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而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野心膨胀到这一步，袁世凯还不满足，一心想当皇帝，梦想恢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各国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东方各国的掠夺，日本趁机扩大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看出了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狼子野心，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谒见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说：“若开诚交涉，日本政府从此对袁世凯遇事相助。”后来又对负责交涉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说：“中国如想改国体复辟帝制，日本政府必将赞成。”说白了就是，只要袁世凯愿意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就支持他做皇帝。

丧心病狂的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竟在5月9日接受了这个条约。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的罪恶交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广大爱国群众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愤怒斥责袁世凯及其走狗的卖国罪行。

为此，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发表了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的交涉真相，把袁世凯的卖国勾当和复辟帝制阴谋联系起来，号召革命党人坚决进行反袁斗争。当1915年初袁世凯正与日本帝国主义交涉时，孙中山便命令胡汉民前往菲律宾，邓铿、许崇智等前往南洋筹款，并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10月，中华革命党派王皖峰、王明山在上海刺杀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郑的汽车行至外白渡上，他们扔出炸弹，将郑汝成当场炸死。12月初，又发动了上海肇和军舰起义，被袁世凯的心腹用重兵镇压。

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和中华革命党发动的反袁斗争，没有遏止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相反，袁世凯在镇压了反袁暴动和爱国运动后，用国家民族的权益换取了帝国主义支持，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发布命令，承认帝制。13日，举行典礼，接受百官朝贺，准备于新年元旦正式即皇帝位。

12月13日那天，天空阴沉沉的。早晨8点多钟，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各部头目和各军队师长以上的文武官员，还有社会上的名流、绅士，以及各国驻华公使馆外交官员，都聚集在中南海居仁堂门外，等候传进大厅朝贺。

9时许，袁世凯的干儿子段兰贵喜形于色、神气十足地高声宣布：

“洪宪皇帝登基，百官朝贺典礼开始！”

参加今天这个“旷世盛典”的文武百官都是早晨才接到通知，便慌慌忙

忙赶来的。就要朝贺了，众人还不知该行何种礼仪，是三鞠躬的新礼，还是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谁都吃不准。

居仁堂大厅里，上首摆设龙案龙座，绣缎帷垫，一片金黄。龙座两旁均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世凯的几个卫士排列在座后两旁。袁世凯没有坐上龙椅，只是站在龙椅旁，左手扶着龙椅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朝贺者点头致意。奇怪的是，袁世凯今天没有穿上赶制的龙衣，也没有戴皇冠，只穿着海陆军大元帅戎装，连那顶叠羽的元帅礼帽也没戴，就这么秃着肥大的脑袋。

文官武将事前暗暗约定了行三鞠躬礼，礼毕即退出大厅。轮到身穿褂袍的满族及蒙古族王公、绅士上殿朝贺时，这些人纷纷下跪，行大礼，结果下跪姿势不一，叩首也很不整齐，大殿上恰似一群大花公鸡在啄米，此起彼落，有的还当场摘帽，得意洋洋地甩出一条盘藏在头顶几年的大辫子，真是无奇不有，丑态百出。到各国公使朝贺时，袁世凯赶忙讨好卖乖地堆起笑脸，不停地朝洋人们点头致谢，一副奴才相。

朝贺礼毕，文武百官、名流、绅士、王公贵族们，冒着凛冽的北风，一个个站在居仁堂外，等候洪宪皇帝封赠颁诰。哪知礼毕后，大厅上空荡荡的，连万岁爷的影子都不见了。在堂外久候的文武百官和袁家的亲信，感到大失所望，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原来，今天一大早，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干儿子段兰贵就捧着皇帝衣冠来到袁世凯的卧房，请他更衣，谁知几位机要秘书接二连三地送来各地报告革命军暴乱的急电，还有一份是孙中山在东京发表的《讨袁宣言》，吓得袁世凯临时决定不穿龙服，改着大元帅礼眼，礼帽也忘了戴，就战战兢兢地走进居仁堂，龙椅也不敢坐，身在殿上，心又悬挂着那份《讨袁宣言》，封赠颁诰的事也因吓忘得一干二净。

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袁世凯称帝的消息，怒不可遏，他立即在东京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彻夜未眠，伏案疾书，愤怒地写下了《讨袁宣言》。妻子宋庆龄一边译成英文，一边打字。次日，天边刚吐鱼白，这篇讨袁檄文就由日本朋友向全世界发布了：

……今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百姓无安宁了；解散国会，国家无正论了；滥用公款，谋杀人才，使国家陷于危险地位；假民党狱，陷害无辜良民。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既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既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国民！今长江大河万里以内……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义动天地……犁庭捣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正义所至，何坚不破，愿与爱国之豪杰共图之。

袁世凯当日读到这份讨伐他的宣言，又气又急又怕，一边吹胡子瞪眼，一边擂桌案跺地板。他令人发出密电，限时间，增赏银，要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

1916年元旦，是袁世凯宣布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的第一天。称帝以来的十几天时间，袁世凯过得并不舒坦，各地反袁的呼声日益高涨，皇帝的宝座能否坐稳还很难说。

这时，孙中山正针锋相对，密电指示国内各路中华革命军准备起事，于是很快就爆发了讨袁护国战争。

护国战争

袁世凯公然称帝，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及全国各地的反袁爱国力量，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早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就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干部深入各省进行联络策动讨袁工作，其中云南的发动工作颇有成效。云南的军政骨干，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富于革命思想，有比较浓厚的民主共和意识，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嫉恶如仇，早就在酝酿着反袁斗争。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负责人吕志伊于1915年夏受孙中山的委派，由日本回到云南，秘密从事反袁的组织发动工作。他在云南军政界发展了一批中华革命党员，为云南护国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

吕志伊在对云南的状况进行分析后，向孙中山汇报，打算首先争取云南的实力派人物唐继尧将军，希望他对讨袁义举能积极支持，如果他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可以拥护他作为云南讨袁的领袖。孙中山对此表示赞成。

唐继尧对袁世凯的罪恶勾当也十分痛恨，他感到孙中山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讨袁旗帜，便派人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孙中山能“登高一呼，使各地都响应”，还说，“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都义愤填膺，誓不与袁贼共视息”。唐继尧还表示，一切机宜，随时等候孙中山的指示。于是，孙中山指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从香港赶到昆明，酝酿起兵。

这时，推倒袁世凯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也应运而生，这就是蔡锷。武昌起义时他曾在云南积极响应，担任云南都督，现在也下了打倒袁世凯的决心。袁世凯对这位年轻有为的蔡锷将军既赏识又害怕，想了很多办法收买蔡锷，许以高官厚禄，蔡锷不为所动。袁世凯称帝前，将蔡锷请到北京，表面上是商量国事，实际上是将他软禁，怕他回去闹事，蔡锷则借治病的名义，秘密地摆脱了袁世凯在北京对他的严密监视，巧妙地化装后跑出居所，到了日本。在日本，蔡锷又写了许多假信给袁世凯的亲信，报告他游览和养病的情况，使袁世凯觉得他确实在日本。然后，蔡锷悄悄地回到了他的根据地云南。

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称帝后的十多天，在革命党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的支持下，蔡锷宣告云南独立，成立了护国军。大家献血为盟，刺破手指，沥血于酒坛内。誓词是：

“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共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明神必殛。”

宣誓完毕，各人饮血酒一杯，然后焚化誓词，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三声。

护国军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第一军的讨伐路线是出四川入武汉，当时朱德同志就是第一军第三支队的司令。第二军讨伐路线是经广西、广东、取道湖南、江西到武汉，与蔡锷的第一军会师，再分兵向北挺进。唐继尧的第三军担任留守，负责粮饷供给。

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了讨袁檄文。整个昆明市沸腾起来了，各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手举旗帜，参加游行。人们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报名参军的人十分踊跃，十天内征召新兵达五六千人。1916年1月16日，护国军兴师出发，昆明市群众情绪极其热烈，商

家门面，重要街道都悬挂横幅，市区主要路口都搭起了彩棚，自发涌出家门的老百姓含着眼泪欢送护国军出征。海外华侨听闻云南举起了讨袁的旗帜，也以实际行动支援。南洋侨胞在此之前已经汇款七十余万，获悉云南独立后，又电汇一百余万元。美洲华侨和澳洲的华侨也纷纷来电认捐，总数在二百万元左右。

国内群众和海外侨胞的拥护支持，大长了护国军的志气，官兵们士气旺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袁世凯一看阵势不妙，急忙调兵遣将，派三个师的兵力取道重庆进驻泸州，另派两个师进入贵州，又电令川军的部队加强川南一带的防守，同时派部队由广东进入云南，妄图以优势兵力，迅速扑灭护国战争的烈火。

护国军中，有很多军官原先就是革命党人，四十八名将领中就有二十七人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或中华革命党员，他们奉孙中山为领袖，在创造共和国的斗争中曾经浴血沙场。在这次护国战争中，这些将领更是身先士卒，英勇作战。

护国军在川南一带与袁世凯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在当地武装力量的配合下，又得到贵州都督五万元军饷的支援，3月下旬，势如破竹地攻占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聂江等县，北洋军全线崩溃，护国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云南宣布独立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开始发动了武装斗争。孙中山先后派朱执信在广东，居正在山东，程潜在湖南，于右任在陕西，石青阳在四川，夏之麒、毛福全在江西，陈其美在江苏组织起讨袁的队伍，在各省部分地区迅速打开了局面。

随着护国战争的进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反袁的高潮，除云南外，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连他的心腹亲信也开始分裂。先是黎元洪请求辞去副总统职，迁去东厂胡同，不再到公府议事，同时要求撤销武义亲王的爵称。徐世昌也请辞国务卿职，迁出了官邸。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要求辞职或请假出京。护国战争正在进行中，袁世凯手下的五名将军准备联名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这对他无异于当头一棒。在云南等省宣布独立以后，一度十分热衷于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芑铭也先后宣布独立。

在举国上下的讨袁声中，袁世凯自知大势不好，于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妄想仍然保持总统的地位。但此时全国反袁呼声不断高涨，各地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反对袁世凯继续当总统，并要求对他惩办。江苏的一个社会团体在声明中说：“袁世凯已经构成谋叛之罪，丧失了总统资格，要等待国民组织特别法庭听受裁判。”

在这样的形势下，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与廖仲恺、张继、宫崎寅藏等人自日本乘坐“近江丸”轮启程回国，5月1日抵达上海，亲自主持讨袁事宜。5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宣言强调指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同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表达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血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对那些类似袁世凯之流的野心家提出了警告。

当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并没有收敛自己的罪恶行为，他与他的爪牙们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怀有刻骨的仇恨。5月18日，孙中山的亲密战

友和重要助手陈其美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寓所里会客，不幸被袁世凯的爪牙刺杀殉难。孙中山闻耗，亲至现场抚尸痛哭，悲愤欲绝。黄兴和海内外的革命党人、爱国志士闻讯后也都失声痛哭，一致愤怒声讨袁世凯的血腥罪恶。

为了使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军能够协同作战，孙中山在上海向各省的讨袁军致电，要求各方面互相配合，协同一致，声讨国贼。并给正在日本的黄兴写信，详细述说了国内的情况，委托他筹款购买军械，希望黄兴到上海来，共同商量大事。

云南等八省将军的先后宣布独立，对袁世凯是个很大的刺激，等于是给他当头一棒。尤其是四川陈宦和湖南汤芑铭这两人，一直受到袁世凯的宠信，他们竟也宣布独立，这简直如两把尖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加之孙中山由日本回国，袁世凯更觉得自己的末日可能真的要来临了。他渐感头重脚轻，不能自主，病倒在新华宫。洪宪皇帝的美梦成了泡影，原先打算好的太子继位的戏当然更无法再演下去，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此时，北洋军内部围绕袁世凯转的已经为数很少了。他的心腹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另一名亲信冯国璋也在南京与护国军暗通声气，其他的亲信和将军们也都各有各的打算，脚踏两只船。袁世凯在一片讨袁声中，已经无力回天了。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情加重，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又是抽血又是打针，忙忙碌碌抢救，仍然无效，一命呜呼去了！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袁世凯这个短命皇帝连同他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终于在众叛亲离、楚歌四起和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首举护法旗帜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了大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但是，天下依然没有太平，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依然没有完成。古老的天安门前依然是尘土飞扬，人力车夫拉车慢吞吞地走着，大街上的帝国主义分子则旁若无人地昂首阔步。故宫里面，享受优厚待遇的末代皇帝依然接受百官的行礼。街头，间或见到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的年轻大学生……中国的政局处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之中。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失去了袁世凯这个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都在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得力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的现象。北洋军阀系统中，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以冯国璋为首，东北的奉系则以张作霖为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把持北京政府，控制了皖、陕、鲁、浙、闽等省；直系的后台是英、美帝国主义，主要地盘有苏、赣、鄂三省，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东北的奉系也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各省也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除南方六省外，各省的军阀都直接或间接地处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

南方六省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各省，也由地方军阀统治着，其中最大的势力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这两个派系军阀都属于亲英、美的势力，滇系范围涉及云南、贵州，曾向四川扩张过，桂系则占据了两广的地盘。

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操纵下，各派军阀势力争夺地盘，扩张势力，彼此争战不休，把诺大一个中国，搅得民不聊生，山河破碎！

在北京，中华民国也只是一个招牌而已。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也发生了尖锐激烈的“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院”是国务院。到1917年春天，“参战问题”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爆发剧烈冲突。段祺瑞提出对德参战案，黎元洪和国会坚决反对。其实，斗争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参战，而在于由谁主持参战，以便从中捞到可观的帝国主义借款，借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黎元洪利用国会和美国的支持，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则指使皖系督军所在八省脱离中央，在天津设立“总参谋部”。黎元洪为了对付段祺瑞，邀请张勋予以调停。

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的名义，从徐州率领了三千辫子军北上，滑稽的是，张勋并没有帮黎元洪的忙，而是干起了复辟的可笑勾当，他先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于7月1日凌晨涌入清宫，与旧王公贵族和封建遗老一起重新把已宣布退位的宣统皇帝扶上宝座，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

张勋一伙开历史倒车的丑恶行为，很快便陷入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各地军阀对此当然不敢轻易表态。但张勋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并使黎下台，倒帮了段祺瑞的忙。于是，段祺瑞看准时机，组织了讨逆军，宣布讨伐张勋，成为反对复辟、再造共和的英雄。复辟的丑剧十二天后便破产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张勋逃入东交民巷的荷兰使馆。这场风波之后，黎元洪下台，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新上台任国务总理，把持了中央政府大权。

在此情况下，段祺瑞对德宣战已无障碍，便正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参战为名，段祺瑞政府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组成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

实力，实行“武力统一”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则企图通过段祺瑞的卖国政府来实现它独霸中国的野心。

孙中山面对如此浊波横流、变乱迭生的政局，不禁痛心疾首，义愤填膺。本来，孙中山一直十分看重总统、国会、宪法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他认为由各党派选举产生的国会是民国的重要标志，《临时约法》则是民国的保证，约法与国会，是共和国的命脉。如果听任国会解散，约法废弃，则几十年为之奋斗的革命业绩，将全部毁于一旦，这是革命党人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孙中山主张对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于是，便于1917年夏天，发起了护法运动。

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等人，乘军舰赴广州，建立护法根据地。7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督军陈炳焜到黄埔江岸迎接，当晚，召开了欢迎会，孙中山发表了护法演说。他指出：

“中国的共和，已经实行了六年，但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共和的幸福。其主要原因是掌握共和政权的人实行的是假共和，仍然以专制的手段对付老百姓。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共和，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对军阀实行武力。”

此后，孙中山通过上海、天津各报馆电邀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海军总长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联合通电拥护护法，并于22日率海军第一舰队由浙江省吴淞口开赴广州。部分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对抗段祺瑞，附和护法。

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了由一百三十名议员参加的“非常国会”，议决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

9月1日，非常国会会议根据《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出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当天下午，在黄埔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大元帅受印典礼。

正当孙中山等候陆荣廷、唐继尧来广州任职的时候，陆荣廷自广西、唐继尧自昆明分别发来电报，表示不接受元帅之职。原来，这两个人既想借孙中山护法的旗号以图自保，又不愿意与北洋政府完全决裂，以图留有圆转的余地。

孙中山心急如焚。陆、唐二人不肯就职元帅，对护法的军事实力来说，明显受到极大削弱。在电催久等之下，孙中山下定决心说：“我不能再等待了！”他告诉朱执信，“马上与非常国会联系，我决定于9月10日，就在尚未修复完工的士敏土（水泥）厂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

9月10日那天，晴空朗朗，广州珠江波涛翻滚。孙中山身着特制的大元帅礼服，手持大元帅指挥刀，乘军舰前往位于珠江南岸的士敏土厂就职。虽然这里仍处在紧张的修缮之中，但经过几大的突击修整，可以看出军政府就职典礼的气氛：台上挂着醒目的横幅，两旁各悬挂一面五色大旗，原来破败的小礼堂陡然亮堂起来。

典礼仪式简单，礼堂也很简陋，气氛沉寂庄重。孙中山没有顾及这些条件礼仪之类，声音朗朗，喜气洋洋地宣读了就职宣言，好像是在庆贺一个盛大的节日。仪式完毕，孙中山来到小礼堂左边的一块空地上，身后不远处是刚

修建起来的围墙，脚下是零乱的石头和土块，就这样让摄影师拍了照，留下了难忘的镜头。

军政府成立的当天，非常国会还选出了各部总长如下：内务总长张洪伊，外交总长伍廷芳，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交通总长胡汉民，财政总长唐绍仪。孙中山又以大元帅名义任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林葆懌为海军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亲军总司令，章太炎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谋长，李耀汉为筹饷总办，廖仲恺协助管理财政。这样，一个与北洋反动政府相对峙的广东革命政权建立了。

遗憾的是，陆荣廷与唐继尧一直不肯与护法军政府合作，使这个无“军”的军政府陷入困境。孙中山为了力求能在广东站住脚，只能对他们一再让步，委屈求全。他主要的依靠力量是程璧光的海军和与桂系军阀矛盾重重的驻粤滇军以及粤系地方军队。军政府成立后，财政十分困难，仅靠华侨有限的捐款来维持正常开支。桂系军阀对孙中山实行财政封锁，企图扼杀军政府。孙中山手中没有掌握军队，广东省长朱庆澜愿意交出亲军二十营，但遭到了桂系军阀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在广东各界的支持下，经多方周旋，最后任命了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带领这支广东部队进入福建，躲开了桂系军阀的猜疑和压力。

就这样，孙中山在西南军阀并不合作的情况下，于10月间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出师北伐，勇敢地向北洋军阀挑战，以谋求革命的统一。北伐军挺进湖南，与北洋军队激战于湘南一带，开始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便处于胶着状态。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在闽西南打了一些胜仗，攻占了部分县城，部队也由原来的几千人扩充到二万人左右，到这时，孙中山才算有了一部分军队。

护法战争开始后，段祺瑞政府命令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段祺瑞工于心计，他认为这一招既可以借直系军阀力量消灭护法军，又可以利用护法军削弱异己势力，使双方消耗兵力，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

冯国璋则另有打算，他想与南方军阀周旋，排挤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夺取中央政府权力，于是便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唱反调。

在冯国璋的命令下，直系军队在湖南实际上并不积极进攻，他们不想为段祺瑞卖力地打仗。加之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地的直系督军联合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段祺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被迫辞去了国务总理的职务。

然而，段祺瑞并不死心，他又找到日本帝国主义做靠山，指使他的部下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进关，对冯国璋进行武力威胁。此外，他也仿效冯国璋的做法，唆使皖系督军团通电要求段祺瑞复职。冯国璋迫于无奈，只得再任命段为国务总理。

段再次上台后，皖系占了上风，又大呼“武力统一”的口号，反过来再次压迫直系军阀对南方作战。直系的曹錕、吴佩孚在湖南打了胜仗，攻占长沙，段祺瑞却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借机扩大皖系的地盘。曹、吴二人对此当然恼火，便按兵不动。

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正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他们所以动用了一部分军队参加了“护法战争”，不过是对付段祺瑞威胁的一种权宜之计，所以他们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与直系暗中勾结。吴佩孚借机在湖南衡阳与佳系

军阀达成和解，湖南战事平息了。

这时，桂系军阀便不肯再按照孙中山的号令继续北伐。他们觉得孙中山这个大元帅成了他们与北洋军阀勾结妥协的障碍，于是反过手来，拆军政府的台，并图谋排挤孙中山。桂系军阀还将海军总长程璧光视作眼中钉，非要把它拔掉不可。一天，程璧光乘艇横过珠江，在刚抵海珠对岸码头时，陆荣廷派来的凶手向他连开数枪，程璧光当场倒在血泊之中。程璧光被暗杀，使孙中山的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对西南军阀来说，除掉程璧光不是最终目的，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排斥孙中山。他们勾结直系军阀，内外呼应，反对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直接提出要改组军政府，把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

孙中山对此寸步不让。他打电报给唐继尧，表明了对北洋军阀不能作丝毫让步的坚定态度，同时督促各军要坚持北伐，讨伐段祺瑞。孙中山还约请了全体国会议员到军政府谈话，严厉地提出质问：改组军政府这件事是关系全局的大举措，国会怎能不事先征求军政府的意见就突然提议？这种做法符合情理吗？孙中山态度坚决地表示：根本反对改组军政府，即便改组后当选为总裁，也决不赴就。

在桂系军阀和其他政客的收买操纵下，1918年4月1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

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于5月5日发表了辞职通电。孙中山在通电中追述了一年多来护法的过程，斥责桂系军阀们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西南军阀们的阴谋得逞了。5月20日，他们操纵了国会非常会议，根据所谓的修正案，选举出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懌、唐绍仪、孙中山七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孙中山虽然也被选为总裁之一，但实际权力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再也不可能贯彻他的“护法”主张。

5月21日，孙中山怀着悲愤和黯然的心情离开了广州。

孙文学说问世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加上他自己毫无军事实力，只是利用南北军阀的矛盾，采取联合南方小军阀反对北方大军阀的办法进行斗争，结果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失败了。于是，孙中山被迫离开了广州，再次来到上海。

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经日本返回上海。抵达上海码头时，很多归国学生、新闻记者和各界仰慕孙中山的人士前来欢迎。人们见到孙中山离开上海南下护法仅一年时间，须发已经斑白，纷纷议论起孙中山忧国忧民的奋斗经历，对他更加尊敬。孙中山虽然护法受挫，但精神仍然饱满，他热情地与迎接他的人握手致意，风度翩翩地回答记者的提问，没有一点灰心气馁的神色。

这时，宋庆龄因为父亲病危，已经先期来到上海。5月，宋耀如病故，宋庆龄办完丧事后，就留在上海为孙中山落实回沪的有关事项。孙中山回沪后，先与宋庆龄在环龙路（今南昌路）63号住了一段时间，不久便迁到了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这所房子，是1917年的时拿大华侨赠给孙中山的。当时，加拿大有四位华侨前来拜见孙中山。他们从卫士长马湘口中得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任大总统，连住房都没有，每月要付六十五元房租。几位华侨大为震惊，回去后召开股东会议，提议集资为孙中山购置一所住宅。再次来访时，他们向孙中山说明了来意，孙中山却说：

“送房子给我吗？不可！不可！”孙中山连连摆手，“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物？”

几位华侨恳切相劝，说：“您这样的伟人，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总得有个住处吧。”

劝了很久时间，孙中山感到盛情难却，不便再推辞了，便收下了这所房子。

在这所幽静的住所里，宋庆龄始终伴随着孙中山，给了他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孙中山由于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曾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经过宋庆龄的照料，身体日益健康。胃病也渐渐地好转了。

有时，孙中山因在家里呆了几天，心情烦闷，便与宋庆龄出来散散步，但每次上街，孙中山心里都不痛快。出门所见，满目疮痍。黄浦江上行驶的，停泊的，几乎都是挂着外国旗帜的轮船。马路上五花八门的汽车在横冲直闯，没有一辆是中国造的。大街上，外国人在趾高气扬地评头论足，目无一切，仿佛高人一等，而不少中国人却衣着破烂，满脸菜色，扶老携幼地沿街乞讨。海关的钟声叮叮咚咚地响着，但中国的关税却不能自主，海关也是洋人把持的。一种说不出的愤懑之情沉重地压在孙中山的心头，他有时仿佛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一次，孙中山不知不觉地来到外白渡桥，桥下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公园，孙中山想进去闲坐一会儿。一抬头，只见公园门上挂着一块刺眼的牌子：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孙中山仿佛遭到电击一般，不觉浑身一震，热血直往脑门上冲。他悲哀地呻吟了一声，宋庆龄赶紧扶住他，以免他跌倒。

他什么也不想再看了，喊了一辆人力车，闷闷不乐地回家去了。

这段时间里，孙中山每每想到大好河山支离破碎，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真是忧心如焚，实在有说不出的痛苦，想到自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虽然推翻了一个专制暴君，但一转眼又产生出无数的专制强盗。他一心追求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但现实情况却是“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依靠什么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他一时尚未理出头绪来。他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地读一些书，从理论上系统地深刻地思索一些重大的问题。

孙中山一生爱好读书，青少年时代求学时是这样，革命受挫折或失败时，他仍然能调整情绪，坐下来从容不迫地看书学习，研读有关革命书籍，并能融会贯通，得其要领。

在莫利爱路这所房子里，孙中山买来了很多新书，连同他原有的藏书，将他的书房兼工作室塞得满满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天清晨，宋庆龄经常陪伴他打网球，锻炼身体。早餐以后，孙中山便开始办公，有时接待来人，在一起讨论革命理论。晚上，则是孙中山读书的时间，几乎每天都看书、看报或写作到深夜。看书报时，孙中山特别喜欢铺开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有时看书累了，便要宋庆龄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著名科学家写的书。

孙中山读书的范围很广，在国防问题上，他精心收集了成套陆军、海军的年鉴；在经济学方面有许多关于财政和货币的书籍；在技术方面有各种工业、运输和城市建设的书籍；地质学的书籍也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有很多文学作品，外语手册、指南和修辞学著作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恢复和身体调养，孙中山认真读书思考，他意识到，仅仅依靠暴力手段进行革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理论上加强革命党人的心理建设，提高素质。

还是在护法运动开始的时候，孙中山曾在广州全省学界欢迎大会上作过《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著名演说。经过反复琢磨，他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为革命党内有不少人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正是革命的大敌，它能夺人之志，惑众之心。要继续革命下去，就必须驳斥“知易行难”的谬论！

孙中山认真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历，认为不是“知易行难”，而恰恰是“知难行易”。当初，他曾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多次托人疏通日本政府，请求它支持中国革命。谁知道结果总是和自己的愿望相反，日本政府先是支持袁世凯，后来又扶植段祺瑞，目的就是想独霸中国。武昌起义胜利以后，他曾奔走呼号于英、美、法等国，然而这些列强根本就不支持中国革命，即便表态也只是空头支票。在对待袁世凯的认识上，开始也看不清这个独夫民贼的真面目，多次受骗上当，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篡夺。这些事实，都深刻地说明要探求革命的真知是多么困难啊！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关心照顾下，于1918年至1919年间，在上海发奋读书，闭门著书，写成了《孙文学说》，即《知难行易学说》，作为《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一部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在这部哲学著作中，他集中了很大的笔墨，历数了“知易行难”说的种种罪状，详尽地论述了“行易知难”的道理，热情地倡导“知难行易”、“以行求知”的实干哲学。他在《孙文学说》中明确指出，一切知识都是从

行开始的，“先行后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为了通俗地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孙中山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十件事为例来深入浅出地论述。

比如饮食，这是人们生活中最普遍，人人都会做而必须做的事。婴儿一出生就能吃奶，不需要教。但是要真正懂得饮食的道理，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生理学、卫生学、医药学、化学和物理学以及科学的烹调技术等许多专门知识。即使科学发达，也难以完全搞清楚。可见，行是容易的，知是比较难的，而且是行在前知在后。

孙中山在书中列举实例之后，又进一步指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身体力行的结果。他把自己的学说，归结到一个“行”字。“行”了才能发明创造，才能科学进步。他认为那种先求知而后行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后者，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而放弃了一切。

孙中山强调的“行”，就是“实践”。因此，他的“以行求知”的认识过程，是他认识论中的唯物论。同时，他也注重知对行的反作用。在《孙文学说》中，他又列举了很多说明“知”的重要性的例子。比如人们掌握了电学的理论知识，就能以此制造出奇奇怪怪层出不穷的电机，为世界上各行各业所用。进行革命事业，也要掌握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如果革命党懂得了革命理论，又掌握了一个好的方法，那末，革命一经发动，便能够成功。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而更进于行”，“知之则易行之”的道理。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武器，阐述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指出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

孙中山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号召革命党人破除心理上的大敌，坚定信仰，勇于实践，早日使革命取得成功。他坚信，历史的潮流是滚滚向前的，民主革命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孙中山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在革命处于困难的低潮时期，许多革命党人面临信仰危机或产生动摇的情况下，起到了统一认识、鼓舞斗志的作用。

《孙文学说》一书完稿于1919年4月。当孙中山兴奋地脱稿联系出版时，却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联系，可商务印书馆认为北洋军阀政府的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担心此书出版会带来麻烦，婉言推辞了。孙中山十分气愤，只得自己掏钱，找华强书局给予印刷。书稿的清样出来后，孙中山与宋庆龄十分认真地校对了三次。6月上旬，《孙文学说》终于问世了，上海《民国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对该书作了介绍，题为《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

《孙文学说》脱稿以后，孙中山又以巨大的精力写成了《实业计划》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二的“物质建设”。早在1912年，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国的实业，奔走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已经比较系统地思考过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至今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西方经济萧条，面临解决过剩资本的出路问题，而中国要进行经济建设，迫切需要资本。因此，孙中山认为可以采用国有方式和借助外资，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就必须开发资源，发展实业，改变中国落后的手工业生产，进入工业化社会，这是中国存亡的关键。

在《实业计划》一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交通、都市、水力、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建设计划。他希望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和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建立和发展包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水

泥等在内的大工厂、大企业。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孙中山还提出建立渤海湾、杭州湾和珠江口等三个巨大的海港。同时，治理河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林、牧各业，发展纺织品、食品加工、印刷等多种轻工业，提高人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平，以及移民于东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等。

孙中山提出，吸收外资来发展实业，主权必须操在中国人手里，要以维护国家的独立为前提。发展实业的目的是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

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一书，不仅需要参阅大量中外图书资料，还要绘制各种有关的地图和统计图表。宋庆龄多次陪同孙中山到四川北路购买需要的书籍、地图和绘图器具。宋庆龄有时还帮助孙中山查阅英文资料，打字和抄写英文原稿。《实业计划》一书凝集着孙中山的无数心血，体现了他热切希望祖国早日富强的强烈愿望，描绘了一幅具有宏伟气魄的经济发展蓝图。从这些细致明确的计划中，人们可以看出，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1917年，孙中山曾经在上海写成《民权初步》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三的“社会建设”。这本书，最早名称是《会议通则》，这是一本关于民主政治的专著。后来为了名实相符，就将书名改成《民权初步》。

《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与《民权初步》三本书，合起来称为《建国方略》。随着这部重要著作的产生，孙中山对未来的设想越来越清晰了。然而，现实与孙中山的设想之间还有着巨大的差距，革命党人组织涣散、毫无生气的状况依然如故，军阀之间的争斗厮杀也未停止，经济建设的资金和人才更无着落，但孙中山坚信，革命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建国方略》中的计划也一定能够实现。

尽管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由于种种局限，还有一些缺憾或消极的东西，但是后人应该看到，在历尽艰险之后，他仍能矢志不移地忠于他的信仰和事业，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在上海集中精力著书期间，表面上是“不理外事”，实际仍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这时，国内外都出现了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变化。

就在孙中山感到十分苦闷孤独的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5月4日早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们，勇敢地走上街头，高举起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和北洋军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通过了宣言，其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他们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

“同胞们，起来呀！”

“向专制、黑暗、血腥、愚昧的社会宣战！”

五四运动唤醒了千千万万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天安门广场轰轰烈烈的集会，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像一场猛烈的风暴，冲破了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高压。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开始登上了民主革命的政治舞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及各种示威游行。

北洋军阀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面前，被迫作出了让步。6月10日，军阀政府不得已下令免除直接参与卖国条约活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的官职。

此后，北京、天津的学生又组织了一万多人的示威队伍，包围了总统府，要担任总统的徐世昌责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能在卖国条约上签字。

青年学生们的英勇的呐喊，给了孙中山新的勇气和力量。这一爱国运动一发生，立即被孙中山所重视，他深切同情、支持学生和工人的正义行动。当他得知北京政府逮捕游行学生时，立即打电报给段祺瑞，要求他释放被捕的学生。7月中旬，孙中山又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学主代表，并指出：“人民反抗的怒火愈烧愈烈，如依靠武力摧残，不仅引起广东人民的愤怒，也为全国人民所不容。”严厉谴责了在桂系军阀支配下的广东政府对革命群众运动的镇压。

五四以后，北京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上海学联于5月11日正式成立，随后组织了全市四十多所大、中学校的两万多名学生，聚集在西门外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罢课救国宣誓典礼，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后怎么行动，几个学联负责人正面临困惑。在这关键时刻，孙中山打来电话，叫学联派代表到西藏路南京路口老晋隆西餐馆约会商谈。晚上，孙中山派代表会见了学联负责人。这位代表告诉他们：“中山先生很关心学生运动，要你们再大胆些进行活动，不要怕这怕那，要有牺牲精神，要有突击行动，要扩大阵线，设法激起怒潮来。”

孙中山考虑到，上海工商局不允许学生在租界游行，万一学生与租界发生冲突，根据“领事裁判权”，中国的律师不得出席租界的法庭为学生辩护。从保护学生安全出发，他特地聘请了两名外国律师，如发生纠纷，由他们出庭交涉。

北京的学生代表许德珩等人也来到上海，准备联合上海学联掀起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许德珩等人一同谒见了孙中山，向他汇报了北京学生运动的具体情况。孙中山听后，对许德珩等人予以鼓励，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界的斗

争。

6月2日，孙中山在莫利爱路的寓所里亲切接见了上海学联的负责人，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后，非常兴奋地赞扬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对上海学生将圣约翰校长卜舫济破坏爱国救亡运动的阴谋活动彻底粉碎与揭露的壮举予以高度评价，他兴奋地说：“他们能攻破上海这个帝国主义的顽固堡垒，是很了不起的胜利！”

这时，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相继到了上海，6月16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孙中山接见了全国学联的代表，并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支持。全国学联约请孙中山为学生演讲，孙中山准时来到借作会场的“环球学生会”，为学生们分析了巴黎和会，俄国的十月革命，对学生进行热情的鼓励。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领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及时报导上海各工人团体的动态，并发表社论指出：只要工人和学生结合，再唤起其他各界民众，“便是解决山东问题的真力量”。

上海工人罢工后，孙中山在《民国日报》载文论罢工策略问题，强调指出罢工应有预备，工人须分清敌、我、友，以便尽可能将罢工作为打击敌人的有效武器。

五四运动使孙中山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信中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也不能正面硬碰，”这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改变过去对人民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并隐约地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所以他在当年10月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名称前加上“中国”二字，是为了区别于1912年的国民党。这次改组废除了旧总章，采用新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虽然谈不上彻底改造，但孙中山是打算用改组后的国民党新党，继续领导革命。

五四运动以前，对孙中山产生推动作用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介绍和赞扬1905年的俄国革命。1917年春，孙中山在上海曾电贺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革命的胜利。1917年11月7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农群众举行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一次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孙中山领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就首先以《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的醒目标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情况。

孙中山看到俄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统治，废除剥削制度，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的大革命，而这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相符合的。当时，他正处于寻找走什么道路的困境之中，正当他为找不到答案陷于苦闷之时，十月革命胜利的曙光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真诚地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成是人类的伟大希望。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十分向往列宁，他们虽然从未见过面，但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函电往来，互相同情，互相声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18年夏，孙中山在上海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一封贺电，电文指出：“中国革命党对俄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

这封电报由于帝国主义封锁，经过很多曲折，托美洲华侨打给俄国。列宁接到这封贺电，极为欣慰，把它视为“东方光明的到来”。同年8月1日，列宁委托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覆函孙中山，对他的贺电表示衷心的感谢，推崇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齐契林同意孙中山的提议，希望双方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认识到，利用军阀来打军阀，终非长久之计。他进而认识到，中国革命如果不借鉴俄国的成功经验，很难成功。孙中山准备派人到苏联去学习，特意要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文教师来执教。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从困惑苦闷中兴奋起来，他重新振作精神，劲头十足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在上海，他一方面抓紧《建国方略》一书的写作、出版和发行，及时对革命党人加强理论指导，同时分出精力具体安排落实革命斗争的重要事务。1919年8月7日，孙中山致函广州国会参众两院，正式辞去政务总裁的职务，声明今后对军政府的行动概不负责。电文还强烈谴责了西南军阀可耻行为。在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孙中山还在上海出版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由朱执信担任主编，大造革命舆论，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适时东山再起。

孙中山一直苦于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这时，他打算通过他自己长期培植起来的粤军，夺回广州这个根据地。因此，他作出了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决策，派朱执信到漳州去敦促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回到广东去驱逐桂系，然后在广东策动民军和农民起义。

1920年8月，孙中山命令粤军首领陈炯明迅速行动。粤军在漳州誓师，分三路进军。9月6日，朱执信等占领了虎门要塞。可是，朱执信为了调停虎门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不幸于9月21日在虎门要塞遇害。

朱执信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他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时期的卓越人才，是一位政治宣传家和军事指挥者，追随孙中山近二十年，始终不渝地为革命事业奋斗。孙中山在上海听到朱执信遇难的噩耗，深为悲痛地说：“执信牺牲，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党失此长城，我也失去了左右手。”

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军阀势力，岑春煊逃往上海，陆荣廷等桂系残部退踞广西。

粤军将领许崇智等人请孙中山回广州主持政局。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寓所召集伍廷芳、唐绍仪等军政界人物举行会议，决定到广州重组军政府。11月25日，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等人一起，乘军舰离开上海，28日到了广州。29日，在广州军民的欢迎声中，重新组成军政府。拥护孙中山的国会议员，此时也相继来到广州，准备重新召开非常国会会议。

这时，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认识到仅举起护法旗帜，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要想革命完全成功，要平定西南，巩固民国基础，必须建立正式政府。与此同时，国内外要求成立正式政府及选举总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召开参众两院联合会，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1921年5月5日，从清晨开始，广州全城便沸腾起来，每条街道都是挂彩旗彩带，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十几万市民成群结队上街游行，各界人士

都纷纷来到观音山南麓的德宣路总统府庆贺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神采奕奕地坐在主席台上，旁边是外交部长伍廷芳、财政部长唐绍仪、次长廖仲恺、司法部长徐谦、海军部长汤廷光、秘书长马君武等人。广场上，粤军第一师官兵，军装簇新，精神抖擞，手持新造的五响步枪，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正准备接受孙中山的检阅。

孙中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前台，发表了《就大总统职宣言》。他指出：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际此拨乱反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材，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文誓竭志竭诚，以救国民，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凡我国人，幸共鉴之。”

孙中山今天的心情无比兴奋，他看到了民众对革命的支持，看到了他的助手们高涨的热憎，看到了战士们英姿飒爽的阵容，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在全场一片欢呼声中，一个消灭广东桂系，实行北伐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出来了。

第五章 缔创伟业

驻节桂林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后，立即着手组织北伐，并要求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加速西进，消灭残余的桂系势力，扫清北伐道路上的障碍。孙中山的计划是：扫清北伐道路上的障碍后，立即组织湖南、云南、广西各省的军队进行北伐，然后以广东的粤军为北伐军的大后方，为北伐军提供粮响。可是陈炯明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只想在广东当个草头王，对什么北伐和统一中国不感兴趣，碍于大总统的面子，表面上又不好正面反对，便阳奉阴违，始终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后来经不住孙中山的一再催促，便和自己的一些亲密的部下密商出一条诡计，向孙中山提出辞呈，说是自己因长期征战，患了风湿性关节炎，要去休养一段时间，辞去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的职务。当时，讨伐桂系陆荣廷、莫荣新的战役刚刚告一段落，溃败的桂系余部仍在梧州集结，时刻有反扑之势，讨伐桂系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这时候提出这样的辞呈，分明有要挟之意在。而且，就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当天，广州城万人空巷，都来观看大总统就任盛典时，作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却借故托病不来参加典礼，国民党的其他首脑人物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对此均深为不满，他们提醒孙中山，从陈炯明对孙中山出任大总统的态度来看，陈炯明对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不仅是心里不服，并且已经在行动上直接表现了出来，要孙中山采取措施。孙中山对于陈炯明的态度也了如指掌，尽管也不高兴，但是当时没有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来，还为陈炯明作了解释，要大家以革命的大局为重，不要互相猜疑。孙中山的本意是希望陈炯明能以大局为重，在北伐的大立场上和自己站在一起。可是意想不到的，陈炯明居然得寸进尺，提出辞职，分明是要公然对抗，这使得一直隐忍不发孙中山怒不可遏，当即驳回了辞职请求，责令他休整一段时间以后，加速西进，务必要彻底打垮桂系军阀。

6月25日，粤军大举进攻，梧州收复，桂军守将陈炳昆仓惶出逃，捷报传来，孙中山兴奋异常，指示：讨伐桂系军阀的成功之日已经到来，要一股作气，全面消灭桂军残部。还亲笔签署了命令，要江西、云南、广东各路军马，集中讨伐桂系残部，决不姑息！在孙大总统的命令下，获胜的粤军意气风发，乘胜前进，连克平南、南宁等重镇，陆荣廷仓惶逃往龙州，8月13日，最后克服桂林。到这时候止，讨伐桂系的战斗宣告结束，新生的革命政权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滇（云南）、赣（江西）、粤（广东）军讨伐桂系军阀的伟大胜利，使孙中山兴奋不已，他再一次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之所在。他并吩咐秘书：做好准备工作，当伐桂的粤军胜利归来之时，自己要亲临第一线去欢迎他们，还要作长篇演讲。这时候，在孙中山的心中，正运筹着北伐的具体计划，他想：现在，桂系叛军已被消灭，中华民国政府在广州已经获得了稳固的基础，军队的力量相当壮大，军队中上层将领基本上是听从政府调度的，除了陈炯明所管辖的粤军有一部分不听从政府的指挥外，粤军的大部、滇军、赣军、黔军、湘军均能听从指挥和调度；再说，北方已经取得了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的协议，可以南北夹击直系军阀政府，北伐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9月3日晚上，广州粤秀山上的总统府宴客大厅里，灯火辉煌，讨伐桂系叛军凯旋归来的粤军将领和滇、赣、黔军各路军队将领们欢聚一堂，这是大总统孙中山在为讨伐桂系叛军胜利归来的将士们举行宴会。席间，大总统容光焕发，高擎酒杯，为将士们祝酒，孙中山说：“今天的宴会，是为伐桂凯旋的将士们举办的，也是为我们即将进行的北伐而举办的，讨伐桂系的成功，表现了国民革命的伟大力量，说明了反动军阀并不可怕。目前，我们在广东、广西已经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国民政府已经成了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我就位大总统时，有人说我是广东的总统，有人要逼我下台，北方的军阀们不承认我这个总统和我们的政府，外国的洋人也不愿意承认我们这个政府，这是因为我们要实行的主义是尽快使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不再作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我们是要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能再让列强和反动军阀们在中国任意胡为！这是我们建党的宗旨之所在，但这却是那些反动军阀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顿了一顿，孙中山接下去又说道：“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已经十年，可是革命仍然处在徘徊之中，军阀仍然统治着中国的大片土地，中国仍然是贫穷，经济仍然是落后，资源得不到开采，交通仍然闭塞，外面的信息传不进来，人民仍然处在愚昧落后之中，这样的现实使我孙文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解决这一现状的根本措施是统一中国，而统一中国的手段又非出兵北伐不可！所以，今天请诸君来此，一是为伐桂凯旋的将士们接风，而更主要的目的，是号召北伐！诸君如无异议，请干了此杯！”

孙中山慷慨激昂地说完了这一席话以后，带头干了这一杯酒，将军们轰然响应：“愿跟随大总统北伐，统一中国！”说完一齐干了杯中的酒，宴会尽欢而散。

这次宴会的盛况，使陈炯明更加不舒服，他知道，孙中山的北伐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了，他想，如果孙中山北伐，自己的粤军肯定是主力，他苦苦思考着对策。还没等他的对策想出来，忽然接到孙中山从梧州发来的电报，要他立即到梧州去商讨北伐事宜。原来，在这一段时间里，孙中山积极为北伐做筹备工作，乘军舰出巡广西，考察北伐路线，准备从湖南取道北伐，并且已经有三万北伐军同时开拔，陈炯明知道，只要自己去了梧州，自己的军队就会被孙中山抽调出一大部分，自己的实力就会大打折扣，今后，不管北伐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遭受损失最大的是我陈炯明的粤军，因此，陈炯明连考虑都没考虑，就以身体不适为理由，拒绝去梧州见孙中山。

孙中山这次召陈炯明来梧州，一方面是想看看他到底对北伐的态度如何，再者，也确实是要和陈炯明商量北伐的经费、粮饷筹措事宜，陈炯明的再次拒绝会见，使孙中山非常失望，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孙中山仍然对陈炯明抱有幻想，希望他有一天会省悟过来，坚定地站到革命的队伍中来，积极参加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因为过去陈炯明也曾经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动摇过，后来还是被说服了，再说，陈炯明之所以有今天的实力和权威，也是孙中山赋予他的，是孙中山三次典当了在上海的法国租界内的公寓，将卖得的钱作为军费无偿地送给陈炯明的，陈炯明怎么也不能在这样大的关键问题上背叛革命吧。

陈炯明为了抵制北伐事业，处心积虑地找借口，想办法，最后决定从动摇革命党的领导地位入手，以否定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党的必要性来反对孙中山的领导，陈炯明指使自己的心腹部将们四处散布“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的理论，他们说：现在，革命军已经建立起来了，还要革命党干什么？这种理论对那些出身行伍的军人们来说，很具有煽动性。他们非常赞成这一说法，认为，天下是军人们打下来的，怎么能让那些文人出身的党人来管着自己呢，一时间，到处都是传说着这种理论。不久，这些传言都被孙中山听到了，他非常气愤，知道是那些行伍出身的旧军人们在鼓噪，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如果不能及早地清除掉，将会给国民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于是，孙中山决定，自己亲自到军人们中间去，要用国民革命的大道理来说服那些思想糊涂的军人。

11月中旬，孙中山来到广西梧州，第一件事情就是召见陈炯明，反复对陈炯明说明国民革命的大道理，要求他明朗态度，积极支持北伐。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陈炯明仍然执迷不悟，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这不由得使孙中山想到自己在广州时，胡汉民等人曾几次劝自己免除陈炯明的职务，看来他们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时候，孙中山还没有料到有一朝一日，陈炯明会背叛革命，还想争取陈炯明能站在革命队伍这一边，便退一步要求他在自己北伐时，好好地守住广东，这样，陈炯明当然满口答应下来。

为了澄清军队中逐渐抬头的糊涂思想，孙中山决定在公众场合来好好地宣讲一下革命党的理论，让军队的将领们弄清楚革命党和革命军队的关系。因此，当梧州的国民党员为他开欢迎会时，他在会上严肃地批评了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理论，孙中山说：“现在，在我们的革命军中，在我们的革命党中，渐渐兴起了一种奇怪的理论，说是革命军起来了，革命党就可以消亡了，这是一种非常糊涂和非常危险的理论！我们革命的‘主义’是要靠革命的党来实现的，而我们的革命军只是用来消灭反动势力的，一旦我们的中国统一了，我们进入了和平时期，将要大幅度地裁军，而那时，革命党却任务更加繁重。现在，我们已经革命了十来年，但是只是有一个民国的名字，却并没有民国的实际的东西。我们革命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说到这里，孙中山停了一下，扫视了一下会场，发现到会的人听得很认真，他再一次提高了嗓门：“那些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想以这种理论来蛊惑人心，来否定政府的绝对领导权，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一种人是糊涂人，他们认为自己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为中华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享福、自由一下了。我们应该清醒起来，光靠武力是不能实现我们的主义的，要靠每一个党员都认识到自己的革命目的才行！我们要有这么一种新的思想：革命军起，革命党成！”哗——，孙中山的话还没落音，底下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孙中山向会场上挥挥手，接着说下去：“从今天开始，我们到会的每一个人，要努力地去做，并且要努力地去做这个道理！我一直对诸君说要要进行北伐，要统一中国，这是我们革命的目标，我们要建设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

离开梧州以后，孙中山又率领随从们前往桂林，途经昭平、阳朔时，一路宣传实现三民主义的道理，批判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理论，并一路部署北伐的计划。这时候，粤、桂、滇、黔、赣各路大军齐集桂林，准备誓师北伐，孙中山看到北伐形势如此之好，情绪非常高昂，从梧州到桂林的一路上，和随行人员有说有笑，水路乘船、陆路坐轿，一边欣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一边筹划着到桂林后如何组织北伐，精神焕发。一天，经过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警卫人员找来了一乘小轿，抬着孙中山行走在山道上，孙中山看到一个年纪相当大的轿夫，精神矍铄，穿着一身旧衣服，但迈出的步

伐却非常稳健，孙中山便和他攀谈起来：“您今年多大年纪啦？”轿夫答：“今年整六十啦！”孙中山一听，连忙喊道：“快停下来，快停下来！”大家都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不知道孙中山要干什么。孙中山走下轿，对轿夫说：“你都六十了，年纪比我大，按道理应该由我来抬你才是，怎么能要你来抬我呢！”轿夫说：“您是大总统，我是轿夫，我就是干这一行，我抬您是应该的，快请您上来吧！”大家都劝孙中山快坐到轿子上去好快点赶路，可孙中山怎么也不肯答应，坚持和轿夫并肩走。这使得轿夫们非常感动。孙中山一边走，还一边给轿夫们讲着革命的道理，他说：“将来，国民革命成功了，你们也就不去抬轿子了，你们可以去种自己的地或是去开矿、办实业等等。”

听说孙中山大总统要到桂林来，桂林人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立即组织了一个由七十六个机关团体二三百个代表人物参加的庞大的“欢迎大总统筹备会”，筹备会下设文书、宣传、总务等六七个工作部门。预先选定了桂林王府作大总统的住处。这桂林王府原是元、明两朝时藩王的故宫，是清代当地举办科举考试时乡试的贡院，在民国初年时被辟为广西省议会，现在被当成了大总统的行辕（行辕的故址在今天的桂林师范大学内）。当时人们睡的都是硬板床，为了使大总统能睡得舒服一点，人们在全城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一张唯一的钢丝铜床，安放在总统的卧室内，负责内务的学联代表们还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总统住房看守起来，不让人轻易进去，以免将房子弄得不干净。

12月4日，孙大总统和他的夫人宋庆龄一行到达桂林，欢迎大总统的队伍从城内一直排到将军桥，长达十几里路，从桂林南门到大总统行辕，一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桂林人民还创作了一首歌曲：

跽节兮遥临，桂岭兮生春。
君子兮至此，万众兮欢腾。
笑徐逆抗命，伪廷卖国计空逞。
不见武鸣陆，祸桂残民终自焚。
不见谭、陈、莫，穷兵黩武终逃奔。
到头来还是强权失败民权胜，
三民五权主义真，欢迎我元勋！

这热闹的欢迎场面，使得孙中山激动万分，也更加坚定了他北伐进军、统一中国的决心。

孙中山进驻桂林王府，便将王府作为自己北伐的大本营。安顿妥当后，早已会师桂林、等候大总统的各路军队将领们都来求见，先后有：滇军总司令朱培德、黔军总司令谷正伦、赣军总司令彭程万、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广西绥靖督办刘震寰、大本营总参谋长李烈钧。孙中山命廖仲恺筹划北伐的财务工作，命粤军总参谋长邓铿组织警卫部队，成立海陆军北伐大本营，命胡汉民为文官长。为了保卫孙中山的安全，邓铿组织了一个团的警卫力量，团长陈可钰，下设三个营，第一营营长薛岳、第二营营长叶挺、第三营营长张发奎，共计二千多人。

孙中山在大本营里一一接见了各路军队首领人物，决定从湖南进军北伐。当时已经是冬天了，孙中山让大家休整一下，明年春天正式大举北伐。

一天，孙中山处理完公务以后，便一个人步出行辕，要爬爬行辕背后的独秀峰，他从王府的后园出发，来到独秀峰下，看到独秀峰虽然不是很高很

险，但它奇特挺拔，秀丽迷人，一时倒找不到上山的路了。孙中山看到山脚下的花园里有几个工人正在修理花圃，一个督工在指挥工人工作，便走上前去向他问路，这个督工正苦干没有人和他啦呱，也正好工作干完了，见孙中山面色和蔼，便对孙中山说：“好歹我也闲着没事可干，我就陪着你一同上山去。”

在上山的路上，孙中山一面攀登，一面和督工说话，他啧啧连声地说：“这里的花草修剪得这样整齐，和这秀丽的独秀峰恰好融成一体，相得益彰啊！”督工见有人夸奖他的工作，心中不免有几分得意，可又有点不无遗憾地说：“这里原来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是为了欢迎大总统的到来才修理好的。这几天，各界人士都在集会欢迎大总统，可我却偏偏要在这里督工，也没有缘分去见见大总统……”

孙中山笑着说：“大总统有什么好看的，他也是一个凡人，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仙，我就是孙中山，你看我不是和你一样地有鼻子有眼睛吗？”

督工这才回头仔细打量了一下孙中山，原来真的就是孙中山，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他惊奇地大声说：“对！对对！您就是大总统！”说完深深地给孙中山鞠了一个躬。

12月10日，孙中山召集驻桂林的滇、赣、粤军所有的团级以上的军官开会，作了题为《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孙中山说：我们革向的目的，是要实现我们的三民主义，所谓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达到，就是中华民国国家进入独立的地位，我们当前的国家，虽然已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但这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完成，中国现在仍然是处在分裂、动荡之中，北洋军阀所鼓吹的“汉、藏、回、满、蒙五族共和”完全是欺人之谈！我们只有实行北伐、统一中国，才是真正的实现了民族主义。所谓民权主义，可以称之为众民政治，是说政治上的一切权力完全在人民的手中。而所谓的民生主义，就是要打破当前的不平等的生活现状，现在社会上的富豪阶级拥有无数的财产，而老百姓却穷得没有立锥之地，这正是我们要革命的。作为一个革命的军人，要有一种精神，古人要求军人要有大智大勇、大仁大义，什么叫智？智在于明辨是非，分别利害，认清时势，在对敌作战中要能知彼知己，这就是军人的智；什么叫仁？仁，不是一种小恩小惠，仁的目的在于救国，在于为人民的仁；所谓的勇不是单纯的不怕死，要能懂得生与死的大道理，要能立定决心，从事革命，为了革命而不怕死，这才是真正的勇。作为一个立志于中华革命的军人，就要有为革命而必死的决心，这就必须有一种革命的精神来支持着我们。

孙中山又说：今天的革命与古代的革命是不同的，今天的革命是为人民的革命，革命事业的完成要有一种革命的精神来支撑，在北方，我们的紧邻——俄国的军人就有一种可贵的精神，他们处在列强的重重包围之中，可是他们就是为主义而坚强地挺了下来，他们的军人能与工农结合而创造出一个新的国家，我们的军人，只要有主义及革命的目的和决心，那么我们改造中国的效果，一定不会在俄国之下的。

孙中山的讲话，一次次地被军官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当孙中山在桂林积极为北伐做准备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各派军阀们的内部矛盾也在日益尖锐化，北京政府的掌权者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已经不得人心，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正在密谋策划要推翻直系军阀，并且表示愿意与孙中山合作，南北呼应，打倒直系军阀。这一消息，使孙中山

更加兴奋。孙中山觉得，北伐的时机，这时候已经完全成熟了，而且，在孙中山看来，这时候出兵北伐，只要北伐军发出一纸檄文，各地的反动守军就会望风而逃，北伐的形势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在孙大总统这时候看来，北伐只是速度的快慢问题，而不存在胜败问题了，只等一过了年，春暖花开，他就要大举挥兵北进了！

会见马林

广西，岭南的初冬仍然是花草丰茂、绿树丛丛，清早起来，像薄纱一般的轻雾笼罩着山头，一个一个的山头影影绰绰地浮现在云雾之中，真像仙子一般。在这样的早晨，孙中山经常一个人早早起来，到大本营的四面去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一天的工作便神清气爽。

这天清早，孙中山又是一个人早早起来，独自在独秀峰下做柔软体操，深深地呼吸着早晨的新鲜空气。今天，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先生要来和自己会谈，这是他盼望已久的事情了。在他的第一次护法失败之后，经过这几年的挫折和奋斗，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南北军阀乃是一丘之貉，要想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不能依靠任何一个军阀，必须探求中国革命的新路子。最近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却聚集着不少英才，共产党的不少主张倒是对自己大有启发呢。而在北方的邻居——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更是对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大有启迪和教益。

孙中山不自觉地回想起自己今年8月份给俄国外交委员齐契林的一封信来。当时，他接到了俄国外交委员齐契林的信后，非常激动，立即给他回了一封长长的信，直到现在，自己还清楚地记得这封信的所有内容。齐契林在收到自己的信后，立即派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专程从欧洲绕道来和自己会见。

孙中山正在遐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宋庆龄已经来到了身边。宋庆龄轻轻地说：“这么早就起床了，也不叫醒我？”“不，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我也乘这会儿想想问题”，孙中山答。“是不是考虑今天要接见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先生的事？”“是的。哦，这次马林先生来到这里可不容易呀，他是绕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中国的，我们可不能慢待了人家。今天的会见，请你也来，还要为会见做记录。”宋庆龄轻轻地点了点头，笑着说：“听说马林可是个容易激动、急公好义的人啊。”孙中山也笑了，说：“这个人还是非常可爱的，据说他在上海的时候，看到一个洋人欺负中国人，他竟然挥动老拳，上去就打那个洋人。”

宋庆龄说：“这几年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现在，北伐大军云集桂林，共产国际的代表又来和你会晤，形势是越来越好了。”孙中山也很高兴：“是啊，眼看就要大举北伐了，我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了，怎不令人激动！”可是，孙中山说着说着，脸色忽然阴沉下来：“只是竟存（陈炯明字竟存）这几个月来令我大伤脑筋，他至今仍然不支持我北伐，对我当大总统他也是十分地不高兴，要他为北伐军筹集粮饷，他也是推三阻四，叫他到这里来和我商谈北伐工作，他也总是推脱，这个人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在广州的时候，党内的许多同志都劝我免去他的职务，可我想，当前正是国家用人的关头，竟存是个难得的将才，我说服了党内的其他同志。等我和马林谈过以后，再亲笔给他写一封信，好好地劝说劝说他。”这时候，孙中山脸上愉快的笑容，已经消失殆尽。

对陈炯明的忧虑，不光是孙中山有，宋庆龄也有，她也知道陈炯明这个人极负野心，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要想说服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说：“陈炯明这个人刚愎自用，恐怕很难说服，我在广州的时候，风言风语地听说他和吴佩孚有往来，和湖南的赵恒惕也有往来，陈炯明的这些行动只怕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两人议论到这里，心情都复杂起来，默默地回头向山下走

上午8点，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的陪同下，准时来到了孙中山的会客厅。孙中山率领胡汉民、许崇智等起身迎接。一见到马林和张太雷，孙中山的眼前不觉得一亮：好英俊的人才！只见张太雷面目俊秀，举止优雅，眉目中有一股勃勃的英气；再打量一下马林，只见他身材高大，给人一种雄壮魁伟之感。

孙中山陪同马林和张太雷并肩走进客厅，双方没有多少客套，便开门见山地交谈起来。“马林先生，听说您这次来中国，一路上被不少国家关押、拘留，受到了重重的阻难，但这都没有动摇您的决心，我对您这种不屈的精神深表钦佩，我代表国民党和全体北伐将士向您表示热烈的欢迎！”孙中山的话一落音，张太雷立即作了翻译，马林激动得站了起来，声音宏亮地说：“我在我自己的祖国的时候，早就听说了您的大名，这次我受党的委派来到中国，一路上经过了许多国家，受了不少的磨难，可这使我更加进一步地了解到您和您创造的事业的伟大。”

孙中山微笑着说：“您太过奖了，这次请您来桂林会晤，主要是想听听您对我国革命的看法，还想听听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请您多多指教。”

马林说：“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都很关心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已经于今年7月正式成立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希望你们两党能很好地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中国的革命事业！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成立时间很短，孙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这么多年来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这是值得称赞的！”

孙中山轻轻地摇摇头说：“马林先生，说起来真惭愧，我党成立这么多年了，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也已经十来年了，可是中国依然是腐败的官僚和军阀、政客们统治着天下，国家被弄得四分五裂，中国革命还远远不能说是成功啊！在我们的革命中，有着沉痛的教训，我最大的失误，是当初不该把政权让给袁世凯，这使我们又丧失了一次宝贵的成功机会。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把革命的政权让给军阀，对军阀们抱有幻想，这是我们幼稚的表现。像你们的国家，就没有在这方面犯错误。试想一下吧，如果列宁把革命的政权拱手让给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是弗兰格尔，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呀，真是不敢想像！”

马林说：“孙先生，苏俄革命的成功，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建立了一个能联合工农群众和各个阶层一起起来革命的政党，并且还建立起一个革命的武装核心，这才是我国革命成功的根本经验，不知道孙先生是否研究过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的心目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尚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孙中山说：“贵国的经验是很可贵的，我党可以借鉴，但是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我最近也有过一些研究，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东西，在我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早有涉及，比如说春秋时期的孔子，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对社会的许多精辟的见解，至今还是十分有用的。”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孙中山和马林谁也没能说服谁，只得把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在谈到如何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时，孙中山和马林越谈越投机，马林直率地说：“孙先生您必须明白，您现在即将举行北伐，您自己也清楚，靠您目前所有的兵力，只有几万人，是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的。

我建议：

一个国家的主体在工农，工农的领导者是他们自己的政党，您所领导的国民党应该改组，要组建一个包括工农大众在内的政党，这样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您第一个要联合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你们两党联合起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才真正有望。”

孙中山说：“我欢迎苏俄的十月革命，我也非常欢迎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真诚帮助，我还欢迎中国共产党与我们联合，我现在在桂林组织北伐，我的敌人就是直系军阀，是曹锟、吴佩孚，除了这些敌人以外，我可以包容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或者政党、团体！”

马林对孙中山的大度非常钦佩，又对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不仅要有一个团结各阶层力量的以工农为主的政党，还要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装核心，为了建立好一支革命的队伍，首先要办起一个革命的军官学校，用这样的学校来培养革命的骨干。

对马林的这一建议，孙中山十分赞同。

送走了马林和张太雷，孙中山的情绪很高昂。晚饭后，孙中山和宋庆龄一边散步一边交谈着白天的会见，宋庆龄说：“这位马林先生辞锋很健，很善于雄辩啦。”孙中山点了点头说：“这位马林先生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第一个能在理论上让我心服的外国朋友，那位张太雷先生可也是个难得的人才啊，看来，共产党的前途不可限量！”

宋庆龄说：“从马林先生今天的谈话来看，他对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素质似乎有不小的看法。”

“是的”，孙中山也忧郁地点点头，“我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担心，前几天，我为北伐军中团以上的军官作了一次讲话，我反复强调了军人精神的教育，军人一定要入党，为我们的主义而奋斗。”

宋庆龄说：“军官们入了党，也并不一定就能和政府同心同德，像陈炯明那样的人，虽然入了党，可是现在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对先生您的主张不是不了解，可他却就是不合作，我真提心……”

孙中山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何尝不知道竟存此人越来越靠不住了呢，我只是想，当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直系军阀，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进行北伐，待到北伐战争胜利，我们再来整顿我们的党。”

这时候，一阵山风吹来，天也渐渐黑了下來，映着天幕，孙中山站立在山坡上，黝黑的身影像一棵顶风屹立的劲松……

恸失仲元

在孙中山的民国政府的上层人物中，有一批高级文武人才，他们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主要的人物有朱执信、邓铿（字仲元）等人。孙中山以他们为自己的左右手，可惜这些人都早早地离开了孙大总统。

朱执信是广东人，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战友，1920年9月在虎门牺牲。朱执信是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他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讨伐桂系军阀的胜利，为孙中山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朱执信的死是死在敌人的手里的话，那么邓铿的死则是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的。

邓铿是早期中华革命党的中坚分子之一，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的时候，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长，任命邓铿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兼第一师师长，这是一个要职。在孙中山想来，陈炯明和自己的北伐主张总是格格不入，必须有一个人从中作为调停人，同时也对陈炯明起到一点牵制和制约作用，将邓铿放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确是孙中山的一番苦心，这也足以说明，孙中山虽然对陈炯明一直抱有幻想，但也并不是一味地信任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后，在桂林设立大本营，集中了滇、粤、赣军的大部主力，自己也带着一大批高层人士前赴桂林，将陈炯明留在广州，让他在后方接济粮饷。孙中山知道，陈炯明无论如何是不会为北伐而冲锋陷阵的，他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不愿意离开广东。因此，孙中山巡视广西时，动身之前也就等于向陈炯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竟存，我这次北伐，如果胜利了，我当然是不会再回广东来的了，如果我败了，我也是无脸回广东来的，广东这块地盘就交给你了。”这无疑是在说：只要你陈炯明支持我北伐，我就让你在广东占住这块地盘了。这种姑息迁就的做法等于是在向陈炯明表示自己的软弱可欺，这也是陈炯明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对北伐拒不支持的原因之一。当然，孙中山也不是对陈炯明一无防备，他把邓铿留在广州，并且兼任着一个主力师的师长职务，实际上就是牵制陈炯明的一个重要措施。

就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后，陈炯明为了表示自己是听从国民政府的命令的，便率领粤军主力向广西进发，讨伐桂系军阀，邓铿留守在广州。一天，驻军汕头的粤军旅长尹骥发来急电：

“据可靠情报，桂系方面有间谍在潮汕一带活动，在我军中煽惑人心，鼓动军人造反，来此的奸细已被抓获，并供出在广州设有秘密机关……”

电报后面还附有广州敌方秘密机关的详细地址。

邓铿接到这一情报之后，立即调来一支特别行动队，紧急行动，前去抓捕桂军奸细。原来，敌方的秘密机关就设在总司令部的北校场里面，当特别行动队人员到达之前，对方也已知道了要来抓捕他们，在销毁了一批秘密文件之后，越墙逃跑，被特别行动队人员赶上，敌人故意将一袋子洋钱撒在地上，希望追赶的人去拣洋钱而耽误追击的时间，可是特别行动队的队员们不为所动，奋起追赶，一举将奸细们全部抓获。其中有一名是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有一名是总统府的军官。经过审讯，发现了陈炯明的心腹部下洪兆麟的人。在审讯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的气焰非常嚣张，大声地叫喊：“你们不能扣押我，我不对你们坦白，我要到总统府见到大总统才能讲话！”邓铿根

本不买这些家伙的账，下令立即将为首的执行枪决。当时，在邓铿来说，此案非常棘手，如果将此事去和洪兆麟等人对质，他们肯定不会承认，弄不好还会使为首的坏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如果要将自己根据侦察得来的情报如实向大总统汇报，又没有多少事实证据，有可能会将事情搞糟，加上当时桂系的沈鸿英又大军压境，容不得再作详细的调查了，所以才下令快速地结了案。可是正由于这件案子的快办，使得陈炯明及其部下洪兆麟等人怀恨在心，时时图谋报复。

到了1921年的11月，陈炯明讨伐桂系大获全胜，以胜利者和功臣的姿态回到了广州，这时候的陈炯明更是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一些吹牛拍马的人士将他捧为“儒将”，因为他在清朝曾经中过秀才，而当时执掌北京政权的吴佩孚也曾中过秀才，因此有人又称他俩为“南北两秀才”，这使得陈炯明的骄傲之气更盛。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把孙中山视为革命的领袖了。他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为自己当个广东王而打下基础，便一再以“准备不充分、革命军队的力量不够壮大、周边的军阀势力还没有荡清”等为借口，拒绝出师北伐。

可是，孙中山的北伐决心是不会为一两个人的阻碍所能挫败得了的，他几次电令陈炯明来和自己相见，共商北伐大计。陈炯明实在烦透了心，便打起了鬼主意，他决定三管齐下，不惜一切手段来阻止北伐。

第一步，联络唐继尧，分裂革命军，削弱北伐军的实力。

唐继尧是滇军的首脑人物，1920年时想独霸云南，在云南驱逐滇军互相混战，消灭异己势力。当时，率领滇军第一军驻在四川的军长顾品珍，在1921年的3月率领军队打回云南，赶走了唐继尧。唐子无可奈何之中，只身逃跑到香港，过着寓公的生活。孙中山回到广州就任大总统以后，和唐绍仪、伍廷芳等人发电报邀请唐继尧回到广州，孙中山还亲自率领高层人士到广州火车站迎接，并向他宣传革命的大道理，希望他醒悟过来，并且还专门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表示对他过去的军阀行径既往不究。可是唐继尧并没有因此而感谢孙中山，反而以身体有病为借口，离开广州，重返香港养病，还通过自己的原部下在云南活动，图谋有朝一日，重回云南掌握政权。

陈炯明要阻止孙中山北伐，第一个人便想到了唐继尧，他几次派遣密使到香港，表示，只要唐继尧愿意回到云南，他愿意助一臂之力，这使早就野心勃勃的唐继尧大喜过望，立即给自己的亲信张伯群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孙中山当大总统，陈炯明并不赞成，孙中山搞北伐，陈炯明更不赞成，孙中山要陈炯明为其北伐筹集粮饷，陈炯明也不愿意。现在，孙、陈二人之间已成水火之势。陈炯明已派亲信人员来到我处，表示愿意助我回滇。请你立即回云南去，等待我到来。”

这样，陈炯明与唐继尧之间便达成了第一个秘密的协议：陈助唐回云南复辟，唐则在云南树起大旗来独立，既分散了革命军的力量，又堵住了北伐军的一条前进通路。唐继尧几次到梧州、南宁与陈炯明会晤，孙中山知道他们在秘密集会，也几次晓之以理，并且委任他为大本营参谋长，可是一心要闹独立的唐继尧却一面假意与孙中山周旋，一面收买土匪暗杀了顾品珍，重新掌管了云南。

陈炯明的第二招是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要赵恒惕在湖南树起旗帜，反对北伐军，赵恒惕果然被收买，北伐军的最好的进军路线又被阻住了。

陈炯明的第三招是与吴佩孚勾结起来，南北联合，反对北伐。

经过几次信件往返，陈、吴之间已经基本达成了协议：陈炯明在南方拖住孙中山的后腿，使北伐军无粮无饷，吴佩孚在北方分几路进军，消灭北伐军的有生力量。事成之后，陈炯明保有广东、广西两省的地盘。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陈炯明的阴谋活动，不免风风雨雨地传了出来，自然有人把话传到了邓铿的耳中。邓铿开始还是将信将疑：陈炯明是有野心不假，但是孙中山是把陈炯明一手提拔起来的人，而且对陈非常信任，委以重任，陈炯明再怎么有野心，也得考虑到这一层关系吧？不过，邓铿从此后也就多了一个心眼，时时注意着陈炯明的对外界的交往行动。

这一天，邓铿的一个卫士来向邓铿报告：吴佩孚派来了一个密使，正在陈炯明的内客厅里密谈，谁也不让进，不知道在谈些什么名堂。邓铿闻报，立即急急匆匆地以讨论北伐的军事行动为由去找陈炯明，在他进门时与一个陌生人迎面相遇，只见这个人穿一生长袍，戴一顶棉帽，撑着一副黑色的眼镜，完全是北方人过冬天的打扮。邓铿当即拦住此人，正要问话，却见陈炯明和机要秘书陈鹤年从后面匆匆忙忙地赶了出来，对邓铿陪着笑脸说：这位是陈总司令当年流落南洋时的一位老朋友，在北京做生意，这次到南方来办一点货，顺便来看看总司令的。一边说着话，一边马不停蹄地从邓铿的身边走了过去。

待陈鹤年走了过去，邓铿更加怀疑了起来：我并没有问他是干什么的，陈鹤年说这么多话干什么？仔细地想了想，觉得外面风言风语地传说陈炯明的话是有来由的，假如陈炯明真的和吴佩孚勾结在一起，那将会对北伐造成极大的危害！想到这里，邓铿不由得愤怒了起来：“孙大总统对你陈炯明真是有再造之恩，你陈炯明能有今天，完全是孙大总统所赐，怎么能这样在背后拆孙大总统的台呢！我今天非要和你理论理论！”

邓铿怒气冲冲地走进陈炯明的内客厅，这里对于邓铿来说是不陌生的，他几乎每天都要在这里和总司令议事，因此当他进门时，卫兵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个军礼，按平时，邓铿总是要客气地给卫兵还个礼，可他今天心事重重，只是对卫兵摆了摆手，便头也不抬地走了进去。

邓铿进门也没有给陈炯明打招呼，气呼呼地一屁股坐了陈炯明的对面，陈炯明刚刚送走了吴佩孚的信使，猛地就看见了一脸怒气的邓总参谋长，心里不免一惊，但是一瞬间便冷静了下来，故作镇静地说：“仲元，你脸色不好，好像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邓铿开门见山地说：“请问总司令，刚才走出去的是什么人？”陈炯明心里一跳：“哦，那是我过去的一个老朋友，在南洋时共过患难的，现在在做些小生意，最近路过我这里，顺便来看看我。怎么啦？我的总参谋长什么时候又当起侦察处长来啦？”陈炯明故作轻松，实际上心里已经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邓铿见陈鹤年和陈炯明说的来由是一样的，才稍微放了点心，但他觉得还是有必要把该说的话说明清楚：“陈总司令，你我投身革命，为的是实现我们的主义，为的是结束旧中国的残破局面，现在，孙大总统在桂林主持北伐大计，我们要全力支持他的行动，现在有人在说你要和北方的大军阀吴佩孚联合起来对付大总统，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全体革命党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当年，孙大总统第一次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广东省长朱庆澜先生将二十个营的兵力交给孙大总统，那时候的桂系军阀以及其他的军事领袖人人都想得到这二十个营的兵力，而大总统却毫不犹豫地这二十个营的兵力交给了你，这是对你的最大信任，我们可千万不能做对不起大总统的事情啊！”邓铿是个心直

口快的人，他也不管陈炯明是不是愿意听，一连串地把自己多日来心里想说的话全部说了出来。

邓铿还想苦口婆心地再劝说陈炯明，可是陈炯明这时候已经不耐烦听这些话了，他对邓铿摇摇手说：“仲元，不要言过其实，耸人听闻，外面的传言不可轻信，我怎么会去做反对孙大总统那样的事情呢？我只是对北伐有不同意见，但那决不影响我对大总统的支持，你就把心放回到肚子里面去吧。”

邓铿见陈炯明这样说，也就不好再往下说了，只好站起来告辞。

送走邓铿以后，陈炯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好险，要不是自己早就和陈鹤年统一好了口径，只怕是今天就要露馅了。再转念一想，长期这样下去，早迟是要露出马脚来的，要想好办法。陈炯明的眼珠转了几转，叫来了侦缉处长黄福芝……

从陈炯明处出来之后，邓铿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把这几天陈炯明的行动联起来一想，已经不能再对陈炯明抱幻想了，他立即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将陈炯明这段时间以来的行动和表现作了详细的叙述，并且把陈和吴佩孚悄悄往来的事情也写了进去，连夜派了一个密使送到桂林。

在密信送走以后，邓铿又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情报，陈炯明和吴佩孚的联合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了，为了防止陈炯明的行动给北伐带来损害，邓铿又给孙中山打了一份电报，证明陈炯明的不轨行为，请孙中山对此事早作安排。

孙中山接到邓铿的报告，立即给陈炯明打电报，命令他赶到大本营来参加北伐的军事会议，可是陈炯明还是推辞不到。

1922年3月21日黄昏，邓铿来到广州大沙头火车站，迎接他老师周善培，因为是来迎接自己的老师，邓铿就没有带自己的卫队来，只带了两个勤务兵，是准备为老师提行李的。火车站上，人群熙熙攘攘，有的是来接客人、接亲友，有的是路过，还有的是来做生意的小商小贩，热闹得很。邓铿自从给孙中山的电报发出后，一直在等待回音，想着陈炯明对北伐事业的掣肘，不由得感到心痛。

日暮时分，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火车进站了，人群立刻开始骚动起来，邓铿也移动步伐，准备去找自己要接的人。就在这时，两个穿着长衫的人，一前一后的走到了邓铿的身边，只听得砰砰砰，邓铿的身前身后同时响起了枪声。邓铿猛觉得腹部一阵剧痛，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指着前面，吃力地说：“有人害我，快抓凶手！”可是走不到几步，便支持不住，倒在地上，他吃力地说：“我知道参谋长的地位危险，可是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呢！”两个卫兵急急忙忙地找来几个人，将邓铿送往医院。

听说总参谋长遭人暗害，粤军的将领们都来探视，陈炯明是第一个来到邓铿的床边的，他对邓铿说：“你好好地治伤，我们一定要严拿凶手！”邓铿这时候已经昏迷不醒了。由于失血过多，终于不治身亡。

孙中山正在为陈炯明拒绝来大本营筹划北伐事宜而恼火，忽然又传来邓铿在广州被暗杀身亡的消息，这使孙中山大为震惊而且悲痛，他失声痛哭：“仲元，我的好同志啊！”

邓铿被杀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大本营，孙中山请来了胡汉民，告诉他要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将北伐军的高级将领们通知到大本营里，商量采取紧急对策，将军们对邓铿的死议论纷纷，群情激愤……

（邓铿血案一直到1928年才算调查清楚，主犯是陈炯明的族人陈觉民；

行凶者是陈少鹏、黄福芝，二犯也供认不讳。他们说：“邓铿是孙中山的人，他坚决主张北伐，北伐的财力完全靠广东来支持，这样会使广东民穷财尽，孙中山是主张用武力来统一中国的，而我们是主张联省自治的。我们拥护陈炯明总司令，双方政见不合，那当然就是敌人。如果北伐成功，我们将会不容于孙中山，假如北伐失败的话，那北伐军就会全部退回广东，那么广东也不会有安宁的日子。我们干掉了邓铿，也就等于斩断了孙中山的一根臂膀，北伐也就搞不起来了。所以我们非干掉邓铿不可。”）

北伐受阻

就在邓铿被暗害的同时，从云南又传来了令人不愉快的消息，顾品珍被土匪头子杀害，云南省被唐继尧占领，唐继尧拒绝与北伐军合作，这使北伐军的后方立即出现了危机。紧接着，湖南的赵恒惕又派来了一个心腹送信说：“我原来是同意北伐军从湖南北上的，但现在考虑到湖南的现状，如果北伐军再从湖南经过将会给地方带来战乱，为保持地方安全起见，请北伐军改道。”并且还说，如果北伐军一走坚持要从湖南经过的话，到时候恐怕难免要出现令人不愉快的局面，将会使北伐军的行进受阻等等。这分明是在威胁说：如果你孙中山一定坚持要从湖南进行北伐，我赵恒惕就要不客气了。

这接踵而来的几份情报，在孙中山本来就已经忧虑重重的心头又压上几块大石头，使孙中山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他告诉秘书林直勉：“立即通知各路北伐军的将领来大本营开紧急军事会议！”

不一会，总参谋长李烈钧、文官长胡汉民、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第二军参谋长蒋介石等人一一来到大本营会议室，会上，孙中山对大家说：“从我们在桂林设立大本营以来，已经历时半年多，其间几次电召陈炯明来大本营商讨北伐大事，可他总是推三阻四。在我看来，陈炯明固然不乐意北伐，但是为北伐军提供粮饷应该不成问题，可是这几个月来，总是不见粮饷及时送到，看来，陈炯明对于北伐已经成见很深了，诸位看当前应该作何处理才好？”

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第一个发言，他说：“前此以来，北伐的粮饷虽说接济不够及时，但所赖有仲元在后方全力支持，粮饷还不算多么困难，现在，仲元一死，廖仲恺一人在后方孤掌难鸣，如果粮饷不继，北伐大计断难实施。再说，湖南的赵恒惕又改变了主意，不同意我们从湖南经过北上，这时候如果再不调整原计划的话，后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胡汉民说道：“北伐大计，竟存始终心存不满。仲元之死，我看与竟存很有关系，当前之计，应该先除掉自己革命队伍里的内奸，否则，后院不宁，怎能兴兵北伐！”蒋介石和邓铿是好朋友，当年，蒋介石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是邓铿慧眼识才，把他一直提拔到了现在的参谋长的位置。邓铿的死，使得蒋介石十分悲伤，他立志要为邓铿报仇，这时候听到了胡汉民的议论，立即附和道：“陈炯明早就有背叛之心，当前的大敌，就是要消灭自己队伍里的内奸！依我看，仲元就是竟存杀害的，一定是竟存心怀不轨，破坏北伐，被仲元察觉后想杀人灭口！”

总参谋长李烈钧也同意大家的看法，要求孙中山采取果断的措施，先清除革命队伍里的内奸，然后再举兵北伐。

从大家的议论中，孙中山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对陈炯明的信任是否有点过了头？从陈炯明最近的表现来看，他不光是不同意北伐，甚至会不择手段地来阻止北伐的，孙中山怎么都想不通，自己已经很清楚地向陈炯明表示过，这次北伐，不论成功与否，我都是不会再回到广东来的，广东这块地盘已经明摆着就是他陈炯明的了，陈炯明怎么就是想不通这个道理呢？孙中山抬起头，深邃的目光扫了一下会场上的将军们，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陈炯明不可不防，但还没到惩治他的时候，北伐是不能再受挫折了，要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无论如何要把北伐大业进行下去。

孙中山决定：鉴于当前的形势，再从桂林经湖南北进已经不可能了，为

为了防止陈炯明再对北伐计划造成损害，北伐军立即秘密回师，将大本营从桂林移到梧州。孙中山还命令谢文炳所率领的一个旅，昼夜急行军，从广西的富川、贺县进广东北江，作为前头部队，以免陈炯明的粤军阻止北伐军回粤。然后，北伐军的大本营和主力部队渐次回到广东。

可是，率领一个旅先回广州的谢文炳却是陈炯明的老部下，他见陈炯明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早就想回到陈炯明的麾下，他愿意和陈炯明一道留在广州。现在，见孙中山要悄悄地回到广州，这实际上将会对陈炯明大大的不利，必须让陈炯明及时知道这个消息，便在离开桂林后的第二天，就给陈炯明发了一个电报，告诉陈炯明孙中山将要采取的计划，要陈炯明早作打算。

陈炯明接到谢文炳的电报后，立即慌了神，生怕孙中山一回到广东后会对自己不利，便发加急电报，要自己的陈家军快速回到广东来保驾。可是，这时候的陈家军的主力因伐桂胜利后留守在遥远的广西南宁和浔州一带，回到广州还需要一段日子。无论陈家军怎么快速行军，也不能抢在孙中山回到广东之前来阻止北伐军的主力部队了。眼看着自己就要被孙中山控制，陈炯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子中走来走去，无可奈何，他决走索性给孙中山来个不理不睬，以退为进，让孙中山拿自己没有办法。

1922年的4月12日，北伐军的主力部队到达梧州，孙中山立即发电报给陈炯明：“我已率大本营回到广东，请接电后速来梧州面商北伐大计。”在广州的廖仲恺怕陈炯明对北伐军回广东多生疑心，便给陈炯明发去一份电报说：“孙大总统此次率军回广州，目的是补充粮饷、弹药，增加有生兵力，改道从江西进军北伐，从桂林调回来的各路军马，将集中到韶州一带，要在一周之内通过，请你给留守在两广边境的各路粤军发个通知，让他们为调归的各路北伐军提供粮饷和通行的方便。”廖仲恺还对陈炯明说：“你是北伐的大后方广东省的军政长官，应立即与孙先生取得联系，与孙先生戮力同心，共商北伐大计。”

陈炯明接连接到孙中山和廖仲恺的两份电报，心里也有点着忙，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无可奈何之下，准备硬着头皮去梧州一趟，想必孙中山也不会怎样为难自己。可是他的心腹秘书陈鹤年却说：“总司令不可贸然去梧州，你想，即使孙中山不会为难你，他的部下怎会放过你？特别是胡汉民、许崇智等人，他们谁不想替邓铿报仇，你去了还能好好地回来吗？”

陈炯明一想也觉得有道理，便放弃了去梧州的打算，一面加紧调叶举、洪兆麟等人火速回师广东，一面却给孙中山打去了一份电报说：“我长年征战，已有多种疾患在身，特此请求免去本、兼各职，回乡休养。”

发过电报以后，也不管孙中山是否同意，便准备回惠州去。

孙中山召回陈炯明的电报发出去后三天，仍然不见陈炯明到梧州来议事，非常着急，可是到了第四天却等来了陈炯明的辞职电报，气得孙中山把电报摔到了桌上。这时候的孙中山才真的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后方了，北伐大计眼看就要成功，却又有顷刻之间毁于一旦的危险。

军事会议上大家议论纷纷，都认为陈炯明的背叛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不能再犹豫了，从当前的局势来看，必须先除内乱，然后才可放心地去打北方的敌人。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的言辞最为激烈：“陈炯明狼子野心，万万不可再予轻信，北伐军应该留在广东，先清除内乱，再北上中原。”

另外一种意见是，改道进军，从江西北上，这时候的江西是军阀统治比较薄弱的省份，可以韶州为本营，占领江西全境以后，再以江西为根据地，

稳步前进，等北伐成功以后，再回师广东，清除陈炯明这块隐患，如果陈炯明不是真想叛乱的话，他还是有机会为北伐立功的。多数人觉得这种意见有道理。

孙中山也还是对陈炯明抱有幻想的，他总是不相信，陈炯明怎会背叛自己，因为建立中华革命政府，不光是孙中山的理想，也是早期参加革命党人的共同理想。于是他没有采纳关于留驻广东、先灭陈炯明后举行北伐的意见，而是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改道北伐。

但是，对于陈炯明的行动，不能再给以无边的宽容了。孙中山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等三个职务，保留其陆军部长之职。”孙中山这样做的目的，还是期望陈炯明能幡然悔悟，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免去了陈炯明的职务以后，孙中山任命伍廷芳为广东省省长，任命粤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部队总司令，又将广东的陆军和海军全部调归大本营直接管辖，撤去粤军总司令一职。

孙中山的免职令由廖仲恺带回广州，廖仲恺是明白孙中山的心情的，他把免职令装在口袋中，暂时不发，而是先去面见陈炯明，想再说服陈炯明转变态度，支持北伐，如果这时候陈炯明改变了态度，廖仲恺还可以再请求孙中山收回成命，让陈炯明继续当粤军总司令，使事情出现转机。可是，这时候的陈炯明已经完成了他的设防和叛变计划的筹划，早已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了，他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取而代之，根本不理睬廖仲恺的劝告。廖仲恺没有办法，只得将免职令交给陈炯明。陈炯明却乘机假戏真做，当天晚上就在省署里召开紧急会议，举行下野仪式，带领随从们退居惠州西湖百花洲，一面秘密给自己的亲军们发去电报，要驻在广州的陈家军在虎门、石龙一带布置防线；又命令叶举火速赶回广州；同时，陈家军的其他主力部队也在悄悄地向广州集结，陈炯明已经完成了他的反叛准备工作，只等合适的时机一到就动手，消灭孙中山。

4月22日，孙中山再到广州，他还想说服陈炯明参加北伐。孙中山认为，陈炯明是个顽固的军人，他只是对北伐的成见太深了，思想上转不过弯子来，广东的军事和财政实权还是掌握在陈炯明的手里，只要有一线可能，就要力争陈炯明共同参加北伐。所以，孙中山一到广州，立即派信使前往惠州，持自己的亲笔信去召陈炯明回广州来议事，在信中劝陈炯明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要把个人的利益看得太重。可是这时候的陈炯明怎么还会听得进忠告呢？

与孙中山同行的罗翼群忧心忡忡地对孙中山说：“陈炯明个人的去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是他的一些心腹部将如叶举、洪兆麟等人，这些人都是些贪图功名利禄之徒，如果让他们和陈炯明成天在一起的话，那后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孙中山觉得罗翼群的话有道理，便派遣古应芳、罗翼群等人去惠州再劝陈炯明回来。陈炯明对来劝他的人说，自己劳顿多年，心力交瘁，正想乘此机会休息一下，不愿再回到前线上去了。罗翼群等人也只好空手返回覆命。

孙中山这次来广州，不光是来再争取陈炯明的，在“护法”革命中，有一支北洋海军舰队驻在广东海面，这批海军舰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孙中山来广州后，密令广州的江防司令陈策、同安舰舰长温树德率海陆军将北洋舰队收编，收编以后，任命温树德为北洋舰队的司令。

北洋舰队被收编后，广州的北伐军的力量再一次壮大起来，陈炯明这时

候也装模作样地来与孙中山周旋，表示他愿意支持北伐，在致孙中山的一封信中说：“自己的病已经逐渐好起来了，不日就可回广州来和孙中山见面。”

陈炯明的态度转变，孙中山一度时间很高兴，他认为陈炯明终于认清了形势，还是自己的同志。

5月1日，北方的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大战，孙中山觉得这是大举进行北伐的好机会，机不可失，便以大元帅的名义声讨徐世昌的罪行，下令北伐。在大元帅令中，孙中山表示：自己要亲自冲锋陷阵，率领北伐大军，扫除国家政治上的黑暗与罪恶，以达到国家的统一。

5月5日，广州各界举行隆重集会，庆祝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一周年。

5月8日，孙中山重返韶州大本营，在韶州大本营发布北伐总攻击令，北伐军分三路向北挺进。为了进一步争取陈炯明支持北伐，孙中山任命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命令他率领所部人马分驻肇庆、高州、雷州、钦州、廉州、梧州一带。同时要求陈炯明积极在后方支持北伐。陈炯明却阳奉阴违，一面假意和孙中山电报书信往返，一面却密令叶举率军回到广州，这时候的广州已没有多少北伐军的力量了，陈炯明立即从惠州赶到广州，广州又为陈炯明所控制。

当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地前进的时候，叶举在广州发出通电，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各项职务，要求免除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的职务。

在江西前线，北伐军节节胜利，先后攻下了江西的赣州、吉安，前锋直指江西省会南昌。孙中山忽然接到了叶举的电报，一阵痛苦的思考以后，他决定再作一次让步，因为他不能再让目前北伐节节胜利的大好时机丢失，他同意让陈炯明署理两广军务，并电令叶举立即率领所部兵力奔赴驻防处。

在广州，陈炯明的部将们到处寻衅生事。廖仲恺不得不向孙中山发出急电，请求指示如何处理后方事宜。为了稳住后方，孙中山决定走一步险棋：只身回广州去，先稳定后方，解决北伐军在前线作战的后顾之忧，孙中山将韶州大本营交给胡汉民暂为代理，自己返回广州，亲自督促陈炯明的行动。大家都劝孙中山不可过分相信陈炯明，如果一定要回去，也要带足卫队，可是孙中山考虑到北伐前线兵力紧张，只带了五十名卫士返回广州。

当孙中山只身返回广州时，北伐军在赣州发现了陈炯明与吴佩孚的来往信件数封，信中商量的事情是如何南北夹击北伐军，如何在消灭孙中山以后让陈炯明占两广为王。这一情报立即被送往广州，报告孙中山，请求孙中山密切注意陈炯明的动向，不要为乱臣贼子所乘。可是这时候无论孙中山采取什么行动也来不及了。

再返广州

当北伐军在江西节节胜利的时候，陈炯明是亦喜亦忧，忧的是北伐军势如破竹，进展神速，力量飞快地发展，将会对自己在两广的地位构成极大的威胁，假如北伐军就这样成功了，自己将来不就永远被孙中山控制住了吗？可是这也有令人高兴的地方，那就是北伐军的主力远在江西前线，广州的兵力空虚，这时候如果叶举、洪兆麟等人率部及时返回，便可一举占领广州，占领总统府。而且，叶举已经在白云山郑仙祠里设立了司令部，这无疑是一个大大的定心丸，只等时机成熟就可举事了。

为了保证自己的阴谋顺利地得以实现，陈炯明佯装服从孙中山的命令，给孙中山回电说：“自己已经给叶举等人发布了命令，谅他们还不至于敢违抗军令，我敢用生命来担保。目前，我的病况已经大为好转，不久就可重返前线，为北伐效力，为革命的大事业效力。”

陈炯明和孙中山几次书信往返，他认为已经稳住了孙中山，心里不免有点得意。可是，这一天，当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广州作战地图的时候，秘书陈鹤年忽然送来一份电报，陈炯明一把抓过电报，紧张地看起来，只见电报上明明白白地写道：“孙中山已秘密返粤，请密切注意动态。”

读着这份电报，陈炯明的冷汗“唰”地一下就流遍了全身，一时间六神无主，急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连连说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孙中山回广州的消息，对外是严密封锁的，为了保证孙中山的安全，北伐军内部许多高级军官都不知道，那么是谁给陈炯明发的这份电报呢？原来，陈炯明早就有准备了，当孙中山率领大本营进驻韶关的时候，要带走粤军的一部分，陈炯明将自己的心腹将领梁鸿楷及其所部派遣与孙中山同行，表面上表示陈炯明虽然对北伐有成见，但是对孙中山的命令还是服从的，暗地里却嘱咐梁鸿楷密切注意北伐军的动向，随时向自己报告。所以不论北伐军有什么大小行动，只要前方一有动静，陈炯明在广州立即就知道了，这正是陈炯明工于心计的地方。现在，这份报告孙中山秘密返回广州的密电正是梁鸿楷从韶关前线发回来的。

陈炯明拿着这份电报，感觉到形势的发展对自己十分不利，苦苦地思考对策。沉默片刻，陈炯明抬起头，对秘书陈鹤年说：“快，查查孙中山这次回来，带了多少卫队！”

陈鹤年答了声是，正要准备回身去安排行动，忽然，门外卫兵报告：“叶、洪二位将军到！”

陈炯明闻听大喜：“快，快请二位将军！”

随着陈炯明的话音，叶举和洪兆麟一身戎装、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陈炯明大步走了上去，一手拉住一个，连声说着：“欢迎二位将军凯旋！”一面又回过头大声地吩咐：“快快备酒，为二位将军接风！”

不一会，酒菜全部上了桌，陈炯明给二人不断地斟酒、挟菜。叶、洪二人是来请示关于对孙中山的下一步行动如何着手的问题的，这事是陈炯明最关心的事情，而从现在看来，他好像全不关心这件事。城府比较深的洪兆麟不怎么着急，而素有大炮之称的叶举就耐不住性子了：“奉总司令的命令，我部已经全军返回，并已完成了对总统府的包围，请总司令下命令，下一步该怎么办？！”

陈炯明对叶、洪二人说：“孙中山早就对我不放心了，前几天，他派姚

雨平、程潜二人来惠州西湖，劝我出山北伐，我给他们来了个故将聪明作糊涂，对他们的游说不予理睬，把他们打发回韶关去了，那个姚雨平还算得上是个文人雅士，我请他们到西湖上去钓鱼时，姚雨平还作了一首诗劝我出山，诗中有两句却也还有点文雅：‘征西奔走劳鞍马，扫北归来垂钓丝。’这明明是在对我说，要我先去为孙中山卖命，卖完了命再回来过隐居的日子，我给他来了个一概不懂，他俩吃了个软钉子。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孙中山可不是个糊涂人，他也不是一两次装糊涂就能糊弄得过去的人，现在，他自己回广州来了！”

叶、洪二人一听说孙中山自己已经回到了广州，当时就吓得面面相觑，半晌不得作声。好一会，叶举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好不容易布置好了一切，难不成就因为孙大炮回来而功亏一篑！我有雄师五十个营，弟兄们都愿意和我同生死、共患难，岂能束手就缚！索性我们一不做、二不休，乘孙大炮回来的当口，把他给抓起来！然后对外宣言，成立广州政府！”

陈炯明要的就是叶举这一句话，立即高举酒杯，说：“叶将军真不愧是一员勇将！来，为你干了这一杯！”稍顿了一下，陈炯明又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就要敢作敢为，不冒险怎能成大事！”

密商了一阵子之后，如何对付孙中山的计划已经大体有了眉目，正在这时，又接到了韶关梁鸿楷的密电，电报说，孙中山这次回来只带了卫士团中两个营的兵力，这使陈炯明等三人大喜过望，更加坚定了要在路途上把孙中山干掉的决心。

一阵碰杯之后，他们商量好了如何在孙中山回广州的途中突施杀手的每一个细节，他们认为，孙中山秘密回广州，这是自投罗网，反倒创造了一个不费力气下手的极好机会……

1922年的6月1日，孙中山乘坐着专列开赴广州，这次随行保护孙中山的是卫士团中的两个营，临行前，孙中山说只带五十人就够了，是卫士团的团长陈可钰亲自挑选了叶挺和薛岳为营长的两个营的兵力作为护卫队伍，而将张发奎的一个营留在大本营里继续担任警戒任务。

列车到达新街车站时，广州各界人士都来欢迎孙中山大总统，许多人都在说陈炯明将要叛变的话，要孙中山多作准备。孙中山一面叫大家放心，一面说，陈炯明只是反对北伐，还不敢公然反对革命。尽管这样，大家还都是劝孙中山要多加小心，孙中山对大家的关心表示感谢，并一再说不怕。

这时候，有一位老华侨从人群中走到前面对孙中山说：“大总统，陈炯明在惠州经常召集他的部下在一起密谋策划，大有谋乱的企图，大总统千万不可从固定的车站下车，切不可直到黄沙车站，以免被陈炯明暗算。”孙中山要大家放心，反复说不会有事的，还说，我对陈炯明一直以诚对待，他怎么也不会害我的。但是欢迎的人都劝孙中山小心点好，卫士团长陈可钰非常赞成这些意见。陈可钰对孙中山说：“陈炯明的背叛之心，已经有目共睹的了，现在我们最好暂时不要回广州的总统府，以免出什么差错……”

孙中山把手挥了一挥：“你不要说了，我懂得你的意思，你是从我的安全来考虑的，而我是从我的身份来考虑的，哪有大总统回到广州却不回总统府的道理？要是这样让北方的那些军阀们知道了，还不要笑掉了大牙？有人说陈炯明要叛变，要我先对付他，我却不同意自相火并，我这次为什么不多带一些卫队回来，就是要向陈炯明示以诚意，我要劝他早日觉悟，回到北伐的队伍中来。我们赶快回到广州去，把事情办完后，我还要回到韶关大本营

指挥北伐去。”

孙中山乘坐的火车还是按照原定的路线到了黄沙车站，孙中山下车以后，陈可钰指挥两个营的卫队把孙中山簇拥起来，严密防范。正巧海防司令陈策早已派来了几艘军舰在江边等候，陈可钰一直等到把大总统护卫上了军舰以后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孙中山登上军舰以后，担任后卫任务的营长叶挺最后登船，他报告陈可钰，就在大总统上船以后，黄沙车站突然来了一大批身份不明的人，他们在车站上横冲直撞，企图寻事。陈可钰心中想：“果然狗急跳墙了，幸亏陈司令来得快，要不然今天可还真有点麻烦！”

6月2日，孙中山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顺利地回到了总统府，这使得随行的卫士们松了一口气，孙中山自己也松了一口气。回到总统府的第二天晚上，孙中山便带着马湘和黄惠龙、张仙逸等人出来视察白云山的情况，从总统府的粤秀楼出来，经震武楼往文澜阁方向一路巡视，令他大为吃惊的是，文澜阁后面的粤秀茶室里住满了军队，茶室的墙上还凿了许多枪眼，都是对着总统府的粤秀楼的。

孙中山让马湘去找来一个士兵，问：“你们的长官是谁？”

“是洪兆麟司令。”

“你们的洪司令也住在这里吗？”

“不，这里的长官不是洪司令，是李旅长。”

“你们在这里有什么任务？你们是从哪里开过来的？”

“我们是从江西的北伐前线开过来的，我们在那里打仗打得正是高兴的时候，却被不明不白地调到这里来了，在这里又是挖工事，又是搞训练的，这上面不是总统府吗，这是干什么呢？真弄不清楚！”士兵不认得孙中山就是大总统，一边说一边嘟囔着。

本来，从韶关安全抵达广州使孙中山稍微安心了一些，可是眼前的现状却叫他更加担忧起来，孙中山此刻开始意识到陈炯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了。

为了感化陈炯明，孙中山再次致电陈炯明，要他“火速赶到总统府共商北伐大计。”另一面又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宴请陈家将，可是陈家将们却一个都不来参加宴会，把大总统送去的请帖轻蔑抛在一边，陈炯明干脆连信也不回一封了。到了预定开席的时间，不见一个人来，气得孙中山一拳擂在桌子上，厉声警告：“不要以为你们占据了白云山，就可以胡作非为，我用几门海军大炮，完全可以消灭你们！”

陈炯明和叶举、洪兆麟等人商量好了暗杀孙中山的计划之后，便在家里静等着孙中山被杀或是被俘的好消息，可是到了6月2日，秘书陈鹤年送来一份电报：“孙中山已安全抵达总统府。”气得陈炯明咬牙切齿地骂道：“一群废物！”

就在这时，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曹、吴不满徐世昌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袒护，通电全国责令徐世昌下台。同时，曹锟、吴佩孚看到北伐军的势头不可遏止，便在通电中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口号，要求南北总统同时下台（南总统指孙中山）。

对北洋政府的叫嚣，孙中山不予理睬，在6月6日就徐世昌辞职发表宣言，称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以“中国事实上、法律上、唯一政府行政首领之资格”申明：我们正在从事改造旧中国旧生活的伟大事业，一切帝国主义列强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任何列强不得承认现北京的伪政

府、伪总统（6月3日，黎元洪在北京复任大总统）。

6月7日，孙中山发表宣言，认为当前解决国内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恢复约法，要改造现有的军队，使现有的军队变成工兵，“收其武器，与以工具”。这一宣言后来被称为《工兵计划宣言》。

6月8日，孙中山就黎元洪复任大总统、毁弃《临时约法》的叛国罪状发出通电，指出“北京已无政府”，国家与外界的一切交涉事宜，均应由广州政府承担。

吴佩孚见孙中山不肯下台，便想通过陈家军来迫使孙中山下台。吴佩孚给陈炯明送去一封密件，要他立即发动政变。陈炯明心领神会，给他的陈家将们发去一封密信说：北伐军现在丧师失地，军心不定，广州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我们应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及早消灭孙中山的力量，如不乘此大好时机下手，将来就很难办了，我们就有被孙中山吃掉的可能，最好的情况是和北伐军同归于尽。另一面却又和孙中山敷衍说：现在军队已经不听我的命令了，我本来是想到广州去的，可是现在我不能回去了。

孙中山接到陈炯明的回电后，误认为陈炯明的话是真的，决定通过对陈家军、陈家将施加压力，迫使陈家军撤离广州，重返韶关，参与北伐行动。

6月12日，孙中山在广州财政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愤怒地谴责陈家军，孙中山说，现在，以叶举、洪兆麟为首的军队，驻扎在白云山附近，拒不听从政府的向令，已经成了一支蛮横无理的、目无上官的、反对政府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无时无刻不可以作乱，无时无刻不在贻害地方，我现在下命令，让他们撤出广州省城外三十里。他们如果胆敢不听从的话，我就会用武力来压服他们。人称我孙大炮，以前我曾经炮轰过反动军阀陆荣廷，如果现在我们自己的军队拒不听从政府的命令的话，那他也就成了新军阀，我也用大炮去轰他们。我完全能在三个小时之内，用重炮把他们轰成齑粉！我现在还不想这么做，今天请诸君来，是想请你们在舆论上造成一种压力，让陈家军们知难而退，只要他们还回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我们还是欢迎的！

可是，对于孙中山的警告，陈家军们置若罔闻，陈家军以为，在广州，他们有军队二万五千多人，而孙中山只有五百来名护卫队，只要他们一发动政变，一定会稳操胜券。一切准备停当以后，陈炯明要发难了。

同时，北伐前线，捷报频传，眼看着就要拿下赣州，孙中山计算：赣州攻克后，乘势进取吉安、南昌，再到九江，屈指数来，总计行程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孙中山梦寐以求的时刻，决不能再错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孙中山决定：6月16日离开广州，再赴韶关大本营，他要在攻克南昌后，亲率舰队至上海、入长江，北定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然而，就在这样的時候，陈炯明已完成了他的反革命部署，他也觉得，消灭孙中山，独霸广州的时刻到了，因而，他也准备行动了。

剧变前夜

1922年6月14日，廖仲恺从香港回到广州，立即求见孙中山，孙中山听说是廖仲恺求见，非常高兴，马上出门来迎接。见面第一句话，廖仲恺劈头就说：“听说您只带了两个营的兵力来到广州，这是很危险的事，陈炯明现在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我担心陈炯明随时都会发动叛乱的，请您还是早点回到韶关大本营去的好，那样，一来您可以继续指挥北伐战斗，二来也比在广州安全。”

孙中山笑着说：“你到香港去，听说是去筹款的，怎么样？筹到了没有？”

廖仲恺愤怒地说：“款子倒是筹到了，可是实在是令人气愤，我们现在的关税全部控制在英国人的手上，而省内的税收又全部被陈炯明截留了，我到处筹款，处处碰壁，最后只好到香港去筹款，好不容易才弄到了二十万元，请先生您先带着这二十万元赶快回北伐前线去吧……”

孙中山说：“那也不必，陈炯明日前还给我打电报说，他正在努力做陈家军的工作，虽然有点难，但他还是保证说叶举等人不敢有非分之举，他也正在做工作，劝叶举等人按我的布防命令去办，不管怎么说，陈炯明目前还不至于背叛我的。我已经给陈炯明打了电报，要他来广州和我面商北伐大计。不过，我倒是很想听听你关于当前广州局势的看法。”

廖仲恺道：“当前广州的关键在于陈炯明的态度如何，只要陈炯明不带头闹事，陈家军是不会闹事的。我想您邀请陈炯明来广州，他是不会来的，倒不如我去一趟，正好竟存昨天给我发了个电报，要我去惠州，我顺便去劝竟存，或者还有可能让他到广州来见您。”

孙中山沉默了片刻，想了想说：“那也好，当年正是你在陈炯明最困难的时候带着钱到漳州去帮助他的，现在你去，好好地动之以情，晓以利害，争取让他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到时候，你走的时候通知我一声，我让叶挺带一个营的警卫来保护你。”

廖仲恺摇摇手说：“不必了，我只要一个人单独去就行了，我不带一兵一卒，也好向陈炯明表示我们的诚意，陈炯明是个多疑的人，不能给他留下任何话柄。”

就在6月14日这一天，陈炯明在石龙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准备对孙中山发难，陈炯明在会上给他的心腹爪牙们鼓劲打气：“谁先向总统府开炮，谁就为我们立了头功，就是我们粤军的大阿哥！”

陈家将们虽然一个个平日里不可一世，在陈炯明面前大吹牛皮，说要如何如何为陈总司令效力，要对孙大炮实施攻击，但一听说要动真格的，要在对总统府的行动中开头一枪，这些骄兵悍将反而害怕起来。冷场了一大会子，只有土匪出身的杨坤如把袖子一掬，帽子一摔，吼地站起身来表示要立这个头功。可是那些自认为名门正派出身的军官们却不满意，一致公推叶举出来做大家的头。

叶举还真不愧是陈炯明的心腹，竟然站起身来表示同意。但是叶举也有他的顾虑，别看他似乎是个粗鲁的军人，可还确实有点歪心眼子，他在同意自己率先发难的时候，却又建议由资历、声望都很高的老军长熊略来当总指挥，大家都没有意见。熊略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可是嘴上还是不好说，反过来给陈炯明一个难题做做，他说：“大家推举兄弟我来当这个总指挥，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我有一事不明，陈总司令是我们大家心目中共同的主

帅，只要陈总司令下一道命令，我当率领所部一万多弟兄，率先奔赴战场。陈总司令为什么不下命令呢？”

陈炯明早就料到部下会有这一着了，他轻轻地对着心腹秘书陈鹤年点点头，陈鹤年站起身来，对师长钟景棠说：“请钟师长给大家讲一讲他今天做了些什么。”

钟景棠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用得意的眼光扫视了会场一周：“今天上午，兄弟将廖仲恺给扣留了起来……”

“噙……”的一声，钟景棠的话还没有说完，会场上立刻乱了起来，有的人在心里连呼可惜，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钟景棠这个家伙抢去了；有的人在暗自庆幸：有这个老兄先下手，将来万一攻打孙中山失败了，我自己也有一个退路，不是我带头打的大总统，以下犯上、谋逆叛变的恶名也不会落到我的头上了；有的在感到惊讶：陈炯明果然对孙中山动手了，陈炯明可真是那个敢说敢做的大人物，今后和他共事可得防着点，不要一不小心上了他的当……

这时候，陈炯明终于站立起来，笑容满面地对大家说：“自古时世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世，现在是我们一显身手、改造时世的时候了！现在，我们已经捉住了廖仲恺，这就等于把孙中山的钱口袋给锁住了，没有廖仲恺给孙中山筹款，孙中山他有天大的本事也踢腾不起来了！”

受到陈炯明的感染，会场上的陈家将们开始活跃起来，一致推选熊略为攻城总指挥，推选洪兆麟为先锋，并且很快就讨论好了进攻总统府的行动计划。

还是6月14日这一天，孙中山在总统府再次宴请粤军中旅长以上的军官，他想在这次宴会上，一方面向大家说明自己明天就要离开广州去赣南前线督促北伐，另一方面也乘机对陈家军陈家将们做做说服教育工作，要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去干那些背叛革命、使亲痛仇快的事情，要认真理解中华民国的主义，以统一中国为大业，为民族的兴旺和昌盛作贡献。

可是，时至中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伍廷芳、海军司令温树德、广州江海防司令陈策、直辖警备司令姚雨平等已经一一来到，却就是不见粤军将领们的到来，这使得孙中山大为恼火，正在控制不住的时候，忽然秘书林直勉又来报告说，廖仲恺在赴惠州途中，被叶举的部下、师长钟景棠在石龙扣留。林直勉还说，他在向粤军送请帖的时候，被叶举的卫兵挡在营房的外面不让进去，粤军的将领们一个都不肯来。

孙中山听罢，不由得怒气填胸，手指白云山，高声说道：“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如此胆大妄为！不要以为你们占据了白云山就可以任意胡来了，我一样可以打得你们落花流水！”

应邀来赴宴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大家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纷纷要孙中山早早作出决策，不要给陈炯明以可乘之机。

孙中山在室中来回踱了几步，毅然决定地说：“现在看起来，广州的事情，陈炯明仍是关键，我就不相信，他陈炯明敢于背叛我！既然他不来广州，我就去惠州，当面问问他，他陈炯明到底还革命不革命，他陈炯明当年的革命誓言还算数不算数！他必须下令叫叶举退出广州，还必须立即释放廖仲恺！”

孙中山怒不可遏，立即就要动身去惠州，这时，直辖警备司令姚雨平走上前来说：“大总统，您不能去冒这个险，陈炯明与我是老朋友了，我们从

广州起义时起就在一起并肩作战，共事多年，请先让我去一趟惠州，促他悔过，同时也可查看一下他最近的动态，回来再向您报告。”孙中山见姚雨平肯去惠州，便对姚说：“你去了惠州，见了竟存，只叫他立刻来广州见我！”

6月15日，姚雨平来到惠州，卫士向陈炯明通报说，直辖警备司令姚雨平求见。陈炯明闻报，对自己的秘书陈鹤年说：“说客来也，看我怎么糊弄他！”一面对外面大声说：“请姚司令在客厅小坐片刻，我马上就到！”

不一会，陈炯明满面春风地从室内走了出来，极其亲热地拉住姚雨平的手，互道寒暄，寒暄过后，不等姚雨平说话便大声地说：“与兄一别多年，现在正是西湖好景，你我何不去湖中垂钓，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以来，隐居西湖，过着不闻世事的生活，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回想起来，过去那么多年南北征战，出生入死，实在是苦不堪言！哪知隐居有如此多的乐趣，真是前半生虚度了青春！”

钓鱼时，姚雨平几次试图劝陈炯明说服叶举，不要做背叛革命的蠢事，请陈炯明到广州去和孙中山共商北伐大计。陈炯明总是装聋作哑，推作听不懂姚雨平的话。姚雨平知道再要多说，也只是空费口舌，留下一首诗后，愤然而去。

姚雨平去后，陈炯明拿起了姚雨平写的诗读了起来：

百花洲上影模糊，
不听嚶鸣听鸛鸣。
铁像何如铜像好，
凭君点缀此西湖。

姚雨平的这首诗里用了几个典故，嚶鸣是用的《诗经》里的两句诗：“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是在告诫陈炯明，要听听老朋友的话，老朋友是不会害你的。而鸛鸣的叫声仿佛是“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这是在暗中警告陈炯明，背叛革命是要不得的，如果不听老朋友的话是要失败的。而铁像和铜像的比喻则更加明显：宋朝的秦桧卖国投敌，结果身后被人们在杭州西湖铸了个铁像，千年万代被人唾骂，而民族英雄岳飞则被后人树立了铜像，千秋万代受人敬仰。

陈炯明看了这首诗，气得火冒三丈，诗中分明是在说自己不会成功，并且还会遗臭万年，就三把两把撕碎了姚雨平的这首七绝诗。

下午，叶举在郑仙祠召开军事会议，特意向自己的部下出示了陈炯明的手令，给部下们壮胆，布置炮轰总统府的行动。叶举说：“民贼（指孙中山）不除，国无宁日。”又说：“今天的会是为民请命的会，是共除民贼的会！”会议决定6月16日凌晨3时进攻总统府，不论是普通士兵还是军官，凡是捉住孙中山者，赏大洋二十万元。

下午5点，罗翼群向孙中山报告了叶举召开军事会议的消息，说是要攻打总统府，孙中山不相信：“我明天就要回韶关大本营去，直到刚才，竟存还和我有电报往返，表示他愿意支持北伐，叶举怎敢不听竟存的命令？”

不一会，陈策又用电话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叛变的消息，孙中山干脆告诉他，这些话只是外间的一些谣言，不可轻信，以免乱了我们的军心。”

晚饭后，陈少白来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今晚真的要发动叛乱了，请大总统及时离开总统府！”孙中山还是不肯相信：“有我在，竟存不敢造反！”

晚上10时左右，警卫团战士李洁之的老乡何云生来了，何对李说：“不好了，我部的统领罗献祥已经下了命令，明天早上我们的部队就要围攻总统

府，通电请孙大总统下野，我们都下达了作战任务，还发了识别带子，禁止士兵外出，我是撒谎说出来大便才溜了出来，你们要赶快作好准备呀！”

深夜 11 时，陈策、魏邦平一齐打电话告诉孙中山，陈炯明谋叛已经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请大总统立即离开总统府！孙中山这时已经不光是愤怒，而是有点悲怆了：“我不管陈炯明是否叛变，我就是不离开总统府，我只知道为国家谋利益，陈炯明为什么要谋反？！”许久，总统府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大本营运输队长陆志云匆匆赶来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的叛变消息，并且连叛军的口令部搞清楚了，是“食饱饭、杀民贼”。大总统再要不走就怕来不及了。

孙中山这时变得更加慷慨激昂了：“我就是不走，我是大总统，不能擅离职守，我被叛逆所害，正是我为国捐躯的时候。如果陈炯明敢于叛变，那全国人民都可以共同讨伐他，他就会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我如果这时候因害怕叛军而逃走，那就玷污了我们的国家！”

到了凌晨 2 时，在总统府的粤秀楼上已经能听到叛军的集合号声了，卫士们一齐来劝孙中山赶快离开总统府。孙中山就是不愿意，马湘和黄惠龙叫来几个人，强行给孙中山换上了一件白布长衫，戴上一副墨镜，提着一个药箱，装扮成医生的模样，两个卫士一边一个挽起孙中山的手，挟着他出去。

孙中山只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转身回到卧室，喊宋庆龄一起走。宋庆龄在睡梦中被惊醒，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孙中山对她说：“陈炯明已经正式叛变了，我现在必须到军舰上去，到那里指挥平叛战斗，你快起来和我一起走！”

宋庆龄一边急着穿衣服，一边对卫士马湘、黄惠龙等人说：“你们快扶着大总统先走，我随后就来！”

孙中山坚持要宋庆龄和他一道走，宋庆龄果断地说：“不，我和你一起走，目标太大，容易被叛军发现，再说我已经有了身孕，行动不方便，你还是一个人先走吧！”

孙中山还要坚持等宋庆龄一起走，宋庆龄说，“不！还是你先和卫士们走，我一个人好走。再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先生，请你赶快走！”

在宋庆龄和卫士的一再催促下，孙中山不得不先走一步。临行时，孙中山对宋庆龄交代：“我到了军舰上后，就放三声大炮，你听到大炮的声音，就知道我已经脱险了。”

重围脱困

孙中山离开宋庆龄，卫士马湘、黄惠龙要求随行保卫，孙中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跟我走，留下来保卫总统府，什么危险我都不怕，再说我也有脱困的方法。你们一定要坚守粤秀楼，明天我要是没有消息，马湘你就领夫人先到你的家中躲避一下。”孙中山交代完，便带着秘书林直勉和林树巍二人，悄悄地离开了粤秀楼，不一会儿，便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这当儿，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孙中山一行人不慌不忙地走在大街上，孙中山是一副医生的打扮，穿一身白色的长衫，戴一副墨晶眼镜，左手提着一只小医药箱，右手还拿着一根黑色的拐杖。

大街上，到处是叛军的岗哨，孙中山和林直勉等人走到爱惠路的时候，忽听得前面一声大喝：“站住，干什么的！”

林直勉沉住气，走上前去说：“老总，我的母亲忽然生了病，半夜里天太黑，送医院不方便，便请了个医生，请您行行好，让我们过去吧。”

叛军的岗哨看了看孙中山，果然是个医生模样的人，还提着个药箱子，便不再怀疑，挥挥手，让他们走了过去。

走了不远，眼看就要到海军驻防的地带了，刚想松一口气，又遇到了一大队叛军，堵住了去路。林直勉轻轻地拉住孙中山的衣服，躲到一边，探头往四面看了看，正好从马路的另一头过来一二十辆手推车，孙中山等人便乘机夹到小车队中，从容不迫地从叛军的面前走了过去，也没有引起叛军的注意。

来到靖海路口，孙中山和林直勉等人雇了一只小船，划到了海珠海军司令部，再改乘小电动船登上了停泊在白鹅潭的军舰宝璧号，这才算是安然脱险。

上了船，林直勉和林树巍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一摸身上，已经汗流浃背。孙中山立即招呼：“快快鸣放大炮三响！”“轰——轰——轰——”

大炮三声震天轰响了起来，正在粤秀楼上静静等候消息的宋庆龄高兴得跳了起来：“先生脱险了，先生脱险了！”

孙中山脱险的消息立刻传遍了粤秀楼的每一个角落，卫士们都高兴得露出了笑容，大家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霎时间，连大战在即，流血牺牲的危险都忘记了。

凌晨3时，陈炯明的叛军开始了全面行动，叛军占据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地对着总统府开枪开炮，呼啸的枪炮声中夹杂着叛军的嘶哑的嚎叫：“打死孙文，打死孙文！”粤秀楼的卫士们一个个怒气填胸、奋起反击，一直打到天亮，叛军在粤秀楼前丢下了三四百具尸体。

到了白天，战斗进行得更为激烈，叛军由于视线清楚，用山炮轰击粤秀楼，用机枪扫射，卫士们的子弹都快打光了。

在总统府和粤秀楼之间，是用天桥接通的，两边都有卫士守卫，为了集中兵力，团长陈可钰决定，把守卫天桥的卫士和守卫粤秀楼的卫士集中起来，退守总统府，命令马湘快到粤秀楼去请宋庆龄来总统府。

马湘和守卫粤秀楼的卫士们一齐拥着宋庆龄借着天桥上的护板、躬着腰从天桥上向总统府撤退。叛军见天桥上有人，立即大声喊叫着对天桥上开枪开炮，好几次，子弹呼啸着从宋庆龄的鬓发上擦了过去。好不容易走过了天桥，进了总统府，刚刚坐下来，只听得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一发炮弹击中

了粤秀楼，大家都为刚才能及时跑出来而捏了一把汗。火车去上海，可是恰巧京沪铁路中断，只得改乘日本的“上海丸”轮，绕道日本后再去天津。12月4日，当孙中山乘日本“北岭丸”到达天津时，两万多群众自动集合到码头上热烈欢迎孙中山。

从离开广州北上开始，孙中山就感到身体不适，从日本到天津，轮船一路颠簸，孙中山的肝病开始发作了，可是，面对天津几万欢迎的群众，孙中山依然坚持步行，并且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挥帽致意。当天下午，孙中山就带病去看望了张作霖，和张作霖谈了两个多小时，回到住处之后，当晚便肝病大发作，痛得浑身颤抖，医生嘱咐孙中山必须卧床休息。

第二天，关外大帅张作霖开了二十多辆汽车，率领一百多名卫士，到孙中山住的张家花园回拜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张作霖，张对孙中山说：“我决心追随先生，愿作先生的卫队长。不过先生的主张中，有不妥之处，那就是反对外国列强这一说法，只要孙先生放弃这一主张，我愿意代替你向外国人疏通感情，使外国人同情我们，支持我们。”孙中山见张作霖就是这么个主张，非常生气，现在他才知道，军阀们是靠不住的，他对张作霖也彻底失望了，便推说病痛，不发一言，不理张作霖。

就在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时，北京的政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段祺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他对外国人丝毫不敢得罪，急切地向外国人表示：自己的政府是“外崇国信”的，对历年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是承认的，并表示准备召开善后会议来解决这些国际问题。

对段祺瑞的媚外政策，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第四次发表了关于时局的主张，表示支持孙中山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做法，反对所谓的“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主

马湘和黄惠龙二人扶着宋庆龄还在小巷子里寻找安身之所，可是不巧却走到了一条死胡同里来了，宋庆龄已经是一个有了身孕的妇女，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路，实在是走不动了，没办法，找到一家虚掩着门户的人家，轻轻推开门，见里面没有人，便走了进去。

马湘和黄惠龙先把宋庆龄扶进内室去休息，然后把军服脱下来，裹着手枪投进了井里，坐在客厅里休息。

不一会，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走进门来，见有人竟然不打招呼也没经过自己同意就坐在自己家的屋子里，顿时大为光火，高声斥问他们是什么人。马湘只得陪着笑脸，解释说，自己陪姑母到街上去买点东西，不巧碰上了军队打仗，吓得不敢上街，也不敢回去，只好先在这里躲一下，请老人家千万行个方便。一面说着话，宋庆龄也从里屋走了出来。

老妇人见到宋庆龄长像和蔼，面貌俊秀，有了几分好感，怒气消了一点，但还是坚持要他们赶快离开。她还说：“我儿子是熊略军长部下的连长，你们再不走，等他回来，我跟他一说，你们想走都走不掉！”

听了这个老妇人的话，宋庆龄一阵急，忽觉得腹痛如刀搅，遍身大汗淋漓，顿时便昏了过去。二姐马上上来扶着宋庆龄到房里去躺下，二姐心里明白，这是要流产的征兆。

马湘和黄惠龙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忽听得一阵紧急的打门声，老妇人一边咕哝着一边去开门，马湘和黄惠龙则拉开架势，准备万一不行就要搏斗，拼着死也不能让宋庆龄给叛军抓去。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看到家里来了好几个外人，一点

也不惊讶，旁若无人地向里面走去。马湘迎上去把刚才和老太太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这个年轻的军官倒还和善，把宋庆龄等人上下打量了一番，见宋庆龄似乎病得不轻，便和颜悦色地说：“这位夫人病得厉害，快请扶她到里面去休息吧。”

马湘便和这位军官攀谈一起来，原来这位军官姓朱，也是个早就投身革命的青年军人，他对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也十分不满，前几天借故说送妻子去乡下养病，今天才回来。马湘见这位军人很有正义感，便大着胆子想请他送自己出去。

马湘说：“朱连长，我们住在四牌楼，早上上街，被乱军冲到这里，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得去，能不能劳驾您给指一条路或是送我们一程？”

朱连长爽快地回答：“可以，这里正好是我们的防区，我送你们出去，要不然你们今天是很难出得去的。”

听了朱连长的话，大家喜出望外，迅速地收拾了一下，便跟随着朱连长走出了大门，走完了小巷，很快就走出了乱军区。马湘这才对朱连长道：“朱连长，真是太感谢您了，您军务在身，不劳远送，请您即回吧。”

大家道别后，马湘对宋庆龄说：“刚才真是险！总算过来了。”

宋庆龄说：“暂时还不能说是脱离了险境，还要小心才是！”

在一个街口，宋庆龄捡了一只菜篮子，放了一些蔬菜在里面，打扮成妇女上街买菜的模样。

又过了一个街口，气氛忽然紧张起来，到处是叛军的队伍在巡逻，搜查躲闪不安的过往行人。宋庆龄对马湘和黄惠龙二人说：“不要紧张，我们就冒充是为朱连长家办喜事去买菜的！”

正说着，几个叛军来到他们身边，要搜查他们，马湘陪着笑脸：“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是为朱连长家办喜事来采买一点时新菜蔬的，朱连长说了，叫看到弟兄们都打个招呼，中午过去喝一盅！”黄惠龙即走上来，拿出一包三炮台香烟，给几个弟兄们一人一根，大家抽着烟，一时间竟有了共同语言，几个叛军也客客气气地放他们几个人走了过去。

宋庆龄一行数人走过维新路，穿过高第街，来到了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的住所，马湘看了看前后无人盯梢，才举手敲门。里面听见有人敲门，半晌没有开门，只是大声地问是什么人，宋庆龄听出是马伯麟的妹妹的声音，大声说：“是我，我是宋庆龄！”听到是宋庆龄的声音，里面的人走出来开了门，正是马伯麟的妹妹和夫人在里面。经过了一天多的奔波，宋庆龄这才算是找到了一个安全休息的场所。

刚刚休息了一会，就听到马伯麟的勤务兵敲门进来，他是回来烧毁文件的，宋庆龄问他见到大总统没有，他连声说见到了，还说大总统的身体很好。宋庆龄让他给大总统捎个信去，就说自己已经从总统府出来了，不几天可以到军舰上去。

第二天，宋庆龄仍然装扮成农妇，和马湘两人冒着危险走到沙面租界地。他们前脚刚进沙面，后面的叛军就要来追查，马湘对沙面租界的华人差役说：“后面的几个流寇要来抢我们的东西，请你千万不要放他们进来。华差信以为真，挡住了几个尾随而来的叛军。”

1922年6月18日上午，岭南大学的校长钟荣光开着一只小汽船，把宋庆龄等人接到了自己的家里，经过了两天的辗转奔波，在马湘和黄惠龙、二姐等人的护卫下，宋庆龄终于在孙中山脱险之后也脱离了险境。

可是，虽然脱离了险境，但是宋庆龄腹中的孩子还是流产了，这对这位伟大的女性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她经受了一个普通女性所未曾经受的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避居海上

当孙中山和宋庆龄先后离开总统府时，总统府前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警卫团长陈可钰和卫士队的队长姚观顺率领部下死守着总统府，叛军不断地缩小包围圈，战士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透过战火和硝烟，卫士队长姚观顺发现，叛军正在向阵地上运送炸药和火油，很明显，叛军是要来炸毁总统府了。姚观顺和警卫团长陈可钰一商量：既然大总统和宋夫人已经突围出去，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守着一个眼看就要化为灰烬的总统府。经过一番互让，决定由陈可钰率领警卫团先突围冲出去，由姚观顺断后。等陈可钰率领的警卫团离开以后，姚观顺也率领卫士们从后面的小巷子里撤离了总统府。姚观顺他们前脚刚走，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叛军的大炮也把总统府给炸塌了。在这个大总统府里，孙中山日日夜夜工作、处理的无数文件和来往的函电、未完成的书稿，全部付之一炬。

叛军攻破总统府和粤秀楼之后，在大街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驱逐国会议员，残杀革命志士，一面却在街上张贴布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以示大公。商民人等，切勿惊恐。”

叛军在广州的行动立即为各国列强所严重关注，他们纷纷以为：中国的革命就到此为止了，陈炯明已经代替了孙中山，国民革命政府已经消亡，今后要与中国打交道，就是和北京政府发生关系了。对各国列强来说，和吴佩孚打交道，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也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的大好时机。

北洋政府的头头吴佩孚更是兴高采烈：“陈炯明为我做了一件我自己日夜想做却做不到而又不敢做的事情，拖住了孙大炮，阻住了北伐军，让我坐牢了这块江山，岂不快哉！”

可是，陈炯明的叛变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愤怒，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宣言，声讨陈炯明的罪行；6月17日，海军全体官兵一致通电讨伐陈炯明；全国各界联合会致电孙中山，要求孙中山调遣海陆各军和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黄埔附近的乡民组织了几千人的义勇队，保卫黄埔；广州的工人也举行罢工，通电全国，支持孙中山，谴责叛军，要求陈炯明立即撤出广州，恢复北伐行动。

6月17日，孙中山登上了海军司令温树德所在的永翔舰。一上军舰，孙中山立刻要求温树德率领军舰向陈炯明开枪开炮，给叛军以应有的打击。可是，温树德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这时候，陈炯明正如日中天，广州全境都在陈的掌握之中，孙中山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不如先观望一阵子再说。便笑嘻嘻地对孙中山说：“请大总统不要着急，我们海军全体将士是一致拥护大总统的，我们与叛将陈炯明不共戴天！不过，现在还不忙在一时，请您休息一会再说……”

孙中山愤怒地打断他的话：“我要立即对陈炯明开炮轰击！这表示我已经到了海上，这表示我们的海军还是一致拥护革命的，我早上已经发出了全国讨伐逆贼的通电，现在海军对叛军开炮，就表示海军对我的号召的热烈响应！这样做，不光是对叛军在军事上的打击，还具有心理的作用！请你不必再犹豫了，立即下命令开炮！”

温树德还推三阻四地说：“我不是不行动，我是想，现在就打，我也太势单力孤了，等我和陆上驻军取得了联系后再行动，如果光是海军行动，形

不成打击力量，没有什么大用处……”

实际上，温树德是有着自己的特殊用心的，他原来就是一个看风使舵的高手，早在第一次随孙中山南下护法革命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舰长，由于他一直是在大元帅府左右充作护卫力量，与孙中山比较接近，又善于察言观色，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逐渐当到了海军司令，担当着统领护法舰队的职责。后来，当孙中山率部北伐时，他发现陈炯明一身而兼任四职，权大无比，便又转过身来投靠了陈炯明，在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脚踏两条船，摇来晃去，玩着平衡游戏。现在，孙中山要开炮攻击陈炯明，他不能不考虑到假如失败了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才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呢！

考虑稳妥之后，温树德总算开了口：“既然大总统要打，我立刻遵命就是。只是我想先把各舰的舰长召集到永丰舰上来，商量一下攻击的计划。”

孙中山见温树德这样畏首畏尾，不由生起气来，正要发火，忽然听到报告说：永丰舰的舰长冯肇宪带着五名水兵来到舰上，请求大总统接见。

温树德却想：“我之所以冒着危险把孙中山接到我的军舰上，就是为了使孙中山永远在我的掌握之中，如果陈炯明胜利了，那孙中山对我来说，就是奇货可居，就可以和陈炯明谈谈价钱；反过来，如果孙中山胜利了，我保卫大总统就又是奇功一件，那时我将可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个时候还是不让孙中山走开的好。”

温树德对来报告的参谋说：“我和大总统正在商量大事，不要让人上舰！”

“不！”孙中山举起手对温树德说：“冯舰长来得正好，我们正好可以听听冯舰长和其他士兵们的意见。”转头对参谋说：“快请冯舰长上舰！”

温树德在心中暗暗叫苦：目前，在温树德的手下，所有的军舰几乎都安插了亲信，而只有永丰舰还没有来得及扫除异己力量，主要是广东籍的将士。对温树德来说，这舰就没有把握控制住。

当温树德还在暗暗叫苦的时候，舰长冯肇宪已经领着五个士兵来到了舰上，一见面，冯肇宪向孙中山敬了个军礼说：“大总统受惊了，我永丰舰全体将士恭请大总统上舰，给大家讲讲话，鼓舞士气！”

孙中山见到士兵们这样热心地拥护革命，一时激动得热血沸腾：“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温树德这时不好拦阻，只得说：“大总统，待会儿要召开军事会议，请你不要去永丰舰吧。”

孙中山回头对温树德说：“不碍事，你先和舰长们议事，等会儿我给永丰舰上的士兵们讲完话以后立即回来。”

孙中山和永丰舰的五个官兵坐上了小电轮，劈波斩浪地向永丰舰驶去。

当孙中山登上永丰舰的时候，只见江海防司令陈策、豫章舰的舰长吴芝馨、楚豫舰舰长招佳章、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等人早已在甲板上等候了。孙中山正在奇怪：“怎么这么多人已经在永丰舰上了，温树德却不知道呢？”大家看出了孙中山眼中的疑问神情，冯肇宪舰长等孙中山坐下以后说：“大总统，这几年来，温树德司令一直在培植亲信，排斥异己，与陈炯明勾勾搭搭的，我们不放心，怕他对大总统有什么不利的行动，所以以请您来讲演为名，让您就住在永丰舰上，好保护大总统的安全。”

孙中山听了冯肇宪的话，想了想刚才温树德对开炮打陈炯明的态度，心里不免明白了几分。

第二天，宋庆龄从岭南大学来到永丰舰上和孙中山相见，这是这几天来

最令孙中山高兴的事情。他兴奋地拉着宋庆龄的手，端详了好半天，激动不已。孙中山又一一和卫士马湘、黄惠龙、内侍二姐握手问好。孙中山对宋庆龄的身体非常关心，当他得知她已经流产了的时候，心中非常难过。为了让妻子好好养病，也为让自己能放心地在军舰上指挥平叛战斗，他要求宋庆龄离开军舰到陆地上去，最好是到上海去休养一段时间。

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宋庆龄只好同意回到上海去养病。

宋庆龄离舰不久，外交总长伍廷芳和卫戍司令魏邦平来到永丰舰上求见大总统，孙中山一见到魏邦平，立即质问道：“叛军围攻总统府，你到哪里去了？你的卫戍军队干什么去了？！”

魏邦平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叛军炮轰总统府的时候，也包围了我的司令部，我出不来……”

孙中山挥挥手说：“过去的话不要再分辩了，我已经将海军的全部舰队都集中到黄埔了，马上就要实施对广州叛军的总攻击，为了早日戡平叛乱，你可将你的部队加快速度集中起来，向大沙头调集，配合海军攻击！”

他回头又对外交总长伍廷芳说：“你今天回去后，立即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向全世界发表宣言，声讨陈炯明的叛逆罪行，号召我中华革命党、革命军的全体成员一致行动起来，共同讨伐叛军！”

伍廷芳激动地对孙中山表示：“我一回去就办，我要照会各国领事馆，让他们认清当前的形势，不要为陈炯明的气焰所迷惑，陈炯明的叛逆行为是不会长久的。不要为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所左右，要保持中立，对我中华民国政府不可持敌对的立场。”

孙中山对伍廷芳的态度非常赞赏，他对魏邦平说：“你看伍外长已经年逾古稀，尚且有为国牺牲的精神，你正是壮年，而且有着一个师的兵员，要在这国家动荡的时候站出来，为国尽力。‘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你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

魏邦平连连点着头说：“是、是、是。”并且保证回去后立即组织向叛军发动进攻。

送走了魏邦平和伍廷芳，孙中山命令冯肇宪给永翔舰、楚豫舰、豫章舰、同安舰、广玉舰、宝璧舰等用旗语下达命令，立即随永丰舰行动，向叛军发动总攻击。

不一会，冯肇宪回来报告：“其余各舰均已回答，向大总统表示致敬，服从大总统的指挥，跟随大总统一道行动，讨伐叛军！”

孙中山要来一部望远镜，健步登上永丰舰，发出了出发、进攻的命令。

在永丰舰的率领下，十来艘军舰浩浩荡荡地从黄埔出发，首先向车歪炮台猛烈开炮，然后又直驶白鹅潭，向占据沙河、瘦狗岭、沙头、观音山等地的陈军发动了猛烈的炮击，陆上的叛军也向舰艇开炮还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当孙中山下令向叛军阵地发动猛烈炮击的时候，他一直侧耳倾听着岸上魏邦平守军早点传来枪炮的声音，可是直到黄昏，仍然听不到岸上军队的枪炮声音。没有陆军的支持，光靠海上作战，力量非常单薄，不能给叛军以致命的打击，孙中山只好命令军舰经中流砥柱炮台返回黄埔。

这次炮轰叛军，虽然没有多大战果，可是大大地震慑了敌人，显示了政府军队的威力，也给全国人民一种精神鼓舞。在这次平叛战斗中，永丰舰被当作平叛战斗的指挥舰；在后来的整个平叛过程中，永丰舰也始终起着指挥

的作用。直到平叛战斗结束，孙中山一直是住在永丰舰上。为了纪念这次事件，后来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中山舰”的名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在炮轰叛军阵地的时候，温树德所率领的永翔、同安二舰一直是沉默不语，没开一炮。这使得孙中山大为惊讶，这才知道温树德是真的不可靠了。回到黄埔以后，孙中山命令江海防司令陈策：火速给韶关大本营发电：命胡汉民立即亲赴江西赣州，向许崇智详细说明广州陈炯明叛变经过，命令许崇智迅速率领所部北伐军回师广州，平定叛乱，廓清后方，再图北伐。

风雨永丰舰

叛军一万多人围攻总统府，死伤无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头来却还让孙中山和宋庆龄安然脱逃，这使得陈炯明大为光火，大骂部下们是一窝废物。可是骂归骂，他也没办法，只好瞪着眼睛看着孙中山在海上发电报声讨自己，向社会各界宣布自己的背叛行为。

孙中山炮轰大沙头、瘦狗岭等叛军阵地，叛军死伤惨重；北伐军又从江西、广西、云南等地纷纷回军广州，对广州已呈三面包围之势，这使陈炯明更加恐慌了，他决不能眼看着到手的宝座再被孙中山夺走，便竭尽自己所能来阻止北伐军的回归和尽量早一点消灭孙中山。

陈炯明决定多管齐下，一面严令钟景棠率部攻占长洲对面的牛山、鱼珠二炮台，利用陆上的炮兵力量对水面上的军舰形成威胁，只要水面上的军舰一动，大炮立即可对军舰进行攻击。同时，陈炯明又利用海军司令温树德的弱点，对他晓以利害，让他率领所属舰队投降自己。如果不成，退一万步说，只要温树德保持中立，对陈家军不进行攻击，那也就把孙中山的力量瓦解了一大半，孙中山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自己较量了。只要能在北伐军的主力赶回来之前把孙中山消灭掉，那时自己就是两广的王，也用不着害怕其他派系来攻击自己。

当钟景棠派人来报告已经拿下了牛山、鱼珠二炮台的时候，陈炯明便开始了他的第二步行动：收买温树德。

永翔舰上，陈炯明派去的特使正在和温树德秘密交谈。特使说：“陈总司令派我来向温司令致意：他一向是非常重视人才的，而且陈总司令很欣赏您的才干，所以特地让我带来密信一封，请您过目。”

特使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温树德，同时还打开了小手提箱，只见里面黄灿灿地摆满了金条，还有一张支票，票额是港元二十万。

温树德收下了这份厚礼，看完了信，这才问特使：“我愿意为陈总司令效劳，不知道陈总司令有什么吩咐？”

特使笑着说：“现在，吴礼和的军队已经控制了鱼珠、牛山炮台，有一个营的野炮封锁了海面，虎门炮台也早在我军的控制之下，陈总司令本人也从惠州来到了广州，亲自指挥这次剿灭孙大炮的军事行动，陈总司令要你做一件事：开炮击沉永丰舰，叫孙大炮葬身鱼腹，或是秘密派人上舰刺死孙大炮也行。干掉孙大炮之后，你再率领海军归顺陈总司令……”

温树德听了特使的话，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我要是开炮轰击永丰舰，只怕是永丰舰还没沉下去，我的永翔舰却要先沉下去了。现在，海军全体将士都是听孙大炮的，我一开炮，大家肯定会掉过炮口来攻击我，目的达不到，还要白白地送上性命，这样的事情万万做不得！派人行刺也不行，孙大炮在永丰舰上，那个舰上的士兵都对他赤胆忠心，谁也近不了他的身……”

特使沮丧地说：“那就看着他在海上耀武扬威吗？”

“不看着他耀武扬威还有什么办法？”温树德反唇相讥。

特使眼珠转了几转：“据我看来，温司令您如果不想办法及早脱身，跟着孙大炮在海上转来转去，只怕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你的海军有生力量不被消灭也会被饿死，跟着孙大炮同归于尽可没有多大意思啊。”

温树德不得不叹了口气：“你说的是有道理，我何尝不知道？我现在唯

一的办法就是只能带走我的永翔、海圻、海琛、肇和四艘军舰。不过，这四艘军舰是我的主力舰队，这四艘军舰一走，剩下的军舰便失去了一大半的战斗了。再说，我们一走，其他军舰上的官兵们也就人心不稳，那时孙大炮就会不战自败了。”

温树德一番话，说得特使心里非常舒坦，连声说好。反过来又问：“只不过是这件事宜早不宜迟，请问温司令什么时候能行动？给我一个准信，我也好向陈总司令报告。”

温树德考虑了一阵子说：“这事情还要等我和几个大舰的舰长们悄悄地商量好才能行动。不过，我温某人一言九鼎，少则三日，多则五日，我一定会行动的，到时候我会驶离黄埔港的。”

在陈炯明的司令部里，听完了特使的报告，陈炯明高兴得连连点头，说：“这下好了，任凭你孙中山有三头六臂、七十二般变化，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部署完分化海军的计划之后，陈炯明又耍起了另一手，给外交总长伍廷芳发了一份电报，邀请伍廷芳和自己一道，请孙中山下台。在电文中，陈炯明把自己打扮成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愿意和伍总长一道，请孙中山下台，不要把那个大总统的名声看得那么重要，只要孙中山放弃大总统的称号，自己立即就可以收拾残局。

伍廷芳看了这份电报，气得当场昏了过去，当天晚上猝然病逝。孙中山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悲痛，在对全舰士兵说话时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孙中山说：“伍总长年过八旬，尚且为国家大事鞠躬尽瘁，以致于累死，我们后死诸君，要多多效仿他，同心合力，早日剿平叛乱，完成我党的革命大业！”士兵们被孙中山的情绪所感染，一个个义愤填膺，表示坚决追随大总统，发誓剿平叛乱，报效国家。

这时候，南北两个秀才又合伙唱起了一出双簧戏：吴佩孚从北京打来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词情似乎十分恳切，邀请孙中山早日北上，离开广州这个战乱频仍的地方。看起来是关心，实际上是如果孙中山离开广州黄埔，平叛战斗也就销声匿迹了。对于这种“好心”，孙中山一笑置之，立即回了一封简明扼要的电报：“临难苟免，人之大耻，国之大辱。”

当威迫吓唬手段都不奏效的时候，陈炯明又耍起了另一手，让秘书陈君韬代替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孙中山，在信里面假惺惺地表示自己的委屈，软硬兼施，想使孙中山屈服，主动退出大总统的位子，让自己在广东称王称霸，信中说：

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及。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6月16日奉列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余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率。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于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使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

专此，即请钧安。

陈炯明这封信，由钟惺到永丰舰上去送给孙中山。孙中山看罢了陈炯明的信，冷峻地笑了笑：“陈炯明他倒是很聪明，说什么和我十余年患难相朋，不敢负我，他叫自己的军队对我总统府开枪开炮，用数万人围攻妙香山，捣毁粤秀楼，说什么自己兵柄解除，对军队无能为力，可在粤军攻下粤秀楼的

第三天，他就急匆匆地从惠州赶到了广州，在粤军总指挥部里发号施令起来，这能说是兵权解除了吗？他还在探花酒楼里举行了庆功宴会，这能说是进攻总统府与他无关吗？说什么北征部队将互相残杀，他是害怕北伐军回来和他算账，这才装作悲天悯人的样子，他要是真的考虑到革命的利益，他现在就应该亲自到永丰舰上来见我，今后洗心革面，一心一意地打军阀，我一定既往不究，决不与他为难！陈炯明要我给他指出一条道路，实际上是在向我示威，要我早点下台，好让他当这个广东王！回去告诉他，我孙中山这么多年来对他陈炯明处处倚重，把军队中最高权力交给了他，他现在羽翼丰满了，就来和我争夺天下。我孙中山并不想和谁去争天下，我只想打倒旧军阀，解除老百姓的痛苦，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陈炯明想逼我下野，让他来为所欲为，办不到！”

孙中山把陈炯明的信愤怒地扔在桌子上，指着钟惺的鼻子一顿训斥，钟惺只好灰溜溜地回去覆命。

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软的里面夹着硬的还是不行，这是陈炯明在派钟惺去之前就预料到了的，他并没有放弃毁掉孙中山的打算，而是采取了更加毒辣的手段：

江防卫戍司令魏邦平有一个师的精锐部队，在广州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当陈炯明的部下炮轰总统府的时候，魏邦平袖手旁观，不发一枪一炮，是一个十足的骑墙派。孙中山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想把他拉过来，共同参加平叛战斗，可是魏邦平的态度始终是暧昧不明，这就给了陈炯明以可乘之机，他派人把魏邦平请到了自己的粤军总指挥部中，在一阵肉麻的吹捧之后，他又打又拉，想让魏邦平为自己所用。可是魏邦平也有他自己的小九九，他想：当今天下群雄割据，你争我夺，谁有实力，谁就可以拥有天下，在陈炯明和孙中山的争斗之中，只要他魏邦平不是明显地靠向哪一边，将来不管是谁打赢了这场战争，都会把自己作为依靠的力量，因此，自己在这场戏中要演的角色就是和事佬。

抱定了这么一个念头，魏邦平是不会明显地倒向谁的，便说：“陈总司令，连日来，广州已经是兵连祸结，人民不堪其苦，现在孙中山已经到了海上，广州又在您的掌握之中，双方到这个时候，是罢战言和的时候了，如果陈总司令有意，我愿作为信使到海上去一趟，劝孙中山先生和陈总司令握手言和。”

魏邦平的念头正是陈炯明所期望的，他立即表现出高姿态说：“魏司令说得很对，你去军舰上劝劝他，老是呆在军舰上也不是事情，水上湿气太大，呆长了有伤身体，如果孙中山先生愿意回到广州来，我是欢迎他的。当前的局势是，只要孙中山和我都不来当这个头，战事马上就会平息，我愿意跟随孙中山先生一道归返田园，过一种躬耕自娱的生活，此话请你务必带到。”

魏邦平来到永丰舰上，硬着头皮见了孙中山，也不敢正视孙中山的眼睛，嗫嗫嚅嚅地说自己是来为陈炯明和孙大总统两家劝和的，并且还假意就自己没能在大总统困难的时候尽保护的责任而感到羞愧，想请大总统看在广州市民受苦受难的情分上，早早息战，自己愿意在中间奔走等等。

孙中山一直是侧着身子听魏邦平说话的，这时把身体掉转过来，两眼直视着魏邦平，射出犀利的光来，望得魏邦平心里直发毛。半晌，孙中山开口说：“魏邦平，你使我感到痛心！当叛军围攻总统府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的军队又干什么去了？当我军舰重炮猛击叛军长堤想协助你夺下江防阵地好

对叛军在水陆同时发动进攻的时候，你又在哪里？陈炯明威胁外交总长伍廷芳，他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还有勇气和叛军作斗争，竟至于气死在床上，你一个手握重兵的卫戍司令，却在革命遭到危险的关头袖手静坐，不发一枪一炮，现在又不明是非，要来当个什么中间人，劝我去和叛军讲和。你的这种行为，是懦夫的行为！你好好地想一想，你对得起革命吗？你对得起四万万国民吗！”

孙中山一顿训斥，魏邦平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永丰舰上的士兵都很气愤，一个个瞪着大眼看着魏邦平。

孙中山看到魏邦平似乎有点悔过的意思，心想还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为好，便改变了声调，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在我和陈炯明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调和的余地了，陈炯明不是要和谈吗？你告诉他，除了向我投降以外，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回去也好好地想一想，不要怕陈炯明那几个骄兵悍将，北伐的大军已经在回程的路上了，不日将会到达广州，陈炯明现在也是非常害怕的，你要认清形势，早点醒悟过来，不要再以中间人自居了，你回去想好了再来！”

魏邦平被孙中山一顿训斥，军舰上的士兵们又个个横眉竖目地看着他，他只得连声说是，转身退回去了。

7月8日晚上，温树德率领的永翔、海圻、海琛、肇和四舰突然间一齐熄灭了灯火，永丰舰长冯肇宪对孙中山说：“报告大总统，温树德早就有叛逃的动向了，现在他们突然熄灯，可能要跑！”

立在孙中山身旁的蒋介石说道：“永翔等四舰是我海军的主力舰，如果他们一走，我们海军的实力就大大地削弱了，假如他们在开走时对我们开炮轰击，那我们就更加危险了，依我之见，不如先对永翔舰开炮！”

大家都赞成蒋介石的意见，可是孙中山摇摇头说：“不能再自己相互残杀了，我们已经吃够了自相残杀的苦头，再说，永翔舰也未必就会向我们开炮，你们想一想，鹬蚌相争，得利的是谁？”

听了孙中山的话，大家都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互相望望。

过了好大一会，忽然听到永翔等军舰又升火起锚了，舰长冯肇宪大声地下达命令：“弹药手装填弹药，准备战斗！”

前后甲板传来士兵的回答：“弹药装填完毕！”

对士兵们的快速反应，冯肇宪非常满意，孙中山也轻轻地点了点头。

又过了一会，永翔舰领头，四艘军舰一起锚，鱼贯地离开了黄埔港。许久许久，海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孙中山仍然久久地立在船头，久久地沉思着……

永翔等军舰一走，孙中山能够亲自指挥的军事实力猛地显得薄弱起来，海军将士们的心情都变得非常沉重。7月9日，驻长洲炮台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叛变，将长洲炮台拱手送给敌人，岸上失去了屏障。剩下的军舰上的士兵们开始有点担心了。孙中山见形势发展不妙，便通知各舰舰长来永丰舰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平叛作战计划。

不一会儿，接到永丰舰打出的旗语后，楚豫、豫章、福安、舞凤以及江海防舰队的各舰长们都来到了永丰舰，孙中山请大家坐下，开始分析军事形势和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这时，秘书林直勉急匆匆地走进来，面带喜色地递上一份电报，孙中山读完电报，拿着电报对大家说：“好消息！北伐军许崇智部已经挥兵南下，

将被叛军占领的韶关大本营重新夺了回来，北伐军正以不可抵挡之势迅速南下，不日将可会师黄埔，平定广州叛乱！”

这份电报如一个霹雳在大家的心头炸响，各个舰长们都激动起来，刚刚因温树德逃走而带来的一点不快一扫而光，磨拳擦掌地要大干一番。

在考虑到怎么干的时候，大家不免又有点担忧起来，温树德率军舰走了以后，以永丰舰为首的舰队就不宜停在原来的地方了，万一温树德被陈炯明利用，率领军舰来和我们作战，而牛山、鱼珠二炮台再要参战的话，那我们的形势就有点危险了。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寻找一个理想的停泊点，更好地坚持战斗。

孙中山拉开地图，胸有成竹地说：“诸位舰长所言很有道理，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海面上的军舰是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的，必须有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可供停泊，才能有效地打击叛军。我们可以利用列强在华目前的势力，到外国人军舰停泊的地方去停泊下来，叛军不敢对我实施军事进攻。照这种计划，我看白鹅潭是最理想的地点。请大家拟好作战计划后，明天凌晨4时开始行动！”

第二天凌晨4点，按孙中山的命令，鱼雷艇豫章号率先起锚，一马当先，永丰舰紧随其后，舰队出三河口，往新造河面驶去。当舰队出发的时候，永丰舰舰长冯肇宪在心里嘀咕：“出三河口，这是一条老河道，水面狭窄，水深也不够，万一舰队搁浅怎么办？”心里是这么想，可嘴上没敢说，只是紧紧地跟在孙中山旁边，以防万一军舰遇险时，自己好保护好大总统。

舰队出三河口，果然是最好的选择，从这里走，避过了叛军鱼珠炮台炮火的袭击，只有车歪炮台叛军的炮火在不停地向舰队射击，可是这并不能构成多大威胁。舰队一面向前。一面向岸上的叛军炮台发炮轰击，孙中山巍然屹立在舰首，沉着地指挥舰队前进，好几次，炮弹从孙中山的头顶呼啸而过，冯肇宪要求孙中山下到船舱里去躲一下，孙中山丝毫不动，坚定地说，“我今天与军舰共存亡！你们记住，如果我死了，那也是死在平叛战斗之中！”最后，舰队顺利地通过了炮火的封锁，安全地进入了白鹅潭。

事后，永丰舰的舰长冯肇宪问孙中山：“大总统，我一直在担心，怕军舰无法通过新造河面，因为这里的水深不够，我们的舰队每次从这一带经过时，都是绕道而行的，现在又不是涨潮的时候，怎么还能通过呢？”

孙中山笑笑说：“自古用兵，讲究兵法，兵法中不光讲行军布阵、对敌打仗，还要懂得天文地理，尤其是地理，不光要知道地形，还要知道地形的变化。这新造河一带，近几年来，经过潮水的反复冲刷和上游水流的冲击，水面虽然没有多少扩大，可是水底的泥沙已经被冲走了不少，河水的深度大大地增加了。我对这一带河面的地理作过了研究，知道它的变化情况，所以才敢于下这样的命令。同时，我还考虑到，叛军也一定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把防守的重点放在水面宽阔的地带，对这一带防备较少，我们反而可以从从容容地通过。”

孙中山的一席话，令大家惊叹不已，对大总统的渊博的学问表示钦佩。

海上周旋

永丰舰刚刚在白鹅潭停泊下来，只见远处有一艘白色的小艇在向这边摇过来，两个洋人要求登舰。舰长冯肇宪请示孙中山怎么办，孙中山说：“让他们上来！”

两个洋人上船之后，态度非常傲慢，其中的一个胖子自我介绍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粤海关税务司的夏利士，请问孙先生，您到白鹅潭来，大概是来避难的吧？这白鹅潭一带是我们大英帝国的租界，您到这里来了以后，可能会给这里带来战争，这样将会影响这里的生活的安宁，我们请孙先生考虑这一后果，最好是不要在这一带居留……”

还没等洋人的话说完，孙中山已经怒不可遏，“砰”的一声，一拳砸在桌子上，怒斥道：“我是中国的大总统，这白鹅潭是中国的领土，我在中国的领土上，想在哪儿停留就在哪儿停留，我有完全绝对的自由权。你们外国人在我国的土地上，只是一个客人，客人怎么反过来干涉主人的自由权？真是岂有此理！我现在是在率领海军讨伐叛军，我避什么难！”

洋人见孙中山发火了，旁边的卫士也一脸怒气地盯着自己，心里害怕，一下子软了下来，说：“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孙先生不能在这里停留，而是因为这里是通商口岸，濒临租界，万一发生战争，将会危及外国人的安全，这样会引起麻烦。不过，孙先生如果要走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方便。”

孙中山见洋人软了下来，也放缓了口气说：“我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留，这完全由我自己作主，不劳你们操心。不过，我告诉你们，本大总统驻在永丰舰上，是在指挥我国的平叛战斗，我还要就近不断补充给养，到时候希望你们提供方便。”两个洋人连连点头，知趣地告辞而去。

永丰舰停泊白鹅潭以后，发现随温树德而去的永翔、同安两艘军舰也停泊在这里，孙中山立即派永丰舰上的人去收编他们。永翔舰不听收编，又偷偷地离开了。同安舰被顺利地收编。同在白鹅潭的还有好几艘外国军舰，中国的军舰与外国的军舰在一起，排成了一条长长的船阵，陈炯明听说孙中山已经开进了白鹅潭，气急败坏，想打又不敢打，怕伤了外国军舰，洋人一旦发火，那可不是好惹的；不打又实在是不甘心，急得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陈炯明的焦急心情被他的一些谋臣策士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纷纷献计献策，怎么去打永丰舰。张碌村献计说可以用鱼雷去打，张说他认识香港的一个工程师，这人名叫徐直，是个鱼雷专家，会造雷也会布雷，在白鹅潭里布上几个鱼雷，不怕炸不死孙中山。陈炯明觉得这个计划可行，便委托张去筹划，张和周天禄、徐直共买了五个鱼雷，选了几个办事干练的士兵去白鹅潭布雷。

这天早晨，白鹅潭水面上波平浪静，几艘中国军舰和外国军舰都在顺着退潮的海水掉转船头。永丰舰刚刚掉好了头，忽然听到一声巨响，舰上的人都几乎被抛了起来。舰长冯肇宪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枚鱼雷爆炸了，飞快地跑上甲板，去观察鱼雷爆炸的现场，同时指挥部下赶快在军舰停泊的水面戒严巡逻。蒋介石听到这轰然一声巨响时，立即跑到孙中山的船舱中去看大总统受伤了没有，等他匆匆忙忙跑进船舱时，却看到孙中山正在安安静静地一边进餐，一边读报纸。见蒋介石这么慌慌张张地跑到下面来，孙中山问：“什么事这么紧张？”“报告大总统，有人在水面上对永丰舰放鱼雷，很危险！”孙中山说：“战争时期，放几个鱼雷有什么可怕？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就行

了嘛！”蒋介石一面答应着出去了，一面心里难免有点惭愧，想：“大总统真是个大伟人，这么大的风险，他却若无其事地样子，我倒反而显得沉不住气了。”

很快地，冯肇宪舰长派出去扫雷的水兵，顺利地排除了其他的鱼雷，还带回来一条小船和两个可疑的人。经审问，正是他们布的雷，并说是叶举派他们来的。问他们带了多少鱼雷，回答说一共带了五个鱼雷，目的是要炸毁永丰舰，炸死孙大总统。他们还供认说，陈炯明给他们说，不管是谁，只要打死了孙中山，就赏大洋二十万元。陈炯明还准备着，如果这次鱼雷炸不死孙中山，就用小轮船来撞击永丰舰，已经买了十几艘小轮船，具体哪一天行动不知道。

陈炯明这次施放鱼雷没能炸死孙中山，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好像孙中山有神在保佑一般，怎么就那么巧，刚刚在鱼雷发射时船艇掉转方向，要不然，孙中山早就报销掉了。想来想去，把牙一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准备好了的十几只小船再派出去，破釜沉舟，干掉孙大炮，彻底消除这块心病！”想到这里，正要叫秘书陈鹤年来传达命令，忽然有侍从副官来报告说：“英国租界的领事求见。”陈炯明不知道他们的来意是什么，赶忙命人请进。

进来的还是那个曾经被孙中山在船上训斥了一顿的领事夏利士，他来到陈炯明的司令部里可就更加神气活现了，他傲慢地对陈炯明说：“今天早上，你们中国的鱼雷艇在白鹅潭放置鱼雷，这时我们外国人的船只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使我们感到不安全，我们抗议这种行为，请贵军今后不可再轻率地行动！”夏利士说完话，也没有容得陈炯明解释，便打道回府，气得陈炯明噎在当场，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可是气归气，打却是真的不敢打了，万一用小船攻击孙中山时，误伤了外国军舰，外国人认真追究起来，可不是好玩的，那时候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陈炯明是不敢攻击永丰舰了，可是在白鹅潭的军舰的处境也是越来越困难了，困守在白鹅潭里，时刻在叛军的包围之中，供给也成了大问题，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北伐军早日打回广州，消灭叛军，将孙中山救出困境。然而，关于北伐军的消息却是时好时坏，一会儿报告说，北伐军进展顺利；一会儿又说北伐军南下受阻，弄得军舰上的士兵开始焦虑不安了，孙中山也成天在翘首盼望，个把月的时间过去了，还是没有北伐军的确实消息。

原来，北伐军南下的速度在韶关一带受到了阻碍，陈炯明在图谋杀害孙中山时就考虑到了北伐南下的威胁，早在6月18日就命令自己的得力干将翁式亮率领本部军队进驻韶关，其主要任务是阻住南下的北伐军的前头部队。同时，担任北伐任务的粤军第一师是陈炯明的“秘密武器”，师长梁鸿楷是陈炯明的心腹干将，与陈炯明约有特定的密码。陈炯明又给梁鸿楷发去了一份绝密的电报，要他从北伐前线秘密回师，从背后袭击北伐军。梁鸿楷接到命令后，立即将自己所属部队分兵三路，连夜向韶关方向后撤，到了和平、连平一带后，梁鸿楷的团长陈修爵自告奋勇担任先锋，不休息地连夜兼程开赴马坝与正在这里集结的翁式亮部会合，在此给南下的北伐军以迎头打击。

叶举知道这一情况后，又调来自己所属的大部分汽车，将陈修爵的部队用汽车运往马坝。在这之前，南下的北伐军势不可当，一路打得叛军望风而逃，粤军翁式亮部在韶关与北伐军先头部队相遇，双方一接触，叛军即被打得溃不成军，往马坝方向逃窜。北伐军乘胜追击，正好遇到陈修爵的部队赶来加入战斗，这是一支生力军，他们装备精良，立即遏止了北伐军的进攻势

头。

南下讨贼的北伐军已经连续作战多天，全凭一股勇气在作战，一旦被阻止住了的时候，便很难再前进了。恰巧又听说阻止自己前进的又是自己人，北伐军内部出现了倒戈现象，使得北伐军的军心大大动摇起来。翁式亮的粤军反过来进攻北伐军，迅速将北伐军的大本营韶关拿了下来，北伐军的大本营被迫迁移。南下讨贼的主力许崇智部退入福建省境内，李烈钧、李明扬、朱培德部退入贵州省境内，赖世璜部退回江西省赣州境内。经过一个多月的较量，北伐军南下讨贼平叛的计划没能取得预期的战果，平叛行动受阻。

8月3日，南下讨贼的北伐军在南雄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平叛军事计划，考虑到北伐军长期作战，兵力疲惫，补给困难，人心浮动，决定暂时收缩一下军事讨伐的规模，并改变作战方式，北伐军中的粤军从江西转入福建境内后，休整一段时间再图进攻；进入湖南的北伐军、江西省的北伐军休整后向广西进军讨贼。这时，得势不饶人的叶举大军又进攻南雄，南雄失守，北伐军继续向湖南、江西一带撤退。讨陈平叛的战斗由进攻态势转入防守态势。

8月8日，程潜从大本营辗转来到白鹅潭，向孙中山报告了北伐军回师失败的消息，力劝孙中山早日离开这危险的境地。孙中山还在犹豫，他怕程潜的情报不准，如果自己贸然离开了军事指挥的前线而错误地导致了平叛战斗失败的话，那将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与此同时，陈炯明还派了飞机在白鹅潭的上空盘旋，虽然没有轰炸，可是在士兵们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内部的谣言开始多了起来。温树德又在暗中通过老乡关系对士兵们进行收买，有的军舰上的官兵开始扬言要到温树德那儿去。对这些现象，孙中山深为忧虑，在船舱中来回踱步，静静地考虑对策。

第二天，蒋介石来报告：“有一位从南洋归来的老华侨，只身一人来到永丰舰，要求大总统接见。说是从粤北来，亲眼看到北伐军的情况，来此报告北伐军的消息。”孙中山忙令请进。这位老华侨一进船舱，就痛苦地拉着孙中山的手，喊了一声大总统就泣不成声了。孙中山一眼认出这就是当初在新街车站上劝自己不要到广州去的那位老人，就激动地抓住他的手，请他坐下来慢慢说。老人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只身跑到粤北看到的北伐军南下情况一一说给孙中山听，孙中山这才知道北伐军南下讨贼的战斗真的失败了，自己强抑着内心的痛苦，安慰老人。

送走老人以后，孙中山请各舰舰长到永丰舰来开会，商量下一步如何继续讨伐陈炯明的计划。会上，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一致认为，北伐军南下讨陈受挫，海军力量薄弱，平叛战斗已非短期内可以完成，大总统应该另图良策，长期住在军舰上也不是长久之计，不如暂时离开广东省，重新联系好各方力量后，等退回江西、云南、湖南等地的北伐军休整过来以后再重整旗鼓，讨伐叛军。孙中山认为舰长们的意见是对的，便决定从香港取道上海，重新组织平叛行动。

孙中山驻在白鹅潭，一直是各国租界的一块心病，听说孙中山要离开这里，他们很高兴，英国领事立即派出一艘炮舰来护送孙中山离开。当天下午，孙中山偕同陈策、蒋介石、冯肇宪等人乘英国的摩汉号炮舰离开白鹅潭，取道香港转赴上海。

租界风云

作出离开永丰舰、从香港取道上海的决定，这是令孙中山极为痛苦的事。临行前，孙中山对来永丰舰开会的各位舰长和指挥官们说：“我此次离开黄埔，转赴上海，并不是向叛贼陈炯明低头屈服，而是要在上海重新组织革命力量，继续指挥讨贼战斗，一旦时机成熟，我还要再次回到广东来，重新开始我们的北伐事业！在我离开永丰舰的这些日子里，秘书林直勉和参军李章达留下，继续负责广东的讨贼事务，要把我们现有的革命力量保存好，我不久就会回来的！只要找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已经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永丰舰上的将士们为孙中山激烈的情绪所感染，一齐表示坚决听从大总统的命令，坚持同逆贼陈炯明战斗到底。

8月10日，在乘船赴上海的途中，孙中山一个人久久地伫立在俄国皇后号的甲板上，看着被船头劈开的海浪，心潮也如大海奔腾的波涛一般在起伏不已：为了使中国早日统一起来，我率领革命的同志们前赴后继，顽强奋战，牺牲了多少亲密的战友和同志，失去了多少优秀的人才，这次北伐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可是却被来自革命阵营里自己的同志破坏了，功败垂成，真是令人心痛欲死。这时候，孙中山才真正地认识到：用了陈炯明这样的野心家来领导军队，要想实现崭新的理想，无疑是在做梦。认清了这一点后，孙中山的心里豁然敞亮，对下一步如何完成自己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开始有了截然不同的认识，可是对于具体如何去实施它，心里一时还没有清晰的思路，这使他心里又充满了彷徨和苦闷。孙中山的这种彷徨和苦闷一直到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才算彻底消除。不过这是在孙中山到了上海之后的事情了。

从香港到上海，途中要行驶三四天的时间，这几天里，孙中山一面反复思考、检讨着自己在领导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一面思考着下一步的对策。他觉得：要想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大批意志坚定的革命同志，这些革命的同志还要有着献身“主义”的革命精神，还要对那些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欺世盗名的勾当的假革命者们有着清晰的认识，以保证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站稳立场，这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因此，孙中山把随同自己同行的人员一起召集起来，问他们对这次革命失败的看法，孙中山对随行人员说：“请大家自由地发表意见，不要有任何顾虑，从你们的思想中，或者有能启发我新思想的地方。”

有一个文书带有点迷惑不解地说：“大总统，我们的‘革命’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义’，可是陈炯明也说他是在‘革命’，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呢？”

孙中山点点头，很高兴地说：“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好，陈炯明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就在于他提出的口号有着迷惑人的地方，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呢？不是那些自诩自己是革命的人就是革命的，陈炯明是个叛贼，他提出的所谓‘联省自治’，和反动军阀的腔调没有什么两样。反动军阀们在想独霸天下时，就发动战争，以统一天下为借口，对别人发动进攻；而当他们自己没有力量能统一全国的时候，就又喊出了‘联省自治’的口号，又反对战争，这就是叫别人不要再去打他了，好让他坐稳这一块地盘。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共产党人早就看出来了。再说，什么叫革命呢？革命与叛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革命有革命的道德，有革命的主义，有革命的

精神，是一个非常高尚而又尊贵的名词，只有我们这以统一天下为大业的、以拯救中华民国为目标的事业才能称得上是革命。从西方国家来看，法国有大革命，美国也有革命，法国的革命以争自由为口号、为目标，美国的革命以独立为口号、为目标，他们的革命都是成功的，他们的革命目标也都达到了；在我国，我们的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为目标的，我们的革命尚未成功，今后，我们要在如何实现‘主义’上多下工夫。”

又有一个文书问道：“军阀们的‘联省自治’，看起来是不要战争了，这还是受到人民的欢迎的，请大总统告诉我们，‘联省自治’的危害到底在什么地方？”

孙中山稍微沉思一刹那，又重点点头说：“是的，‘联省自治’的口号是有很大的欺骗性的，从表面看起来，大家都自治了，和平了，没有战争了，一派升平的景象，不是很好么？可是你从其实质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如果承认了联省自治，就等于承认了军阀统治存在的合理性，就是把我国可爱的中国划分成了无数个小块领土，让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去统治着。军阀们的口味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一旦他们自认为坐稳了自己的地盘，就要去争夺他人的地盘，那就使整个国家常年陷于内乱和战争之中。陈炯明和军阀们喊同一个口号，足可看出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军阀了。可是这样的叛贼竟然要我和徐世昌同时下台，故意把我这个堂堂的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和反动政府的头头混同在一起，这完全是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是不会答应的！”

听着孙中山慷慨激昂的言论，大家都觉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一个个精神振奋起来。

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开来，反动军阀们个个欢欣鼓舞，认为他们这次是真的彻底打败了“孙大炮”了；陈炯明更是气焰嚣张，在自己的司令部里大肆请客，庆祝自己的胜利，还对各处发号施令，俨然以广东的“王”自居。在这种时候，那些本来就是抱着靠革命来混个官位当的投机者和革命意志不坚定的“革命者”们立即倒向了反动势力，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在广东的周边省份，北伐军受了暂时的挫折后正在休整，陈炯明的叛军们趾高气扬，洋洋得意，好像从此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可是，在另一面，广大的革命的工农阶级却对孙中山继续寄以厚望，他们对孙中山来到上海表示热烈的欢迎，希望孙中山能在上海继续领导中国的革命。当孙中山要在8月13日到达上海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上海的各界人民立即沸腾起来了。当天，在孙中山预计要上岸的码头上，早早地就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大家翘首盼望着孙中山乘坐的俄国皇后号轮船。可是等啊等啊，预计要到的时间过去了几个小时，还是不见孙中山的船只到来。傍晚时，有人来说：“孙中山先生在海上遇到了风暴，轮船耽误了行期，要到明天才能到达。”人群这才快快离去。

第二天一大早，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了码头上，他们生怕来晚了看不到孙中山，都想早一点看到自己心目中的领袖和英雄。据当时的报纸统计，除了自发地来欢迎孙中山的人以外，有组织地来欢迎孙中山的团体就达四十多个。可是不巧的是，因为海面上风势还是很大，俄国皇后号不得不在吴淞口提前靠岸，孙中山从这里乘车回到了他在法国租界里的莫利爱路29号的公寓里。当天在上海码头上欢迎孙中山的人群尽管扑了一个空，仍翘首盼望，直到听说孙中山已从陆路到了家后才肯散去。后来，孙中山听说有这

么多的人在码头上欢迎自己，激动不已，便通过报纸对上海的大众表示诚挚的谢意。孙中山说：“找这次到上海，有劳诸位在江岸连续两天迎候，这使我深为不安，更为没能在江口与各位一一相见而深表遗憾”。

孙中山一到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上海向社会各界再次揭露叛贼陈炯明的逆行，他发表了一篇宣言，简要地叙述了陈炯明的叛变经过，并在宣言中大声疾呼：“在我党中，凡是忠于民国者，我将以他为忠实的朋友；凡是不忠于民国者，我将把他当作敌人，对于民国的敌人，我将竭尽我之所能，全力以赴地讨伐他！”

因为没能在江口见到孙中山，上海各界的代表们又在8月21日，这一天选出了四十多位代表，集体来到孙中山的住所求见孙中山，这使孙中山更进一步看清楚了人民大众中蕴藏的强大的革命力量，更加坚定了他把三民主义坚持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据记载，当时到孙中山寓所求见孙中山的有中国工人联合会的张公权，中华工会主席史观涛，中国妇女劳工促进会的程志英，上海职工工会浦东分会的徐锡麟，船务栈房工人工会委员会委员卢丕，湖南劳工会王光辉，中华劳工会主席陈国梁，广东同乡会凌翼之，商工互济会主席董理章，妇女联合会会长黄宗汉，河北建设会汪剑农，上海印刷工会张占刚，中华进步劳工会王吉人，中华民国各团体联合会翁吉云，旅日归国学生会俞之，旅法归国华工会杜虎臣等等。各界代表来到孙中山的公寓后，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尊敬之情，大家都不进公寓去，一齐站在庭院里。孙中山见大家如此盛情，也便来到了院子中，人群立即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将孙中山拱卫起来。孙中山就站在这圈子中间向大家讲了很长时间的话。孙中山对大家说：“诸位都是来自各民间团体的，大家来看我孙中山，使我感到无尚的荣耀，是各位对我民国政府的信任和期望。我希望今后大家能更多地关心国家的政事，更多地尽到自己作为一个国民的责任，主动地监督政府的行动，都来为救国做点工作。这次陈炯明叛变，使革命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北伐军正在准备南下讨伐广州的叛军，目前虽然受了一点挫折，暂时退了回去，但是并没有彻底失败，最后一定会打败叛军的。陈炯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居心险恶，他只可得逞于一时，是不会得意于永远的。等到我们的革命最后成功的时候，大家才会明白强权是不可以永远为所欲为的，真正的公理必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欢迎孙中山，上海各界准备举办更大规模的欢迎仪式，六十六个团体派代表来筹备这次欢迎会，并决定在9月9日这天借上海总商会或借法国租界的尚贤堂来正式举行一个“中华民国各团体欢迎孙大总统大会”，会议准备要请孙中山在大会上即席发表演说，还要出版大会的特别会刊，并且在上海各界发出通知，凡自愿参加各团体都可以报名。通知一出，立即得到了各进步团体的支持，几天之内，有一百五十多个团体来报名，要参加这次盛会。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不光是反动军阀们不高兴，连外国的反动势力也非常恐慌，他们生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取得成功后会损害他们在华的利益，总是勾结起来反对国民革命。当孙中山离开广州的时候，外国在华的各种势力对孙中山仍不放心，他们派出密探密切监视孙中山的行动，竭力阻止和破坏孙中山的革命行动。就在孙中山刚到上海的当天，在香港的英国陆海军联合情报局香港总部便致信上海情报局的特务，要他们密切注意孙中山的活动，信中说：“孙中山现在已经到了上海，务必将他在上海所进行的政

治活动每周给我们报告一次，如有重大事件请随时给我们发特别报告。”

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加斯丁收到这封信以后，立即让工部局警务处派人暗中监视孙中山，并把孙中山每一天的活动和每一件事情不分大小都要向他们报告。

美国人则对孙中山在上海如此大受欢迎感到吃惊，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克银汉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孙中山原定在8月13日到达上海，主动到江口来迎接他的人成千上万，因为风大船小，耽误了船期，第二天来江口欢迎的人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在欢迎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团体的代表，而且到孙中山的住所来看望孙中山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由此看来，孙中山虽然在广州失败了，可是他在上海乃至在全国取得了胜利，他已经奠定了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尤其令人发生兴趣的事情是，来到孙中山的住所里的人很多是当前北方政府的著名的军政官员。克银汉还据此提请他的政府多加注意。同时，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通讯说：“孙中山在上海已成为了政治人物的中心，连孙中山的住所也已经成为各种不同政见的领袖人物所朝拜的圣地，并且几乎成了政治领袖人物的共同的沙龙。”

对孙中山在民众中的巨大的吸引力，上海军阀和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当局势力甚为害怕和担心，他们总是要想方设法来破坏孙中山的活动，阻隔他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一面派出大量的特务去监视孙中山，一面又多方阻挠孙中山的行动。他们听说上海各界要在法国租界内举行盛大集会来欢迎孙中山，还要请孙中山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而且还要出版特别会刊，立即慌了神，拒绝在租界内的尚贤堂开会，也不准总商会开会，说会议是带有政治性的，违反了工部局的章程，禁止召开。

尽管各种反动势力的阻挠，孙中山仍然顽强地进行他的革命活动，他在自己的住处不断接见国民党的高级军政要人，部署继续讨伐陈炯明的战斗计划。9月18日，孙中山发表了《就陈炯明叛变事件致海外同志书》，对这次因陈炯明的叛变而导致革命的失败深表痛心，再次揭露陈炯明的叛乱经过。文中说：

此次陈炯明叛变，非惟文与诸同志所不及料，亦天下人所不及料，盖以陈炯明之性质而论，其坚忍耐劳，自有过人之处；然对于国事常存私心，且城府深严，不以诚待人……以炯明与文相处关系而论，相从革命以来十有余年……方期戮力中原、以酬夙志，乃出师甫捷，而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不但国事为所破坏，党义为所摧残，文与诸同志为所牺牲，即以其本身人格信用亦因以丧失无余……文于8月13日抵沪，15日发表宣言，进行方针大略已具，撮其要旨，不外数端：其一，文任用非人，变生肘腋，致北伐大计功败垂成，当引咎辞职。其二，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以祸粤者祸国。其三，护法事业，当以合法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为究竟。其四，关于民国统一与建设，当实行工兵计划，发展实业，尊重自治。至文个人，以创立民国者之资格，终其身为民国尽力，无间于在位在野……近据报告：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部现在赣东者有众万余人，朱培德、陈嘉佑等部现在湖南者亦有众万余人……军力未失，士气踔厉，疲劳恢复，不难再举。黄明堂在高、雷、钦、廉举兵讨贼，以为响应……而两粤同志军队蓄志杀贼、待时而动者，为数尤多，陈炯明叛党祸国，纵兵殃民，罪恶贯盈，难稽显戮。凡我同志，但当踔厉奋发，努力不懈，粤难平定为期必不远也。

确实，在孙中山的秘密部署和指挥下，北伐各路军队经过一番休整之后，

有步骤的南下讨贼行动正在积极的筹划中。

再度讨贼

在上海的日子里，孙中山一面深刻反思自己建立民国十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一面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着讨伐陈炯明的行动。

首先，孙中山命令驻扎在江西的北伐军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人率领自己的部队进入福建，与福建的皖系北伐军王永泉部会合，进攻福州。孙中山在给黄大伟的信中说：“记得你在梧州时说过，陈炯明他敢打我孙中山一枪，你黄大伟要打他陈炯明十枪、一百枪，现在，陈炯明已经不是打了我一枪，也不是十枪，而是成千上万枪，看你黄大伟怎么给我向陈炯明讨回这个公道来！”

接到孙中山的命令后，许崇智立即通电声讨投靠了北洋军阀的福建总督李厚基，挥兵进入福建境内；王永泉也在福建境内宣布独立，与许崇智相互应和。李厚基大为惊慌，火速向陈炯明求援，陈炯明也立刻派出他的心腹将领洪兆麟为援闽总司令，带领三千人马奔向福建。

可是，这时候的北伐军已经不是上次从北伐前线匆匆撤回、疲劳不堪的队伍了，这是一支带着消灭叛军的坚强信念的勇猛无比的军队。李厚基和洪兆麟率领的军队刚刚跟北伐军一接触，立即溃不成军。入闽的北伐军长驱直入，到1922年的10月6日，就迅速地攻占了古田；12日，又攻占了福州。

捷报传来，孙中山为之欢欣鼓舞，立即发去电报，对英勇的北伐军将士表示热情的鼓励和赞赏。这时候，福州各界又纷纷来函来电，邀请孙中山早日赴闽主持福建的政局。孙中山这时正在考虑下一步如何改组国民党的问题，命令廖仲恺代表自己赴闽慰劳北伐军，同时又让廖仲恺带去自己的命令，将北伐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的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任命蒋介石为许崇智的参谋长，任命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任命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让他们分别带着自己的部队从福建南部取道进攻潮汕，直捣陈炯明的老巢。又成立了香港办事处，任命邹鲁为驻香港特派员，联络在广西的滇、桂各军，组织滇、桂、粤军四路联合起来讨贼。孙中山还给了邹鲁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策反驻扎在广州的粤军，孙中山对邹鲁说：“陈炯明以为他现在占领了广州就取得了一切，他自认为最靠得住的粤军都是向着他的，我看不见得，粤军是一支革命性很强的队伍，粤军中的大部分将士是我党的好同志，他陈炯明欺骗得了一时，欺骗不了永远，给你邹鲁这一特殊的任务，你要认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并努力去实施它。”

福州克复以后，一时间成了革命的军事政治中心，各方面都对讨贼军寄予厚望，国民党的党政军的要人不断前往视察和指挥。为了支援讨贼军的行动，海外的华侨还捐资购置了几架飞机，送给讨贼军，作为在福州建立空军基地的基础。

东路讨贼军一路势如破竹，洪兆麟在福建境内惨遭失败的军情很快便传到了广州，陈炯明一颗本来就悬着的心这时更是提到了嗓子眼上。不久，又传来了滇军和桂军占领了梧州，熊略抵挡不住，已经退到肇庆的消息。陈炯明这回真好比是热锅上的蚂蚁，他火速给叶举发出命令，要他速来总司令部接受命令，开赴福州前线去支援洪兆麟和李厚基，挡住北伐军东进的迅猛势头。陈炯明还给叶举打气说：“你赶快领着全部精锐部队去福建，我立即通知云南的唐继尧和赵恒惕，让他们从云南攻打北伐军的屁股，前后接应，粉碎北伐军的进攻。”

叶举接受了陈炯明的命令，带领着他所属的三个师出发了。叶举走了以后，陈炯明想来想去还觉得放心不下，便又叫来秘书陈鹤年，让陈鹤年秘密地到北京去一趟，向吴佩孚报告广东的局势，请求吴佩孚在北方同时对北伐军发动进攻，以牵制北伐军的军事行动。

在云南，北伐军同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讨贼行动，受孙中山任命的中央直辖军总司令杨希闵、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沈鸿英、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刘震寰和驻扎在梧州、肇庆的粤军，接到孙中山策应福州讨贼军的行动命令后，各自派出军事代表在广西藤县的白马庙会商，通过了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计划，这就是民国革命史上有名的“白马会盟”。这是一次重要的事件，这次会盟，划定了各军的进军路线，分配了各军的战斗任务，各路军分头行动，很快便打退了陈炯明叛军的抵抗，取得了讨伐陈炯明战斗的关键性的胜利。

送走了叶举，布置好了向北京方面的求援计划，陈炯明决定自己第二天亲自到前线去看看，给士兵们打打气，只要打败了孙中山的这一次进攻，孙中山就不可能再有能力来组织力量和自己较量了。还没等陈炯明动身，忽然接到了叶举从前线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叶举自己率领的前往西江前线增援的三个师主力部队中，第一师发生了内讧，军士已经倒戈进攻自己的军队，第三师在遇到北伐军时不战自溃，北伐军的滇、桂联军来势汹汹，我军士气不振，眼看就要一败涂地了，请总司令速来前线指挥，以安定人心，等等。

看了这份电报，陈炯明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好一会儿，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等他回过神来后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完了，我彻底地完了！”话是这样说，事实也确实这么个事实，可是陈炯明不愿意承认它，他还要作最后的一次挣扎。他决定自己亲自到三水前线去，亲自去督战，他就是不相信或者说他不愿意相信。自己这么快就被孙中山打败了，自己惨淡经营了多少年的精锐部队，怎么会这么快就在刚刚还是自己的手下败将面前输得一蹋糊涂？陈炯明在想：只要自己到了前线，给弟兄们一打气，士气马上就会再度旺盛起来。带着这么点幻想，陈炯明匆匆地收拾了一下就踏上了奔赴前线之路。

就在陈炯明匆匆地踏上督战之路时，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的后院又恰恰在这时候起了火！受孙中山任命为驻香港特派员的邹鲁早就在粤军中暗暗地做策反工作，粤军中的谭启秀师长，原来本是为陈炯明的口号所迷惑了的，通过陈炯明占领广州之后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看透了陈炯明的野心，对陈炯明极为不满，很容易地被邹鲁争取了过来，他和邹鲁约好，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在广州举事，邹鲁在香港等地为外援，共同讨伐陈炯明。陈炯明一离开广州，邹鲁就得到了这一情报，立即和谭启秀联系，约定了举事的时间和地点。当陈炯明头一天离开广州，谭启秀就率部起事，连同驻观音山的粤军炮队也参与了起事，很快便控制了整个广州城。

对自己后院发生的变化，陈炯明还是一无所知，他只是在一个劲地想怎么去挡往北伐军的进攻，好保住自己现有的这一块广州的地盘，至少还可以当一个广东的“王”。可是当陈炯明行到三水时，却碰到了令他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只见刚刚派出去不久的叶举的三个师的精锐部队正在溃不成军地从前线败退下来，陈炯明连声查问叶总指挥在哪里，士兵们替他找到了叶举，这时候的叶举已没有了往日那不可一世的骄横气了，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使陈炯明大失所望。叶举对陈炯明说：“总司令，北伐军的势力不可阻挡，我

们的弟兄都顶不住，退了下来，请总司令赶快回去，镇住广州要紧！”

陈炯明看着叶举的狼狈相，再看看粤军混乱溃败的样子了，只好作退一步的打算，下令退回广州，先守住广州再说。

可是，还没等到陈炯明退到广州，一封加急电报又送到了陈炯明的手中，这是秘书陈鹤年打来的，告诉陈炯明，谭启秀已被邹鲁策反，连驻扎在观音山上的炮队都已经哗变了，广州已经被北伐军所控制……

读完了这份电报，陈炯明像个斗败了的公鸡，耷拉着脑袋，半天都没缓过神来，他这时候才真正感觉到了一种输光了的绝望和悲哀，仰起头来望着苍天，真想放声痛哭一场。叶举在边上看到陈炯明如此伤心，便从旁劝慰道：“总司令，请您不要太难过，我们虽然现在将得到的广州又丢失了，但是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老根据地，我们可以暂时先回到东江去，在东江重新站稳脚跟以后，再回来和孙中山较一个短长！”

听了叶举的话，陈炯明想想也无可奈何，现在也只有回东江这一条路了。不得已，陈炯明哀叹数声，带领残余部队逃往惠州。第二天，陈炯明还假模假样地发了一道通电，声明自己离开总司令的岗位，再次回到惠州。

1923年的1月16日，各路讨贼军陆续进入广州，一度被陈炯明占领的广州再次回到了革命政府的控制之中。孙中山在上海得知讨贼军取得了全局性胜利之后，立即发布了一道命令，他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管理广州以及广东省的军事政治事务。同时，孙中山还决定，在自己没到广州之前，由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五人为全权委员，在广州管理政府事务，代行总统职权。到此为止，讨伐陈炯明的战斗，算是告一段落。

联共联俄

孙中山从广东被迫退到上海，他一面继续部署讨伐叛军陈炯明的战斗，一面深刻反思自己这几年来为什么总是走弯路的教训。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待自己的同志不可为不诚，对革命事业的成功不可为不努力，而对如何去建设新的政权、统一中国更是呕心沥血，费尽了心机，为什么总是不见成效，反而往往是功败垂成呢？这使得孙中山十分苦恼。特别是自己一向最为推重的陈炯明却带头起来反对革命，破坏革命，差点儿就在陈炯明的手里葬送了革命的前程，这是自己有生以来失败中最大、最惨痛的一次！他感觉到，自己手创的这个党，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当孙中山住在莫利爱路的公寓里反复推究着自己错误的根源时。当时上海的许多名流都来拜见他，正在家中度暑假的北京大学教授张西曼，特地赶到上海来见孙中山。张西曼早在1919年的时候就与孙中山就有了相当深的交往，这次来到上海，他再次向孙中山表示：“我张西曼是竭诚拥护孙大总统的，对孙大总统的英明领导，我竭诚支持。”张西曼还对孙中山建议说：“国民革命为什么成功十几年了，仍然没能达到统一中国的大目的？其原因就出在我们这个党的内部，现在从事革命，一定要纠正那些不肖党人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惜牺牲民族利益的卑污心理，要健全党的领导组织，巩固民众基础和团结一切革命的力量……”

张西曼的一席建议，使孙中山的心胸豁然开朗，对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的政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孙中山下定了决心，要真正实施自己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的联合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

当孙中山还在白鹅潭坚持指挥讨伐叛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已在7月份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了和国民党以及其他一切革命团体团结起来，建立联合的民主主义革命战线，和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作斗争。8月份，共产党中央又在杭州的西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就如何与国民党联合的问题作出了新的决议，并特派李大钊和林祖涵（即林伯渠）专程赴上海会见孙中山，公开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8月23日，李大钊和林祖涵来到上海孙中山的公寓，求见孙中山。孙中山一看到李大钊，就为李大钊的不凡气度所吸引，宾主见面后也没有什么客套话，立即走上了正题。孙中山说：“我早就仰慕李先生的风采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李先生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来见我，一定要在国家大事方面多多赐教。”

李大钊也很坦率地说：“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现状下，中国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的政党，这是我党从对中国革命的现状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但是，就在中国国民党的内部，也有着完全不同主张的两个派别，一派是像孙先生这样的坚定地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一派是对外亲近帝国主义，对内亲近北洋军阀的。还有很多人往往在这两者之间动摇不定，因而影响了国民党的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孙中山听了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许。

李大钊接下去又说道：“从我党的眼光来看，贵党的内部正在发生变化和瓦解，人群正在划分为不同的阵营，在国民党领导辛亥革命时，贵党是蓬勃向上的，是一个正处在发展时期的革命的政党；辛亥革命以后，一大批官僚和政客混进了国民党内部，带动了原来的党员队伍发生变化，许多人入党

的动机只是为了当官发财，党的组织纪律开始涣散而不可收拾，一些早年追随孙先生的国民党的元老们很多人失去了原先的革命精神，而有的人却野心极度膨胀之后而一发不可收，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像陈炯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当孙先生您被困在永丰舰上亟待革命力量支援的时候，而贵党的一批革命元老像李石曾等人却又甘心附逆、与叛军陈炯明一唱一和，通电要求您下野，这些人的举动是受什么动机在支使？这些都是您不得不多加考虑的……”

孙中山对李大钊的话深深地表示赞许，孙中山说：“李先生看问题果然有独到之处，李先生所说的这些问题正是我来上海之后每天都在考虑的问题，只是暂时还没有想出救治的好办法来，请李先生不妨多指教。”

李大钊说：“当前要根治国民党自身的这种疾病，唯一的办法就是正视它，首先要敢于承认它，而不是去回避它。在我和我们的党组织看来，贵党如不极早地加以改造，就很难完成孙先生为贵党所描绘的革命蓝图。相反，在内部各种腐败因素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必将导致贵党的全面覆亡！”

李大钊的话，让孙中山感到十分震惊，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政党已经走上了这样一条危险的道路，从情感上来说，他实在不愿意接受李大钊所说的话，但理智又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人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深处，李大钊所说的话半点都没有危言耸听的意思。

李大钊顿了顿再说道：“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革命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您领导的民主革命是要推翻满清皇帝的统治，而今天我们必须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要完成这样的革命任务，不是目前您所领导的国民党的现状能够完成的，必须给革命队伍中增添新鲜血液……”

孙中山对新鲜血液这一词很感兴趣，便问道：“什么是‘新鲜血液’？”

李大钊答道：“所谓‘新鲜血液’就是指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在人员状况的一种力量，从贵党的组成来说，当前的新鲜血液就是指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参加的，国民党应该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使命来！”

联合共产党，这一想法孙中山去年在桂林时就听共产国际的马林先生说过，当时，孙中山由于对共产党还不甚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感兴趣，所以对联合共产党这一主张就没怎么往心上放，现在，在这样的场合，由李大钊这样的人说出来，分量就不一样了。孙中山的脑海里在迅速地翻腾着波涛：俄国人早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可惜的是没能早点考虑这个问题。从今天来和自己交谈的李大钊身上，孙中山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的影响力，他发现，有无数人才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就凭着有像李大钊这样的人才，中国共产党就是值得信赖的，共产党的未来也是不可限量的，和共产党携起手来，肯定会为自己的民国革命大业带来更加辉煌的成绩！

孙中山对李大钊说：“我非常欢迎像您这样的有着过人的天才的共产党人加入我们国民党中来，改进我们的血液，帮助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党再度焕发出青春来。只是不知共产党人是不是有这样的诚意？你们共产党人愿意不愿意加入我们国民党？”

李大钊激动地抓住孙中山的手说：“只要孙先生您接受，我代表共产党人的立场，愿意与您衷心合作！我党早已作出决定，同意共产党人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非常高兴地说：“守常先生，我十分高兴地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

身份，介绍你加入中国国民党。只是我还有一个要求，贵党人士加入我党以后，须得遵守本党所固有的纪律和章程。”

李大钊爽快地说：“我非常感谢孙先生对我的厚爱，我可以代表我党的立场，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当然是作为国民党党员的一分子，在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下活动。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既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那我们的共产党的党籍是不能脱掉的！”

孙中山高兴地拍着手说：“不错，你尽可以一边做你的共产国际成员，一边在我党中帮我搞好国民党的建设。我们可以为实现中国革命的大业而并肩奋斗嘛！”

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会面，使孙中山确定了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实现革命大业的基本思想。此后，李大钊又和孙中山多次会面，具体商谈中国共产党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这导致了中国革命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和李大钊的相见使孙中山进一步了解了什么是共产党和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之后，和朱德的一次会面，更坚定了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决心。9月份的时候，朱德和孙炳文一同从云南来到上海，他们是听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活动，要到上海来找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怀着深厚的感情来到莫利爱路来看望孙中山。孙中山这时候正在积极部署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行动，他知道朱德原来是滇军中的旅长，也是个很有名气的军官，便劝朱德重新回到滇军中去，对自己原来的部下进行整编，等到时机成熟时，会合各路北伐军共同讨伐广州，重新建立新生的广东政权。

可是朱德却不同意孙中山的意见，他说：“我们对孙先生的革命主张是非常信服的，可是对孙先生目前的做法却有不同意见，孙先生和国民党人发动革命这么多年来，总是利用这个军阀的力量来打击另一个军阀的力量，这样的做法，有时候也会成功，但是结果总是失败，每次总是革命派最后失败而让军阀们获得了胜利，因为军阀们的本质是靠不住的，你要想和某一个军阀结成同盟，最后吃亏的总是革命的力量。”朱德还说：“我是一个军人，我花费了十一年的时间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可是总是失败，无论是当旅长也好当军长也好，最终只不过是军阀们的一个工具，打了十几年的仗，仍然看到人民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可是在世界的北方，俄国革命却取得了成功，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他们有着共产主义的思想，这是一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现在要到欧洲去，到那里去寻找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里有比我们进步得多的制度，更重要的是，那里的社会主义力量非常强大。”

听了朱德的话，孙中山很有感慨，但他确实信服朱德的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并且对朱德说：“你说的不错，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了，还不能取得成功，这是我们的理论方法和采取的措施有误，不过，我正在采取新的政策，不久就会正式实施，到那时候，希望你能回来帮我共同工作。”孙中山这时候说的要实行的新政策，就是已经在他的心中考虑了很长时间的联俄、联共的新政策。

与苏联共产党联合，也是孙中山考虑了很长时间的事情。早在1921年，孙中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的会谈，就奠定了孙中山联合苏俄的思想基础。孙中山到上海以后，苏联派出特使越飞到中国，一方面和北京政府谈建交的事情，一方面秘密地和孙中山谈国共两党合作以及和苏联共产党合作的

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苏联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9月4日，正式在上海召开了改进国民党的第一次会议。除了在上海的国民党首要人物外，共产党人陈独秀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上，孙中山以总理的名义指定九人为新纲领的起草委员会，这九人中就有共产党人参加。大会一致通过了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的新政策。

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行动给予积极的反响，共产党人蔡和森在9月13日发表了一篇《统一，借债，与国民党》，这篇文章把辛亥革命十一年来为什么没能成功的原因剖析得鞭辟入理，令孙中山看了大为叹服，特别是其中关于对中国革命将来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提法，更让孙中山感兴趣：

“……所以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亲切的结合，一面视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高涨，革命行动一天一天丰富，勿以民众力弱而与之疏隔，勿以善邻势微而不与接近，勿因一时之利害而忘远大……”

孙中山对文章中“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这一句话十分赞赏，文章中要与民众和苏联的联盟的提法也正好说到了自己所思考的问题的节骨眼上，觉得共产党中真是有人才。所以当宋庆龄在问他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联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我们这个党太缺乏新鲜血液了！”

孙中山在1922年的11月和12月先后召开了三次这样的关于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将改组国民党的基本文件都准备好了。最后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实行新的三民主义，是在1923年的年底和1924年的年初。不过，就在1922年的下半年，北伐军回师讨贼的进展十分迅速，很快打到了广州。孙中山激动不已，他要再赴广州，在那里再度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重新完成北伐大业！

第六章 壮志未酬

沈鸿英之乱

陈炯明被赶到惠州，滇、桂联军胜利地进驻广州，孙中山的讨伐叛军的战斗获得了彻底的胜利。接到广州讨贼军胜利的消息后，孙中山在上海作了一些安排，准备再下广州。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大野心家陈炯明被赶走了以后，会又冒出新的野心家来。

广州陈炯明的失败，使得北京的军阀们坐立不安，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就这样看着孙中山再度到广州去重掌革命的政权，再来与北京的统治者们作对。吴佩孚挖空心思，要在滇、桂诸军中再找一个自己的代言人，阻遏孙中山革命政权势力的发展。北洋政府的一些幕僚们分析，在打败陈炯明的滇军和桂军里头，将领们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内部存在着许多利益上的利害冲突，如在滇军里头就大致有两个派系，一是朱培德所统率的军队，一是杨希闵统率的军队，他二人看起来都是滇军的领袖，实际上二人各自心怀鬼胎，互不放心对方；而在桂军里头，情况也是一样，一是粗人出身的沈鸿英所率领的军队，一是刘震寰所率领的军队，这两个人也早就各自找机会想吃掉对方；再从广州现有的粤军来说，成分就更为复杂了，有陈炯明的旧部，有江防司令魏邦平的旧部，真正属于孙中山指挥的粤军还远在广西没有回到广州来，这就是许崇智的军队，许崇智的军队要从广西回到广州，首先要突破叶举和洪兆麟的防线，而要突破这一道防线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经过一番分析，吴佩孚采纳了谋士们的建议：一面支持在汕头一带驻扎的叶举和洪兆麟的部队，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拖住许崇智的军队，使他们不能及时赶回广州；一面出重金买通沈鸿英，并且给沈鸿英以总督广东军务的任命书，让沈鸿英在广州守住，不让孙中山回到广州去。

桂军司令沈鸿英与北洋政府的谋士们所预料的一点也不差，他正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小军阀。沈鸿英参与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就是想在广州再占下一块地盘，好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当滇、桂、粤联军还未进入广州时，他就密令自己的心腹李易标率领所属的一个师，星夜兼程，抢先占领了观音山、白云山这两个广州城的制高点。沈鸿英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先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地控制整个广州城，左右广州城的局势。

沈鸿英进入广州之后，又碰上了吴佩孚派来的特使，这位特使带来了吴佩孚的委任状和许诺，委任状是：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总督，并授给上将军衔。沈鸿英捧着委任状和上将军服，乐不可支。他想：我本来就想打到了广州，一定要站稳脚跟，决不再受孙中山的窝囊气，本来还担心自己的实力不够，现在吴佩孚又送来了这么一桩好事，还答应在北方给我军事支持，这样的好事不要岂不是傻子？有了吴佩孚在北方的支持，我在广州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消灭其他的军事力量，就可以顶住孙中山，不让他进入广州，然后，等我有了足够的实力，我还说不定能向北方进发呢，那时候，连你大帅吴佩孚也还不一定在我的话下！

沈鸿英虽然是个粗人，可是他在用兵打仗和勾心斗角方面决不比其他任何军阀差一分。他进入广州，住进白云山总指挥部以后，很快就筹划好了如何行动、吃掉其他力量的计划。沈鸿英第一个要干掉的军事力量就是广州的江防司令魏邦平，因为魏邦平有一个师的粤军精锐部队，这时候又被孙中山

任命为广州的卫戍司令，只有先干掉魏邦平，将广州的卫戍大权掌握在手中，才能控制广州的整个局势，才能做到行动自由。恰好这时候又流行起了“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的传言，沈鸿英便在滇、桂各军中煽动说：“广东人历来仇视外军，现在我们进入广州，是为了执行大总统的讨贼命令而来的，广东人心里不服，所以到处鼓动反对外军的情绪，听说，魏邦平即将要联合广东的各路军队，制服滇、桂各军，我们滇、桂各军要想在广东站住脚，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要把魏邦平和他的军队解决掉。”沈鸿英的谣言，虽然在不明真相的下级军官中有一定的煽动力，可是在高级军官中却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大家都知道沈鸿英有多少花花肠子。但是，在各自怀着鬼胎的滇、桂军的高级将领的心中，却引起了不少的联想，杨希闵和刘震寰都故意表示相信沈鸿英的话，并且表示担忧，他们都催沈鸿英早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

1923年的1月26日晚，沈鸿英和杨希闵、刘震寰三人联名发出邀请，请胡汉民、邹鲁、魏邦平、李烈钧、陈策等人到江防司令部滇军杨如轩的旅部里来召开军事会议。接到沈鸿英的通知后，刚刚上任当了广东省长的胡汉民、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海防司令陈策、特派员邹鲁和桂军将领刘震寰也带着军长刘玉山按时到达，独独缺一个滇军的司令杨希闵。因为杨希闵也有他自己的打算：这次来此开会，必定没有什么好会，沈鸿英很可能要在会上发难，自己不到会，任他们拼个鱼死网破，我到时候去收拾残局，不论谁胜利，我都是白捞一把便宜。沈鸿英也知道杨希闵的居心所在，在心里暗骂这个老滑头，“到时候我连你也一锅煮了，看你还到哪里去弄巧卖乖！”

开会之前，沈鸿英早已在会场的四周围布下了层层暗哨，命令自己的卫队把守住各个要道通口，一旦事情发生，不让任何人活着走脱。

会议开始了，沈鸿英讲了两句开场白以后，就凶相暴露，拔出手枪，在空中挥舞着说：“今天你们都要听我的命令，谁要想不听，就先问问我这支手枪答应不答应！”说完话使用恶狠狠的眼光扫视着会场上的人。

卫戍司令魏邦平却不买他的账，他是广州的卫戍司令，他对目前广州城中的混乱的治安秩序感到焦急不安，他说：“在孙中山大总统主持军政府期间，广州城里秩序井然，有明令不准军人在城中抽大烟、开赌馆、狎妓嫖娼、乱收捐税，捐税一律由政府统一收取。可是现在，滇军、桂军进入广州之后，不顾过去的禁令，公然在城中抽大烟、嫖娼聚赌，还乱设关卡收受捐税，已经严重地扰乱了地方的治安秩序，军队还占据了大量的民用楼房，弄得整个城里乌烟瘴气，人民生活没有安全感，我请求各位将领同意，我要在城中禁烟禁赌，还要请各位将领们把占住的房子早日腾出来，归还给老百姓。”

魏邦平的话还没有落音，沈鸿英的师长李易标早已拔枪在手，指着魏邦平的鼻子骂道：“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民众讲话！你一会儿投靠陈炯明，一会儿投靠孙中山，有什么脸面跟我们讨论广州的秩序？我们辛辛苦苦地打跑了陈炯明，你们不给我们充足的粮饷，我们开个赌馆，抽点钱作军费有什么不可以！”李易标说着说着，举起枪来就对魏邦平“砰！”地开了一枪，魏邦平在李易标拿着枪比划来比划去的时候就预防着他的枪走火，早作好了躲的准备，见李易标要扣动扳机的时候，吓得就地一滚，趴在桌子底下。李易标一开枪，沈鸿英、刘达庆和黄鸿猷也拔出手枪，连连向胡汉民、陈策、邹鲁等人开枪，胡汉民一见到李易标向魏邦平开枪，早已向楼下冲去，下楼的通道被沈鸿英的卫兵堵死了，胡汉民一时间急得无处可逃，情急之下，钻进走

道旁的厕所里躲了起来；陈策在慌乱中从楼窗上跳了下去，落地没站稳，将腿摔断了，痛得不能走路还不敢发出哼哼的声音；刘震寰和邹鲁也四处乱奔，正好会议室面对的就是旅长杨如轩的卧室，刘震寰和邹鲁二人一齐挤了进去。

这些奔跑和逃命只是在一刹那间的事情，沈鸿英见几个人跑不见了影子，谅他们也跑不掉，从桌子下面将魏邦平抓了出来，命手下人将他绑在柱子上，准备找到其他人以后一并干掉。

正当沈鸿英提着手枪，杀气腾腾地找人的时候，旅长杨如轩带着自己的卫兵冲上了楼，三下五除二就解除了沈鸿英的卫士的武装，制止了沈鸿英的找人杀人的企图，救出了胡汉民、陈策、邹鲁、刘震寰、魏邦平等人。沈鸿英见杨如轩带来的人数众多，也没敢下令硬拼，只好眼看着这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

这次的“鸿门宴”计划没有成功，沈鸿英觉得一时不宜和孙中山对着硬干，便一面发出电报，请省长胡汉民主持广东的全省军政事务，一面命令自己的军队撤出观音山和白云山，将自己的防区全部移交给滇军接防，自己按孙中山的部署开出广州，到北江一带驻防（实际上他只开到韶关、新街一带驻扎下来）；佳军的另一支部队刘震寰移防东莞、石龙一带。另一方面，沈鸿英还给孙中山打电报，请他早自来广东主持军政事务。胡汉民脱险之后，立即跑到广州的沙面租界里躲了起来，不敢出来主持广东的军政事务，接着又跑到香港，并发出电报、辞去广东省长的职务。

陈炯明叛变，革命政权差点丧失殆尽，孙中山对旧式军人的性质已经有了本质的了解，特别是对自己领导下的各军队首领们的本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沈鸿英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孙中山的眼睛，沈鸿英在广州召开所谓的“军事会议”的消息，孙中山也早已得到了报告，他清醒地认识到，沈鸿英是想做广州的第二个陈炯明了。他本来是准备当天就要赶回广州的，现在决定推迟几天，先布置好讨伐沈鸿英的行动计划再说。

首先，孙中山致函海陆军各路将领，命令他们立即组织力量讨伐沈鸿英，不要让沈鸿英得到喘息的机会，如果让沈鸿英在广电站稳了脚跟，那时要想再讨伐他就很难办了；同时，孙中山又致函杨希闵，叫杨希闵不要受沈鸿英的迷惑，沈鸿英现在是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一时还不敢公开地与国民政府作对，一旦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他就会像陈炯明那样，露出其野心来；孙中山还致电告诉杨希闵：“在沈鸿英的变乱阴谋中，你所率领的滇军也是他要吞并的势力之一，你可就近组织军事力量，迅速讨平沈鸿英，以确保广州这块护法、革命的根据地。”

沈鸿英在离开广州的同时，又给孙中山发了一个电报，表示自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领导，说自己已经按孙中山的意见移兵驻防北江一带了；同时，沈鸿英又通电全国，表示拒不接受北洋政府所委派的职务。孙中山一下就识破了沈鸿英的小丑式的表演，他严肃地给沈鸿英回了一封信说，要他对自己在广州的一番表演悔过自新，孙中山说：“国家大事，要出以公心，国民革命的军人要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行动，那些喜欢耍一些小聪明、玩弄一些小权术、搞一些小阴谋活动的人是从来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于一时，也不会成功于永远的，最终一定要失败！”

2月21日，孙中山乘船来到广州，这一次，孙中山在广州东郊农林试验场设立大元帅府，自己就任大元帅，而不再称大总统了，因为前几次都是称

大总统的，结果是大总统总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所以这次改称大元帅。同时组成了陆海军大本营，对政府的组成发布了一系列的任命：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古应芬为法制局长，朱培德为参谋长，林云陔为金库主任等等，这是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革命的政权。而且，这一次孙中山将军队称为讨贼军，宣布进入了讨贼期，说：“这次，本总理再回广州，不再提护法了，现在的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是军事建设时期的政府，要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一个个地来讨平。”

沈鸿英对自己在广州的失败，一天也没有甘心过，他一直是在和孙中山做表面上的敷衍工作，暗地里紧锣密鼓地在准备进攻广州。1923年4月16日，沈鸿英正式通电接受北京政府给予的职务，升任广东“督军”。在庆祝自己升任督军的大会上，沈鸿英将自己所辖部队中营以上的军官全部集中起来，宣布了进攻广州的作战计划。沈鸿英鼓动说：“弟兄们，我们军人千辛万苦地打败了陈炯明的叛军，攻下了广州，可是却被赶到这样偏僻的地方来驻守，而孙中山却不费一点辛苦就来当了什么大元帅，我们眼，我们要打回广州去！现在，驻在广州的各军之间，内部不和，互相猜疑，有守军也同没有守军差不多，这是我们进攻广州的大好时机。吴佩孚吴大帅又派了三个精锐旅的部队从江西进入广东，作我们的声援，我们此次进攻广州，将会马到成功！”

第二天，沈鸿英便兵分三路，向广州进发。

当沈鸿英的部队到达广州的时候，广州还在沉睡之中，叛军的枪炮声惊醒了酣睡中的人们。孙中山一听到枪炮声，就命令各处迅速查明枪炮声的来源，很快，孙中山知道了这是沈鸿英在作怪，立即向各路军队发出命令：令正在受攻击的滇军杨希闵部坚守待援，挡住沈鸿英叛军的进攻；令桂军刘震寰火速从石龙方向回援广州；令滇军军长范石生坚守广州的北郊和北门。发完命令后，孙中山亲自率领卫队登上观音山督师反击叛军。

孙中山率领卫队来到观音山上，一进入镇海楼，老远地就看到军长范石生正躺在床上抽鸦片，房子里烟雾缭绕，山上的军队防务还没有布置好，到处乱哄哄的。孙中山十分恼火，大喝一声：“范石生，敌人已经打到你的鼻子底下来了，我让你警戒这一地区，防区丢了，你拿什么来见我？”范石生正在吞云吐雾，猛然听到有人敢于这么大呼小叫地叫自己的名字，正想发作，猛抬头看到是孙中山站在自己的面前，当时就吓得手足无措，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孙中山对卫士马湘大声他说：“你立即用这里的机关枪去布置阵地，挡住敌人的进攻！”

马湘高声答道：“是！奉大元帅命令，取机枪杀敌！”一面飞快地率领着几个卫士取来了三挺轻机枪、两挺重机枪，分散在城墙上布置开来。

卫士们刚刚布置好阵地，沈鸿英的叛军已经逼近了。孙中山蹲在战壕里，手拿望远镜，静静地观察着敌军的动静。叛军们一边前进，一边向山上开枪射击，孙中山不发命令，卫士们都不打枪，滇军的守军也不还击。等到敌人走进到只有四、五百米的时候，孙中山大喝一声“打！”山上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进攻的敌军没料到有这么密集的火力，顿时就倒下了一大片，没死的赶快抱头鼠窜。

孙中山见敌人逃跑，立即大声地发布命令：“范石生，现在敌人要逃跑

了，你给我率部追击，务必要把敌人全部消灭掉！”

范石生一直在孙中山的身旁看着孙中山指挥打仗，他还真的没想到，孙中山临敌作战，也是如此的冷静，正在惭愧无余地时候，听到孙中山叫自己率部去追击残敌，立即大声地应道：“是！我一定尽力去干，决不会再辜负大元帅的希望！”

与此同时，吴佩孚派出支援沈鸿英的三个旅中的两个旅也奔赴广州来支援沈鸿英。孙中山在前线亲自督战，以范石生军为主力的滇军在广州郊外与沈鸿英叛军殊死搏斗近一天，终于将沈鸿英的主力部队和吴佩孚派来增援的两个旅的部队大部消灭，沈鸿英大败，仓皇带着儿子和几个残余的卫队逃到江西。到5月18日，讨贼军攻克肇庆，叛军余部逃到广西，讨伐沈鸿英的战斗以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东江风雨

讨伐叛军沈鸿英的战斗，没费多长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通过这次战斗，孙中山再次体会到旧式军队的难以全心依靠，他要集中精力来改造旧军队。本来，当沈鸿英叛变事件还没有暴露出来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做好了裁减军队的计划，他要通过裁军的办法来削弱所辖各路旧式军队的实力，然后再建设一支真正属于国民革命政府领导的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最后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可是，还没等他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就爆发了沈鸿英的叛变事件，为了保卫广州这块革命的基地，打击叛军的嚣张气焰，孙中山只得调动在广州的滇、桂各路军事力量，全力平叛。在沈鸿英叛变被彻底打垮以后，孙中山又要来实施自己的裁军计划。可是，孙中山的这一裁军计划同样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放置了下来。

1923年的5月8日，陈炯明的旧部叶举又率部在东江地区再次发动叛变，同为陈炯明旧部的洪兆麟也在潮汕地区起兵响应。当陈炯明广州兵败逃往惠州并从惠州取道香港时，陈炯明授意自己的旧部，先在东江和潮汕地区安定下来，如果孙中山不来进攻，就不要向广州进发；如果孙中山要派兵向你们进攻，你们就随机应变，可以接受孙中山的改编。投降孙中山，主要是保存实力为上，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日后没柴烧。所以当孙中山南下广州以后，叶举和洪兆麟都向孙中山表示悔过，愿意接受孙中山的改编。孙中山因为考虑到当时没有精力来解决叶举和洪兆麟的问题，便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可是，孙中山对他们并没有失去警惕，立即派了得力的干部去收编他们。不过，收编和改造旧军队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就能奏效的，还没等收编工作取得有效的进展，沈鸿英已经在北江发动了兵变。而当沈鸿英叛变刚刚扫平之时，叶举和洪兆麟又分别在东江和潮汕地区发动了兵变，这使得孙中山简直累得喘不过气来，他一时有心力交瘁之感。

在痛苦和愤怒之后，孙中山再次振作起来，投入了部署平叛的战斗指挥之中。当时，北伐军许崇智部正在返回广州的途中，恰恰是走到潮汕一带遇到了洪兆麟的部队，本来，洪兆麟也是受了孙中山的改编的，许崇智认为大家都是自己人，也没有多作防备，只想快点通过洪兆麟的防区回到广州去，帮助孙中山在广州建好这块根据地。可是就在他们要通过潮汕地区的时候，洪兆麟突然发难，不打招呼地向许崇智部发动了突然袭击，许军猝不及防，被打了个手忙脚乱。幸好许崇智的军队久经战斗考验，在短时间的混乱之后，很快地就站稳了脚跟，在潮汕一带固守下来。而叶举则是在东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和调整之后，同时分兵三路向广州发动了进攻。陈炯明得到了两个老部下同时举事的情报之后，也立即从香港动身回到惠州，实地指挥作战。

根据这一形势，孙中山当机立断，先打电报给许崇智，命令他率部在潮汕一带固守待援，只要他能在潮汕地区守住，就能拖住叛军的一大部分力量，使敌人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来进攻广州。他告诉许崇智，你守的时间越长，就对广州的平叛战斗越有利；然后给驱逐沈鸿英的西江、北江军队发出电报，命令他们立即向石龙一带集结，控制叶举兵团的攻势，孙中山任命程潜为这次讨贼军的总指挥，总管在广东境内的滇、粤、桂各军。为了改变每次总是被动挨打的局面，孙中山命令程潜，在战斗中取攻势，分兵直捣叛军的老巢——惠州。

以攻为守的战术果然非常奏效，陈炯明担心一旦惠州被攻破，自己就会

死无葬身之地，他立即给叶举发电，命令他赶快分出一部分军队来保卫惠州，叶举也不愧是一个沙场老将，他见程潜进攻惠州的势头很猛，知道要想一下子就挡住他的攻势是相当困难的，那将会使自己的军队增加许多无谓的伤亡，他也来了个围魏救赵之计，不去分兵救惠州，而是命令军长杨坤如领兵进攻博罗城，攻下博罗后，立即兵抵石龙，企图占领石龙之后，进窥广州。叶举认为，惠州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有两三条小路可通行人进出，素有“铁链锁孤舟，浮鹅水面游，任凭天下乱，此地永不忧”之称，是易守难攻的地方。孙中山的军队没有足够的力量在短期内拿下惠州城，因此他便放心大胆地去实施他的进攻广州的战术。叶举的计划是，只要你广州吃紧，还怕你程潜不回兵去救吗？

叶举的这一招果然有效，程潜见叛军向石龙挺进，担心石龙一破，广州就失去了屏障，便从石龙分兵争夺博罗，派滇军刘震寰部单独进攻惠州。孙中山在广州城里接到叛军向石龙进攻的情报，深感博罗城的意义重大，觉得现在正是战斗进行的关键时刻，便亲自来到石龙督战，动身前，命令还驻扎在广州的滇军蒋光亮军火速奔援博罗，可是，这些滇军打仗向来是只为了钱才动身的，这回因为没有粮饷而不肯动身。和孙中山一起到达博罗前线的大本营总参谋长李烈钧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觉得博罗这下肯定是危在旦夕了，可是，孙中山却认为，在广州的胡汉民和廖仲恺是不会束手待毙的，他们一定会想出好的办法来。果然，第二天便传来了好消息：廖仲恺因国库空虚，无力筹款，已向日本贷款十万元，并交付滇军蒋光亮部，蒋军已经开拔出城，奔赴博罗前线。孙中山这才放了心。

蒋光亮部开到博罗城时，正是杨坤如的部队进抵博罗城下，博罗城在战火中摇摇欲坠的时候，滇军在万分火急的时候赶到，城内的守军见外援来到，大开城门从城中杀出，里外夹攻，杨坤如部大败，逃进惠州城中躲了起来。

惠州城下，刘震寰正在指挥大军进攻，刘震寰在进攻惠州之前就对惠州的地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惠州城在军事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因为它的地势险要，而夺取惠州的最根本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占领能进入惠州城的唯一一块陆地——飞鹅岭。因此，刘震寰在到达惠州之前就命令自己的部下们，务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飞鹅岭！可是，当刘震寰到达惠州城的时候，居然发现飞鹅岭没有派兵把守，这使得刘震寰大喜若狂。刘震寰对自己的秘书说道：“立即给孙大元帅发电报，就说我军已经拿下了飞鹅岭，不出三天我就会京下惠州城的，请大元帅就在广州等我的好消息吧！”

电报发出之后，刘震寰立即命令全力攻打惠州城，可是，城中的叛军并不是个个草包，陈炯明就在城中督战，飞鹅岭没有防守，那是杨坤如在进城时的疏忽大意，已经被陈炯明骂得狗血喷头了。但这并不等于说惠州就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的。陈炯明刚从香港回来，带回了英国人送给他的许多精良的武器，凭着惠州城的深沟高垒，刘震寰要想在短期内拿下惠州，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当刘震寰急于攻城的时候，几次都被守军打退了进攻，先是集中火力掩护步兵架竹梯攻城，被城上守军密集的火力给封住了；后来用挖掘坑道的办法，想从城墙下面凿个洞钻进去，可是护城河水太深，坑道无法挖得过去。连攻了几天都没有打下惠州城，反而损失了好几百个士兵的生命，连刘震寰自己的头部也受了相当重的伤。

孙中山先是接到了刘震寰的电报说很快就能拿下惠州城，心情非常振奋。可是等了几天，却传来了刘震寰受伤的消息，惠州城不但没有攻下，攻

城的滇军弟兄却伤亡相当惨重。为了早日拿下惠州城，孙中山决定再亲自到惠州去一趟，一方面给攻城的士兵们打打气，一方面也好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中山来到惠州城外的飞鹅岭上，从山头上用望远镜察看城中的情况，三面被水环绕的惠州城，确实像一只漂浮在水面上的大白鹅，飞鹅岭与惠州城的距离不远不近，要想从岭上冲下去，再攻城，士兵们没有这么长的耐力能够一口气攻到城下，从岭上直接向城中开枪又打不着城中，一时倒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打下惠州了，孙中山在山上踱来踱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孙中山命令讨贼军回到广州虎门去搬来了巨型大炮，将大炮架在岭上，居高临下地对惠州城中发炮，孙中山亲自指挥士兵发炮。可是一连发了十几炮以后，只见得惠州城墙上硝烟弥漫，却看不到城中守军的动静，孙中山从卫士马湘手中要过望远镜，向城中察看，只见大炮发出的炮弹根本打不到城中去，只是落在城墙下面，有的炮弹离城墙很远，落在老百姓住的村里，把老百姓的房屋炸塌了许多。孙中山连忙叫士兵停止发炮，对士兵们说：“这样打不行，炮弹打不到城中去，只能把老百姓的房屋打倒，这样会引起老百姓对我们的愤恨的，我们不能这样打下去了，等到想出办法来再说。”

惠州城下的战斗进入了胶着状态，孙中山苦苦思索不得其法，只得暂时先回广州。可是，这段时间的僵持却给陈炯明带来了有利的机会，陈炯明一面把各路叛军调集起来，向广州发动进攻，一面又和北洋政府取得了联系，北洋政府已派出重兵从北方对广州形成包围之势。久攻不下的惠州城中；陈炯明正在召集他的部将们开军事会议。陈炯明得意洋洋地对部下们说：“诸位，你们固守惠州已达数月，完成了我的预定计划，现在我的大军已经在四面八方集结起来，分头向广州进军，目前，我军如果按计划前进的话，已经拿下了博罗、石龙、石滩，下一步就是集中力量进攻广州城了！石龙、石滩一下，广州城就近在咫尺。我进军广州的计划是分三路并进，一路是从石龙进攻，一路是从两阳猛扑，再一路是吴佩孚吴大帅的三个劲旅邓如琢、方本仁、樊钟秀的部队，他们沿着铁路向广州进攻，有这三路大军，广州一个小城不久就将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再说，我还计划派重兵堵住黄埔，封锁住虎门，不让孙中山从水路逃跑，这一下谅孙中山就是插上翅膀也休想逃出广州去！”

陈炯明所料不错，石龙、石滩两城很快失守，广州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立即陷入了危险之中。孙中山得到这一消息以后，心情非常沉重，从这两处阵地失守的情况来看，石龙失守，完全是守将失职所致，石龙守将蒋光亮认为石龙已经没有危险了，擅自从石龙跑回广州来享乐，当敌军突然来攻的时候，守军群龙无首，毫无战斗力，很轻易地就被叛军攻破。而石滩则是不得已而弃守，石滩守将范石生打仗是很不含糊的，他和洪兆麟打了几场硬仗，差点把洪兆麟赶下了湖。可是，最后还是不得不弃守石滩，那是因为孤零零的石滩已经无法守住了。由此看来，叛军这次不光是有备而来，而且是来势汹汹，不可轻视。现在，广州城中可供作战的兵力有：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他的三个军的兵力，一个是蒋光亮，一个是范石生，一个是朱培德；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和他的军长刘玉山，再就是刚刚回到广州的粤军许崇智和李福林。孙中山立即传令将各路将领们召集起来开紧急会议。

会议开始，孙中山说明了当前战局情况，便重新调整布防兵力，孙中山任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为滇、桂、粤、湘联军前敌总指挥，部署各军守卫广

州四面；任命谭延闿为湘军总指挥，率领本部军队接防北江防区，堵住吴佩孚的邓如琢和方本仁两个旅，不让他们南下进攻广州；任命黄明堂为中央直辖军第二军军长，林树巍为第四师师长，率本部军队堵住叛军邓本殷的兵力，不让他东进与其他敌军相呼应。广州布防结束，孙中山暂时回到大本营中稍事休息，他要养精蓄锐，以饱满的精力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在广州城陷入叛军四面包围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也发动广州近郊的工农群众，组织了数万农民军，拿起最简陋的武器来支持孙中山保卫广州。

当广州城处于危急关头时，孙中山想起了自己还有最后一支秘密军队，这支秘密军队不是旁人，正是北洋政府认为最得力的精锐部队之一的樊钟秀旅。原来，当1922年8月孙中山还在上海的时候，樊钟秀就曾派人专门和孙中山联系过，他表示愿意浴血效忠孙中山大总统，以自己的一个精锐旅归孙中山指挥，只要孙中山一声令下，随时开过来为大总统到沙场冲杀。而这樊钟秀又是何许人呢？这人原来只是河南宝丰县的一个农民，早年不堪土匪和反动官府的欺压，率领百姓起来自己保护自己。后来队伍越拉越大，军阀们都来拉拢他，他也先后为好几个军阀卖过命，但都是被当作工具，到头来总是想吞并他的军事力量，樊钟秀干了十几年，总是摆不脱这个卖命的命运。后来，他终于发现了孙中山和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认清了这一形势之后，便下定决心要投靠孙中山，当孙中山从广州被迫来到上海时，樊钟秀便派了两名亲信到上海表示自己的一片诚意。孙中山很为樊钟秀的精神所感动，便答应他作为自己的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但要他仍然不动声色，继续充当吴佩孚的旅长的角色。在沈鸿英叛变时，孙中山曾经考虑过将这支部队拉出来，但又考虑到当时还没有到最困难的时候，便没有动这支最后的革命力量。现在，陈炯明的气焰极为嚣张，而且陈炯明的势力也远远地超过了沈鸿英的势力，广州城已经陷入了叛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正是用这支军队的时候了。孙中山给樊钟秀送去了一封信，告诉他，现在是他为革命出力的时候了，请他立即率部奔赴广州。

1928年11月18日，叛军洪兆麟、杨坤如的部队几万人兵临城下，把广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军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正在十分紧急的时刻，樊钟秀旅从韶关乘火车来到黄沙车站，全体士兵跑步奔到战斗第一线，樊钟秀亲自向孙中山报到。孙中山见援军及时赶到，说不出的高兴，紧紧握住樊钟秀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樊钟秀命令士兵们就地造饭，饱餐之后准备上战场，樊钟秀一边听孙中山介绍战斗进行情况，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馒头，孙中山将战斗情况介绍完了，樊钟秀的四个大馒头也下了肚，用手抹抹嘴，就要对士兵们下达出发令。孙中山问他：“你们新军刚到，需要什么？”“什么都不需要！”樊钟秀说完就要动身。正好站在孙中山身边的财政部长叶恭绰见他如此豪壮，不由得心中佩服，说：“我献上一万元以犒赏你的军队！”樊钟秀还是摇摇头说：“无功不受禄，不敢领受。”说完话就带着部队直奔瘦狗岭前线去了。

围攻广州的叛军见守城的滇军已经渐渐力不从心，一个个得意洋洋，只等着把守军困死以后不费力地拿下广州后好享清福了。猛然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支生力军，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冲进叛军的阵地后，简直就如老虎冲进了羊群里，直杀得叛军哭爹叫娘，眨眼间就乱了阵脚。

谭延闿的湘军也正在这时候赶到，二话不说便加入了攻击叛军的行列。

广州城外、两天激战，叛军主力被大部歼灭，讨贼军乘机挥兵大进，一

举夺回了石滩、石龙，叛军主力的残部退入惠州城中，陈炯明的第二次进攻广州的计划再一次泡了汤，广州城再次转危为安。广州这块革命的根据地，像一艘永不沉没的航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乘风破浪，扬帆猛进！

关税风波

在平定陈炯明第二次叛乱的过程中，孙中山深切地感受到面临着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自从大元帅府成立以来，快到八个月的时间里，政府收入不超过三百三十万元，而包括军费在内的各项支出却要花去将近一千一百万元，政府收入极其微薄，除了应付正常的经费开支外，还要给参加平叛战斗的滇、桂、粤军等开列恫银，这些旧军阀领导的军队，不见饷银死活也不肯上前线去打仗，有几次因为钱的问题差点就误了军机大事。

一次是在进攻惠州时，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命令胡汉民支取二十万元的饷银给滇军和桂军，让他们拿了钱之后立即上前线去协助刘震寰攻打惠州的守敌杨坤如，胡汉民接到命令后丝毫没有怠慢，立即签发了取款手令，让副官张猛到市政厅去支取二十万元的款项。张猛拿着胡汉民签发的手令在早晨8点钟就到达了市政厅，可是市长孙科不在，没办法支款。一直等到上午11点正，才见到孙科摇摇晃晃地来上班，张猛赶紧迎了上去，将胡汉民签发的命令给他。孙科一看是要提取二十万元的款子，当时就来了火：“我哪里有钱？我这个市长早就是一个空架子了，我去变戏法也弄不出这么多的钱来！”孙科一边说着，一边还真的来了大火，三把两把就把胡汉民的手令撕得粉碎，把一大把碎片向张猛的脸上砸去，竟然连班也不上，一甩袖子，扬长而去。

到了中午时分，孙中山认为各路军队已经出发了，打电话给各军首领，一查问才知道，没有一支队伍开出广州，都还在兵营里猫着一动没动。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说：“还没有领到饷银，士兵们不肯出发。”孙中山感到奇怪：“不是早就去支款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说没有钱呢？”他不放心，又去打电话问刘震寰，得到的回答也是没有粮饷，部队不肯出发。孙中山连忙去问会计司，会计司回答说早就没有钱了，孙中山又问：“不是早晨就到市厅去取钱去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钱呢？”会计司司长黄汉生回答说：“我不知道有这回事，也没有见到钱来。”

孙中山满腹狐疑，来到胡汉民处查问钱的事情，胡汉民回答说，一大早就让副官张猛去取钱去了。正在说着，副官张猛带着一肚子的气回来了，见了孙中山，便将自己去取钱时受到的一肚子的气统统的发了出来，如实地给孙中山作了汇报。孙中山一听，当时气得满脸通红，火冒三丈地立即打电话让孙科来一趟。

接到父亲的电话，孙科吓得战战兢兢地来到孙中山的面前，不等孙科开口，孙中山就将他一顿大骂，要他马上去筹集二十万元的款子来，否则，就不要当这个市长！

第二件事情是在博罗争夺战的时候，急需十万元的款子给广州的桂军，让他们火速来博罗增援，可是，政府的财政仍然是极其紧张，财政部长廖仲恺只好到香港去向日本人借了十万元的贷款来，才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这两次事件，使孙中山深切地感受到财政问题的重要性。在当时，各路军阀们可以自己设卡收费，在大元帅府成立的八个月里，粤军自己的收入可达到每个月一百多万元，滇军每个月可得三百多万元，海军可得到三四十万元，其他的军队总数加起来也要超过一百多万元，而这些军队还要向政府伸手要钱要粮，没有钱粮就不打仗，这使孙中山感到非常头痛。

考虑了很长时间以后，孙中山决定：收回广东省的关税主权。这两个

好处，一是筹到足够的军费，二是可以给帝国主义者以一个有力的打击。当时，广东省的关税每年都被北洋政府的代表收了去，外国人在广州做生意，不向广州政府交税，却向北洋政府交税，每年的关税在一千万元以上，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如果成功地将这部分关税收归大元帅府所有，就基本上解决了广州政府的财政问题，孙中山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在 1923 年的 9 月 5 日，孙中山命令大元帅府的外交使团，照会北京公使团，要求将每年广东全省的海关税收入扣除给外国赔款的数额之后，全部交给广州革命政府，并且应将自从 1920 年以来的关税收入同样交给广州革命政府。当时，正是讨贼军平定沈鸿英叛乱和叶举、洪兆麟叛乱的时候，外国公使团认为，有北洋政府和陈炯明的南北夹击，孙中山在一个小小的广州这样的弹丸之地，根本无法坚持下去，等到孙中山失败之后，他也就没有力量再来和外国各国公使团叫板了，所以他们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的要求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10 月份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平定了两次叛乱，再次向北京的外国公使团提出了收回关税的要求。这一次，外国公使团有点沉不住气了，但是他们又没有好的办法，便决定一动不如一静，采取拖的办法来应付广州革命政府，对广州政府的要求仍然不作答覆。

到了 11 月 23 日，孙中山见外国使团仍然没有对广州政府的要求作出答覆，便命令大元帅府外交部，第三次给外国公使团发出照会，如果外国公使团在照会限定之日内，仍然不对广州政府的要求作出明确答覆的话，广州革命政府将自行将广东省境内的海关关税全部提留。

这一下，外国公使团才慌了神，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在华势力受到任何侵害，在 12 月 3 日，给广州革命政府外交部回了一封电报，电报口气蛮横：“广州政府于 9 月 5 日给我外国公使团照会尚未答覆，你们不得擅自收回广东省的关税，如果广州政府竟然强行收回广州关税的话，那就是粗暴干涉外国公使团在华的既定利益，我们将以强硬的手段对付。”

孙中山接到这一份无理至极的电报之后，非常气愤，立即指示外交部，给外国公使团回覆照会，以更加强硬的措辞说：“接到外国公使团的覆电之后，我们非常气愤，中国的海关是中国的国家政府机关，中华民国革命政府是中国境内唯一合法的政府，凡在我中华民国境内的各海关，理应遵守本政府的各项法律法令和政策，我们在我中华民国境内行使自己的主权，任何外国势力不得干涉。自今日起，二周之后，将是我中华民国收回在广东省境内的全部海关关税的日期。”

北京的外国公使团接到了孙中山这一份措辞更加强硬的照会之后，对孙中山的绝不退让的态度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自从清末进入中国的地盘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哪一任中国政府、哪一个中国政府官员像孙中山这样强硬无比，他们觉得丢了脸，想找回自己的面子。于是外国公使团们暴露出来了他们一贯蛮横不讲理的真面目，在北京的外国列强组织起了军事联合体，搜罗了二十多艘军舰，从香港驶入白鹅潭，大炮脱去了炮衣，炮口对准广州，军舰在水面上一字儿排开，想以军事上的优势来吓倒广州革命政府。

帝国主义的军舰开到了白鹅潭，一时间吓坏了广州政府中那些胆小怕事的人们，广州的市民们也惶惶不可终日起来，广州市内谣言四起，都在说：孙中山向外国人发照会，要收回广州的关税主权，现在，外国人发火了，英国、美国、荷兰、法国等几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组织起了二十多艘军舰开到了白鹅潭，要对广州发动进攻，孙中山不怕陈炯明，不怕吴佩孚，这外

国人可不同中国人，他们是说到做到的……随着谣言的到处传播，广州市的市场也开始萧条起来。

对孙中山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一些老牌的国民党党员们，也来小心翼翼地劝孙中山最好不要得罪外国人，要为广州革命政权留一条后路。对这些种种不同的议论，孙中山只是一笑置之。

12月7日，胡汉民向孙中山报告：《字林西报》的记者要求采访孙中山，孙中山想：“这家报纸历来是为英、美各国列强说话的，记者来访，无非还是关于关税的事情，想来就外国军舰开进白鹅潭试探我的态度，来得正好，我正要借你报纸的口来宣传一下我们的立场。让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政府的立场，也可以让市民们了解事件的真相。”便在电话里对胡汉民说：“请他立即过来！”

《字林西报》的记者一落座，便开门见山地发问：“孙先生，您所领导的广州政府最近接二连三地向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发出照会，声言要收回海关关税，外交使团不同意此事，而你却不顾公论，还声称要强行收回关税，此事已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不知先生您有何妙策收拾这一残局？”

听了记者的话，孙中山知道他没怀好意，便淡淡地一笑道：“两广关税收入，每年在一千万元以上，这本来就是两广人民自己的钱，理所当然地应为两广人民所有，本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本政府代表国民的利益收回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什么大波好言？我倒是为我们有些人的软骨头而感到耻辱。不过我更感到困惑的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司长的职务，为什么会是由外国人担任？”

记者又问：“如果外国人把海关关税交出的话，那你将采取什么办法？”

孙中山毫不犹豫地答：“我早已向世界各国打了招呼，如果他们在我们限定的时间内不将海关关税交出来，我们将强行接收，这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记者又威胁道：“如果孙先生要强行接收关税的话，势必要引起争端，现在外国人已经将军舰开到了白鹅潭，难道孙先生不认真考虑一下这一现实吗？”

孙中山这时候不怒反笑了说：“我早就想好了，外国人就会搞武力恫吓这一手，现在，关税交到北京，给那些旧军阀们使用，这无疑地是人民自己给钱让军阀来欺压人民自己，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说到外国人的军舰，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怕的话，我就不会提出收回关税的这个要求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当年我在安庆烧毁鸦片的时候就是当着英国人的军舰烧的，英国人气势汹汹地要对我开炮，结果还不是夹着尾巴逃走了？现在，我有几万革命军驻在广州，他们都决心为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而战斗，别说你二十艘军舰，就是再来四十艘军舰，我又有何惧哉！还有，我已经作好了部署，海军早已作好了战斗动员，如果帝国主义的军舰竟敢真的对我广州发动进攻的话，那时候真正吃亏的可能不是我，而是那些自以为稳操胜算的帝国主义者！”

停了停，孙中山又说：“我就不信外国人能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赢这场战争，我要为我中华民族的主权而战，即使是牺牲了，也是虽死犹荣！”

话说到这种程度了，《字林西报》的记者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吓

唬得倒孙中山了，只好知趣地离开了大元帅府。

第二天，孙中山答《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在广州各大中文报纸披露，广州市民们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正义行动，工人、农民们上街游行，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广州市掀起了反帝革命运动的高潮。

在各界人民的压力下，帝国主义的军舰气势汹汹地开进白鹅潭，却又悄无声息地开了出去，广东省的关税被顺利地收归广州政府所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这次反帝革命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这次革命的胜利中，孙中山尝到了胜利的欢乐，也真正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改组国民党

早在 1923 年初，孙中山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就痛心地感到：国民革命总是遭受重重挫折，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国民党内人心不齐，许多国民党党员甚至是老同志都把加入国民党看作是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很少有人是抱定了为拯救中国的革命宗旨而加入国民党的，更谈不上不惜为之牺牲生命了，而党内的不少好同志却一个接一个地牺牲了生命；再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一支服从自己指挥的过硬的革命武装力量，因此每次打仗时只能依靠旧式军阀的力量，而这些旧军阀们是不信奉主义的，他们打仗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实力，争夺更多的地盘，要么就是为了发大财，革命党并不能管束住他们，相反，经常是受制于这些旧军阀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孙中山看来，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有对自己现在领导的政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它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来。基于这一设想，孙中山还在上海的时候，就委托自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和苏俄代表越飞进行了多次秘密谈判，商量改组国民党的良方。同时，孙中山还委托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为改组国民党出谋划策。孙中山到广州组建起大元帅政府之后，立即把这一任务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23 年的 10 月 6 日，苏联派驻广州的全权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到达广州。鲍罗廷从莫斯科来到广州，首先递交了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介绍信。加拉罕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曾经三次发表对华宣言，他特别尊重孙中山，称孙中山是“新俄的老朋友”，他曾经多次向孙中山表示，他要尽自己的全力来发展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在鲍罗廷到中国后，加拉罕写了一封长信给孙中山，告诉孙中山：鲍罗廷是苏联的一名老党员，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很强的工作能力，并介绍鲍罗廷代表自己向孙中山转达他对中国国民党的一切意见和建议。

孙中山见到鲍罗廷，如同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详细地向他询问了苏联的情况和列宁同志的身体情况，在和鲍罗廷的谈话中，孙中山对苏联革命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的顾问、训练员，请他在广州协助自己搞好这次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为了让党内的同志理解自己的意图，孙中山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对国民党党员们解释说：“我请鲍罗廷君为我党的训练员，鲍君有丰富的办党的工作经验，我的目的是要借助于鲍君的经验为我党的改组服务，鲍先生来到中国，也是诚心诚意地来帮助我们的。我衷心地请各位不要对他抱有什么成见，而是要牺牲自己的片面的见解去理解鲍先生的思想，去学习他的方法。”

10 月 19 日，孙中山致电上海的国民党事务所，告诉他们：他已经决定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委员，又秘密地给北京的李大钊发了个电报，要他立即去上海主持商讨改组国民党的事宜。10 月 24 日，孙中山又委任廖仲恺、邓泽如、林森、谭平山、陈树人、孙科、许崇清、谢英伯、杨庶堪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以林直勉、谢良牧、徐苏中、林云陔、冯自由五人为候补委员，正式组成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3 年的 11 月 25 日，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走出成功的第一步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宣言把这次改组国民党的动机和目标写得清清楚楚，宣言认为，中国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

也做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从国家当前的状况来看，不能不承认：国民党二十年来的革命非但没有成功，相反是失败了的。接着说到要想改变中国目前的落后状况、使革命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必须对现在的政党进行改造：“……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而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则民众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为军阀之牛马、外国经济的帝国主义之牺牲而已……而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更迭口号，然宗旨主义未尝脱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总理委任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始其事；行将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副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愿与同志共勉之！”

孙中山预料：这一改组宣言一发表，将会引起党内外广泛关注，特别是党内的一些不大赞成改组的同志，将会产生许多疑惑，很多人还会思想不通，少数人还将会起劲地反对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必须尽早对党内的同志进行思想教育，用说服的方法，把这些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以免给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力。因此，在这一宣言一发表的时候，孙中山就注意党内同志的反应，抓住机会进行演说。他在大本营中召集起来一些老党员来，反复解说这次改组国民党的动机，他说：“过去，在我们党内，有同志认为，革命军起则革命党消，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旧军队身上，殊不知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危害，陈炯明、唐继尧、沈鸿英、温树德、叶举、洪兆麟等等，他们先前都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后来，随着他们个人势力的增长，野心也越来越大，竟走到了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去，差点就使革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今天，我党改组的唯一目的，在乎不光是依靠兵力，而且更要依靠我们党本身的力量，我们党本身的力量从何而来？从民心而来，人民心力是革命成功的基础。只有人民的心力是最足依赖的，单纯的兵力是不足依赖的，因为兵力的胜败无常。我们党必须先有一种基本的力量作基础，然后兵力才有可靠的希望。俄国人为什么革命在我们之后而成功却在我们之前，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人心的力量作基础，不光胜利了，并且能在列强的重重压力之下不会失败……”

有人对学俄国的方法表示不理解，问孙中山说：“我们素来认为俄国革命党是一种过激行动的党，我们现在学习俄国，岂不是也要走过激的道路么？”

孙中山回答说：“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过激的行动，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而今天的俄国已经恢复了秩序，并且已经开始了建设新国家的工作，成绩斐然。所以，从这里看来，当初的一些过激的行动也是无可厚非的，从今天俄国的现状来看，还有一点过激之处么？俄国人学问深、气魄大，所以他们能想出良好的方法来，我们想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一定要学习俄国！”

还有人对联共共产党表示不理解，说：“共产党成立不到两年，成员不足一百，和共产党联合有什么好处？再说，共产党主张共产，过激议论和行动比苏联还要厉害，我们怎么能和共产党联合呢？”孙中山又对这一观点进

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孙中山说：“共产党成立时间虽然短，人员固然也不多，但是共产党内有许多杰出的人才，共产党人有着博大的胸襟，共产党人还有着做民众工作的良好的方法，这些都是我们所没有的。君不见：叛军叶举、洪兆麟部围攻广州时，共产党人振臂一呼就组织起来数万武装；外国军舰开进白鹅潭的时候，还是共产党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使外国列强不得逞其阴谋。这些都是共产党人超过我们国民党人的地方，我们正是要学习共产党人的这些方法，学习共产党人坚定的主义的精神，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给广大的国民党员们以深深的感染，许多人都对孙中山的观点表示心悦诚服。

可是，国民党中一些持右派思想的元老们却不买这个账，他们就是顽固地反对和共产党联合。身为改组委员会成员的元老张继，他就是坚决反对改组国民党的，他更加反对和苏联、和共产党人联合，张继、冯自由、戴季陶等人联合起来，反对联合共产党，冯自由最为卖劲。他对孙中山说：“国民党不能和共产党合作，如果国共合作，共产党将会乘机打倒国民党，即使是叫共产党进来，也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而不能把共产党当作正菜！”

孙中山对这些人的顽固不化非常气愤，反复说服教育都不顶用时，孙中山真的生了气，孙中山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那你们就退出国民党；你们不愿意进步，我就解散国民党，我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孙中山还是努力多作说服工作。一天，孙中山集中一些老党员来开座谈会，主要是召集那些对改组有意见的人，张继、冯自由等人都被召集到会。会议从一开始，孙中山就立足于国民党建党思想的“天下为公”的主张，反复说服这些老同志，希望他们能理解自己的苦心，真心地支持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可是，还没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冯自由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喊大叫地表示不同意国民党改组，冯自由说：“先生的所谓联共联俄的主张，我考虑再三，就是不能同意，因为您的这一主张简直就是引狼入室，将来会后患无穷！”张继也连连拍着桌子大声地说：“联俄联共，这是亡党的主张，我要求孙总理能听取我们的意见，撤销三大政策，至于改组的事情，只能由本党自己内部进行，不要俄国人和共产党人插进来！”

孙中山对冯、张二人顽固不化的态度非常生气，本来想对他们发一通火的，后来总算是忍住没发火，又耐心地将改组国民党和联合共产党、联合俄国人的意义反复讲了几遍。可是，冯自由却一边跳脚一边大声地叫：“联俄联共，亡党亡国，我冯自由绝难从命！”

冯自由说完话就要离开会场，气得孙中山实在是憋不住了，大声地叫：“冯自由，你给我站住！今天晚上是发扬民主，大家讨论党内事务的，你反对改组的主张也可说，可以以理服人，可是你却耍起流氓手段来，竟然捣乱会场，为严肃纪律，本总理决定给你以处罚！马湘！”“在！”卫士马湘在门外答应了一声。“给我把冯自由关起来，禁闭一夜！”马湘高声应道：“是！”走过去，将冯自由带走，冯自由只得老老实实地跟马湘走出会场。

国民党中资格最老的两个人物胡汉民、汪精卫二人也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怀疑和反对，汪精卫和胡汉民一道去向孙中山进言，对孙中山说：“联合共产党，就会像是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里一样，我们就没有安宁的时候了。”孙中山见自己的这批老同志都不理解自己的政策，便决定起用廖

仲恺，让廖仲恺来主持改组工作。

邓泽如、林直勉等一批资格较老的国民党员也向孙中山上书，反对三大政策，他们把孙中山想实行三大政策归结为是受了共产党的蒙蔽，在信中说：本党改组，虽然是出自我们总理的独自主张，但其中的组织法和党纲、党章的拟定则多是出自俄国党人鲍罗廷和共产党人陈独秀之手，今天，陈独秀率领他的党人集体来到我们党中，就是想借我党的身体，注入共产党的灵魂，将来会使我党受共产党人的指挥，革命成功，是共产党人的福；革命失败，是我国国民党人的祸。所以认为，联俄联共政策切不可行……

看了这样的信，孙中山非常生气，当即在信上一一批示：“党纲、党章的起草，是我请鲍罗廷君作的，我亲自加以审定的，原稿为英文，后由廖仲恺译为中文，陈独秀并不知其中之事，我党诸君切不可疑神疑鬼。”又批示道：“我国革命，历来为各国列强所不容，所以常常助反对我们的力量来扑灭我们，只有俄国才是真正地同情我国革命，如果联合之中有弊端，理当人人起来改变它，而不应该坐而论道，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

对孙中山的解释，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就是不听，他们甚至要再成立一个组织来反对改组国民党。

可是，孙中山痛感到自己三十多年革命的经历不会欺骗自己，他下定了决心，改组国民党的主意绝不变更。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到会代表一百五十六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人二十四人，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会议的主席。

大会开幕，大会秘书长刘芷芬请孙中山致开幕词，孙中山对这次大会终于能顺利地召开，感到无比欣慰，他还预感到大会中可能要遇到不少阻碍，便用凝重的语音说道：“我们这次大会只有十天，会期很短，我们要集中精力来研究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各人都要虚心，绝不能以无意识的问题来制造纷争，生出无谓的争论，耽误大会的时间。”孙中山说：“我们这次大会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改组国民党，第二件事是要用革命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从前，本党一直不能巩固成功的原因，不是敌人有什么大的力量来打败我们，而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常在自己的队伍中生出一一些误解来，致使全党的团结非常涣散，革命因此而常常失败……”

开幕词的最后，孙中山要求：“今天这个大会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的第一次，这次会议将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我要求与会诸君在这短短的十天时间内，把我们大会预期要做的事情做完，使我们这次大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革命的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就是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外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调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的压迫，“各民族有自决权”，在革命胜利之后，将组建一个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所谓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是少数人的民权。同时，宣言认为，凡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个人和团体，都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而凡卖国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则无

论其为个人还是团体，都不得享有自由和权利。所谓民生主义，就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制度操纵国民的生计。

大会进行期间，忽然传来了苏联国家领袖列宁逝世的噩耗，孙中山非常悲痛，决定休会三天，广州政府机关下半旗致哀。

大会结束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大会的宣言草案，草案中原来有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内容，有些代表顾虑到这些内容写入之后会刺激列强，主张删去，孙中山坚决主张保留，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保留了这些内容，大会最后选举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等二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十七人为中央候补委员，邓泽如等五人为中央监察委员。

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创建黄埔军校

孙中山在领导国民革命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实现革命的目标，必须有一支基本的革命军事力量，这也是苏联革命成功的基本经验。苏联革命成功之后，之所以能在各国列强的环伺之下，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有一支革命的基本军事力量在支撑着，这一条道理，当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不得不退居上海时就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因此，在讨贼军日益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时，孙中山就已经开始了创建军事学校的部署。在 1923 年的 2 月，苏联的全权特派员越飞来到中国时，孙中山便授意廖仲恺和越飞会谈，重点解决创办军事学校的事情。这之后，孙中山又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向苏联人学习创办红军的经验。8 月 5 日，孙中山正式决定，派蒋介石、瞿秋白、张太雷、王登云等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军事、政治等事务。代表团由蒋介石任团长，8 月 16 日从上海正式启程赴苏联，9 月 2 日到达莫斯科。孙中山给蒋介石一个明确的指令是：代表中国国民党，向列宁和苏联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希望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代表团到华南来，依照苏联训练红军的办法来帮助中国训练革命的军队，派来的人越多越好。第二个要求是，孙中山自己在适当的时候要亲自到苏联来考察苏联红军，希望苏联政府为孙中山提供方便。第三个要求是，此次中国派去的代表团在苏联可适当地多呆一些日子，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同商讨中国的作战方案，这一作战方案包括的内容很多，主要是如何巩固新生的广州革命政权，如何北伐以统一中国等等。

中国代表团在苏联期间，孙中山时刻关注着他们的行动和进程，随时与他们用电报保持联络，当得知中国代表团在苏联进展顺利时，孙中山非常高兴。由于叛军沈鸿英对广州的进攻，孙中山只得放慢了创建军校的计划，同时还忙里偷闲地给中国代表团去信去电报，要他们在苏联好好地学习人家的长处，不要急着回来。到了年底 10 月份的时候，孙中山一面忙于筹备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面还不忘记创建军校的事情，向临时组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创建军事学校的提案，这一提案经秘书人员具体化为“设陆军讲武学堂于广州”，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很快就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且决定将新成立的军事学校命名为“国民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亲自任校长。

在任命军校校长的问题上，孙中山早已胸有成竹，他暂时对由谁来当校长的问题不予表态，只是在最后将国民军官学校改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指定由廖仲恺和正在广州帮助孙中山工作的苏联人鲍罗廷两人共同筹划开办学校的具体事宜。在国民党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亲自选定了一个军校筹备委员会的人员名单，由蒋介石任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由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等人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

在军校的校址选择上，孙中山早已看好了一个绝妙的地方，它就是黄埔。黄埔是一个水中的孤岛，离广州还有四十里的水路，小岛方圆有四十里的面积，岛上林木葱茏，山峦起伏。岛上有长洲炮台，南边与虎门炮台相连接，是广州对外的第二个要塞。黄埔岛四面环水，远离城市，是个开办军事学校的好地方。再说，过去岛上也还办过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有一些基本的建筑可供使用，孙中山便建议用这块地方作军校的校址。

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在苏联共考察学习了三个月的时间，一回到广州，孙中山就让他开始筹办军事学校的工作。

筹备军事学校，不光要有教员，还要有大批的器材和枪械，岛上一无所所有，完全要凭筹备人员去各地置办。办事一是要人，要人这好办，只要蒋介石向孙中山开口，要谁都不成问题；可是另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钱，钱从哪里来？这是令蒋介石头痛的事情。当时在广州，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都各自把持着收税的权力，广州地方的大部分钱财都进了这些大小军事实力派人物的口袋，他们对于创办军事学校不但不支持，而且还拼命反对，除了粤军第二师师长李济深积极拿出三万元和一部分长枪以外，其他的桂军、滇军等将领答应了的枪枝和经费都不见踪影。一天，为了筹备即将要使用的经费，蒋介石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我军长范石生要钱，当蒋介石到了范石生的住处时，范石生恰好大烟瘾上来了，他一见蒋介石来到就有点烦，问他来干什么，蒋介石说，筹备军校要用钱，现在已经财力告尽了，请范军长支援一点。范石生还不等蒋介石把话说完，就冲着蒋介石发了一通火：“建什么军事学校，吃饱了撑的！就凭你们那么几个人能干什么？当心哪天我派一批弟兄去把你们连锅给端了！”说完话就自顾自地进屋抽大烟过瘾去了，弄得蒋介石进退不得，十分尴尬。后来还是廖仲恺到范石生那里才弄到了这笔钱，蒋介石感到奇怪：“怎么我去他不给钱，你去他就给钱了呢？”廖仲恺苦涩地笑笑说：“那些军阀老爷们，有一个坏脾气，在他们要过大烟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们，那时候去向他们要钱，不光要不到，还准得挨他们一顿骂，要在他们过足了烟瘾心情很好的时候才去向他们开口，这才有可能把事情办成。”

听了廖仲恺的话，蒋介石想：廖公果然有过人的才能，难怪孙中山那么器重他，从此后，他对廖仲恺更增加了一份敬畏。同时，蒋介石也感觉到，这个军事学校也真是棘手个难办的事情，他真想一甩手了事。

创建军事学校，孙中山仍然坚持他的三大政策，他始终认为，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他正式通过李大钊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请共产党派员来黄埔，帮助筹办军事学校。应孙中山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陆续选派了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张秋人、鲁易、包惠僧、高语罕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帮助工作。1924年3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正式选拔完毕，在第一期学员的六百多人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约六十人。这些人在黄埔军校中起着重要的革命作用，在后来的中国革命运动中，也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当黄埔军校筹备工作正在如期正常进行时，蒋介石忽然不辞而别，一个人跑到上海去了，临行时，他交代秘书王登云，发给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们一批路费，请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原来岗位上去。筹备处的叶剑英和邓演达坚决反对这么做，他们质问王登云：“谁下的命令？蒋介石自己在什么地方？创建军校是孙中山先生的意思，是经过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批准了的，蒋介石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要见廖仲恺廖先生！”可是当时正好廖仲恺到县里去开农民协会会议去了，邓演达和叶剑英坚持要等到廖仲恺回来再说。在他们二人的坚持下，大家都没有散去，一直等了三四天，廖仲恺才回到黄埔。廖仲恺对那些主张散伙的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们说：“你们都是获蒋先生邀请来做军校的筹备工作的，蒋介石中途走掉，这是不负责任的，是一个错误，你们如果真是爱蒋先生的话，就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而要坚持把这个工作

做好。我相信，蒋介石先生考虑好了以后，他还会回来的！我宣布：军校的筹备工作继续做下去！”

在广州的孙中山也接到了蒋介石临走时丢下的一封信，信中说：自己筹备黄埔军校，办事时处处遭受掣肘，无力将此事办好，现已将筹备处的一切事宜交廖仲恺先生代为处理，请求总理同意我辞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并请立即派人接办，等等。接到蒋介石的这一辞呈，孙中山很生气，立即在辞呈上批道：“革命工作在草创时期，总是有许多令人难以预料的困难，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艰苦中去奋斗，务必将事业办成，故不准辞职，请立即回到任上，继续工作。”

可是廖仲恺来向孙中山汇报说：蒋介石已经离开了黄埔，一个人到上海去了。孙中山坚定地对廖仲恺说：我创建军校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请你立即接手这一工作！

黄埔军校筹备处从1924年的3月份开始工作，历时三四个月，终于完成了草创期间的全部工作，廖仲恺请孙中山定一个开学的日子，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开学典礼就定在今年的6月16日进行！”孙中山选定这个日子，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人们所说的，要选一个吉利的日子，恰恰相反，这一天正好是陈炯明叛变二周年的纪念日。两年前，陈炯明用革命的军队来打革命的军队，炮轰总统府，把孙中山逼到了上海，革命成果差点儿被全部断送。孙中山要让大家记住这个日子，记住历史上这一沉痛的教训，今天创建新的军事学校，就是为了建设一支革命党人自己领导的军队，永远保住革命胜利的果实。

学校建成了，校长由谁来当？有的人建议由孙中山亲自当校长，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所军事学校，谁当了校长，将来就有了一大笔政治资本。校长一职是个可以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肥缺，因此许多人都削尖了脑袋要当这个校长。一时间，托人走后门的不计其数，甚至为了确定校长的人选，党内争得很激烈。

孙中山提议：“由蒋介石来当校长。”这个提议一说出来，立即有很多人反对。有的说：蒋介石在困难的时候丢下一大堆事务不管，临阵脱逃，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怎么还能让他来当校长呢？有的说蒋介石的能力不足以担当校长的大任，说来说去，就是要让自己来当校长。孙中山早已胸有成竹，他对蒋介石的才能是了解的，而且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别人都离开了广州，蒋介石却从上海跑到广州，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和自己在永丰舰上共同战斗，这说明蒋介石对革命是非常忠心的。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军事，也就是准备好了要让蒋介石来当军校校长的。见大家这么争来争去的，无非是想争点好处，孙中山坚定地说：“我的意见已经定了，如果不让蒋介石当校长，我宁可这个军校不办！”见孙中山这样果断，大家才不好再说话了。

1924年6月16日，现代中国第一个革命的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在孙中山的亲自主持下，正式开学。开学典礼这天，主席台正中央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黄埔军校的校训：“至爱精诚”四个大字，两边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养天地正气，下联是：法古今完人。学生们唱着军校的校歌：莘莘学生，至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

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至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本校精神，发扬本校精神。

学生们唱着黄埔军校的校歌，一律穿着中山装式的黄咔叽布军装，精神饱满地进入会场。说起中山装，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1923年上半年，孙中山在主持大元帅府的工作时，觉得中国旧式服装既不经济，又不适用，而要穿西装又很费钱，因为当时的西装毛料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很贵。孙中山便在“国民服”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的样式，改装成一种新式的服装，这种新式服装，既有西装的硬挺，又有中国人的特点，孙中山还将上衣的口袋做了改动，改成三个明口袋，大口袋做成“琴式”，这样可以装进去许多东西，笔记本和钢笔都可以装进去，便于装学习用具。后来，这一服装式样在全中国流行，人们便把这种由孙中山设计的服装式样称为中山装。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成立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讲，他对全体学员们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革命因为没有一支好的革命军而失败了，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将来还要永远地失败下去。今天在这里创建这个军事学校，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个军事学校创建出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来，你们这些学员的任务，就是要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冲锋陷阵，以挽救革命的危亡。”

孙中山要求军校的学员们要有“高深”的学问，所谓“高深”的学问，就是要认真学习革命的理论，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使三民主义得到最后的成功，那时候，中国才能在上同列强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能够永远地生存于人类。

在黄埔学校里，最早实行了政治工作制度，孙中山要效仿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设立教导团，并在各连各团委派党代表，主管政治工作。这一措施是黄埔军校作为革命的军事学校区别于其他军校的基本特点。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学校的党代表，先后派国民党的元老戴季陶、邵元冲等人任政治部主任。可是这些人对孙中山的动机并不了解，他们长期不到军校去，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后来，校长、党代表与苏联的代表会商，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派员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周恩来便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来到黄埔军校当了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在孙中山的亲切关怀下，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越办越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剿灭商团

广州革命政权的日益巩固，中国革命的形势飞速发展，使得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心中益发恐慌，他们总是要想办法颠覆中国的革命政权。当孙中山毫不犹豫地收回了海关关税的主权的时候，英国、法国、荷兰等帝国主义国家就想用武力来干涉，可是，最终还是没敢真的对革命政权发动军事进攻，他们先是努力扶持陈炯明，想利用陈炯明的叛军实力来推翻广东的革命政权。陈炯明几次对广州的进攻都以惨败而告终，令帝国主义者非常失望。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还要在中国努力寻找其代理人，寻找能够打败孙中山的力量。

功夫不负有心人，英国人终于在广州找到了一条忠实的走狗，这就是商团团长陈廉伯。

陈廉伯是广东南海西樵村人，出生于商人世家，清朝末年毕业于香港的皇仁书院，早年加入了英国的国籍。他的祖父叫陈启源，1872年就在家乡开办了继昌隆缫丝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陈廉伯16岁时就在英国帝国主义在华的最有实力的实业机关汇丰银行广州支行工作，凭着他的聪明和善于巴结，很快便飞黄腾达，当上了这家银行的中国买办。在陈廉伯当广州支行买办期间，他趁着清末民初政局不断变动的时机，四出投机活动，使香港银行发了大财，英国人对他非常赏识，陈廉伯个人野心也迅速膨胀起来。

陈廉伯不满足于捞几个钱，他要当政府的要人，他甚至想当中国的华盛顿。起先，他非常佩服陈炯明这个人，觉得陈炯明不光有兵权，还有学问，是广州的王，要想走上政坛，陈炯明是一个极好的阶梯。他以一个商人特有的精明，发挥出自己经商的聪明才智，和陈炯明拉起了同宗同族的情谊，借助于陈炯明在广州政坛上的地位，陈廉伯自己的名声也与日俱增，没费多大力气就实现了他的第一步目标。

接着，陈廉伯又干起了欺世盗名的勾当，他狠狠心，拿出了一大笔财产，钻进了广东赈济会这样的慈善团体内，由于他的慷慨大方，陈廉伯被大家选为广东省救济会的总理。后来，他又和桂系军阀陈炳昆拉上了宗族关系，竟然当上了广州商团的团长，地位一日数升，成了地方上的名流，竟然和省长齐名了。

商团本来是商人为了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是自己保卫自己利益的一种非军事化的组织，成立于1912年，参加的人大多数是资本家、商店老板、高级职员等。开始，商团只是“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地方公安”而已，对政府的其他事项，一概不问，即使是像捉到小偷这样的小事，也只是扭送政府警察局处理。自从陈廉伯当上了商团团长以后，情况便起了极大的变化，陈廉伯有目的地发展自己的实力，从他1919年当上商团团长时起，就从商团经费里拿出二百万元来，向加拿大政府购买了四千多枝步枪，商团的人数也迅速扩大，很快发展到十个分团，四千多人。

英国人看中了陈廉伯这股势力，他们给陈廉伯打气，对陈廉伯说：“你放心地干，尽可以和孙中山对着干。孙中山已经越来越走向赤化了，他迟早要和共产党人搞到一起去，那时候，受害的将是你们商人。只要有胆量和孙中山对着干，我们外国公使团支持你；如果你能用你自己的商团武装力量推翻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权，我们英国人就能帮助你组织起商人政府来。在国

外，政权总是由有钱的人来掌握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英国人帮助你组织起商人政府以后，你陈廉伯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华盛顿，将在全世界留下你的英名。”

英国人的一番打气的话，使陈廉伯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他的野心膨胀到了顶点，他决定要铤而走险了。

1924年的5月间，广州街面上经常出现一批古怪的军队，他们身穿黄斜布军服，脚上穿着大皮鞋，扎着绑腿，头上戴着硬边的军帽，身上背着长枪短枪，神气活现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大热天，他们武装整齐地在街上晃来荡去，也不嫌热得慌。他们这种装束既不同于粤军，也不同于滇军和桂军，更不同于地方警察部队，这些人就是商团军，隔老远地就能看到他们肩上那闪着黄光的“粤商团军”的黄色缎带。应该说明的是，这些人不同于政府军队的地方是，他们都很有钱，这些漂亮的军服都是他们自己花钱买来的，因为计划要在5月27日召开全省商团代表会议，所以他们都集中到了广州，这些人便在广州大街上耀武扬威起来。

5月27日，陈廉伯不通知政府，擅自决定在广州召开商团成立大会，大会有全省一百零八商埠的代表团参加，共有代表三百多人，成立了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陈廉伯自任总长，陈恭受、邓介石任副总长。会上还决定要购买武装巡洋舰，筹备设立商团兵工厂，在总部设立军事参谋部，还规定了商团内部上下关系中的特殊行文方式，全然是一种政府的和军队的组织方式了，陈廉伯的目标还不止于此，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推翻政府，在广州建立一个商人的政权机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陈廉伯以商团的名义，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了两批军火，第一批军火中就有步枪、手枪、机关枪等近一万枝，各种子弹达三百多万发，雇用丹麦商船哈佛号往广州运送。

8月9日，哈佛号把军火偷偷地运到广州，停泊在白鹅潭水面，准备偷运进广州。参加商团军的一位理发工人发现了这一只商船，立即向广州革命政府作了汇报。孙中山接到这一报告之后，非常警觉，派海军前去搜查这艘商船，查出了大批军火，孙中山指示：“全部封存，将商船开到黄埔水面上，由黄埔军校的武装力量来控制。”孙中山还指示廖仲恺，立即向广州社会各界发布公告，说明所扣的军火是什么样的军火，以免商团乘机在社会上制造混乱。廖仲恺于第二天便发布了《扣留商团私运枪械的布告》。

陈廉伯正是要向广州革命政府发动进攻，军械被扣留，虽然等于是被孙中山当头打了一棒，但也为他提供了向政府进攻的机会。于是他疯狂地开始向政府发动进攻。他一面发布公告说要辞去广州商团团长的职务，并说，在自己不担任团长职务期间，如果广州市内出现治安问题，本人概不负责，等等。同时，陈廉伯又向社会各界宣布联防总团将于8月13日正式成立。广州商团第九分团竟然在商团的大门上贴出了一副带有示威性的对联：“联团为自治机关，拯众生于火热水深，责无旁贷；武装即和平保障，举全粤之妖氛毒雾，一扫而空。”商团的一千多人还穿起他们的军服，整队来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请愿，要政府立即归还枪支，否则将从次日起，广州全市罢市。

孙中山正在会议室里召开会议，商量对付商团的事情，忽然听到外面乱哄哄的。胡汉民跑到窗口一看，大惊失色地说：“不好，商团闹事了！商团军来了一大批人！”孙中山对胡汉民说：“展堂，你惊慌什么？这些人来了，他们大都是不明真相的人，待我去接见他们，向他们说明事件的真相，他们自然会离开的。”听说孙中山要去接见商团军，大家都反对，怕会出危险。

可是孙中山却像没事人一样，从容不迫地走出元帅府大门。

大门外，商团军正与元帅府的卫士们相互对峙着，一些人在大声地鼓噪：“我们要见孙文！快叫孙中山出来见我们！归还我们商团的枪支！”卫士们则一个个紧握着手中的武器，对商团军怒目而视。

孙中山态度从容地走到大门口，对乱哄哄的人群挥挥手，人群很快便安静下来。孙中山说：“你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不用说我都知道，是要我还你们的枪支。请问，你们商团历来是以保护商团自身治安为宗旨的，你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武装力量，那你们又买进来将近一万支枪干什么？难道说，你们老板和每一个伙计都要有一支枪吗？你们都有了枪，谁还需要你们去保护呢？试问，商人人人有枪，谁来经商？要知道，私运军火是违法的，好好的商人都是守法的，政府没收这批军火，是因为这批军火是违法运进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商团团团长陈廉伯有着很大的野心，有确凿证据表明，他正在策划一个大阴谋，你们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孙中山说到这里，来到大元帅府前的一千多人中大多数人都沉默了，只有少数人还在大声地叫喊，可是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了。孙中山见人群已经沉静下来，许多人正在开始退出，便转过身，像来时那样更加从容不迫地走进了大元帅府，一场来势汹汹的纷乱，被孙中山几句话，就平息于无形之中。

陈廉伯决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他开始了有计划的行动。一方面，他们花重金买通滇军军长范石生和滇军二师师长廖行超，送给他们大批的钱和烟土，让他们出面调停，请他们在广州商团与政府的冲突中保持中立，范石生和廖行超果然贪图商团的钱财，默许了商团的请求。

8月18日，陈廉伯又煽动广州银行业罢市，拒收广州政府发行的纸币。8月20日，商团联防总部转移到广东佛山，陈廉伯和陈恭受龟缩在佛山对广州的商团进行遥控指挥。24日，广州商团还以广东商团全体团军的名义致电政府，威胁说要对政府采取行动，还在广州各地散发反动传单，制造混乱。孙中山指示广州革命军：对商团的叛乱行为要不遗余力地进行镇压。革命政府还逮捕了正在散发反动传单的广州商团第九分团的团长邹竟先，并对邹竟先这样的首恶分子立即处以枪决。

革命政府对邹竟先的处分决定，被商团军知道后，他们竟然胆大包天地要在革命政府行刑时劫法场，把邹竟先抢回来。广东省长廖仲恺指示：将邹竟先就地提前处决。陈廉伯等人又借此大作文章，公开辱骂孙中山。香港的英国人也按捺不住了，从后台跳到了前台，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竟然向大元帅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警告中国军队，不得对商民开枪开炮，否则英国人将对对中国军队采取行动。同时，英国人的九艘军舰开进了白鹅潭，大炮脱去了炮衣，炮口向着广州方向。

孙中山对外国人的干涉不屑一顾，他致电英国麦克唐纳政府，警告英国帝国主义者不要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并表示了中国政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孙中山要与广州商团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国民党中的右派和中间人却被广州商团和英国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力主和平解决商团的纷争。驻广州的滇军军阀范石生和廖行超等人因为受了商团的贿赂，也出来充当调停人的角色。范石生还私自和商团签订了和谈的协议，协议有五条：一是陈廉伯、陈恭受等人通电表示拥护大元帅，服从政府，政府发还陈廉伯等人被封存的财产。二是由范石生、廖行超负责发还商团的全部枪械。三是广州商

团联军应该改组，并应该受广东省省长的节制。四是各商店于8月29日全部开业。五是广州商团拿出军费五十万元等等。范石生等人作出这一调停之后，同时又给孙中山报告说：目前能做到这样已是万幸，如果政附不同意的话，广州势必要发生动乱，那时我们滇军只有全部开回广州，以维护广州的治安。言外之意就是说，到时候发生动乱，我们滇军是只管广州的秩序而不管谁是谁非了。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迫于帝国主义的壓力，见又有范石生等人的调停，便一致主张孙中山接受这一建议。孙中山虽然不愿意，但对此也无可奈何，便将处理广州商团的事情交给胡汉民主持，自己退出事外。

孙中山认为，广州调停之后，将会再度出现稳定的局面，革命的任务再次回到了北伐问题上，孙中山将广州的工作交代完以后，便带着妻子宋庆龄奔赴韶关，重建北伐大本营，为再度组织北伐而做准备工作。

陈廉伯以为革命政府软弱可欺，便进一步向广州政府施加压力，10月9日接受了广州政府发还的四千支枪以后，竟然以发还枪数不够为理由，在10月10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惨案”。这一天，广州市民庆祝双十节，游行队伍路过太平南路，商团军悍然对民众开枪，当场打死二十多人，还抓去了几百人。惨案发生以后，商团军在城里构筑工事，架设天桥，用铁栅封锁各大小街道，广州市内俨然成了一个战区。

孙中山在韶关接到广州的报告，立即给驻防广州的范石生发电报说：“商团叛乱已是事实，决不可再姑息养奸，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给以坚决的镇压！”孙中山立即从韶关大本营返回广州，组成平叛指挥机关——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任会长，任命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陈支仁、谭平山为革命委员会的全权委员。14日，孙中山正式下达平定商团的手令，将所有黄埔军校、飞机队、工团军等全部交蒋介石指挥，命令胡汉民和驻广州各军，立即收缴商团的全部枪械。警卫军在13日夜里返回广州，其他各部都在14日之前返回广州，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正式展开了。

15日凌晨，商团军首先向政府军开枪，革命委员会立即向早已准备好的各军下达总攻击令，久经战阵的革命军从各个地方向商团军发起了总攻。别看商团军平日里作威作福，可都是些享惯了清福的大少爷们，没有几个真正有胆子打仗的，革命军的枪声一响，早已吓得屁滚尿流，有的脱去军装，跑到亲戚家去躲了起来，有的干脆举手投降，前后不到几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商团军全部缴械，一场波及整个广州的商团叛乱没费多少周折就被平息了。事后，许多国民党中曾经坚持要和平处理商团事件的人也感到后悔：早知如此，早就应该对商团采取行动了。停泊在白鹅潭的英国军舰见中国的军舰都用大炮口对着自己，也吓得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走了。

粉碎商团叛乱，广州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孙中山进一步看到了革命力量的伟大，他决心再作一次努力，全面举行北伐。孙中山再度奔赴韶关大本营，筹划他伟大的北伐行动，他坚信，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

巨星殒落

北洋政府的曹锟贿选总统之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愤怒，军阀之间因为利益分配的不均也发生了内讧，1924年9月3日，浙江、江苏两省的军阀之间首先爆发了战争，孙中山认为这是北伐的又一个大好时机，9月4日，在大元帅府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北伐的军事行动计划。当时，有人认为，广州市内的反动商团正闹腾得厉害，先稳住后方要紧，至于北伐，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可是孙中山却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说：“现在，北方的反动军阀们正在互相攻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对军阀的痛恨已经非常之深，这时候再不去消灭军阀的势力，人民将会对革命政府感到失望了。”因此，孙中山在韶关大本营召开筹备北伐的会议，决定湘军、赣军、豫军全部投入北伐战斗中，滇军和粤军抽调部分队伍随行，谭延闿任北伐军总司令。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宣言中说：此次北伐，其作战目的不光是要打倒军阀，更重要的是要打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宣言中还列出了六条政纲，作为打倒军阀之后实现新三民主义的第一步。9月20日，北伐军在韶关大本营举行誓师大会，分两路从湖南、江西两省同时出发。

正在这样的時候，忽然从北京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冯玉祥将军在北京发动了“首都革命”，囚禁了伪总统曹锟，赶走了军阀吴佩孚。“首都革命”是这么一回事：当江苏浙江两省军阀发生战争的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又起大兵十五万，进入山海关，攻击曹锟和吴佩孚，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率兵二十万迎战奉军。正当直奉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却不声不响地秘密命令自己所属部队将后队为前队，一昼夜行军一百四十里，神速返回北京，沿途将电话线全部割断，10月22日晚上到了北京城外，事先与冯玉祥约好的北京卫戍司令孙岳打开城门，将冯玉祥的军队迎进北京，冯军不发一枪一弹就进入了北京城，将曹锟抓了起来，并重组了内阁。吴佩孚在山海关正在与张作霖作战，突然间腹背受敌，便仓皇地由塘沽登上军舰向南方逃去。

冯玉祥发动政变，说起来也与孙中山有一定的关系。冯玉祥原来就是吴佩孚的部下，但是对曹锟和吴佩孚的行径早就不满，在曹锟贿选总统的时候，孙中山派孔祥熙去北京给冯玉祥送去了自己写的《建国大纲》，请冯玉祥就这个大纲提出意见，并说，如果冯玉祥认为大纲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的话，可以任意地增删；如果冯玉祥对这个大纲没有意见的话，那这个大纲将来就是建国的纲领，就可以大家共同遵守。冯玉祥读了这个大纲之后，非常激动，对孙中山的建国纲领表示无条件地服从，并且通过马伯援向孙中山表示：我现在军力微弱，一旦兵力强盛，将会有所行动。在直奉战争期间发动了首都革命之后，冯玉祥立即向孙中山发出了邀请，让孙中山早日北上，到北京来主持国家大计。

曹锟、吴佩孚一垮台，张作霖正好率兵入关，段祺瑞也出来了，冯玉祥毕竟只是一个军人，政治斗争的经验不足，和奉、皖两系的军阀妥协，成立了由段祺瑞为主的临时执政政府。段祺瑞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也和张作霖联名发电报邀请孙中山上北京来商谈国家大计。

孙中山应该不应该北上？大本营里议论纷纷，大多数人说：军阀们反覆无常，没有多少信誉可言，特别是段祺瑞，是个老奸巨滑的政客，他对孙中山的邀请不会有什么好心的，都劝孙中山还是不要北上的好。可是孙中山对

他们说：“关于我个人的危险，我是不加计较的，我个人的生命到底有多少价值？要用大元帅的身份来看我的话，我就不能到北京去，因为万一我这个大元帅出了问题，你们就失去了指挥员；但是如果要用革命党的领袖来看我的话，那我就应该去了，革命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主义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现在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国家大计，我决计要去北京一趟！”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在《北上宣言》中，孙中山再次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宣言说：要实现国民革命，关键在于人民必须掌握武装，要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成为国民的武力。孙中山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由国民来决定自己的国家大事，反对军阀专政。次日，孙中山来到广州，从广州动身北上，临行时，广州九十六个群众团体热烈欢送孙中山北上，并送了一只刻有“定鼎中原”四个字的银鼎一座。孙中山在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我这次到北京去，就是要去宣传革命的主义，大家在广州要同心协力把广州这块革命根据地建设好，要团结现在南方的所有的革命力量，要坚定不移地开展北伐，把北伐军推进到武汉去，南北方同时响应，使革命的声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11月13日，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正式离开广州北上。当军舰开到黄埔时，孙中山还不忘黄埔军校的学员们，特地吩咐军舰在黄埔停靠下来，检阅黄埔学生的军事教学成果。孙中山在全体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学员们要“吃苦耐劳，努力奋斗，为革命的成功而不怕牺牲”。

11月17日，孙中山乘坐的日本邮船“春阳丸”号抵达上海，一万多人到码头上去迎接孙中山，欢迎的人还高呼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在上海小住几天之后，孙中山准备坐火车去上海，可是恰巧京沪铁路中断，只得改乘日本的“上海丸”轮，绕道日本后再去天津。12月4日，当孙中山乘日本“北岭丸”到达天津时，两万多群众自动集合到码头上热烈欢迎孙中山。

从离开广州北上开始，孙中山就感到身体不适，从日本到天津，轮船一路颠簸，孙中山的肝病开始发作了，可是，面对天津几万欢迎的群众，孙中山依然坚持步行，并且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挥帽致意。当天下午，孙中山就带病去看望了张作霖，和张作霖谈了两个多小时，回到住处之后，当晚便肝病大发作，痛得浑身颤抖，医生嘱咐孙中山必须卧床休息。

第二天，关外大帅张作霖开了二十多辆汽车，率领一百多名卫士，到孙中山住的张家花园回拜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张作霖，张对孙中山说：“我决心追随先生，愿作先生的卫队长。不过先生的主张中，有不妥之处，那就是反对外国列强这一说法，只要孙先生放弃这一主张，我愿意代替你向外国人疏通感情，使外国人同情我们，支持我们。”孙中山见张作霖就是这么个主张，非常生气，现在他才知道，军阀们是靠不住的，他对张作霖也彻底失望了，便推说病痛，不发一言，不理张作霖。

就在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时，北京的政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段祺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他对外国人丝毫不敢得罪，急切地向外国人表示：自己的政府是“外崇国信”的，对历年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是承认的，并表示准备召开善后会议来解决这些国际问题。

对段祺瑞的媚外政策，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第四次发表了关于时局的主张，表示支持孙中山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做法，反对所谓的“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人民集

体行动起来，反对段祺瑞，积极开展斗争，强烈要求孙中山早日到北京来主持国民大计。在全国上下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也不得不假惺惺地派出叶恭绰和许世英到天津来请孙中山早日到北京来。

当叶恭绰和许世英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时，孙中山问他们：“听说你们准备接受和承认外国人的全部条约，有没有这回事？”许、叶二人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只得承认说有这么回事。孙中山勃然大怒：“我们国民党人在外面努力奋斗，为的就是要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你们却偏偏要承认这些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既然怕外国人，还来要我到北京去干什么！”由于一气一怒，当天晚上，孙中山的肝病又一次急性发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孙中山觉得病情好了一点，于是在1924年的除夕，孙中山抱病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

北京车站，人山人海，学生、民众、各界代表几万人把北京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车站上空迎风飘扬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两幅大标语，孙中山睡在卧铺车厢里，已经不能起来了，但是当他看到人民欢迎自己的盛大场面时，他再一次激动得心潮澎湃，他坚持着走出卧铺车厢，缓步徐徐走过人群，一面向群众慢慢招手。看着孙中山的一脸病容，许多人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这时候，孙中山很想再向人群发表一次演说，但是，他的精力已经耗尽了，他已经再也没有力气发表演讲了，只得写了一篇讲稿，请人代读：“我这次来北京，前日早已有过宣言，我不是来争地位的，而是为了救国来的。十三年前，我负着推翻满洲政府、使国民享有平等自由的责任，可是满清政府倒台后，国家被军阀们所把持，人民仍然生活在痛苦之中，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地位，我们的责任并没有丝毫的减轻，我们还要继续奋斗。至于救国之道，一时难以尽言，今天我身患疾病，不能对诸君一一详述，待来日再和大家细谈……”

在北京住了一二十天以后，孙中山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手术之后，医生们发现，孙中山已经是肝癌的晚期了，治疗已经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孙中山一再追问医生：“我到底是什么病？请你告诉我，我也是个医生，请不要隐瞒。”医生先是不忍心告诉他，后来见孙中山十分坚决，只得对他说：“请孙先生准备立遗嘱吧。”1925年2月18日，因西医治疗无效，孙中山从北京协和医院转到铁狮子胡同，改用中医治疗，还是不见起色，孙中山感到，自己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便口授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爱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接着，孙中山又用英语口授了致苏联的遗书，由鲍罗廷、陈友仁、孙科和宋子文作笔记。

在弥留之际，孙中山还听到了广州革命军队东征陈炯明的胜利消息，得

知了黄埔军校的学生在东征陈炯明战斗中立下的功劳，他非常欣慰，指示胡汉民，要爱护黄埔军校的学生，不要让他们多上前线，要保留这些革命的种子力量，宁可丢掉一个营，也不要丢掉一个军校的学生。孙中山的这个嘱咐传到黄埔之后，军校的学生们个个噙着眼泪，痛悼敬爱的孙先生。

1925年3月12日上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孙中山先生离开了他生死与共的战友，离开了最爱他的人民，离开了最爱他的妻子宋庆龄，走完了一个民主革命者一生的光辉的道路。孙中山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全国各界人民痛悼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1938年延安人民集会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的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写了三副对联，其中一副是：

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孙中山逝世后，按照孙中山的遗愿，1926年6月1日，中国国民党将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运到南京，安葬在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园。这就是今天尽人皆知的中山陵。

孙中山年谱简表

- 1866年（清同治五年） 诞生
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
- 1867年（清同治六年） 一岁
是年9月5日，早年赴美国当华工的叔父孙观成在国外病逝。
- 1869年（清同治八年） 三岁
10月9日，孙中山的祖母黄氏病故。
-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 六岁
是年，开始参加劳动。孙中山后来自称“生而为贫困家之农家子”，“早知稼穡之艰难”。
- 1876年（清光绪二年） 十岁
是年，入村子里的私塾读书。课余时间参加打禾、插秧、除草等劳动。
- 1877年（清光绪三年） 十一岁
在村塾读书。
- 1878年（清光绪四年） 十二岁
6月，至其兄孙眉在茂宜岛前荷蕾所开设的商店里协助店务，学习记账、珠算等。后入盘罗河学校补学算术。
- 1879年（清光绪五年） 十三岁
9月下旬，入火奴鲁鲁（当时华侨又称作檀香山正埠）英国基督教监理会主办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学习西文、社会、政治演说、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英语、圣经等科目。
- 1882年（清光绪八年） 十六岁
7月27日，在意奥兰尼学校毕业。
秋，入火奴鲁鲁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读书。
- 1884年（清光绪十年） 十八岁
4月15日，入香港英国当局所开办的中央书院（1894年改为皇仁书院）读书。
11月，接其兄孙眉函召，在香港停学，再赴檀香山。
-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 十九岁
4月，自檀香山经日本回国。
5月26日，在翠亨村与卢慕贞结婚。
8月，往香港中央书院复学。
-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 二十岁
夏，在香港中央书院毕业，决定学医，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华南医学堂读书。
-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 二十二岁
3月24日，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病逝。
-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 二十四岁
是年，曾致书香山县退职官僚郑藻如，主张学习西方进行改良，提出兴农桑、禁鸦片、办教育三项建议。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志趣相投，倾慕洪秀全，被人视为大逆不道，称为“四大寇”。
-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 二十五岁

10月20日，子孙科出生。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 二十六岁

3月13日，在香港成立辅仁文社，以“尽心爱国”为座右铭，以“开通民智”为宗旨。

7月，在香港西医书院应第五学年考试，在此之前，连续五年获全年级第一。

12月，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医术精湛，尤擅长外科和肺病专科。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 二十七岁

春，改赴广州行医。

冬，与陆皓东、郑士良等八人集会于抗风轩，提议创设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 二十八岁

6月，上书李鸿章，全文达八千余字，主张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提出改革教育制度和培养人才的主张；认为建设国家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11月24日，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主张资产阶级革命的小团体“兴中会”，通过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到是年冬天，会员发展到一百多人。

1895（清光绪二十一年） 二十九岁

1月，由檀香山赴香港，回国策划武装起义。

3月16日，和杨衢云等在香港再次开会，讨论起义计划，打算以突击的方式占领广州。

10月26日至28日，广州起义被香港英国当局察知，乘轮船逃出广州至唐家湾，改乘轿子到澳门。

12月，截断发辫，改装赴檀香山。同年，长女孙姪出生。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三十岁

3月4日，香港英国当局发布对孙中山的驱逐令。

4月，在檀香山遇其老师康德黎，相约去英国，在伦敦相见。

6月，抵美国。

9月23日由美国纽约赴英国，30日到达英国利物浦。

10月11日，被清朝驻英国使馆人员绑架，囚禁于使馆中，准备偷运回国杀害。

10月18日，在英国老师康德黎及多人的营救下，终于获救，被释放。

12月以后，经常往大英博物院图书室，研读书籍，探求救国真理。

冬天，撰写出《伦敦被难记》。是年，次女孙婉出生。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三十一岁

7月2日，离伦敦赴加拿大，11日到达蒙特利尔，又赴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在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三十二岁

春天，在日本东京进行革命活动，并在长崎、神户、马关等地吸收华侨参加兴中会。

秋天至冬天，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赴日本，孙中山在日本与康、梁多次会谈。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三十三岁

春至夏，往返于日本的东京、长崎、横滨等地，宣传革命，再次策划武装起义。

夏秋之间，在日本与梁启超等在横滨继续就合作问题进行多次交谈，一度有成立联合会的计划。

11月26日，清政府下令缉捕兴中会的重要成员及多名会党首领。

11月，兴中会邀哥老会、三合会各会首领在香港集会，议定三会结成一个团体，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

12月22日，孙中山为自己亲手编绘的《支那现势地图》作跋。该地图于第二年7月在东京正式发行。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三十四岁

春夏之交，孙中山鉴于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蓬勃发展，决定把握时机，加紧在广东策划起义。

8月22日，自日本横滨秘密乘轮船赴上海，计划先由江苏、广东、广西等南方六省宣布独立，全国响应，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

10月6日，郑士良以会党为主力军，在惠州发动起义，孙中山在台湾积极筹备饷械，并准备内渡亲自指挥。

10月22日，起义军转战多时，后遭清军围攻，加之粮饷不够，郑士良宣布起义军解散。

冬天，孙中山总结此次失败的教训，在日本苦心攻读军事著作。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三十五岁

春，赞助留日的粤籍学生郑贯一、冯自由、李自重等组织广东独立协会。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三十六岁

春，在日本横滨热情接待章炳麟，与章讨论改革土地、赋税制度等问题，提出了制定法律按人口分配土地的设想。

是年，孙中山在东京嘱留日学生刘成禺撰《太平天国战史》，充作反清宣传品。该书于1904年在东京发行。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三十七岁

5月，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孙中山评价此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

8月，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革命军事学校，以日野为校长，聘请退役的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入学者约四十人，孙中山主持宣布实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后孙中山离日本，该校不足半年因内部纠纷而停办。是月，接待来访的留日学生廖仲恺、何香凝等，畅论革命救国的道理和方法。

9月26日，离日本赴檀香山。

12月上旬，至火奴鲁各岛，到各戏院发表演说，反对保皇理论。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三十八岁

1月11日，为与保皇党争夺群众，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受“洪棍”之职。

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于长沙，黄兴被推为会长，入会者有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谭人凤等五百多人。

5月，在美国旧金山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鼓吹反清革命。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三十九岁

春，在英国伦敦会见严复，与严复辩论，不同意严复关于“改革中国政

治应从教育入手”的主张，而坚持认为革命才是改革中国政治的良方。

夏，自英国转赴德国，在柏林向留德学生宣传民主革命的主张，吸收二十多人加入革命组织。

7月下旬，经日本人宫崎寅藏介绍，与黄兴会晤于东京凤乐园，建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同致力于革命，黄兴表示赞同。

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全国内地有十七省代表到会。孙中山主张各团体联合，大家表示无异议，最终将名称定为“中国同盟会”，后定誓词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志不渝，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

9月1日，廖仲恺、胡汉民等六人加入同盟会。

11月29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正式发行。

12月4日，留日学生八千余人，为抗议日本内阁文部省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实行总罢课，陈天华愤于日本报纸对中国留学生的诋毁，于8日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四十岁

6月，孙中山离日本到新加坡，命胡汉民为新加坡同盟会分会起草会章，扩充组织，入会者极多。

秋冬间，与黄兴、章炳麟等人制订同盟会《革命方略》，其中包括对同盟会纲领的解释。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四十一岁

4月，准备在广东的潮、惠、钦、廉四府同时起义，令胡汉民往香港做策应工作。

5月，潮、惠、钦、廉四府先后发动了武装起义，均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7月6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义于安庆，战败被捕，英勇就义。

7月13日，同盟会员（亦为光复会员）秋瑾准备响应徐锡麟的起义，被清政府逮捕，被杀于绍兴轩亭口。

9月1日，命王和顺起义于钦州王光山，9月中旬，因给养问题，退至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四十二岁

2月，清政府议定，再加十万赏银，悬赏捉拿孙中山。

4月1日，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在仰光建立同盟会分会。

4月30日，黄明堂、王和顺等按孙中山的要求，从镇南关将起义队伍带到云南，发动河口起义，起义军势力发展甚快。

5月5日，孙中山发电报，委任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命黄兴赴前线督师。后起义失败。

12月7日，赵声、朱执信等策划在广州起义，因秘密泄露而导致起义破产。

年底，同盟会河南分会在开封成立。

1909年（清宣统元年） 四十三岁

5月上旬，同盟会南洋支部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由新加坡迁至槟榔屿，不久，胡汉民赴香港，支部事务由邓泽如主持。

8月7日，孙中山到伦敦。

10月30日，离伦敦赴美国。

12月16日，由美国纽约至波士顿，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和捐款。

1910年（清宣统二年） 四十四岁

1月21日，由纽约赴旧金山，途经芝加哥，出席欢迎大会，发表革命演说，并成立同盟分会。在华侨中募得款项港币八千多元，电汇至香港，供同盟会南方支部作起义经费。

1月29日，黄兴自日本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因事先准备不周，起义军孤立无援，起义失败。2月16日，建立旧金山同盟会分会，加盟者十余人，孙中山亲自主盟，将誓词中革命宗旨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加盟者签名自称“中华革命党党员”。

4月4日，出席在火奴鲁鲁荷梯里街戏院举行的欢迎大会，发表演说，鼓吹再次起义。

7月19日，孙中山母杨氏病逝于香港。

1911年（清宣统三年） 四十五岁

1月18日，黄兴抵香港，受孙中山委托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

4月8日，广州起义统筹部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在广州设秘密据点三十八处，统筹部认为：广州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预定于4月13日在广州发动起义，拟定了十路进军的战斗计划，由赵声和黄兴为革命军的正副司令。

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因实力悬殊太大而失败，事后收殓七十二名烈士遗体，合葬于黄花岗，此次起义又被称为黄花岗之役。

7月31日，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总会，宋教仁被推为总务干事，发布了宣言和章程，准备在长江流域各省组织起义，南京、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省也相继成立分会。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10月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全城，湖北革命党人同日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

10月28日，黄兴自香港经上海到武汉，出任革命军总司令，领导汉口保卫战。

10月31日，孙中山致电荷马李，指出黎元洪的突然成功可能会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各地组织皆寄希望于我来领导，我若得到财力支持，绝对能控制大局，在我们抵达之前，不可能组织起强有力的政府，所以，借款是必须的。

11月24日，由马赛乘船回国。

12月26日，在上海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被商定为大总统人选。

12月29日，被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致电各省代表和都督、军司令长的电文中表示接受，准备赴南京就职。

1912年（民国元年） 四十六岁

1月1日，由上海赴南京，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晚十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誓词为：“颠覆满洲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另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提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

1月3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议通过孙中山提名的各部总长、次长任命名单，黄兴为陆军总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伍廷

芳为司法总长，胡汉民为秘书长等，代表会议还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1月5日，发布《孙大总统对外宣言》，表示革命军兴后，凡清政府对外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所借的外债和出让的权利，民国一律否认。

1月15日，致电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表示：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我立即宣布解职，让首功于袁氏（指袁世凯）。

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

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并推荐袁世凯代任。

2月14日，临时参议院开会，接受孙中山的辞职，讨论临时政府的设置地点，以多数通过设在北京。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任唐绍仪为内阁总理。

4月2日，临时参议院正式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4月4日，孙中山答上海《文汇报》记者问，认为：政治上的革命如今已如愿以偿，后当竭力从事社会上的革命。9月11日，袁世凯持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权”，孙中山接受。

1913年（民国二年） 四十七岁

2月10日，乘轮船“山城丸”号自上海启程赴日本考察。

3月6日，在国民党横滨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注重党纲党德。

3月20日，袁世凯指使暴徒枪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

3月22日，孙中山致电国民党本部，要求查明杀害宋教仁案真相。

3月24日，杀害宋教仁案查明，系袁世凯所指使。

4月26日，与黄兴联名通电，呼吁各界人士负起责任来，要对杀害宋教仁案的凶手予以严办。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举兵讨袁，“二次革命”开始。

7月15日，南京宣布独立，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1914年（民国三年） 四十八岁

1月10日，派陈其美赴大连设机关，联络东北各省力量讨袁。

3月下旬，袁世凯派两名刺客由釜山前往日本，企图暗杀孙中山。

5月10日，《民国》杂志创刊于东京，各期内容均以反对袁世凯为宗旨，中华革命党成立后，该刊即为该党的机关刊物。

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被选举为总理。9月1日，中华革命党本部通知党员，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所有国内外国民党组织未经解散者，一律改为中华革命党。

9月20日，在东京主持召开关于制订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的第一次讨论会，参加者有廖仲恺、胡汉民、居正、许崇智等人。

10月10日，朱执信由南洋抵香港，与邓铿策划在广东发动反袁武装斗争。

1915年（民国四年） 四十九岁

2月5日，邓铿受孙中山派遣，由日本抵南洋宣传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意义。

2月11日，孙中山之兄孙眉病逝于澳门。

3月10日，指示党务部发布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的交涉真相，把袁世凯的卖国勾当与复辟帝制阴谋联系起来，号召革命党人坚决进行反袁

斗争。

4月4日，袁世凯下令，严加通缉“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革命活动”。

夏末，召集廖仲恺等各部长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密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等地筹设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北军军部。

10月25日，与宋庆龄在东京结婚。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以唐继尧为都督，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护国战争开始。

年底，孙中山发函海外各埠洪门，促其各自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

1916年（民国五年） 五十岁

1月6日袁世凯公开称帝。

2月24日，委派冯自由等前往南洋、澳洲等地，募集讨袁军饷。

5月9日，在上海发表二次讨袁宣言，追溯袁世凯的窃国行径和几年来的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指出这次反袁斗争不光是打倒袁世凯就完事，袁世凯破坏民国，是从破坏约法开始的，这次反袁斗争，就要维持民国，维持约法。

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杀死。

7月25日，指示中华革命党通告国内外各支部，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就职，推翻专制、重造民国的目的已经达到，各省革命军可以停止军事行动。

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

1917年（民国六年） 五十一岁

2月21日，在上海写成《会议通则》（又名《民权初步》），阐述了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有关会议的各项细则。

3月30日，中华革命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称，向党员发出通告。

6月10日，再与章炳麟联名致电黎元洪、伍廷芳，希望他们清除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势力。

6月14日，派胡汉民赴粤联络讨逆护法力量，胡于是日到达广州，同广东督军陈炳昆等进行商讨，广东省长朱庆澜赞成出师讨逆。

6月23日，在上海积极运动海军护法，当晚在哈同花园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等“会商大计”。

6月，为日本政府扶持段祺瑞等北洋军阀，致函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提出了批评和劝告，希望日本政府有一个表示援助正义的态度。

7月3日，就张勋复辟事，通电全国，南下护法，讨伐叛逆。

7月6日，为进行护法活动，乘“海琛号”军舰由上海到广州，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炳麟等人同行。

7月19日，与陈炳昆、朱庆澜等商讨邀请国会议员来广东召开国会和组织护法政府问题。

7月20日，在驻粤的滇军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再次揭露复辟真相。

8月5日，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舰队南下抵黄埔，孙中山在全省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阐述护法的意义，号召讨伐段祺瑞，拥护国会。

8月10日，致函邓泽如及南洋革命党人，告诉他们护法运动进展良好，令其积极筹备军饷以备用。

10月6日，南北两军战于湘南衡山、宝庆一带，护法战争开始。

11月15日，命海军炮击广东督军驻地观音山，以驱逐陈炳昆。程璧光拒绝执行。

1918年（民国七年） 五十二岁

1月1日，发出大元帅令，勉励全国军民在新的一年里，奋发前进，勘定内乱，恢复和平。

1月3日，为惩罚桂系军阀莫荣新，令豫章、同安两舰炮击观音山督署。

2月22日，宴请广东商界人士，演讲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认为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最富的国家，又是政治上最优秀的国家，勉励大家积极参与建设的事业。

3月23日，通告各国驻华公使，痛斥北方政府的罪行，并郑重声明，北京政府违背约法而与各国缔结的一切契约借款及其他责任，本军政府一概不予承认。

4月2日，分别致电陈炯明和唐继尧，令其阻止桂系军阀及政客非法改组军政府。

4月17日，军政府向日、美、法、意、俄、英、葡等十六国发出通告，要求各国承认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之合法政府。

4月下旬，唐继尧密电西南各省，积极策划迫孙中山去职。

5月4日，向非常国会辞大元帅职并发表通电。

5月12日，莫荣新诱捕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并将陆军次长崔文藻枪决。

6月26日，抵达上海，住法租界内，段祺瑞欲从租界引渡孙中山，未得逞。

夏天，电贺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愿意使中俄两党团结起来共同斗争。

8月31日，陈炯明援闽粤军占领漳州、南靖、漳浦、同安等县。

12月30日，写成《孙文学说》自序。

1919年（民国八年） 五十三岁

1月6日，北洋政府自动取消通缉孙中山的命令。

1月9日，被军政府推选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

2月4日，覆函陈炯明，告诉他和议难成，要他整顿粤军内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2月7日，拒绝出任巴黎和会代表的职务，并给广州谢持去电报，告诉他自己拒绝出任和会代表的原因。

2月18日，覆函梅培，告诉他自己已经派杨仙逸（返粤的旅美飞机驾驶员）等赴汕头帮助粤军发展空军事业。

4月1日，覆函杨庶堪等，揭露北京政府图谋陕西、四川两省的阴谋。

4月6日，覆函许崇智，嘱其固守原防区，认真训练好军队。

5月28日，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指出要想和平救国，只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的一条路。

6月，在上海与戴季陶谈话，论及有关社会劳动问题和当时社会思潮状况，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和生活还没有发达，人民知识没有普及，国家的民主的建设还没有基础，这种时代是思想动荡时代的共同特点。

6月29日，覆函湖南的廖湘云，指出护法各军不应为利益而争，而要团结一致。

8月1日，指派由廖仲恺、朱执信等创办的《建设》杂志在上海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指出：创办该刊的目的是鼓吹建设思潮，广泛宣传国民党的主义，使之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认识，万众一心地建设一个富强、发达的国家。

10月8日，在上海青年会举行的武昌起义八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的办法都是救国的途径之一，但不是救国的根本方法，今后要改造中国，唯一的方法就是革命，要彻底地挖掉旧社会的基础。

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了规章，要以巩固共和、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

1920年（民国九年） 五十四岁

2月17日，致电唐继尧，望其出师讨伐桂系军阀。

4月2日，召见蒋介石商谈福建、广东两省军事，命令蒋介石到漳州粤军总部去协助工作。

4月16日，中国国民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一步否认军政府在法律上的效力。

5月16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发表演讲，指出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个假招牌，将来应有一番大的革命，并尖锐地批判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谬论，认为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只有在全国人人都化为革命党的时候，才有真的中华民国。在革命未成功时，要用革命的党来维持。

6月2日，在上海与唐继尧、伍廷芳、唐绍仪及云南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应付时局的办法，决定由四总裁发表联合声明，否认军政府在广州的国会。

6月3日，四总裁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军政府为桂系军阀所把持，声明为贯彻护法的主张，将军政府移往云南，主张恢复南北议和。

6月29日，派朱执信、廖仲恺到漳州促陈炯明率军返粤讨桂，并声明经济援助可由上海国民党本部承担。

8月12日，粤军在漳州誓师，分三路回粤讨桂，20日，占领汕头，21日，收复潮安。

9月16日，朱执信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回粤联络国民党旧部和民军响应讨桂军事行动。受朱执信的策动，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于当天宣布独立。

9月21日、朱执信为调停虎门驻军与东莞居民的冲突，在虎门牺牲。

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桂军逃往广西，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要他不惜全力支持陈炯明所部粤军。

10月31日，四总裁再度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所谓南北统一的伪令，声明说春煊早已丧失地位和资格，而军政府依然存在。

11月1日，致电陈炯明、许崇智等，指示他们速调全军进省，先安定广东省的大局，再处置后方的穷寇。

11月4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上作修改章程的报告。

11月9日，在上海国民党本部会议上发表演说，为训政作解释，说明革命党人应担负起教育民众的任务的理由。

11月10日，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1月28日，经香港抵达广州，在广东省署宴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国家统一的方法是实行民治。并大力赞许俄国的革命方法。

11月29日，重组军政府，举行第一次政务会议，推定各部人选，自兼内务部长，唐绍仪兼财政部长，伍廷芳兼外交部长，唐继尧兼交通部长，陈炯明兼陆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等。

12月1日，四总裁再次发表声明，宣布军政府继续执行职务，将以护法诸省为基础，地方自治，普及平民教育，发展实业，刷新吏治。

12月6日，四总裁第三次发表声明，谴责北京政府破坏和平。

1921年（民国十年） 五十五岁

1月1日，在军政府举行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在护法，但护法已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广东此时有建立正式政府的必要。

1月21日，外国使团将关税二百五十万余两银划归北洋政府，孙中山令军政府在28日通知沙面各国领事，声明决定收回海关主权。

2月1日，在广东省中国国民党支部成立会上讲话，阐述三民主义。

2月18日，改组广州市政府，由军政府直辖。

3月6日，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发表演讲，论述三民主义的内容，认为目前中国只是个半独立国，希望建成一个大民族主义国家。

3月16日，与军政府各总裁联名通电，反对北方违法选举总统，指出徐世昌只是非法国会所选出的非法总统，无权召开国会。

4月2日致函康德黎，请其协助在英国出版自己的《实业计划》一书。

4月7日，国会非常议会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广州数十万市民举行大会热烈庆祝，并结彩游行。孙中山发表就职演说。

同日，致电徐世昌，指出徐世昌只是承平时一个俗吏，要他早日引退，不要当什么总统。

5月11日，陈炯明请辞去陆军、内政部长两职。

5月28日，命粤、赣、滇、黔各军准备讨伐陆荣廷，以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

6月17日，致电美国政府总统哈定，促其承认广州新政府。

6月27日，正式下令讨伐陆荣廷。

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7月15日，粤军攻克平南，讨伐桂系战争顺利进行。

7月20日，派廖仲恺、何香凝等赴梧州劳军。

7月，在广东教育会上对中等以上学校职员和学生发表演讲，勉励他们立志救国，并阐述三民主义的要旨。

8月4日，粤军占领南宁，陆荣廷逃往龙州。

8月13日，滇、粤、赣各军攻克桂林。

8月28日，覆信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信中首先说明这是从苏俄那里收到的第一封信，并向齐契林叙述了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历程，认为自己过去辞职是一个大的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一样，袁世凯很快就恢复了帝制。并且提出了要和俄国保持通信联系的意见。9月3日，为援桂凯旋、准备北伐的将领举行宴会，发表演说，指出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可。

10月15日，乘军舰出巡广西，准备取道湖南北伐。北伐军三万在当天

开拔。

10月17日，到梧州，电召陈炯明来梧州商谈北伐问题，陈炯明托同不至。

11月8日，在梧州与陈炯明会晤。

11月上、中旬，在梧州国民党员会上发表演讲，批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理论，要求大家反向“革命军起，革命党成”方向去努力。

11月15日，离开梧州前往桂林。

12月4日，到桂林，在桂林设立北伐军大本营。

12月10日，在桂林对滇、粤、赣三军军官作《军人精神教育》的讲话。

12月21日，宋庆龄率红十字会会员到达桂林。

12月23日，在桂林会见经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商谈多日，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项建议，一是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是要建立革命的武装中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十分赞成这些建议。

1922年（民国十一年） 五十六岁

1月9日，在桂林以大总统的名义宣布徐世昌罪状。

1月19日，吴佩孚派专使黄申芑到广东会晤陈炯明，陈炯明表示可以同吴合作。

2月3日，以大元帅名义发动员令，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

2月12日、20日，张作霖、段祺瑞分别派人到广东，与孙中山商讨合作讨伐直系军阀事。

3月16日，赵恒惕拒绝北伐军过湘，北伐计划受阻。

4月8日，大本营由桂林迁回广东，孙中山指令各军集中梧州待命。

4月12日，陈炯明调动军队，企图阻止北伐军回师广州。

4月16日，到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北伐军改道出师江西，将北伐军大本营设在韶州。

4月18日，廖仲恺由梧州会见陈炯明，劝陈赴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陈拒不同意前往。

4月21日，下令免除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内务部长职务。陈炯明当晚召开会议，偕同粤军总部人员退居惠州。

5月4日，以大元帅名义声讨徐世昌，并下令北伐。

5月5日，广州各界举行集会游行，庆祝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一周年。

5月8日，大本营发布总攻击令，北伐军分三路向江西进攻。同日，为争取陈炯明北伐，任命陈炯明的部将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

5月26日，叶举向孙中山提出无理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原职并撤销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职务。

6月1日，应廖仲恺的请求，从韶关返回广州。

6月2日，巡视白云山，发现陈炯明的部下谋反的意图。

6月6日，就徐世昌辞职发表对外宣言。

6月13日，北伐军占领赣州，查到陈炯明意图与吴佩孚夹击北伐军来往密电三件。

6月14日，廖仲恺应陈炯明邀请前往惠州，至石龙时被扣留，押到石井兵工厂囚禁。

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四千多人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出走，登海军的

楚豫舰，移往永翔舰。同日，宋庆龄亦脱险。

6月17日，转登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在军舰上发炮攻击叛军。

6月20日，海军将领温树德率四艘军舰逃离黄埔，广州江海防司令魏邦平与叛军妥协。

6月27日，北伐军决定以第二军、滇军朱培德部、李福林部及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部回粤讨伐陈炯明。梁鸿楷部中途抗命，反往惠州与陈炯明会合。

7月1日，拒绝陈炯明的假和解。

7月2日，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各部均进入广东，决定攻取韶关。

7月5日，陈炯明托人上永丰舰，意图使孙中山自动下野，然后自己也辞职，孙中山严辞拒绝。

7月8日，温树德为陈炯明收买，率永翔、海圻、海琛、肇和四舰投降陈炯明。孙中山命其余各舰掩护长洲要塞。

7月10日，进泊白鹅潭。

7月19日，叛军用鱼雷攻击孙中山的永丰舰，不中。

7月29日，北伐军讨伐陈炯明的队伍在韶关失利，全线退却。

8月6日，北伐军连续失利，分别退至江西、湖南边境。

8月9日，乘英国炮舰“摩汉号”离开广州赴香港。

8月14日，到上海。

8月15日，在上海发表宣言，揭露陈炯明叛乱经过。

8月23日，李大钊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

8月下旬，会见苏俄全权大使越飞。

9月4日，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会议。

10月6日，北伐军许崇智部攻克古田。

10月10日，为蒋介石作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

10月25日，任命邹鲁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并派邹鲁赴广西联络滇桂各军讨陈。

12月16至18日，再次召开会议，审查中国国民党改进案宣言和党纲党章。12月26日，受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的中央直辖军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沈鸿英、第二路军总司令刘震寰等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会议，即“白马会盟”，讨论讨伐陈炯明的事宜。

12月30日，义军黄明堂部攻克灵山，并向廉州进攻。滇、粤、桂联军会师梧州，誓师东下讨陈。

1923年（民国十二年） 五十七岁

1月1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

1月2日，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次日又公布《中国国民党总章》。

1月11日，派廖仲恺赴上海，与国民党各省支部代表商谈改组国民党问题。

1月14日，滇桂联军进入广州，陈炯明逃往惠州。

1月21日，以总理名义任命中国国民党各部部长，23日，又任命廖仲恺等二十一人为参议。其中均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

1月26日，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

是日，驻广州的滇军将领沈鸿英图谋不轨，孙中山原订于27日启程赴广州，闻沈鸿英事后推迟行期。

1月31日，覆函刘震寰，命其进剿沈鸿英。
2月3日，设大本营于江门办事处，以便组织力量讨伐沈鸿英。
2月15日，离上海赴广州，到达香港时受到全市人民规模空前的欢迎。
2月21日，从香港抵广州，在东郊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职。
3月1日，正式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4月3日，迁大元帅府于河南士敏土厂。
4月16日，沈鸿英叛变，孙中山亲自督师，抵御沈军。
5月8日，沈鸿英部退出韶关，平定沈鸿英叛乱。同时，陈炯明旧部杨坤如、翁式亮等在东江地区叛变。
7月18日，梧州沈鸿英部守军投降。
8月1日，豫军樊钟秀部从大庾（今江西大余）来降。
8月16日，派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
8月，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聘其为国民党特别顾问。
9月11日，东江前线连续获胜，克平山。
9月23日，总攻惠州，未克。
10月7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揭露曹锟贿选总统。
10月19日，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请李大钊赴上海商讨改组国民党事宜。
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讨论改组的必要性和计划。
11月12日，由石滩返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改编滇军，增调援兵，抵御陈炯明叛军。
同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11月19日，陈炯明分四路猛攻广州，豫军樊钟秀部突至，攻击叛军，广州防卫战获得胜利，叛军自20日起撤退。
11月29日，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人上书反对改组国民党。
12月3日，孙中山宣布将收回广州关税，北京外交使团致电广州政府表示反对。同时，外国军舰二十余艘驶进黄埔，对广州政府进行恫吓。
12月5日，命外交部覆电北京外交团，指出中国海关是中国国家海关，广州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收回自己领土上的关税权，与外国人无关，北京的伪政府亦无权收受两广关税。
12月7日，接见《字林西报》的记者，表示决心截留两广关税，不怕外国人的威胁。
12月8日，在大元帅府召开会议，决定积极筹备北伐。
12月9日，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在上海举行第十次会议，讨论有关改组问题。
12月21日，命令海关税务司，将提留的海关税妥为保管，供政府使用。
年底，李大钊到达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事宜。

1924年（民国十三年） 五十八岁

1月4日，在大本营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建国政府，出师北伐。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到会代表一百五十六人，其中有共产党人毛泽东等，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1月22日，代表大会提出党章草案交付审查。

大会授权主席团指定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十九人为审查委员。

1月23日，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1月25日，获悉列宁逝世，大会休会三天以示哀悼。

1月28日，国民党右派人士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经过辩论，同意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

1月30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最后，孙中山致闭幕词。

2月6日，设立黄埔军校筹备处于广州南堤。

2月23日，蒋介石申请辞去黄埔军校筹备处负责人职，孙中山在其辞职书上批示不同意。

2月29日，沈鸿英被迫投降。

4月6日，下令滇、粤、湘、桂各军分三路总攻惠州，未克。

5月2日，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

6月13日，任命廖仲恺为广东省省长。

8月9日，命令黄埔军校当局，派军舰查缉商团走私的枪 8月13日，商团不顾政府的警告，公然举行联防总部成立的活动。

8月18日，商团总长陈廉伯煽动银行业罢市，拒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

8月20日，命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

8月24日，调兵入省并宣布戒严，以对付商团的叛乱

8月25日，商团罢市。

8月28日，英国军舰开进白鹅潭，将炮口对准中国军舰，威胁中国军舰。

8月30日，汪精卫、伍朝枢等坚持商团事件和平解决，并让范石生等人出面调停。

9月3日，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讨论北伐问题。

9月4日，江浙战争爆发，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滇、粤军抽调一部随行。将大本营移到韶关，广州设留守府，派胡汉民代大元帅兼广东省长，以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

9月14日，广东商团阴谋举行第二次罢市。

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

9月20日，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9月22日，下令北伐军一律改为建国军。

10月3日，胡汉民受任广东省长职，立即发还广东商团枪械。

10月10日，广东各界举行大会，纪念武昌起义，广东商团悍然对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是为“双十惨案”。

10月12日，广州商团继续举行罢市，孙中山致电蒋介石，令其坚决镇压商团的叛乱。

10月13日，商团在沙面集会，阴谋扩大叛乱。

10月15日，商团首先向政府开枪，桂、湘、豫、粤军等分五路包围西关，令商团缴械。数小时战斗后，商团叛乱被平定。

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成功后，举行政治军事会议，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

11月2日，孙中山决定北上。命胡汉民留守。

11月3日，到黄埔军校辞别，并发表讲话论述北上的目的。

11月4日，分别覆电冯玉祥、张作霖，告诉他们安排好军事之后，即可北上。

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

11月13日，借宋庆龄乘永丰舰北上。

11月17日，到上海，受到上海群众数万人的欢迎。

11月19日，在上海寓所发表讲话，指出这次北上，是去同全国人民谋求和平统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

11月21日，乘“上海丸”号轮船取道日本转赴天津。

11月30日，从日本神户乘“北岭丸”赴天津。

12月4日，到天津，受到天津群众两万余人的热烈欢迎。

12月5日，带病在卧室内同来访的张作霖、卢永祥等会晤。

12月18日，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等。是日，肝病加剧。

12月28日，由于北京各团体纷纷派代表到天津请求入京，决定赴北京。

12月31日，带病由天津入北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十万人的欢迎，在北京车站发表书面讲话，声明此次自己来北京不是来争地位的，而是来做救国的大事的。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五十九岁

1月1日，因肝病加重，请西医医治。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1月4日，继续请西医医治，并在病榻上考虑对付“善后会议”事。

1月7日，陈炯明再次阴谋进犯广州。

3月11日，在遗嘱上签字，遗嘱中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致苏联遗书一份，其中表明了他把三大政策实行到底的决心。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